

毛澤東全傳

4

新訂本

MAO ZE DONG QUAN ZHUAN

文

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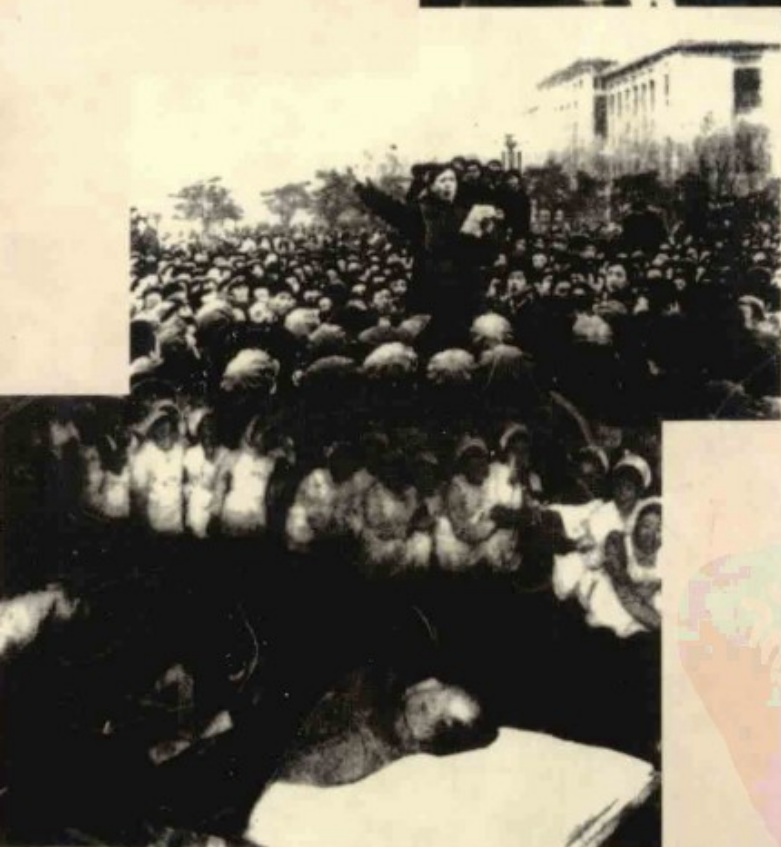
悲

屈

辛子陵 著



忠天出版社



《毛泽东全传》的重大特点，除了对毛一生的完整描述外，尚在于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作者在本书中引用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中共秘密档案，其丰富、可靠程度是海内外其它著述所难以企及的。对于中共党史、毛泽东生平里的疑案，据此便可作澄清与解答。

ISBN 7-80099-693-X



9 787800 996931 >

ISBN 7-80099-693-X/Z·108

定价：128.00元（全套）

辛子陵著

文革悲剧

中天出版



图书在编(CIP)数据

毛泽东全传 卷四:文革悲剧/辛子陵主编. - 呼和浩特:中天文化出版社,2004.9

ISBN 962-7766-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8475 号

毛泽东全传

中天文化出版社发行

北京普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7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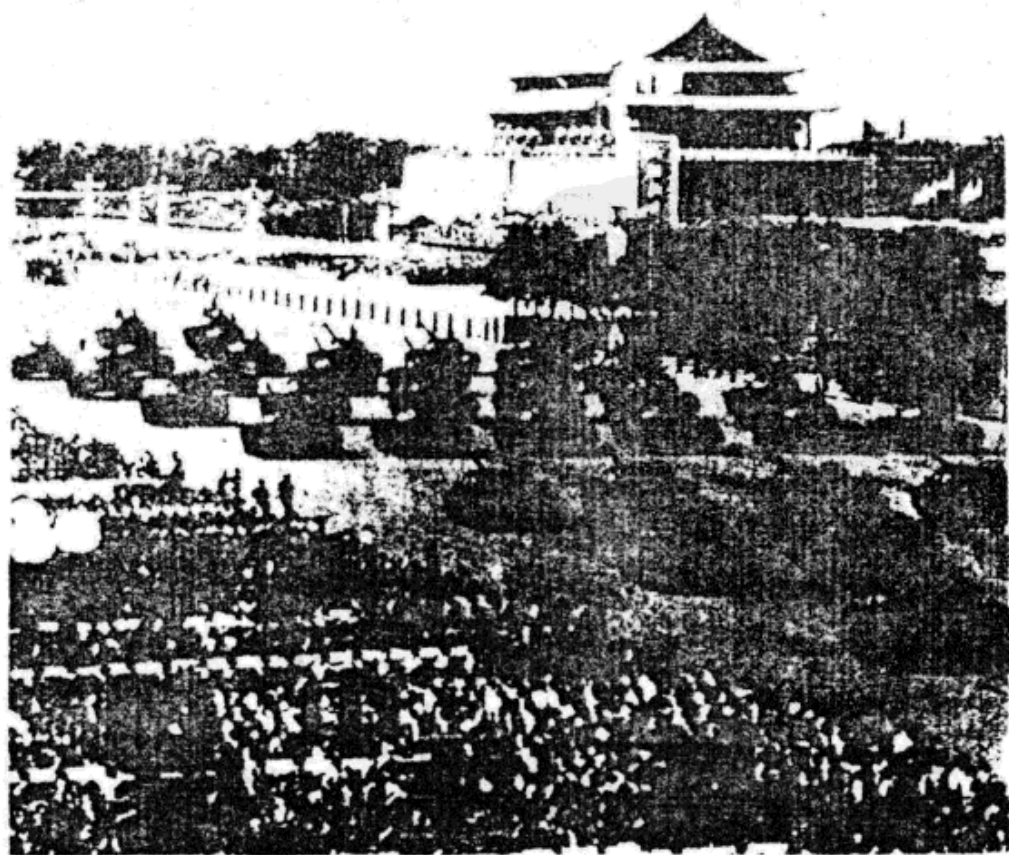
ISBN 962-7766-11-9 定价:128 元(全集)

文革悲劇



1959年10月1日、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左二）來華出席建國10周年慶典，共產世界兩雄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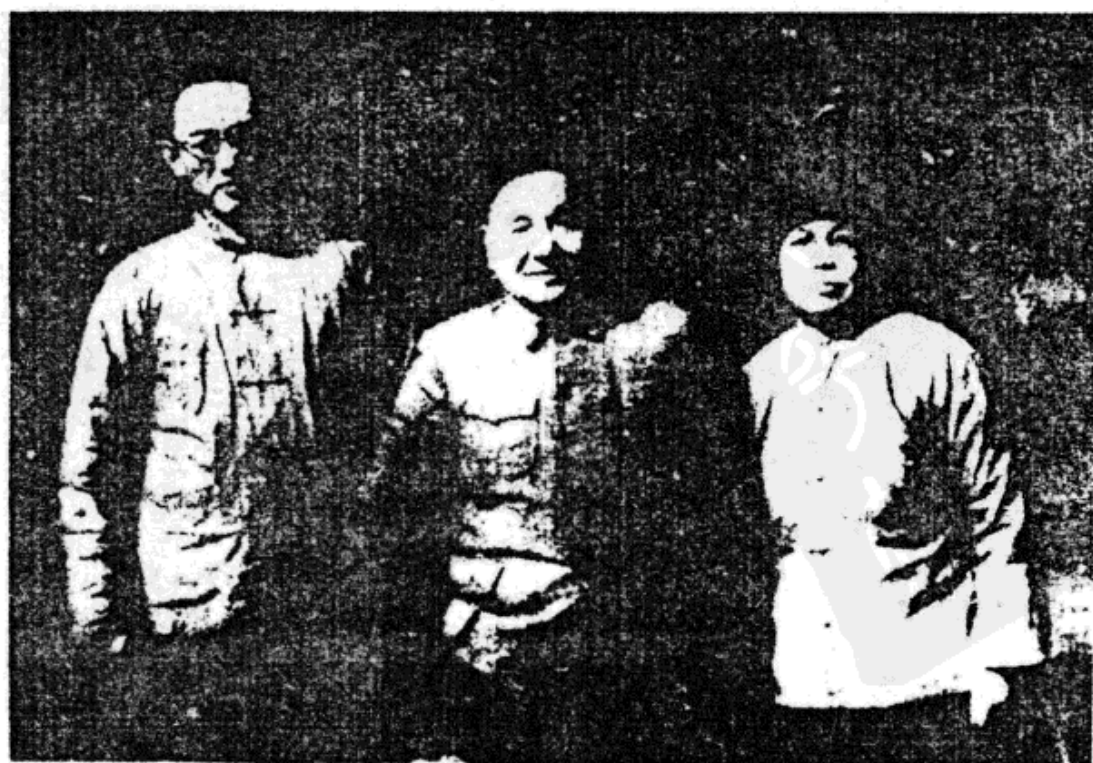
在天安門前接受檢閱的
中共坦克部隊



文革悲劇



1966年11月8日，聶元梓帖出大字報攻擊鄧小平。



鄧小平(中)落難江西時與妻卓琳、秘書王瑞林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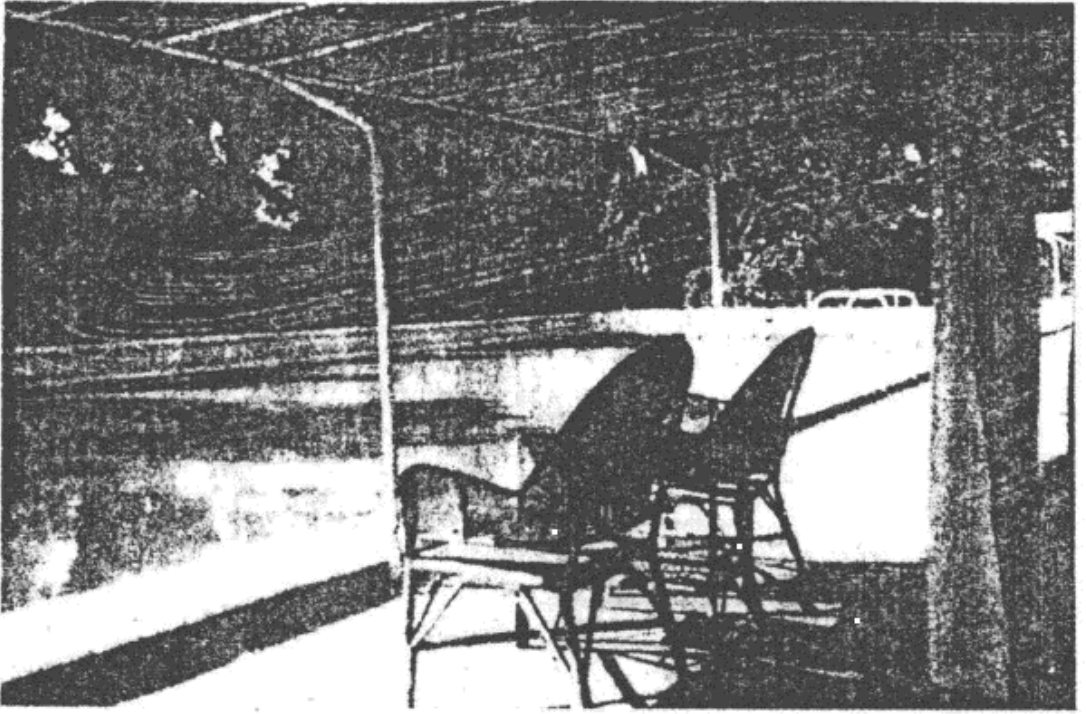
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



劉少奇被打倒，全國進行大批鬥。



1969年11月12日，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含冤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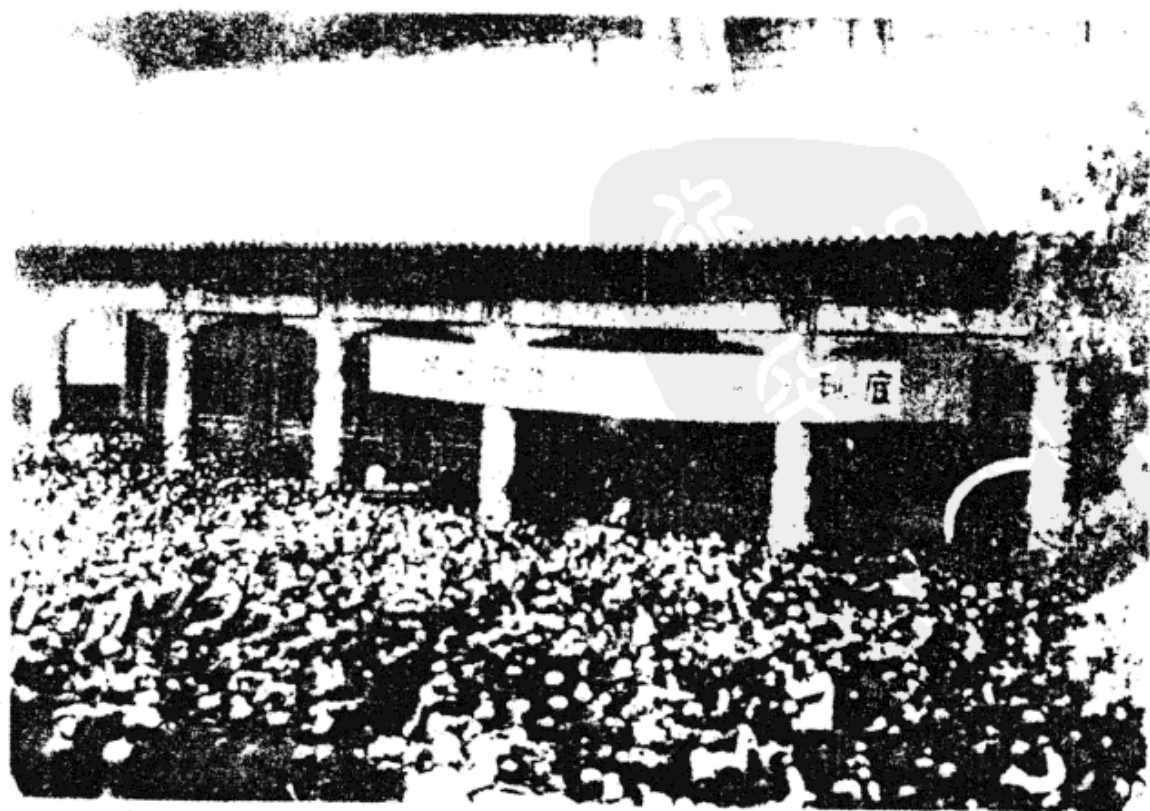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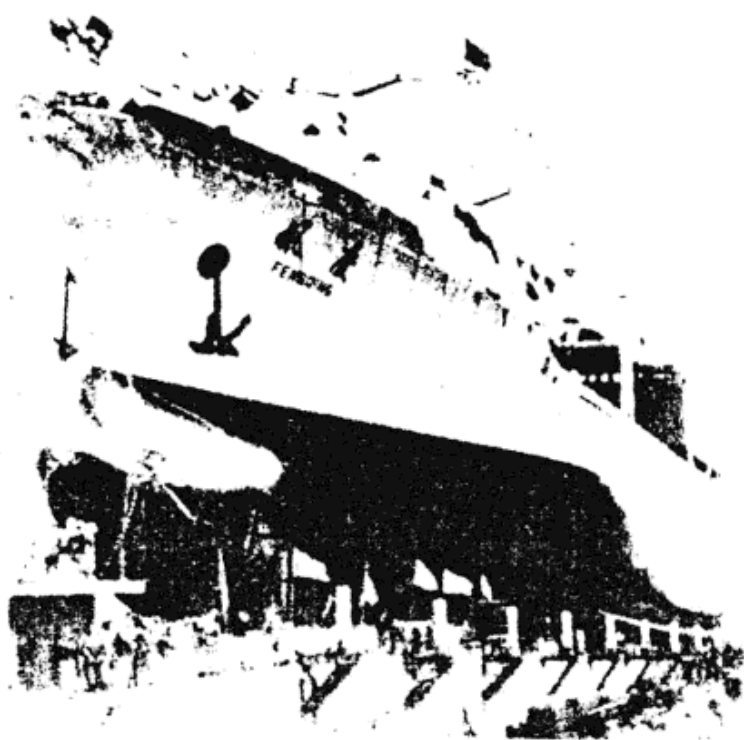
毛澤東晚年住地：中南海游泳池。



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在此之前他曾一度休克。

文革悲劇

“四人幫”曾借以攻擊
周恩來、鄧小平媚外的
風慶輪。



山東曲阜廟內舉行的“批林批孔”現場會

文革悲劇



王洪文



姚文元



江青和張春橋。他們與王洪文、姚文元組成“四人幫”。

目 录

- 91 部长忠心 一次犯颜再次犯颜 (1)
主席武断 说有高潮就有高潮
- 92 全包统管 个体户吃大锅饭 (18)
敲锣打鼓 资本家过共产关
- 93 集思广议 建国大政定方略 (37)
天马行空 跃进高潮卷狂澜
- 94 帮党整风 知识界忠言逆耳 (62)
引蛇出洞 毛泽东翻脸无情
- 95 共产会盟 尼基塔手执牛耳 (78)
坐而论道 毛泽东口若悬河
- 96 违心检讨 周恩来治国难两全 (93)
阶级斗争 毛泽东牧民有奇术
- 97 南巡千里 化日光天说假话 (110)
鹤鸣一声 忠朋忧国吐真言
- 98 劳民伤财 九千万人炼钢铁 (124)
忍饥挨饿 五亿农民进食堂
- 99 倡导读书 领袖纠左定基调 (142)
探求真象 元帅微服访故乡
- 100 炮打金门 解放军得心应手 (158)
乱起边陲 奴隶主出奔流亡

· 目 录 ·

-
-
- 101 大地呻吟 万民诅咒大跃进 (174)
庐山诗兴 百官唱和小神仙
- 102 子珍上山 幽怨满腔话往事 (191)
信阳绝粮 哀鸿遍野望中州
- 103 元帅上书 为党为民为社稷 (207)
重臣议政 见仁见智见灵魂
- 104 疾风劲草 论平衡而谈民主 (226)
文过拒谏 君为贵兮民为轻
- 105 林彪出台 左噪一声定基调 (245)
润之理短 宣讲七发作高深
- 106 忍辱蒙羞 彭德怀违心检讨 (259)
助毛为虐 刘少奇当众失言
- 107 血口喷人 草包飞升当司令 (274)
功高震主 元帅息影挂甲屯
- 108 撤退专家 赫氏制华加压力 (288)
转移视线 毛公反修逞英豪
- 109 十年总结 羞答答泽东忍错 (306)
八字方针 乱纷纷恩来回天
- 110 千夫所指 三面红旗皆褪色 (323)
迷途知返 八大路丝指航程
- 111 中枢分裂 泽东另立司令部 (343)
后党崛起 江青秘下上海滩
- 112 罗织罪名 彭罗陆杨下冤狱 (361)
张为幻 康陈张上舞台
- 113 口蜜腹剑 彭德怀入川上当 (376)
心毒手照 戚本禹小丑跳梁

- 114 囚贺防周 满城风雨说兵变 (393)
掀王倒陶 后党权势欲盖天
- 115 冒死谏言 谭震林大骂武则天 (411)
朕即文革 毛泽东图穷匕首见
- 116 制造伪证 看后党天良丧尽 (426)
元首屈死 叹法制荡然无存
- 117 宣讲天才 老夫子庐山失宠 (443)
谋杀领袖 副统帅折戟沉沙
- 118 紫气东来 毛泽东会晤尼克松 (464)
慎终虑远 周恩来扶持邓小平
- 119 评儒论法 批孔子暗批周公 (484)
治理整顿 为百姓不为君王
- 120 天怒人怨 四人帮难承 (501)
机关算尽 毛泽东撒手尘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毛泽东全传 卷四：文革悲剧

作者=辛子陵主编

页数=530

SS号=12798256

出版日期=2004.09

出版社=中天文化出版社

原书定价=128.00 (全套)

参考文献格式=辛子陵主编.毛泽东全传 卷4 文革悲剧.中天文化出版社,2004.09.

91 部长忠心 一次犯颜再次犯颜 主席武断 说有高潮就有高潮

一九五五年三月上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汇报工作。毛泽东肯定了他离京期间刘少奇、周恩来为缓解农村的紧张形势所发出的文件和所采取的措施。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当场共同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迟解放的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四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有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等参加的汇报会,确定‘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达成的共识是:‘合作社已发展到了六十七万个。其中过多的省份有超过二三万社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在五月十日、十七日省、市季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停、缩、发’的方针。

于是,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在全国展开。

当时,浙江省农业社发最快,有比较严重的强迫命令和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自然成为整顿的重点省份。

中共上海局二月九日的报告说: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中旬,浙江省合作社已从去秋的两千零一十六个发展到四万一千八百八十三个,扩大了二十倍。由于摊子大,问题很多,必须踏步一个

时期,以便集中力量做好巩固和整顿工作。但上面掀起的‘左’风正烈,竟至煞不住车,发展到了五万主干多个社,并且‘还有近万数的自发社’,入社农户接近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少数地区的合作社竟比去年增加了五十倍。许多地区为了办社,干部宣布入了社少派征购任务,不入社要多派;有的为了土地;联成片,强制调换单干农民的土地;甚至在动员会上有的干部说:‘入社是走毛泽东的道路,不入社是走蒋介石的道路。’有的农民感到不入社政治上没有出路,只好勉强入社。说:‘合作社就是死路一条,我也要入了。’(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副处长袁成隆在浙江调查后写给谭震林的信)

三月二十四日,谭震林、邓子恢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浙江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根据毛泽东既定的对浙江农业社要收缩的精神,共同拟了一个中央农村工作部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的电报,稿子拟好后由陈伯达送毛泽东看过,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电报建议‘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仍承认是很大的收获’。浙江省委常委在霍士廉主持下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来电进行了研究,一致表示同意,并召集地、县、区、乡四级干部会议做了部署。经一个多月的工作,全省共收缩了一万五千个确实不具备条件的社,巩固下来了四万个。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子恢。提出:‘全国合作化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个五年计划完成三分之一,十五年在全国完成合作化。’邓子恢听后说:‘中央批准的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规划,在一九五七年组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毛泽东又改了中央批准的控制数字,坚持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三分之一,不要百分之五十了。这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七日,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上,邓子恢传达了毛

泽东的上述指示,在五月六日的总结中分析了农村出现紧张形势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他说:

(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私商改造)这三种都是造成紧张的带根本性的因素,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当然应该承认,合作化是最根本的。……在去年十二月以前,那时我也感到粮食问题压到我们身上,但是去年十二月以后,今年一月以来,我越看越感到合作化是主要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人回家的,没有合作化的那些地方牲口都很好,没有什么乱子,那些地方也有统购统销,就是没有合作化,一个合作社也没有,所以那些地方有牲口的就不那样恐慌,这是很明确的。当然、牲口大批的杀卖也与粮食统购统销有关,不是没有关,但合作化是最根本的。

邓子恢强调反冒进,指出‘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此较多一点的是少数的省份……比如浙江、山东、河北、安徽’。‘但是我感觉干部中的冒进情绪是带普遍性的。这种冒进情绪如果不讲清楚,如果不克服,它将来还要冒进,今天不冒进,明天冒进。今年不冒进,明年冒进’。冒进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的小生产的本质认识不足。……有些地方农民觉悟是有高涨,比如社办得好的地方,老杜有基础,互助组有基础,互助组办得比较多,比较好,社会主义旗帜在那个地方有个榜样,那个地方农民的觉悟当然就有高涨了,这个不可否认。但是你说那样的普遍高涨,普遍的高潮,没有看到不平衡,这样看也是不对的,这只看到了他的表面,没有看到他的本质;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他的内心。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从本质上看,就是不看究竟

办好了多少社，互助组究竟办得怎样，合作社办得怎样，已经有多少合作社摆在那里，不是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光看他的表面：高高兴兴，双手举起来，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你就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这样看会使我们犯错误的，就助长了干部的冒进情绪。

第二个原因，对合作化是改变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深刻的阶级斗争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对合作社办好，对增产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真正使合作社增产，那是很费劲的，那除非天老爷保佑它。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增产了，那就不是唯物论。要把合作社办好，真正增产，内部团结好，样样上轨道，样样制度化，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对今后的方针政策，邓子恢宣布了四条：（一）要求一般停止发展。原来我们今年秋天停止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二）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老社十万个，新社五十几个都要巩固。

（三）少数的省是要适当的收缩。丢掉一些包袱，不是消极的退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更好地巩固。

（四）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个体农民，造就是为了搞好生产，为了将来合作社的再发展。

毛泽东出巡到了上海，见了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共高层干部中承欢媚上之徒，柯庆施是个代表人物。他摸清了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实现全国合作化的心理，对毛泽东说：‘党内有百分之三十的高中级干部和基层干部反映中农的情绪。不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影响了毛泽东，改变了毛泽东十五年实现全国合作化的比较稳健的规划，毛泽东认为农民是听他

的话的,主要是干部作梗。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毛泽东回北京参加‘五一’纪念活动。五月五日晚,在颐年堂召见邓子恢,提出:‘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邓子恢没有跟上思想急剧变化的毛泽东。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对他的‘停、缩、发三字经重新作了解释,主要强调‘发’。说‘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

六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批准了一九五六年在现有六十五万个社的基础上发展到一百万个的计划。因毛泽东出外巡视,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刘少奇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六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又找邓子恢谈合作化问题,他认为政治局会议定的到明年春天发展到一百万个太消极,提出要翻一番,六十五万翻一番就是一百三十万个。邓子恢建议还是一百万个,不要变动了。讲了六条理由:(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任务相当繁重,要打好基础;(三)地区之间群众的觉悟水平不同;(四)干部的领导经验尚待积累;(五)会计的培养训练颇费事;(六)苏联和匈牙利农业合作化过急的教训应

加以注意。

谈话间与毛泽东发生争论。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刘建勋，并要谭震林也参加，一见面毛泽东就重申自己翻一番的意见，批评邓子恢，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不悦，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信说：‘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毛要的是第三次全国农村会议的文件，据以作靶子，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用重炮轰邓子恢。这件事情，是对邓子恢，也是对刘少奇。发展一百万个社是刘少奇于六月十四日政治局会议上定的，毛要邓子恢加码到一百三十万个，邓不同意，毛认为不仅是三十万个社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左右政治局的问题，是邓子恢跟刘不跟毛的问题，是谁代表中央的问题。毛泽东超越于政治局之上的最高权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他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通观毛泽东这篇演说，高屋建瓴，头头是道，把个邓子恢和主张稳步发展合作社的干部，批的抬不起头来。从形式逻辑来

看,毛泽东的推理是严密的,环环相扣,无懈可击。但这一番大议论的前提是农民到底有没有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这是通篇立论的基础。毛泽东说有,很大,而且是高潮,这种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邓子恢认为:‘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认为这种不同的认识,‘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和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是以救世主的慈悲心肠认识问题的。他充满感情地说:‘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作为贫苦农民的救星毛泽东,第一步领导农民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分给了贫苦农民。贫苦农民中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经过三四年的劳动发家,上升到了中农的地位;还有些没有升上来。或由于孩子多劳力少,或由于主要劳力有病和死亡,或由于不会经营,或由于好吃懒做等等,总之,还有一些困难户。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关心这些困难户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是政府拿出钱来救济这些人,但毛泽东领导下的政府百废待兴,拿不出钱来。再一个办法就是富帮穷,具体办法就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政府不要拿出钱来,把农民组织在一起解决了富帮穷的问题,而且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穷的变富,富的更富,政府从农民手里拿到了更多的钱去发展工业,那

该是多么样的好，多么样的妙呢！

毛泽东要防止两极分化，要富帮穷，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科学领域是落后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土改后的小农经济，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没有？远远没有。其人格化的表现就是那些跟着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的贫苦农民们，好日产还没有开始，或者是好日子还没有过够，他们一脑子发家致富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逼着入了合作社。组织合作社，改变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这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物质条件’呢？没有。只是把中农（包括原来是贫雇农的新中农和老中农）的骡马牛归到社里来共同使用，所以激出了一个出卖和宰杀耕畜的高潮。刘少奇坚持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就是要创造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毛泽东要把事情颠倒过来，坚持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所以他坚持办起来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年年整顿，整顿了几十年没有整顿好，直至他死后全部垮台，回到包产到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抗拒的规律。

所谓贫富‘两极分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恩格斯说：‘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反杜林论》哲学编第十三）把不平等当作绝对的坏事，一辈子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自己就陷入了形而上学。‘野蛮人和

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恩格斯：《流亡者·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和半野蛮人的‘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另一种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德家的义愤填膺的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条件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办法是毛泽东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所采取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的办法。

中共在反思历史的时候，企图以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为界，在这以前的合作化是正确的，在这以后的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其实，公社化高潮是合作化高潮的必然的历史发展，在合作化时期对生产力的破坏虽已相当严重，但还没有推向极端，直到公社化、大跃进使生产力遭受了大破坏，从根本上危及中共和毛泽东的政权的时候，才不得不退回来。当时，刘少奇主张‘农业上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坚决反对，折衷的办法是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

队为经济核算的基础。实际上,保留公社名义,是为毛泽东保留面子,队为基础就是退回初级阶段。遇到这一步,并没有使中共在农业上摆脱困境。二十多年来,许多农民付出了温饱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年年‘丰收’的虚假数字,维持着所谓‘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一九七八年底,全国还有上亿农民终年不得温饱,多数农民缺吃少穿,某些农村的贫困落后竟不亚于解放前。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来,在实际政策上摒弃了合作化那一套,‘农业退够’回到了‘包产到户’;但理论上只退到了一九五八年,还在宣扬合作化的正确性,这种理论和政策的矛盾就为否定现行政策(包产到户)留下了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在中共党内极左思潮有时潜流有时汹涌的当代,中共领导人如何接自己立于懈可击的地位,请慎思之。

让我们仍然回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在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各省市自治区,闻风而动,开展了批判‘小脚女人’的反右倾斗争。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到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扩大)全会。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等在会上发了言。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作总结,又有惊人之论,他说:

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

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他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从毛泽东这一番议论来看,他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生产,都是作为纯政治概念来看待的,而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些东西同时还是个经济概念,是个生产方式的概念。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首先是把帝国主义看作一个经济概念,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等在会上发了言。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作总结,又有惊人之论,他说:

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他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从毛泽东这一番议论来看,他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生产,都是作为纯政治概念来看待的,而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些东西同时还是个经济概念,是个生产方式的概念。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首先是把帝国主义看作一个经济概念,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最高阶段,作为这种生产方式的集中表现才是帝国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既把这些东西看作是纯政治概念,他消灭这些东西的办法也是政治手段,即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运用政权的力量,发动和领导群从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作为代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如果不是用经济手段,即创造

更高的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来消灭和代替它们,而用政治手段——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消灭他们,那必然会流于荒谬。但毛泽东竟认为只要不是‘太仁慈’。只要‘良心少一点’就可以办到,这里确实表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惊人无知。他的鲁莽灭裂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计划,最后弄得一塌糊涂、一片混乱,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在总结中心里有些不踏实,自问自答地说:‘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他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坚决执行他的路线。‘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如果老是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这里‘改换工作’是撤职罢官的客气说法。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小脚女人’,各级干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本来毛泽东给共产党的干部订了一条规矩: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相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从开展合作化运动以来,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不一致的情况,甚至绝然对立的情况,愈来愈多。你要坚持对人民群众负责,就要准备当‘小脚女人’,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就要准备撤职丢官。你要跟上中央的精神,跟上毛泽东的路线,就要昧着良心说瞎话,报假情况,对群众,对下级,强迫命令,不择手段,按上边要求的数字,完成发展指标。各级干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抉择之后,决心只能顾一头,顾上头。由于各级干部的努力,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先后掀起

了‘高潮’。一九五五年十月，山西、浙江、广西、四川、广东五个省委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这些报告唱一个基调，大讲本地区的所谓‘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空前高涨’。

毛泽东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促退部’，下令各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电报，直接送给他处理，他通过写批语，树‘先进’的办法，选择一些报告转发全党，无形中造成了各省在做法上和指标上互相攀比的形势？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批发安徽省委的报告时写道：‘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安徽省委承认本地区有‘小脚女人’，有‘改组派’，也有大脚。各省看了安徽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都要我自己本地区的‘小脚女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在这种气氛下，各省不断加码，悄悄修改自己的指标，以免成为落后的典型。所以，实际运动的发展，又比各省报的发展规划快得多。到一九五五年底，全国已建农业合作社一百九十四万四千多个，其中还办了一万七千多个土地、牲畜全部归公的高级社，入社农户达七千五百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

到一九五六年五月底，全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了一亿一千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一一点二。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了七千四百七十二万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九。

于是，奇迹出现了：原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由个体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在短短四年时间就宣告完成了。呼风唤雨，造成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不是所谓广大农民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而是一九五五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三个会议就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毛泽东主持并作结论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选编和撰写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选了一百七十六篇材料，九十多万字，发行一百五十二万册（当然是公家印，公家买）。

毛泽东作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就是声明，他说‘高潮’来了，是有根据的，是唯物论，不是胡思乱想的。这就增加了他的结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但他这一次调查研究，和井冈山时代对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研究，有根本的不同。那时他像个穷教书先生一样，亲自深入到农民家庭中去，农民和他没有一点隔阂，无拘无束地谈自己的境况，毛泽东口问手写，整理成篇。这些成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发动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的最可靠的理论基础。现在不同了。他是国家元首，是主席。在农民心目中，主席和总统、皇帝是一个概念。而毛泽东又给农民分了土地，使他们得到了翻身解放，因此毛泽东在广大贫苦农民心目中又是大救星，有一种半人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他一出现在群众中，就是山呼海啸的一片‘万岁’声，他再也无法接近群众，无法接近农民了。有时他要‘抗议’，一定要见群众，也能见到。但那是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陪同下，在从中央公安部到省公安厅到县公安局的秘密保卫下，见什么人，在哪里见，被召见的人要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在事先导演排练好了。毛泽东

很难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很难知道农民的真正的忧虑和渴望。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一切领袖人物的悲剧。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国家领导人下去视察是很难看到真实情况的。所以古代的有作为的皇帝讲究‘私访’,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照片,群众不知道皇帝长的什么样,‘真龙天子’青衣小帽出现在市廛酒肆之间,很能看到和听到一些真实的民间疾苦。毛泽东既无法真正向农民作第一手的调查,就只能依靠各省送上来的报告。在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情况下,各省要摸准毛泽东的意向,才敢往北京送材料。于是省委对地委,地委对县委,县委对区委,区委找到乡支部,一级对一级,对观点和材料的导向是非常明确的。既然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了实话;碰了那样大的钉子,当了‘小脚女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谁还敢再讲实话呢?于是,从各种角度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合作社比单干确实具有增产的‘优越性’的典型材料,经各级文章圣手的层层修改,层层把关,层层提炼,层层加工,最后送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他据以判断,‘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些东西。

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第二篇序言中说: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

万户,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引者按:毛泽东这一番话又促使各省在合作化道路上狂跑,前面谈到,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就实现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由于毛泽东在《高潮》一书中对北京郊区白盆窑农业社由互助组直接升入高级社加以肯定,各地立即掀起了‘一步登天’办高级社的高潮;由于毛泽东肯定了慈谿县歧山乡办大社的做法,一乡一社、几乡一社的大社也多了起来。总之这种‘左’的狂潮是上下互相推动的,当然原动力还是在毛泽东那里)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就在毛泽东期望农业合作化带来生产大发展的时候,‘不识时务’的忠臣邓子恢又给毛泽东送去了坏消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邓子恢在一份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上说:‘最近在电话中与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八个省委农村工作部作了联系……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了社员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百分之一,多的达百分之五;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点。浙江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百分之五,想退社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七万余

户,占社员户数百分之一,并已有二百零二个社垮了台。辽宁省今年是丰收的,也发生社员退社的现象。’退社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是因为减少收入而引起的。各省一般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社员减少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有技术的手工工人等,积极想出去单干;减少收入不多的户,情绪也有些动摇。’

接着河南省委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临汝县汝河南原十区一带,曾经一度发生所谓‘闹社’问题。其规模涉及到十三个乡,六十七个自然村,三十五个合作社,八十四个生产队,共包括三万人口的地区。……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民代表,个别社抢分公粮,最后闹分社、退社。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又接到广东省委的报告:‘据最近到省人民委员会请求退社较严重的中山县南头区调查统计,全区增收的户五千一百六十四户,占百分之五十四;保产保收的二千四百三十户,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减收户一千七百六十七户,占百分之二十点四。在减收的农户中,多数是上中农。如中山永宁洪水村一户老中农邓丙业,入社前每年纯收入一千七百五十元,入社后只得六百元;九州基老中农刘旺兴,入社前纯收六百五十元,入社后只得一百八十元。上中农认为:合作社富养穷、强养弱,是大拉平。’

毛泽东认为这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一番严重的阶级较量是不行的。他要打退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

92 全包统管 个体户吃大锅饭 敲锣打鼓 资本家过共产关

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高潮’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手工业建社速度明显加快了。据统计,一九五五年六月到十二月半年内,全国手工合作组织从四万九千八百多个增加到六万四千六百多个。社(组)员从一百四十三万九千多人发展到二百二十万六千多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反右倾’的影响下,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于十二月九月召开全国手工业座谈会,检查所谓‘现总路线不相适应的保守思想’,提出了‘加快发展,迎接高潮’的政治任务。接着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

由中央手工业管理局领导召开的这次会议确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上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并且要注意发展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积极推动低级形式的合作组织向高级的生产合作社过渡’。‘会议检查和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保守落后思想后,着重研究了今后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要求各地订出全省、全专区、全县和全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手工业领导机构……进行全行业分期、分批、分片的改造,积极发展,积极过渡。’

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批转这次会议拟定的全面规划。认为：‘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总的要求是：一九五六年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到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九五七年达到百分之九十，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全部组织起来。

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毛泽东批评加表扬，又给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增加了新的推动力。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到年底，达到手工业者的百分之九十二，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九万九千一百个，社员达到五百零九万一千多人，至此，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

手工业合作社的特点是：集中管理，统一核算。据当时统计，石家庄市将八十八个小社合并为三十一个大社，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社社员达到了一千四百余人。广东省有的综合社包括十四个行业，有的跨地的社纵横达六十华里。四川省眉山县五金社把十三个乡的铁匠炉、制秤的、修自行车的、修理钟表的多种行业的从业人员包容在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管理，发一次工资财务人员要骑上自行车跑七天。上海修理自行车的原有一千八百零八个服务点，改造高潮一开始，就撤并了四百五十个。沈阳市北市区原有一百零三户裁缝师傅，就近居民服务，改造中合并成一个缝纫合作社，只设十个门市部。与此同时，走乡村修锅补盆焊洋铁壶的小炉匠，修理雨伞的，理发的，磨剪子磨刀的，修

鞋的等等,全没有了。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化’出了三个结果:

第一,国家背了一个大包袱。大约有五百一十万个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每月由国家发给工资的工人。国家给了他们‘铁饭碗’,但这个‘铁饭碗’小得很,并不能保证他们丰衣足食,所以手工业者并不感激政府。

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个体裁缝铺做件衣服一个星期取活,就近服务,居民称便。成立了缝纫合作社,做件衣服要跑好远的路,一两个月也做不出来。老太太家里水壶漏了十里八里找不到焊的地方。群众啧有烦言。由于并社撤点,活收得少了,社的收入下降,社员的收入也跟着下降,从一九五六年八月份起,北京,天津、上海陆续发生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要求退社的现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承认:‘退社的主要原因,则是这些人参加合作社以后收入减少了。’同年十月二十日手工业管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合作化以后,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社员的收入,比入社前有所减少,合作组织的劳保福利也比较差,多数社员的疾病医疗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虽然毛泽东说:‘小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但改造的结果,原来的师徒关系破坏了,徒弟成了青年团员,领导改造师傅,师傅的一些规矩被当作陈规陋习给改掉了,师傅和徒弟拿一样的工资,这样谁还带徒弟传手艺呢?毛泽东许多话说得都是对的,但他的‘大政策’把他的‘不正确’否定了。自己左脚踩了自己的右脚。大跃进以后名牌刀剪还是没了。无锡的惠山泥人是世界知名的工艺品。有一个传统产品

‘阿福’，是一个笑呵呵的胖娃娃。改造以后，惠山的‘阿福’不乐了。不笑的娃娃没人买。青年工人很用心，但娃娃就是不乐。后来费了好大的劲，公方代表给老师傅做工作，给老师傅落实政策，改善待遇。老师傅把徒弟捏的娃娃接过来，用手轻轻托一下下巴，娃娃就乐了。你政策不对头，这一手他就不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当作一件大事亲自来抓。他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作了报告，对《决议》进行了讨论，作为草案通过；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成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

我们对于处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处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地主阶级，我们是在无偿地没收他们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之后。再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来为国家服务。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是属于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这三部分人大约占资产阶级队伍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三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退步的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处在中间状态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我们在这

方面的任务是：第一、要把其中更加进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分子组成为推动工商业资本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适当地扩大这种力量；第二、要把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方法逐步地争取过来，使他们中间的多数提高觉悟，有所进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减少下去；第三、分化那些顽固分子，使最顽固的分子孤立起来。

要把一切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期分批，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这种全面规划需要包括以下各项：（一）统筹安排各行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对于各行业的公私企业之间、私营企业之间、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要有适当地调节；同时，对于各行业的私营企业要加以必要的或大或小的改组。（二）建立各行业的专业公司（有的是一个行业的单一公司，有的也可以是几个行业的综合公司），以便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轨道组织起来。这种专业公司要担负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上的任务，也要担负改造资本家的政治教育上的任务。（三）准备由原来的按企业所得利润的一定比例分配给资本家利润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有分别地按资本定息的办法。这种定息的办法实际上是将企业交给国家的专业公司直接管理，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将大大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积极性。

小商业的改造，在乡村中一般地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在城市一般地可以在长时间内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的业务，这种代销经销的形式应该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开式。

应该使上述的两种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

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毛泽东邀集陈叔通为首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到勤政殿叙话。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的荣毅仁,天津的李烛尘,北京的乐松生等都出席了。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以及部分在京的中央委员。

从一九五五年年初以来,由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收购的产品已占全部私营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许多工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并且在方式上已由个别合营发展到了全行业合营。私营批发商业基本上都已合营,零售商业也出现了要求公私合营的‘高潮’。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说:

希望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要主动,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应该来反对,应该来主动参加。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这次接见以后,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举行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由主任委员陈叔通作《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厂商业各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提出:‘全国人民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把我们祖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繁荣富强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商业者当

前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一些思想上有怀疑和顾虑的人,要进行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使他们认清前进的道路。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必须展开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希望全体工商业者努力学习,不断地改变新思想,接受新思想,改变新生小活,接受新生活,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以后,首先在上海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上海轻工业中,有棉纺、毛纺、卷烟、搪瓷、面粉等八个行业整个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重工业的船舶、轧钢、机器、电器等十三个行业也开始进行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北京的面粉、电机、制药等九个行业带头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十二月上旬,仅据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和重庆等大城市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私营工业中有三十多个行业、二千多家工厂,私营零售商业中有十多个行业、三千多家商店,经政府批准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新年已过,春节来到。北京的闹市区忽然爆竹声连连不断,锣鼓铁镲不停,大小店铺张灯结彩,游行队伍鱼贯而来。原来这一天又有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户私营工商业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老板率领职工队伍,纷纷到市区政府报喜。这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景观。你要说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强迫中国的资本家这么干的,绝对不是;你要说是中国的资本家从内心愿意交出自己毕生甚至几代积累的资本来,那是天方夜谭。资本家的真实思想,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表示拥护总路线,接受改造,主动申请合营。他们平时出头露面,政治上有一定地位,与政府和靠拢,自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常州大成纺织公司董事长刘国

钩可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对于带头接受公私合营，他私下说‘先走一步既有利可图，又有位可得。’绝大多数是无可奈何，只好随大流走。天津的资本家说：‘一九四九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工商界‘上了贼船，跟着走，能有出路；逆着办，只有下水。’‘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还有极少数非常抵触，幻想‘变天’。无锡赉裕布厂董事长王尧臣说：‘美国已在日本训练精兵二百万，下半年出兵打下越南，然后进攻中国。’常州大成纺织厂老板闻亦友散布：‘上海朋友谈北京有三个人生病，毛泽东已去莫斯科治疗，刘少奇肺病沉重，朱德血压过高。’所以，敲锣打鼓只是一种假象，并不是事物的本质。但不管怎么说，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他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势，特定的社会潮流，让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产关’，这是他的本事。全国率先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北京城，一月十五日，二十多万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胜利大会。彭真市长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接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喜信。

市郊农民给毛主席的报喜信说：‘自从您发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我们郊区就掀起了一个空前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有入社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入社，所有的低级社都积极要求转变为高级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郊区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

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报喜信说：‘我们听到政府按行业批准所有申请入社的手工业者入社的消息，喜欢得跳了起来，互相道喜。在十一、十二日两天里，共有五万三千八百八十二人被批准入社，现在我们新老社员已有八、九万人了。’

私营工商业的代表、同仁堂药铺总经理乐松生宣读报喜信说：‘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于本月十日胜利地全部走上了公私合营，向着社会主义大大迈进了一步。’

最后，北京市市长彭真讲话说：‘我们庆祝郊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胜利。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胜利。庆祝手工业全部合作的胜利。庆祝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国家富强、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一月二十一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大会宣告：‘上海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今天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全市的手工业，今天已经合作化了；上海郊区农业，今天已经转为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了；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北京、上海一带：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报喜，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以前，全面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毛泽东谈笑之间就办成了。其政治魄力和魅力确实令人叹服！

从政沿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没有流血，没有剥夺，实行‘赎买’政策，让资本家敲着锣打着鼓过‘共产关’。中共对此一直引为骄傲，在当时也确有值得骄傲的理由。

但是，从经济上讲，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讲，从创造物质文明推进社会进步来讲，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

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一个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错误,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正确的发展路线。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说: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说:

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

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搞十五年。如果按照这个路线发展下去,十五年不够再加十五年,中间不搞‘三大改造’,不搞‘大跃进’,不搞‘文化大革命’,也许中国的经济早就腾飞了。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由‘三大改造’以后‘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退’回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路线的自然接续,是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的继承,但不再是十五年,可能是上百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实行十年有余,其明效大验已为全国所信服,并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的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极‘左’思想留下阵地和市场。

为什么说‘三大改造’是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发端呢？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引者注：指变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为社会共同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毛泽东在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三大改造’的时候，具备了恩格斯所说的实现这种改造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没有呢？没有。有的仅仅是‘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相矛盾’的义愤，还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所谓‘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当然，有这两样，改造个把资产阶级是绰绰有余了。资本

主义不仅代表剥削和压迫,不仅有罪恶、丑行和血泪,而且代表现代的物质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为了免除为资本主义辩护之嫌,让我们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有关评论吧: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揭露和批判的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除了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民的剥夺、奴役、剥削和压迫之外,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和屠杀尤其令人发指。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殖民主义者带着它的常备军和现代的枪炮,征服和屠杀土著民族,占领殖民地。在美洲大陆,资产阶级甚至在立法会议上规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或俘虏一名印第安人,赏给四十个英镑。大批的印第安人被他们斩尽杀绝。资产阶级还在殖民地进行欺骗性贸易,用玻璃球、小镜子等廉价小商品换取非洲人的象牙、黄金和钻石,换取印尼人的丁香、胡椒和豆蔻。运回到欧洲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殖民主义者还抢掠非洲黑人,贩运到关塔当奴隶,奴隶贸易延续了三百六十多年,成千上万的黑奴死亡,使非洲损失了一亿以上的人口。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

范围,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还进行过多次战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还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几千万人口丧生,使军火贸易兴隆发达,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如此等等,罄竹难书。

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有千条罪恶,万条罪恶,应该被推翻一百次,但是它有《共产党宣言》中所说那一条好处——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高得多的生产力,你就推不翻它;除非你创造了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生产力。

毛泽东发出豪言:要让资本主义绝种,要让小生产绝种。其志虽然可嘉,但事实上办不到。他可以组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人,可以运用其中的政权剥夺资本家和小生产者,可以在他有生之年连年不断地批判资本主义,但他拿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来,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就绝不了种。任何伟大人物在经济规律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顺应不能违抗。就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要闹出大笑话来。

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非常弱小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说还没有发育起来。如果毛泽东按照《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指导思想,采取‘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的政策,其社会效果可能要好得多。据一九五六年八月统计,中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大约有五十三万三千人,私营企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其中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人。资本家拥有资本一万元以上的仅有二万二千七百人,资本在两千元以下的约为四十三万六千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其实是小商、小贩、小业主。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总资产大约是三十三亿(新人民币),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七百六十六亿)的二十三分之一。这笔钱拿到国家手里在建设上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却消灭了具有经

济活力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入了单一、僵化、大锅饭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其弊端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资本家拿定息以后,成为一种旱涝保收的固定收入,是大锅饭的另一种型号,其个人收入和企业经营的好坏盈亏脱接,虽然名义上仍当经理、厂长或副经理、副厂长,但他不关心生产了。公方代表多是经营上的外行,所以生产和营业情况每况愈下。像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是中外驰名的老字号,合营时把匾烧了,改名北京烤鸭店。但鸭子却越来越不好吃了,生意也大幅度下降。它原来的鸭子是定点喂养,饲料是小米和绿豆加工精制,一百天上市,又鲜又嫩。合营后用劳改农场的鸭子给它提供货源,烤鸭当然就变了味。用主管领导人陈云的话说是‘出现比合营前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

其次,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莫大不便。一九五三年全国有商业网点四百三十四万多个,一九五六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减少到二百一十万个,缩减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到一九五七年又减少到二百零四万个。其中私营网点一九五三年是四百一十四万个,一九五七年减到四十一万三千个,留下了十分之一。全社会饮食业网点一九五三年是八十四万个,一九五七年减少到四十七万个。由于商业体制集中,社会商品要经过国营一、二、三级批发站才能转到零售点,流转时间长,费用多,损耗大,同时,国营商业对生产厂家是包销的办法,生产什么卖什么,很少考虑市场和人民生活的各种需要,常常出现积压或脱销。消灭了长途贩运,致使许多农副业产品和土特产品的城乡流通渠道中断。城市推车卖菜的,成立了联营小组,由行商变成了坐商,不到胡同叫卖了。夫妻店占产给定息,按月领二十、三十元,原来半夜敲门买盒香烟也卖,如今叫不开门了;因为卖多卖少跟他的收入

脱钩了。游街穿巷叫卖的上海的莲子粥、北京的杏仁茶、天津的馄饨、豆腐脑全都改造得没有了。

第三是国家得不偿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结果，是增加了三百多万吃皇粮的人员，资方人员变成了国家干部，要一视同仁；私营企业工人变成了国营企业工人，也要一视同仁。工资是铁饭碗，还有公费医疗以及各种福利，国家都得包下来。许多个体手工业者、小本摊贩等等，积极要求‘改造’，要求‘合营’，也是冲着‘铁饭碗’来的。本来这些一私营企业是国家的纳税人，如今变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失去了一部分财源，还要支付定息。

总而言之一句话，三大改造不是换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大衰退。这种改造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只是一场虚热闹。一个历史之谜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抛弃《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届二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中国学者有种种解释和猜测。据笔者看来，其个人动机是毛泽东急于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强烈愿望。自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要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自己的国家搞的是新民主主义。那就不具备这种领导资格，必须使中国尽快地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犯急性病的思想根源。其次，他理论上有一个重大失误，认为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给生产力带来大解放和大发展。这是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犯急性病的理论根源。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了一番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

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毛泽东这一段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这是对的。但生产力只有受到束缚时才需要‘解放’,才应该‘解放’。像女人十月怀胎一样,足了月份,才需要助产士接生。生产力并没有受到束缚,在自己的母体——生产关系的胎胞中正在成长发育,还不足月份,你要‘解放’他提前催生,认为这样可以为他长成巨人创造条件,这就是聪明人办蠢事。所以毛泽东后面几句话是似是而非的。

在一九五〇年大路进失败后,毛泽东在中共干部中提倡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他自己以身作则,认真读书,并写了许多批注。他的批注实际上是为自己的种种失误作辩解,制造理论根据。这些批注印发给中共干部阅读,立即又成了主席的‘最新精神’。其中一条批注写道: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

请读者诸君注意这句话。毛泽东从这里开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历史唯物论,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陷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终身难以自拔。所以,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丝毫不能怪马克思主义不灵,是他自己在理论上犯了错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他自己却一直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的悲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

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请读者细细体味一下,毛泽东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毛泽东不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不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应的还是受到了限制,发生了矛盾,不管这种生产关系是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还是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阶段,莽莽撞撞,上去就打碎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时候,他把这种生产关系打碎了,以为可以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其结果是这种生产力像不足月的胎儿一样,被扼杀了。

不能说中共领袖集团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谁也不懂这个问题。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私人资本是有他的积极性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刘少奇这一番话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马克思主义作出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当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商业停顿了,在商店和仓库里都堆满了大批商品卖不出去,商品价格猛跌;信用也停顿了,大家都追求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但是货币奇缺,利率极高,有价证券行情剧烈下跌;生产也急剧地缩小了,许多工厂停顿或大大减产;许多工厂、商店和银行倒闭破产;工人阶级因为生产了太多的商品,反而没有活干,没有饭吃,同时又有过资本家把牛奶倒入大海,把小麦烧毁

的怪事伴随发生。据法新社哥本哈根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消息,丹麦的米特克拉夫特公司八月三日宣布:将于九月一日把一千四百吨小麦在它的四座电站用作燃料试烧。他们这样做是欧共体为减少农业过剩而奉行让百分之十五可耕地休闲政策的结果。在非洲面临大饥荒,二千五百万人嗷嗷待哺,饿死的老人和儿童一天比一天增多的情况下,丹麦资本家此举在世界上格外引人注目。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到这时候,才是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发展桎梏的时候。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十七章中作了这样的论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办自由发展的界限——在危机中,特别是在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的生产过剩中暴露出来的界限’。过去人类社会的灾难是生产不足,物质匮乏,水旱灾害等等。因为生产东西太多了卖不出去,广大劳动人民又没钱买东西,这种奇异的灾害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出现。自从一八二五年英国发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每隔十年八年就要发生一次,成为周期性经济危机。后来资产阶级也变聪明了,用高福利的办法稳住本国的工人阶级,到国外去转嫁危机,寻求摆脱的出路。

毛泽东一生,没到过资本主义世界,没见过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经历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些限制了他的视野。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得其三昧的是哲学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他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他在与莫洛托夫见面时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资本论》。自从在中共清算了王明的教条主义以后,毛泽东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这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导战争和革命,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逐渐地,他被神化了。他的至尊无上的

地位,连刘少奇、周恩来等也不能和他平等地讨论问题了。清算高饶反党集团以后,他们更加谨小慎微,毛泽东要上天,他们跟着上天;毛泽东要入地,他们跟着入地:伟大舵手是毛,他们只能跟,不能纠正偏差。但他们是参与最高决策的人,毛泽东的错误他们当然也有一份。在毛泽东的天马行空的政策把乱子闹大的时候,他们出来检讨,承担责任,收拾局面。他们都是超一流的大政治家,当然是不甘心扮演这样的角色的。于是就想在总路线、总任务方面遵从毛的思想的前提下,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对毛的空想社会主义有所匡正,使之变成务实的社会主义,亦即科学社会主义。他们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93 集思广议 建国大政定方略 天马行空 跃进高潮卷狂澜

中共领袖集团在取得全国政权后要搞社会主义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在怎样搞法上确有路线分歧。这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和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科学社会主义路线只在中共八大前后一个短时期内(即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八届二中全会周恩来纠正冒进倾向),取得了主导地位。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到十月九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起,毛泽东开始一条一条地否定八大的决议。‘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特别在他取代彭德怀以后以掌握兵权的实力地位,有力地支持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但以刘周陈邓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仍在中共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作用,特别在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把中国引向绝境的时候,如大跃进后的饥荒岁月,文化大革命中的‘整顿’时期,由于这条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存在,中国没有垮台。八十年代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八大’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八大’,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召开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斯大林时代结束。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美国情报局公开披露，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罪行，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对于此事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历史上斯大林曾支持王明反对他。毛泽东说提起斯大林他有‘三肚子火’，如今批判斯大林他是高兴的；惧的是这一反对个人崇拜的国际性思想不能不影响。他在中国党内的地位，起码要主动降点温才显得协调。毛泽东觊觎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觉得斯大林去世以后这把交椅非他莫属，这样一来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只好推迟，但他并没有放弃要做世界革命人民领袖的愿望。

要做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要做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他的基地还在中国，必须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在短期内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他要否定苏联的某些经验，创立自己的路线、道路和方法，就像民主革命时期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样。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到四月，他要薄一波给他组织，连续听取了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在各部门汇报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十个问题，在四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五月二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演。这十大关系是：（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

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关系。这十个问题是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的弯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的理论概括。这些思想中有闪光的东西，但毕竟是听下面汇报中形成的灵感，比他战争时期写的总结自己斗争经验的那些作品来显得苍白得多了。如他自己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的一次讲话中所说：‘我国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后来他对自己在建设问题上的一些理论并不珍惜，一句‘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就把自己比较正确的东西全推翻了。

但这毕竟是毛泽东开国以来第一次系统表达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以《论十大关系》作为立论的根据和基础，刘少奇准备了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准备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准备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代表党员一千零七十三万人。五十多个兄弟党代表团前来祝贺。毛泽东在八月三十日的预备会上讲了一篇话，强调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以钢为例说：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个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最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吨铜，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

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前年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这时候毛泽东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第一位任务的在‘八大’的决议以及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和大会发言中，勾划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遵循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要点。（一）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八大’根据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所作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二）关于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国家市场问题。周恩来在‘八大’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

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防止由于统一过多过死而发生产品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现象，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商业方面，将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例如，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陈云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补充了周恩来的意见。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三）关于反对急躁冒进，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经部分地犯过错误。例如，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一九五六年初，当《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

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上半年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将向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作的《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由于反右倾保守所引起的各种项目争相上马所造成财力、物力紧张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这是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的共同意见。为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展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起草社论进行宣传,统一全党思想。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是周恩来审定发表的。社论说:

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

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致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以上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全过程。后来这成了毛泽东抓住不放的一大罪行,立此存照,容后再表。

(四)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包工包产问题。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说:‘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凡是农民有经营习惯而又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应该继续经营并且加以发展。凡是社会迫切需要、特别是有重大经济价值的产品,例如亚热带作物和热带作物、出口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和副产品,除由国家或者地方统一经营之外,还应该鼓励合作社经营,由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凡是不

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
‘我们要求所有的合作社贯彻执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能够完成农业的增产计划,就有可能使农民的全部收入在五年内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逆境中继续忧国忧民,尽职尽责。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他第一次提出了‘包工包产’的主张。他说:‘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社的物质基础。不能增产那就是空话,要增产打下巩固社的物质基础,这个社才能巩固,新的生产关系才能正常化。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空了。’关于搞好生产、调动社员积极性的办法,他提出:‘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在他领导下制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章程》第五十六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尽可能从实行耕作段落和季节的包工制(小包工)逐步地过渡到实行常年的包工制(大包工)。这是土地公有、包产到户的最初设想。

(五)关于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个体户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说:‘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地不宜过分集中.应该根据发展生产、适应社会的需要、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某些制造性的行业,特别是许多修理业、服务性的行业,都应该让他们继续保持分散活动和原有的经营特点,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他们完全自产自

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从商业方面说,商业机构的分布应该最大限度地便利居民,因此更不应该过分集中,而应该适当分散,并且采取多种的经营方式,为居民服务。我们的商业领导机关,过去往往多考虑自己管理的方便,而少考虑如何便利居民,因而发生了集中过多的偏向,不适当地集中了和取消了一些小商店和小商贩。这种偏向,应该迅速加以纠正。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六)关于改进封建国营企业的领导,给予企业适当的自治权的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陈云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对大企业的管理时进一步指出:‘有些企业的管理权要下放,财务要下放利润也要下放。地方上要求税收和企业利润按比例分成,三年不变。中国一个省等于外国一个国,如果像现在这样,地方机动的余地很少,这种情况不应该是经常的。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所以应该有适当的分权,重点不能过分集中。’

刘少奇在‘八大’强调: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具有重大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加强对

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善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七)关于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居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这样的增长速度,同我国的经济水平发展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是相适应的。’周恩来还谈到:‘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该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来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对此,副总理薄一波在‘八人’发言中作了重要补充,提出了‘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即积累率)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

(八)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

争鸣。’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应郭沫若的邀请，向科学界和文化界作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这一方针。他说：‘我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但在人民内部，我们主张一定要有民主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我们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陆定一说，由于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第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他援引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这一次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新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很久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三，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正是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八大’的决议强调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

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九)关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说:‘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为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十)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非凡的勇气谈了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敏感的问题,尽管他尽量不触犯毛泽东,但其后果不能不对毛泽东把自己置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发生制约作用。邓小平说:‘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在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

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封子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在‘八大’的党纲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遵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作如下说明:“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的词语,并不是出于谦虚。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填补斯大林所遗留的世界共运领袖的位置。二战以后,斯大林在世界的名气比毛泽东大

得多,但只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并没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各国共产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若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能会成为毛泽东充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障碍,被认为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所谓‘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是指外国人的误解,这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的历史背景。

以上十个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构成了中共领袖集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可以说是一条科学社会主义路线。他们在毛泽东过于性急和匆忙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企图稳定局面,建立秩序,立下章法,妥善解决三大改造的遗留问题,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设国家。这十项大政策,有些是毛泽东提出别人加以发挥的,有些是别人提出毛泽东同意的。党的‘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条科学社会主义路线是毛泽东领导主持制定的。按照中共现在封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条科学社会主义路线也应该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八大’选出中央委员九十七人,候补中委七十三人。九月二十八日举行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子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

乔水历史最大的遗憾是毛泽东背离了他应该分享光荣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在‘八大’以后的几年中。他逐条地推翻了这十项大政策,用相反的十条取而代之,形成了他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

关于第一条,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一九五七年六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看来‘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 and 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等以后相继提出。’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作结论时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三中全会统一到毛泽东的新提法上,改变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决议。

从此,阶级斗争被提到了首位,经济建设、发展生产被推到次要、从属地位了。

关于第第二条,国家统一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第五条,关于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个体户经营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总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示说:‘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市场商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时期,许多地区又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其中从事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七十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也有六、七十万人。……他们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倾

向。其中一小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这就不仅妨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的巩固,在不同程度上腐蚀了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思想意识。(引者按:个体户便利群众,发展生产,收入多,引起了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职工的羡慕,此之谓‘腐蚀’。)解决办法是:‘各地应当抓紧目前全国整风这个有利时机,在这些残余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中间有领导地开展以反对资本主义道路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他们的生产经营,加以审查,区别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分别地有步骤地进行整顿、登记、改造、排挤、淘汰或取缔。’‘对于需要转业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应作妥善的安排。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积极动员和组织他们上山下乡,从事农业劳动。’对于‘同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而不能取缔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实行控制其收入的政策。‘(一)个体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稍低于当地同行业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个体户,应当从原料、加工、订货、税收等方面适当地加以控制。某些有特殊技艺的人员的收入,可以高于一般社员的平均收入。(二)小商小贩全年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略低于当地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营业员的平均工资。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应当在货源分配、税收、批零差价、代购代销手续费和盈余分配等方面加以控制。’这个文件一贯彻,手工业和小商业个体户一扫光。市场失去了残余的一点生机。

关于第三条周恩来所坚持的经济建设要反对冒进、综合平

衡、稳步前进的问题,受到的打击最重。因为不批倒这一条,疯狂的大跃进就搞不起来。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针对周恩来,对一九五六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指出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竟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离右派还有五十米,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说周恩来总理反冒进离右派还有五十米,全党震惊。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左’倾路线上来。关于第四条《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问题。

一哄而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问题成山,急待整顿和巩固。刘少奇、周恩来、邓子恢等想在承认毛泽东‘三个会议一部书’所造成的高潮的前提下把局面稳定下来。制定了《示范章程》,不仅交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还交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打算约束一下毛泽东,不要率尔再出新招。毛泽东天马行空,眼空无物,人代会算什么!果然又出新招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总编辑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宣示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

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在《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又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篇讲演。他以权威的姿态披露:‘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交换)、毕(文化教育)、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的藕田和丰产稻。当听到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就凭这一句话,没有经过中共中央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在五亿农民的广大农村,立即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同年九月三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报道:‘截至本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其中两户以上的大社五十一个。毛泽东的气魄超过了秦皇汉武的封禅大典。但秦皇汉武祭告天地是空家伙,劳民伤财也仅是随御驾而行的仪仗扈从而已,顶多几百人。毛泽东对出个‘人民公社好’来,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浪费逾千万,死人上千万,二十年没缓过元气来。此时,毛的骄傲和专断达到了顶峰。

关于第六条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从物质生活上开心职工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月十四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办工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不属国务院系统,属中共中央机关系统)下发《关于企业党群领导干部停止领取奖金等问题的通知》,规定取消企业领导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奖励制度,具体办法是:(一)现在还投有实行这种奖励的企业,不要实行;已经取消的,不要恢复;能够取消的取消;实在不能取消的,其季度奖励标准最高不能超过本人月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二)厂长、副厂长的奖金,自今年第二季度起停发。各地企业党和群众组织的脱产干部的得奖办法也照此原则办理。从此开始了企业干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经济效益和企业领导、技术干部的利益脱钩的时期。工人奖金呈拉平趋势,即不分干得好坏,年终时加半个月薪。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务院决定发‘一九五八年跃进奖’给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奖金总额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一个月实支工资总额的二分之一。个人奖金金额,一般可以发给相当于半个月工资的数额,学徒可以发给十元。厂一级党政工团负责干部,不发给个人奖金。

对企业的要求,不讲质量,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跃进的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是辩证的统一》。社论说:‘国民经济是在波浪式运动中不断发展的,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积极平衡的方针,不断调整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在高速度中前进。我们不应采取消极平衡的方针,让速度来迁就某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比例框框。’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若干企业

隶属关系的通知》，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将三十四地方国营企业收归国务院领导，六个企业由中央下放地方领导。四月二十八日又通知二十一个地方国管企业交中央管辖，二十四地方企业改由中央与地方共同领导，一个企业由中央下放地方领导。总的趋势是加强中央集权。

关于第七条发展经济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邓子恢主持制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积累部分为百分之六（其中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一），将来生产发展了，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三（公积金百分之十，公益金百分之三）。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写的《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认为：‘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他推广一个省的经验，提出：‘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层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

毛泽东又提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收入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

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各地缩减农民的自留地,对副业生产作出种种限制,‘割资本主义尾巴’。

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兴起,城市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中说: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五十亿斤;油料库存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争购的现象很多,有些商品的黑市价格高于国家牌价很多。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毛泽东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要考虑取消薪金制。张春桥闻风而动,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受到毛泽东表扬,发表在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对中高级干部,毛泽东作出了减薪的决定。在一九五七年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干部(大体上是司局长和专员、地委书记以上)降低工资;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三级大体上是副总理以上干部。从三月份起,将国家机关一、二、三级工资标准合并为一级,并且降低为四百元(按六类地区计算)。毛泽东率先垂范,把自己由一级降为三级。通知规定降低的范围限于党内,一、二、三级非党员干部的工资,像宋庆龄等一律照旧,不予降低。这件事情虽仅具象征性意义,但对下层干部和群众影响很大。毛泽东搞大跃进和公社化,浪费了上千亿资财,但没往自己腰包里多装

一元钱,他还减了薪,虽然饿死了上千万人,但毛泽东自己也得了浮肿病,他女儿李纳也跟着挨饿。所以,人民最终原谅了他,认为他是好心办了坏事。

关于第八条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双百政策问题。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认为是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政治家和科学家不同。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发明的人,尽管他私德很坏,或犯了杀人抢劫的罪行,人可以判罪,但他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不能抹煞。政治家贵在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他的理论就是欺世盗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随着一场反右派斗争,把几十万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随着对党内反对他反对对了的干部的错误处理,直至把刘少奇、彭德怀折磨至死,而变成了欺世盛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如果不说是欺骗口号的话。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滔天大祸,关于第九条,民主和法制问题。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从以后的历史来看,确乎如此。他是既不要民主,也不要法制。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四句话值得注意。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这时他已下决心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了。外国学者说毛泽东因为大跃进失败,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这是不对的。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大跃进正热火朝天,败象尚来显露。他本人正处在志得意满的陶醉中。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最后,即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

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共和国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做国家主席,外交礼仪上讲对等,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他得亲自到机场欢迎,并陪同苏加诺乘敞篷汽车穿过市区。苏加诺算什么?他认为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车站、机场迎接任何外国客人,不论是主席、总统、国王、皇帝。在国内,国家元首、共和国主席是他的大副,他的身份就在国家主席之上。至于权力,他不仅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紧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大权独揽’就是这个意思。他要专做中共主席,因此,进一步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第一书记说了算,在中央则是主席说了算。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注:评剧《刘巧儿》有个马专员,正确处理了刘巧儿的婚姻问题,被誉为‘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这一套。’文革期间,他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藐视宪法的尊严,私

自纵容逮捕审讯国家主席刘少奇,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这在现代国家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成就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可以废掉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那是封建社会,没有宪法,没有议会。毛泽东晚年确实把自己摆在了太上皇的政治地位上,他的内心世界,根本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

关于第十条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上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是在中国兴起新的个人崇拜狂热的宣言。毛泽东先声夺人,谁要反对崇拜他,就是有让人崇拜自己的野心。他借用列宁的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个人独裁制造理论根据。

在成都会议上,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由于这个不寻常的表态,两个月后,即五月二十五日召

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毛泽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样板一立,带坏了一大批干部,紧跟和吹捧毛泽东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作风,都被抛弃了。在这种政治气氛之下,中共要犯全局性的、历史性的、大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94 帮党整风 知识界忠言逆耳 引蛇出洞 毛泽东翻脸无情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人物开谈话会，即席发表讲话，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排队，算一个账。过去好像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

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们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重,要开最高国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空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道。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插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这个问题要研究。要李维汉同志

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五月八日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五十多人开座谈会。李维汉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至六月三日，这种座谈会共开了十三次，有七十多位知名人士发表了意见。又从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二十五次，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言。北京这两个座谈会，每天由新华社发消息，批评中共和政府的意见上了公开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量刊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地也都仿效北京，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整风。广大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被发动起来了。带头响应中共号召出来讲话的是费孝通教授，他是国际知名的人类学专家、民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一五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说：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注：指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的报告，报告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较好，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

的。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窝,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出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来说基本上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同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太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走别人

争,自己听。要自己由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费孝通这篇文章,是代表知识分子,向中共交心的真情实话。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溢于言表。凭这篇‘早春天气’把费教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实在令人费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了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最敏感的问题。虽然说拥护共产党是不错的,但在毛泽东心目中,拥护周恩来和拥护毛泽东是大非大是的原则问题。周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则要把周恩来的话翻过来,把知识分子打入资产阶级行列(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讲:‘给知识分子也封了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号’)。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嫉

妒心情在他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有充分表露。开头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些话在正式发表时都删去了。但他逐渐形成了唱《拷红》的决心，后来抓住一个‘反冒进’问题大作文章，一九五八年逢会必讲，就是要把周恩来的威信打下去。

次日，费孝通等八教授《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是‘反党纲领’，细看也属指鹿为马，罗织罪名。五月十三日，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约集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褚圣麟、侯大乾、李西山、陶大镛，陆近仁等八教授对高等学校应否实行党委制提出意见。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四月三十日天安门座谈会亲自讲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要李维汉召开民盟、九三开会研究。尽管毛泽东作了诱导，但费孝通等八教授根本没提教授治校的主张，费孝通等拿出的建议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

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教授治校乃所以抵制反动派向高等学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势显然已和以前有着显著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颇有和党对立的意味。再从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本身来看，也是不够妥当的。一、因为大多数教授所关心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二、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则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都忽视了。因此我们总的意见是：（一）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任务是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二)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三)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四)在务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的吸引教职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总的精神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

改善中共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最尖锐、最系统、最有代表性的意见,不过如此。把这些人定为右派是毫无道理的。

更可骇怪者,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遭遇。马寅初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学校党委制的。他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学校实行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时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发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义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有人说,从前肃反、

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但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么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很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我认为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我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在整风中的表现是好的，以上意见可以说是‘无骨头可挑’的左派言论，但马老先生也在劫难逃，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问题出在哪呢？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书面发言。这篇文章登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人民日报》上，题为《新人口论》共十个问题：（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科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行；（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建议。完全是爱国爱民，利国利民的意见，怎么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受到批判呢？

这件事情的底牌是违背了‘最高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

文中说了如下一段话：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马寅初大概对毛泽东著作研究不够。一不留神在一个经济科学的领域里踩上了一个政治地雷。毛泽东正要在中国知识界树立自己的至尊无尚的权威，如何能容许这种挑战！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大学建校六十年校庆大会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理论打手’陈伯达在讲话中突然点了名说：‘马老要作检讨’。定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围攻。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对德高望重的一代学人马寅初的围攻从北大扩展到社会，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但马寅初没有屈服，他表示：‘我虽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们投降。毛泽东的另一个‘理论打手’康生下达指示：‘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老先生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一九六〇年，撤销了他的人大常委委员和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由于不纳马寅初的忠言，采取控制人口的国策，中国至少多生了四亿人口，成为今天的沉重包袱。

主持统战部座谈会的李维汉，每隔两三天就要向毛泽东及

中央常委作一次汇报。当李维汉汇报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时，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本想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赢得知识分子的心，逐步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是不同的，在中共党内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把他称作是伟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的时侯，罗隆基竟认为他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建立信仰，让他们崇拜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整倒一批‘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样标志着毛泽东已下了反右派的决心。继续组织座谈会，具有了‘引蛇出洞’的性质。‘引蛇出洞’的策略，使整风运动中途变质。不再是发动群众给执政党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而是在提意见的群众中抓右派，整提意见的人。从而使共产党员大信于天下。

经过冷眼观察，毛泽东得出结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关于‘章罗同盟’，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共中央在复查右派问题时明确指出‘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因此，对过去因‘章罗同盟’问题受牵连的地方组织和个人，一律作了解脱和改正。

‘章’是章伯钧，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罗’是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森林工业部部长。既然他们没有反对共产党、颠覆政府的组织活动，他们的主论是否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章伯钧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他说：

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共党内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指为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大右派’章伯钧发言的核心部分。章伯钧提议‘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无非是开放民主，扩大民主，并无恶意。通观其全篇发言，并无反对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意思。如果毛泽东能纳忠言，把大跃进的方案和人民公社的方案，拿到

人大、政协讨论一下,征求一下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意见,而人民又有权否决他的意见,完全可能避免那种造成重大损失的全局性的失误。九十年代搞三峡水利工程,中共就没有由领袖拍板,而是发动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充分讨论,论争利害,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进步。一九九一年由一位人大副委员长率领人大代表中的科学家亲赴实地考察,最后由全国人大下决心上马还是不上马,造就是起‘政治设计院’的作用。

罗隆基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座谈会上发言,开始他说:‘最近有两个外国记者到我家去,让我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我说这次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发言的最后,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问题’。建议: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

罗隆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在当时受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中共党内多数也认为是‘反党言论’,同仇敌

愧。但在二十年后，由胡耀邦领导的中共中央组织都成了名符其实的‘平反委员会’，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强有力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中共自己认识平反冤假错案的必要是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由于毛泽东个人专断，无法无天，以言代法，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后，特别是一九六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他自己犯了全局性的、路线性的错误之后，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支持正确意见的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这些罪名，和‘右派分子’的罪名一样，没打法律上的界定，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毛泽东一句话，林彪一句话，甚至江青、陈伯达、康生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高级干部、高级将领送入监狱。一九七八年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一千七百万人，立案审查的约占百分之十七，即二百八十九万人，到一九八二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基本结束，实际得到平反的是百万干部，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三十万件。

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的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

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平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众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群众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先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

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原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限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被定为第三号大右派，说他代表资产阶级要和共产党争天下，在全国被大张挞伐。民主人士向往开国时期共产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和衷共济的团结局面，这难道错了吗？说造成那种团结局面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又说向往那种团结局面的储安平是反动的，这不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吗！中共新领袖江泽民在一九九二年年年底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郑重表示：中共中央决定选拔一批党外人士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不仅省市自治区一级，国务院副总理中也要有党外人士。果能如此，这也算是恢复毛泽东首创的国家制度吧。

反右派运动中的三大问题：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在当时是被看得很重的。毛泽东判定：‘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一九五七的夏季形势》）据中共北京市委报告：到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止，全市已划右派分子

七千五百一十一人,已在大小不同范围重点批判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全市定极右分子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占右派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七。全市已登报的极右分子一百九十人。北京各高等学校共划右派分子四千二百三十五人,占高校总人数十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三人的百分之三点七四,其中极右分子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教授中划右派分子一百九十二人(其中极右分子八十五人),占教授总数一千三百九十人的百分之十三点八。其中重点批判一百零八人,占教授总数的百分之八。在全国错划右派五十四万人。毛泽东刚宣讲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就犯下了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的严重错误。

95 共产会盟 尼基塔手执牛耳 坐而论道 毛泽东口若悬河

一九五七年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赫鲁晓夫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庆典的机会，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高级会议，确立自己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他需要得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支持。

这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乘苏斯洛夫等不在莫斯科的机会，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以七票的多数，通过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莫洛托夫任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表示，主席团无权撤销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他得到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朱可夫调动军用飞机几小时内就把外地的中央委员接到了莫斯科。在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得到了‘二十大’新选出的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形势急转直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成了‘反党集团’，被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化险为夷，专门派米高扬来到中国的杭州拜会毛泽东，通报苏联党内发生的变化，得到了毛泽东支持赫鲁晓夫的保证。为了投桃报李，赫鲁晓夫同意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和新型歼击机的研制。米高扬走后，聂荣臻副总理与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会谈。七月二十日，阿尔希波夫受权答覆聂荣

臻，中国可以派出代表团去苏联谈判。九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派聂荣臻、陈赓、宋任穷到莫斯科，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正式谈判，历时三十五天，于十月十五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简称十月十五日协定）。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毛泽东接到了赫鲁晓夫的邀请信，希望他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毛泽东欣然接受了邀请。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苏联派来迎接毛泽东的专机，当时苏联最为豪华气派的‘图——〇四’客机二日上午八点，毛泽东率代表团起程。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郭沫若、乌兰夫、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陪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飞机升空后，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知道毛泽东又要讨论哲学问题，微笑着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泽东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大使被问住了，说：‘唉呀，这我可没研究过……’毛泽东直视舷窗外面漂浮的翻云，一幅令人高深莫测的哲人形象，停了几十秒钟说：‘我来回答这道题，请你鉴定对不对。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同机的代表团成员听了都笑了。尤金博士连声说：‘妙！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这段插曲过去，翻译李越然给毛泽东送上一份文件，这是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准备的下飞机时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稿。毛泽东翻阅了一下，把杨尚昆叫到跟前说：‘尚昆同志，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杨尚昆

说：‘做个准备吧。如果赫鲁晓夫同志致欢迎词，主席总得讲几句，礼仪上才对等。’‘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那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尊主席的指示，已把您要求简化礼仪的意见告诉了苏方，也许主客双方都不发表讲话。’‘好，做个准备。’说罢毛泽东把讲话稿装进了衣袋里。飞机在伊尔库茨克短暂停留。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前来欢迎。

莫斯科时间下午三点多钟，‘图——C 四’专机在伏努科夫机场平稳降落。赫鲁晓夫率领几乎所有的苏联党政军显要人物来到机场欢迎毛泽东。先期到达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也来了。

毛泽东沉稳地戴上礼帽出现在机舱门口，面对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然后，从容地走下舷梯。

赫鲁晓夫热情地迎上前去，稍后跟着胡志明。当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热情拥抱之后，第一句话说：‘感谢你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

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能亲自前来捧场。是对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盟主地位的一种承认，内心十分满意。‘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通声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

毛泽东的回答不是普通的应酬。是话里有话的。那时赫鲁晓夫正在鼓吹‘和平过渡’，毛泽东说‘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即是要‘重新肯定；’武装起义的道路，这既是对十月革命的颂扬，又是对赫鲁晓夫的批评。

赫鲁晓夫心里明白，但不能反驳，作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东道主，能说十月革命没有普遍意义吗！只好随声附合一句：‘你说得很对。’然后胡志明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拥抱。胡志

明会说中国话，二人交谈用不着翻译。

‘身体还好吧？’胡志明亲颊时贴着毛泽东的耳朵说。‘好着哩。你怎么样？’‘比上次见面还要好些。’

然后，在赫鲁晓夫介绍下，毛泽东同排列整齐的伏洛希洛夫、布尔加宁以下的苏方党政军领导人一一握手见面。

在苏联外交都礼宾司司长的导引下，毛泽东由赫鲁晓夫陪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同志们好！’毛泽东用湖南高腔向肃立的仪仗队答礼。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虎生威，用俄国话向毛泽东欢呼万岁。

行礼如仪，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上了第一辆‘吉斯’牌轿车。这种车的底座和卡车一样大，很宽敞，在前排和后排之间设有一排活动椅。翻译李越然和卫士长李银桥坐在这里。坐在后排的两位领导人交谈时，李越然要侧过身来帮助他们沟通思想。司机旁边坐着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阔夫。苏方指定他担任中国领袖的卫士长，配合李银桥做好对毛泽东的保卫工作。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宋庆龄还是副团长。他们两位不是共产党，但长期与我们党合作，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希望安排他们参加一切会议，在接待工作中，尤其要给他们应有的礼仪和尊重。’

毛泽东带了两个非共产党员，出席共产党的高级会议。这件事情是很出格的。如果斯大林活着，毛泽东是不敢也不会这么做的。如今他这样做，就是要显示中国党和毛泽东本人地位和身份的特殊。赫鲁晓夫认为，由他召集、主持的世界共产党领导人会议，毛泽东能屈尊而来就是对他的支持，就是他政治上的

一个胜利,绝不原意在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问题上和毛泽东闹别扭。所以迎合着毛泽东的意恩说:‘宋庆龄是孙逸仙的夫人。我们知道她在中国有很高的声望。我们安排她住在克里姆林宫,还为她专门选配了卫士长,设了她的专门餐厅。我知道她喜欢吃煎甜饼子。’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那好。感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汽车进入莫斯科市区。毛泽东见高楼林立,市民熙来攘往,以赞许的口吻说:‘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得很愉快。人们穿着不错。看得出这几年来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进步,成就不小。’

赫鲁晓夫听了很高兴。

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停下来。苏方把最好的席子——当年沙皇的寝宫留给毛泽东住。为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搬掉了俄国皇帝的‘龙床’,换上了木板床,卫生间临时改装了蹲式便池。

十一月六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应邀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他说: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中经历了艰苦的路程。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的敌人曾经显得好像比苏联更强大,他们两次武装进攻苏联。但是英勇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把这些侵略者的进攻彻底粉碎了。

在一般地赞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光荣历史之后,毛泽东有分寸地说了一段话,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揭露批评斯大林,击败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撤销国防部长朱可夫等重大问

题,表示赞同和支持。他是这样说的:

苏联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保证了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就是一个范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工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的演说数次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所打断。

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的正日子,毛泽东作为主实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登上红场的检阅台,与各个国家、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起,检阅阵容强大的苏联武装部队。晚上,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在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他们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越南劳动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罗马尼亚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

会议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举行。毛泽东率中国党政

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在十四日和十六团两次发表讲话。论赫鲁晓夫的资历、功绩和威望,是不具备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条件的;但他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正所谓‘萝卜不大,长在背(辈)上了。这就需要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党出来讲话,需要毛泽东就样在共产主义世界有崇高威望的大领袖出来讲话。根据赫鲁晓夫的请求,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赶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斯大林在世时以‘老子党’自命,随意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撤换兄弟党领导人,东欧各党深受其害。斯大林去世后,苏共继承‘老子党’的传统,继续对兄弟党颐指气使,又加深了裂痕。哥穆尔卡是波兰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反对法西斯占领军的斗争中,重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任总书记。后因于一九四七年四月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被苏共和斯大林视为异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三日波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了哥穆尔卡的总书记职务,后又将其逮捕监禁。斯大林逝世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哥

穆尔卡出狱。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之后同,被党召开七中全会,决定恢复哥穆尔卡的党籍。十月十七日波党政治局根据广大党员和波兰人民的要求。决定第一书记奥哈布让位,拥戴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十月十九日,波党十届八中全会开幕,决定撤换罗科索夫斯基波军总司令和波党政治局委员的军政职务。罗科索夫斯基是波兰人,入了苏联国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被斯大林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罗氏被安排在波兰位居要津,露骨地表明了苏共控制波兰的意图。赫鲁晓夫怀疑哥穆尔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于波党八中全会开会的当天,率领政治局员米高扬、莫洛托夫。卡诺维奇和华约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乘飞机强行飞抵华沙,在空中盘旋两个小时,机场才开放准予降落。与此同时,科涅夫调动驻波的苏军坦克部队向华沙开动,下令苏海军舰队驶入波兰领海,向波党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哥穆尔卡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强调:‘波党政治局如果没有罗科索夫斯基,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取消波苏友谊。’哥穆尔卡说:‘我们声明,对国内形一势作出评价的只有我们,也只能是我们,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感觉到人民的情绪。’赫鲁晓夫等碰了钉子,于十月二十日晨回国。波党中央全会选举时,一致推选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落选,未能进入政治局。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在十三国兄弟党会议上,哥穆尔卡坚决反对提‘以苏联为首’。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应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作客。二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日有了事,总得有个人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哥穆尔

卡最后被说服了,他说:‘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这次会议,毛泽东帮了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大忙,把‘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定下来,并写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文字上是这样表达的:‘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签字。南共领袖铁托没来参加会议,派第二号人物卡德尔来观察动态。所以,发表宣言时签字的是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他不出来争帅旗,主要是中国国力弱,他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像他劝哥穆尔卡时所说的:‘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但他认为就个人的才能和禀赋来说,无论是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军事、政治经验,赫鲁晓夫是无法和他相比的。有一次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用餐,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打仗,卫国战争的胜利跟他没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受一次次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专心致志地夹菜吃饭,咽下一口食物,抬起眼皮对赫鲁晓夫说:‘我原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赫鲁晓夫竟然没听出弦外之音来,接茬说:‘这好办,我们负责安排。’

细心的读者一会看出来,毛泽东在十四日会议提出‘以苏联为首’,对这个首,他是下了明确定义的,这就是:‘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原来‘为首’等同于‘召集人’,不是任何政治上、军事上或思想上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心里的算盘是:会议由苏共召集,其人格化的表现是赫鲁晓夫召集。主意由中共拿,其人格化的表现就是毛泽东拿。有了事,你召集开会,我来拿主意。在中国国力没有赶上和超过苏联以前,毛泽东在社

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争取的就是这样一个名义上的二把手实际上的一把手的地位。所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所让步，有所坚持。‘为首’题他主动让一步，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就绝不让步了。

在起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宣言时。苏共提出的宣言草案沿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捷法，只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并把和平过渡解释为‘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人民政权的工具。’中共认为和平过渡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过争论，作了两处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争取议会多数的同时，还要展开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这一场斗争，毛泽东在幕后领导，是由邓小平出面和苏斯洛夫折冲交锋的。苏方妥协作了修改，毛泽东寸步不让，又指示写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实际是批判了苏联的观点，作为备忘录，交苏共中央存案。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赫鲁晓夫主持了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十八日会上发言。因为各党代表团全体出席，格奥尔基大厅有几百人，发言者都是登上讲台站立着面向听众讲话。毛泽东却坚持坐在在自己的席位上即席讲话。赫鲁晓夫认为这又是一件不尊重会议主席、不尊重与会者的很出格的事情，但他无可奈何。开头毛泽东解释了几句，说他前几年患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但站起讲话有些不方便。这完全是不尊重与会者的一种托词。就在这年夏天，他还在中南海游泳，怎么会不能登台发言呢。他要在这些‘小’地

方,显得自己的身份与群众不同。他要取代斯大林,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红衣大主教’。主持会议的赫鲁晓夫自然不敢勉强毛泽东,任他坐而论道。于是毛泽东口若悬河,开始了他的哲学漫谈。毛讲话不顾意念稿子,尤其不愿念秘书班子写的稿子,他愿意周密的思考之后,讲自己想讲的话。他是个思想深刻、语言锋利的政治家,他的漫谈确有征服人的魅力。他说: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办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说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赫鲁晓夫通过翻译仔细琢磨毛泽东谈话的含义。这是不是说我赫鲁晓夫犯了错误或可能犯什么错误,需要他毛泽东帮助呢?再往下听,还有厉害的,只听毛说: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

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几个人谈判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赫鲁晓夫越听越嘀咕。你毛泽东把在这个格奥尔基大厅开会共产党人,分成了各种成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你毛泽东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赫鲁夫是什么成色的马克思主义呢?是百分之九十,这是百分之八十,还是成色更低些呢?如果是测量金子的纯度的话,那么,谁是拿着试金石的盒匠呢?看来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金匠。他要对各国的共产党领袖,有多少马克思

主义,有多少杂质,作出评定,你提议‘以苏联为首’,一个成色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怎能当‘首’呢?……

赫鲁晓夫似懂非懂,一面听,一面想,心中忐忑不安,并使他想起在此之前毛泽东的几段惊人之论: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是忧虑这

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有信念。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PAPER TIGER)。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确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在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泽东这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解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说战略和战斗、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使那些理论修养

不足的党的领导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外国人不会讲‘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感受。许多第三世界的党的领导人，把毛泽东当作当代的列宁。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选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话原是无懈可击的。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盟主地位受到挑战的赫鲁晓夫，会后在与人交谈中多次攻击毛泽东‘好战’，‘要把世界上的人口消灭一半’，讥笑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由于语言、思维方式和文化素养的不同，也有些领导人没有完整地理解毛泽东讲话的意思，抓出几个片断，几个论点，觉得毛的东方式的哲学不好理解。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毛的讲话，反对的，摇头的都有，但多数人是尊崇的。毛泽东在他讲话的另一部分这样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英共主席)、高兰(英共总书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二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到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散会时,毛泽东起立,大家才起立。但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站在那里不动,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礼让赫鲁晓夫先走,赫鲁晓夫看到了与会者对毛泽东的敬重,身不由己地后撤一步,坚持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以个人传奇般的经历,以泱泱大国的领袖地位。以渊博的学识,以无与伦比的领袖风度,成了这次共产会盟的中心。赫鲁晓夫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宣言上‘以苏联为首’,会场上以毛泽东为中心,共产主义阵营下了分裂的种子。

96 违心检讨 周恩来治国难两全 阶级斗争 毛泽东牧民有奇术

毛泽东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回到了北京。这次共产世界群英会他独领风骚,使赫鲁晓夫相形见绌。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非毛润之莫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使他感到力不从心。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在莫斯科得到的印象,第三世界的共产党,有毛泽东的崇拜者,他们觉得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比马恩列斯那些宏篇巨著更适用,更解决问题。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但他又想到,光有思想理论指导,说点武器、物资的援助行吗?看来按照常规走路发展经济是不行了,得想个办法。于是他想出了发展经济的新路子,这就是‘大跃进’。毛泽东在莫斯科亲自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发表。在这篇社论中不指名批评周恩来‘害了右倾保守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提出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功业心所驱使,毛泽东决心要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¹内出现奇迹。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统一全体党政干部的思想,从中央、国务院,到二十九个省市的党委和人民政府,到地委和专区,到二千多个县委和县府,到八万多万个农业合作社的党政领导,要用一个思想

下把大家统一起来,依靠各级党政机关再去发动和组织亿万人民,鼓足干劲,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限,这个力量是可以移山可以填海的。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他的稳健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于是,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的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中共全党的推行开辟了道路。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规定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九百七十七人,列席代表二百八十九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市委书记、企业或基层党委书记。

在这样一个大范围的会议上,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以及陈云、薄一波、李先念作了检讨。周恩来当然知道,作这样的检讨,等于公开宣布取消自己作为国家总理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格。但不作这个公开检讨是不行的,毛泽东逢会必咄咄逼人,调子越来越高。作这这样的违心的检讨,自己明

明没有错要承认错误,是非常痛苦的;特别是作为国家总理,眼看着整个国民经济像野马一样狂奔,凶险是可以预计的,但不能劝说制止,还要喝彩叫好,将来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乱了套,自己再来检讨,再来收拾局面,那真是双重的痛苦。夜阑人静之后,他把当时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总理兼职秘书范若愚找来,帮助准备这篇检讨发言。他说一句,书记说一句。中间陈云来了一次电话,二人的心情是相同的,相通的,打完电话,周恩来说得更慢了,有时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足见其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是何等激烈。在中拱领袖能团中,周恩来是极少的几个和毛泽东共事到底得到善终的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了。他知道进入北京以后,与毛泽东作为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已经结束,而开始了一种君臣关系,令由毛出,事由周办。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伴君如伴虎,随时可能被虎伤害。他得慎之又慎。范若愚把稿子写完,周恩来又细细推敲澜色一遍,然后打印清楚,送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常委传阅。过了两天,稿子退了回来,毛泽东把一些过重的话删掉了,有些话分量改轻了。范秘书一见心情缓和下来。但周恩来依然沉重。处理矛盾、应付危局的圣手周恩来困惑了。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据理力争,这等于和毛泽东决裂,和毛泽东摊牌,其结果将是自己成为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的代表,毛泽东已经说‘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并几次讲到准备党的分裂,就是表示一意孤行到底的决心。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一条是功成身退,挂冠而去,像汉朝的张良那样。但共产党不兴这个。或是显赫在朝,或是打倒入狱,没有古代做官的向皇帝‘乞骸骨’,归隐林泉之前例。一条是违心检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紧跟毛

泽东,保持路线、政策的一致。将来出了乱子,我再出来承担责任。周恩来冥想苦想:有没有一个既让毛泽东满意,又使人民不受损失的两全之策呢?没有。

这位主持国家大政的总理思潮翻滚,从南宁会议想到成都会议。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在广西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除中央领导人外,有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

会议的开法很寻常。毛泽东下令将周恩来主持特定稿经政治局批准发表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以及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所作的《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作为反冒进的罪证并选了宋玉的《登从子好色赋》作为批判的武器,一并印发给了与会者。

《登从子好色赋》是古代辞赋家宋玉的一篇著名作品。人意说,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说:宋玉长得漂亮,口齿伶俐,又性好色,请大王洒让他出入后宫。楚王责之宋玉。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人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并举事实为证:“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少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女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而登从子的妻子,颧头、呲牙、驼背、满身疥癣,还有痔疮,这样一个丑陋不堪的女子,登徒子和他生了五个孩子,大王明察,究竟是谁好色呢!毛泽东

发思古之幽情,是把反冒进的人比作宋玉,说反冒进所用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与宋玉攻击登徒子相仿佛,是诡辩。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提出批评反冒进,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这次送上检讨稿子,他又勾掉了一些份量较重的话,把问题的性质限制在思想认识的范畴以内,足见毛泽东并无撤换总理的打算。周恩来左思右想。意识到毛泽东这次逼他检讨,类似七届四中全会让刘少奇作检讨一样,毛认为这对于巩固他的领袖地位是绝对必要的。只要刘、周挂不起帅来反对他,全党都只能跟着走。封,一块对;错,一块错。

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下,周恩来走上怀仁堂的讲台。他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中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设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问题。这样建设或者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引者按:周恩来首先给自己的‘错误’定性)毛主席曾经反覆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

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团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列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一九五六年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的讲话,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了增产节约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一九五七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拿最近三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作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一九五七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

方法所造成的两种结果。大跃进从正面教育了我们，诚如少奇同志说的，‘正是. 由于这种反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正确性，就看得更清楚了。’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会’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

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

针。

周恩来这个检讨发言,听起来真诚、朴实、自然,定性准确,分寸适度,上纲恰当。最后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登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义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用共产党人的革命术语,重复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君臣关系中作臣子的应恪守的格言:功则归君,过则归己。

随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都作了检讨发言。

毛泽东在五月十七日下午的讲话中说:‘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算是对周恩来的检讨发言批准过关。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检讨,迅速传遍了全党。像周恩来总理这样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尊敬的人都因为反冒进犯了错误。谁还敢阻挡大跃进的潮流呢?只能顺着来,弄虚,作假,说谎话,吹牛皮,都可以,只是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大跃进半个不字。毛时代的中国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眼看一股社会潮流来了,许多党员和干部明知它是错误的,但不

能挡,谁要挡谁就得准备碰得头破血流。‘大跃进是一次,‘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

群众中还是有阻挡潮流的人,特别是当伤害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总有人出来反对。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他在武汉会议上讲:

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如何,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策略,要冷一冷,放一放,不冷不放他是不出来的。

我在成都会议上说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右派约三十万左右,地、富、反、坏、右是坚决反共的,是敌对阶级,是今天的蒋介石。党内右派也属这股力量,捉住没划或没捉住的也属此类,这些人加起来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五,约三千万,是敌人。但要改造他们,对右派的办法,既要斗争又要拉,要变消极为积极,能把其中十分之一改造过来就是成功,几年以后将心变过来可以摘掉帽子。右可变左,左可变右,他们是会变的,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他们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

右派这顶帽子主要是为知识分子而设的。知识分子在人民中是敏感、敢言、有见识的先进部分。不把他们制服大跃进也搞不起来。毛泽东把右派列为剥削阶级、敌对阶级,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历史上当过国民党、三青团、干过旧军队、旧警察的人)、坏分子(抢劫犯、强奸犯、杀人犯等服刑期满被释放的)并列,合称黑五类,这是一大发明。例如一个小学教员,出身贫农,还是共青团员,只要对现行政策提过意见,或说了不满现行

政策的话,被定为右派,他就成了剥削阶级,敌对阶级。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分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随后他又发明了混淆两类矛盾的方法。这就是把人民中有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右派这个概念像魔术师手里那块黑布一样,黑布一抖,花瓶可以变成鸭子,知识分子可以变成剥削阶级。一村、一乡、一学校、一机关的支部书记,只要手星攥着这块黑布,就可以任意发号施令,群众都俯首贴耳,无人敢说半个不字,叫夜战深翻土地,社员们就挑灯夜战;叫学校老师停课带领学生满山遍野捉麻雀,学校就停课除四害(麻雀是四害之一)。有个青年教师说麻雀是益鸟,结果被打成右派。因为‘四害’是毛主席定的,说麻雀是益鸟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右派。不容说明,不容讨论。后来传下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在武汉会议讲话:‘地富反坏右虽然是三千万人,但是分散的,被包围着,不要怕。要开右派大会,先骂一顿,再拉一把,指出出路,使他们感到皇恩大赦,全身发热,满身舒畅。这个乡也开了地富反坏右大会,黑五类全都上台亮相。因为那个青年教师就说了一句‘麻雀是益鸟’,被摘了右派帽子,宽大处理,给出路。但有一条,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表现不好时再给戴上。经过这一戴、一摘、一拿,这个青年教师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思维敏锐、老实本分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大跃进的狂热分子。乡村干部不敢干的得罪人的事情,例如为了叫社员们到食堂吃饭,去拔老婆婆的锅灶;为了给土高炉搜罗燃料去伐社员家的树木,都派他带领学生们去打先锋。人就这样被改造、被扭曲了。据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小学教员中有很多右派,在二十万右派中有十万。’这十万人大部分布在农村。于是,在大跃进中,几亿人民停止了思想,被

制服了。

当大跃进把全国搞乱，民怨沸腾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武昌会议上，给各省领导人传授控制局面的妙法，他说：‘青岛会议（按：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是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把大跃进说成是自发的群众运动，是人民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完全是文过饰非之词。大跃进的‘第一推动力’是毛泽东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愿望。他要当世界级的大英雄，中国是他的舞台，人民是他的道具。

毛泽东认为他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条件，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中国的经济。他太急迫了，又把赶超英美的时间提前再提前。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宣布：十五年赶上英国。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说：‘七年赶上英国，再八年赶上美国，就是十五年赶上美国，这是个突变。当然突变不是一下子来的。七年赶英国，七年要分七个阶段，一年分四季，有十二个月，分三百六十五天，这中间有许多部分的突变，如煤只要二、三年就能赶上英国。但大部分是量变。突变优于量变，没有量变不可能有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走向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薄一波的一份报告上批

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这样，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不到十个月的时间，毛泽东的思想又发生了飞跃，由十五年赶上英国，变成一年超过英国。昏昏然，纷纷然，毛泽东的功业心驱使他处于亢奋、痴迷的状态。然而他还到处讲话，而且是讲唯物论和辩证法，批判别人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封建王朝留下的谚语是：是王好剑术，百姓多疮痍；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为。毛泽东好什么呢？好高速度，好大跃进，好一年超过英国。下边的各级干部在升官的巨大诱惑和保官的巨大政治压力下，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去创造奇迹，实在创造不出来也得把奇迹编造出来；既然不能说，就只好说谎造假。

我们看看国务院各部是怎样编造计划的吧！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九条提出了‘生产计划两个两本帐’的计划工作方法：‘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南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对于毛泽东的两本账工作法，中央财政部党组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写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是这样理解和贯彻执行的：‘这种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账，组织一次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收支指标，打破第一个平衡，编

制第二本账,组织第二次平衡。这种计划方法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提出来的,它是我国计划上的一次革命。’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组织第二次平衡’,实际上是不顾财力、物力的条件,留下很大的缺口,硬干,硬上,干成什么样算什么样。

周恩来也被逼得改变了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由过去立足于上年的实际情况,根据财力、物力情况,制定下一年的计划,改为从十五年赶超英国的政治需要出发,来确定各个五年计划标,再分配每年的产量指标。简单地说是由根据经济上的可能制定计划,改变为根据政治上需要来制定计划。他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的报告》中说:‘根据十五年钢铁产量要赶上英国的任务,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达到一千五百万吨(按:指钢),去年是生产五百二十四万吨,比起来差一千万吨,那我们第一年起码得增加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吨,每年二百万吨,才能加上去。为什么我们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达到一千五百万吨?因为英国现有二千一百万吨钢,我们设想在十五年后他们国家估计四千万吨的样子。那么,我们就要十五年后达到四千五百万吨,才能够有把握赶上和超过它。’

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各部,就是这样‘紧跟’,仍然跟不上毛泽东的速度。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时,关于钢产量,确定一九五九年生产钢六百二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十七;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时,把南宁会议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一九五八年指标,作为中央的第一本账,另搞了一个第二本账计划。改为生产钢七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五;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八大二次会议后冶金工业部向中央

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八年产钢八百二十万吨的新指标；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一点吧，（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至于翻一番的根据是什么？条件是什么？根本不论，完全是领袖意志。

这时候，农业已弄虚作假，大放高产卫星了。

地方大员中，有些人只想迎合上意，不顾人民死活。如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国，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他宣布要一年完成。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他带头放了第一个高产卫星，宣布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创亩产二千一首零五斤的记录。后来他这个省饿死人最多。但当时‘人民日报’一登河南的高产卫星，吴芝国又得了头彩。湖北、河北不甘落后，得了二彩和三彩。六月九日，湖北襄阳，亩产二千斤；六月十一日，河北魏县，亩产二千三百九十四斤；六月十六日，湖北谷城，亩产四千三百五十三斤；六月十六日，河北临漳，亩产三千六百五十斤；六月十六日，湖北光化，亩产三十六百六十四斤；六月十八日，河南商邱，亩产四千四百一十二斤；六月二十一日，河南辉县，亩产四千五百三十五斤；六月二十三日，湖北谷城，亩产四千六百八十九斤；六月三十日，河北安国，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七月十二日，河南西平，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河南、湖北、河北，这三个省像打擂台一样，在报纸上争高下，吹牛皮。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他是专为与毛泽东商议关于建立共同舰队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而来。陪同他来访的有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和副部长费德林。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南苑机场迎接。但赫鲁晓夫走下飞机时，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毛泽东上前

与赫鲁晓夫握手,显得很冷淡。从机场到中南海,毛泽东也没陪同赫鲁晓夫坐一辆车。

正式会谈在颐年堂进行,只邓小平和杨尚昆陪同。李越然为中方翻译。苏联副外长费德林兼作对方翻译。

‘一路上还好吧?’毛泽东说。

‘还好。你健康吧?’赫鲁晓夫回答。

‘自我感觉良好。’略停一下,毛泽东就单刀直入进入正题:‘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意思,但说不清楚你们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毛泽东表情严肃。

赫鲁晓夫想缓和气氛,讪笑着说:‘尤金告诉我了,说你很火。尤金不行,他没讲清楚。我们只是想法,跟你们商量……’

‘请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单刀直入。

‘嗯、嗯,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赫鲁晓夫想避开要害,慢慢谈。‘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

毛泽东拂袖而起,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还是不敢正面交锋,委婉地说:‘我们不过是来跟你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

费德林提醒苏共第一书记：‘毛泽东可真动火了。’

赫鲁晓夫诡诈地眨眨眼睛，作双手摊开的姿式，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和中国同志商量，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尤金跟我谈，明明是说要搞共同舰队。’毛泽东不承认有误解的意思。

赫鲁晓夫摇摇头说：‘你这么不好商量事情，就不好了。’稍顿，又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不行！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情。’毛泽东断然回绝，毫无通融余地。

赫鲁晓夫压住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愤怒，平和地说：‘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和的话，毛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吸一口烟，也改成了慢条斯理的语气：‘我们不想去你们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又吸一口烟，毛泽东补充说：‘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还有许多别的外国人在我们国土上呆过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说：‘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一九五四年我到这儿来，我们把旅大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 and 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二十五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重复两遍，截

断了赫鲁晓夫的话,结束了第一次会谈,送赫鲁晓夫上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下榻。

第二天,又把赫鲁晓夫接来。赫鲁晓夫被引到毛泽东的私人游泳池旁边。只见毛已换好游泳裤,身上披一件毛巾浴衣,不拘形迹地在吸烟。刘少奇、邓小平穿着齐整陪坐在一旁。赫鲁晓夫心里着实不悦。按外交礼仪,昨天在你这会谈,今天你毛泽东应到国宾馆看我,才算对等;就算我让一步,又到你这里来,你事先并未问我会不会游泳,愿意不愿意游泳,就这样不庄重地跟我见面,好像罗为国王召见属国使臣一样。赫鲁晓夫摒住气,坐在客位的藤椅上,开始了和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

关于建立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提出一个反建议:‘请苏联给我们必要的贷款,我们自己来建立这个电台。’

‘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会把图纸、设备和技术顾问都给你们送来,还会给你们所需要的贷款。’赫鲁晓夫敷衍着。二人又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主要是毛泽东发议论,然后,一起游泳。赫鲁晓夫不精此道,只见毛泽东推涛戏浪,旁若无人,心里更不痛快。

双方没再争吵,长波电台问题说罢就搁置起来了。苏联没给这笔贷款,中国也没建这座长波电台。

赫鲁晓夫于八月三日离开北京回莫斯科。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汇报中国之行时,他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都不理解我们的盟友——一个我已经觉察到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人’。

97 南巡千里 化日光天说假话 鹤鸣一声 忠朋爱国吐真言

送走赫鲁晓夫，毛泽东南巡去也。卫士长李银桥替他打点行装。毛泽东出巡，犹如孔夫子搬家——尽是书。根据需要李银桥找人特制两个大木箱，分层次的，可以分门别类地把各种书装在一定的位置，到了驻跸之地，又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把这些书摆放陈列起来，保证毛泽东随手可以找到要读的书，做到不丢不乱。这次出发，除带上毛泽东正在阅读的《三国志》、《楚辞》等史书外，还有冶金学、土壤学等科普著作。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的专列自北京出发，第一站到河北徐水。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毛泽东视察。八月初骄阳似火，毛泽东头戴一顶大草帽，走几步就汗流浹背了。步出车站，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个大标语牌，上面画的是徐水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平面规划图。县委书记指指点点，向伟大领袖介绍他们的宏伟构想。然后驱车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粮食加工厂、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厂，又在社干部的陪同下参观了农业社的幼儿园和敬老院（供养无子女依靠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毛泽东同老人们订亲切握手问候。又看了农业社办的集体食堂，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新鲜事物之一。最后，张国忠领路，带领伟大领袖来看本县的杰作——丰产田。据几天后进行

追踪采访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报道说：

大寺各庄的卫星山药更是花样繁多。毛主席看过的一种粪堆形山药(地),是用粪和土垒起一个个堆堆,在堆堆上栽满秧子,既提高了土地利用,又肥力厚实。还有毛主席看过的一条埂道上分别是种四行、八行和十二行的山药,过去每亩两千棵秧子的耕作法发展到这里的每亩一万五千棵,计划产量是从每亩二十万斤直到一百万斤。大寺各庄还有多样化的沼气山药(地)。用粪垒成个堆堆,外面使土密封,土上栽满山药;堆顶上插一个竹管直通粪堆,从竹管上浇下水去催动肥料发酵并放出沼气,这样来养育土层和作物。或是用粪垒成一个圆锥形的山坡,沿着山坡把土砌成一级级的楼梯,在每一级楼梯上栽山药。再就,是用粪垒成一个圆锥形的实塔,再沿着塔坡把土围成一层层环形的梯级,在每个梯层上栽种山药。这后面两种沼气堆的顶部,也都插入了浇水的竹管。此外,大寺各庄的多样化的沼气堆,现在已经发展到栽种徐水有名的大白菜,或是栽种葡萄。所有这些利用沼气或不利用沼气的卫星作物,不仅粪大水勤,而且还施钾肥、喷磷肥和种生长素,大寺各庄亩产百万斤的山药,甚至还浇狗肉汤。

看完亩产百万斤的山药地,毛泽东又来到了大寺各庄的七亩棉花地里。著名作家康濯的追踪报道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看过的三棵棉枝都绑上了红布。每亩四千棵,平均高六尺,谁看了都说那是棉花树。每棵平均果枝二十五个,成铃四十个,花蕾四十五个;成铃最多的已这一棵一百一十个,眼前的情况就可亩产皮棉近二千斤。但人们还要叫棉花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一百二十个棉铃,以保证亩产五千斤皮棉,这七亩地的耕作有稀密对比和早晚时比的,还有搭起棚子,晚上在棚顶

盖被罩，棚下用电灯光照明催生的一片。这里每亩产施底肥五万四千斤；喷磷酸钙一百二十斤；追硫镣四次，共用一百七十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轰七次，锄八遍，浇水两次，整枝十次。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再三说过要赶快拍成重影。这片棉花将如许多人所说今年秋后农业上不知要出现多少赫人的高产怪事那样，会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康濯的报告最后说：

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达成一片，要把这儿的粮食亩产从去年的二百一十四斤提高列今年的两千斤。人民公社的建立和毛主席的视察，就是目前争取两千斤的足以使山倒海平的力量。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一个二分地的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可除了几万人大的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套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造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这是当时在宣传工作上进行与论导向的一篇代表作。毛泽东八月四日参观徐水。康濯紧跟着追踪采访，写成《徐水人民公社颂》于二十六天后，即九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如果河北省委和徐水县委弄虚作假露了底，毛泽东好看到的某些现象表示怀疑，表示不欣赏，有所制止，有所批评，有所纠正，报道的与论导向就是另外两种这精神了。《人民日报》这篇‘本报特约记者’的报道告诉全国五亿家民和一亿城里人：徐水县的领

导和农民所干的一切,已受到伟大领袖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徐水的方向就是全国两千个县的方向!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毛主席视察徐水安置定县》,记载下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和毛泽东的一番对话。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问张国忠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哩!”毛主席指示说,还应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从此,毛泽东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里着实发过一阵子说:粮食多了怎么办?

毛泽东八月四日视察徐水之后,刘少奇为了表示紧跟,八月六日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率工作组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宣布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九月二十日,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从九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农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八元,科局级五元,一般干部三元,平民百姓两元。同时宣布,对全县老百姓实行‘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

于是,徐水这个不出名的河北小县,出了大名。当年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九百三十多名外国人去参观,有三千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去‘取经’学习。赫鲁晓夫知道后,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看个究竟。赫鲁晓夫听了记者的汇报后说:‘中国的共产主义

是喝大锅的清水汤，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

这年十一月，县里筹款五百五十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们发了第一次工资及部分生活用品。十二月，又筹了九十万元，终因罗掘俱穷，点金无术，凑不起必要的款项，便挪用商业上的流动资金七百万元，发了第二次工资和实物。实际是把县百货公司和供销社的东西给分了。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县就这样折了。但事后毛泽东批评说：‘徐水县是急急忙忙往前闯。’此是后话，立此存照。

毛泽东看罢河北的三个县，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到十八日又视察了河南农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国和省委书记杨蔚屏、史向生陪同毛泽东视察。

六日下午，毛泽东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乡。全乡农业社合并成立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照例是先看托儿所、‘幸福院’、食堂，然后麦粉加工厂和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听说这个小工厂两天里生产出五千多滚珠极为称赞。在社干部引导下，毛泽东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毛泽东问社干部：‘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泽东笑着对吴芝国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国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在长葛县‘五四’农业社，毛泽东在县委书记吕炳光的引导下，看了长势喜人的麦茬玉米。县委书记介绍说：‘这是四十亩密植麦茬玉米，计划亩产两万斤。’他指指附近的另一块地说：‘那一块是干部玉米试验田，长得更好些，计划亩产两万五千斤。’毛泽东问：‘今年你们全县平均亩产多少？’吕炳光答：‘保

证一千一百斤，争取两千斤。’毛泽东笑了，又问一句：‘能达到吗？’‘一定达到，秋后到北京给主席报喜。’吕炳光满怀信心地回答。

在商丘县道口乡中华农业社‘七一’试验站，毛泽东看了架秧和不架秧的两种试验红薯，以及这个社第一次试验的水稻。当看到高粱的时候，毛泽东问：‘有没有多穗高粱？’商丘地委第二书记任秀峰回答说：‘有许多地方种了这种高粱。’毛泽东说：‘这种高粱产量高。’

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了三天，八月九日到了山东，由省委书记谭启笼、裴孟飞陪同来到历城县北园乡，就在这里，毛泽东说了那句惊天动地，几乎‘一言丧邦’的‘人民公社好’。在北国农业社的稻田里，毛泽东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泽东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真们要争取亩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一路之上，毛泽东到处看到群众冲天的干劲、到处听到想像不到的大丰收的醉人前景。毛泽东心醉了。

到了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上将参见最高统帅。在杨将军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正在召开军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合影留念。代表中有长征中给他当警卫员的陈昌奉上校，毛泽东与这个当年的‘红小鬼’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农业问题过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这是毛泽东视察三省获得的总概念。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根据他的指示，把政治局委员、各省市党的第一书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召到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举世罕见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要

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列了十七个，主要议题是两个：一是人民公社问题，一是大炼钢铁问题，

毛泽东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会上说：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千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每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在八月三十日会议上，他说：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渔盐林牧副，人民公社都有。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劳动妇女可以得到解放。……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就搞掉了。……看起来只要把章程搞好，全国可能很快。秋冬可能搞得差不多了。当然实行工资制和吃饭不要钱，还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人民公社，一下出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二十四条，这是它的宪法。

这个河南卫星公社就是河南遂平县嵒嵒山人民公社，被尊‘公社宪法’的‘章程’第四条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这就是将穷队和富队拉平。后来毛泽东批评‘共产风’，所谓‘一平二调三收款’，

盖源于这个‘章程’。第五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和林木转为公社公有，应该折价为率人投资。’第十三条规定：‘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第十五条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第十七条规定：‘公有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第二十条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这个《章程》的要害是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土地、房屋、对农业社的投资、牲畜、林木等等。得到的就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吃饭，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毛泽东对推广这个《章程》很热心。他说：‘嵒岬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辨，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刘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把嵒岬山卫星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九月一日出版）全文发表了。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就像受了‘皇封’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嵒岬山的‘共产’经验一推广，‘共产风’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像八级台风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刮开了在北戴河海滨的毛泽东丝毫没有意识到他闯下了滔天大祸，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这从他邀请张治中一起到南方视察一事可以看出来。

一九五八年八月末的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的北戴河别墅吃饭、看电影。席间，毛泽东说：‘文白先生，我想到外

地去视察，你市愿同行？张治中说：‘能够有这样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于是，一言为定，相约先回北京，一起南下视察。在国民党营垒时，张治中多次陪同蒋介石外出视察。毛泽东不邀别人，单邀张治中，显然是想让张治中看看他治国安邦的手段和魄力。

九月十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和张治中分坐两架专机由北京飞武汉，十一点四十分到达，在东湖宾馆下榻。住下后，毛泽东对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交代：‘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党老同志，一大代表。他比我大六岁，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此人如来看我，随时可见，你们不要挡驾。’

就是这次武汉之行，毛泽东与李达大吵了一顿。

事情的缘起，是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干部刘西瑞的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在文章中说：‘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

在这样的与论导向之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湖北鄂城县县政府大门口贴出了两条标语：一条是‘宁愿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一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两条标语被搞社会调查的武大学生写在调查报告里，送给了李达校长。李达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条件的，无限地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为害不浅。决定立即去见毛润之。

这时，毛泽东正在会见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谈论游击战问

题,陈毅陪同在座。李达在梅白的陪同下来到东湖甲舍,稍候一会儿,毛泽东送别卡斯特罗,立即传见李达。

‘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句通通不通?’真是故人见面,李达一句客套没有,逼毛泽东对这个口号表态。

机智善辩的高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然后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旁征博引:‘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对打断他的话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拚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大人們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对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适可而止。

毛泽东看见了,冲着这位秘书长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四十四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这是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听到的唯一的几句忠言。

‘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毛泽东的意思是:你敢这样对我讲话,实在是热晕了头。

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火头上,表示告辞。毛泽东说:‘小梅,你送李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

李连在梅白的陪送下上了汽车。在车中,李达说:‘My-Dearxi - aomein(注:我亲爱的小梅),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和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关?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回到东湖宾馆,毛泽东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真;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与李达干起来。’停了一下,毛泽东又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梅白听伟大领袖在他这样一个晚辈、一个下级干部面前说这番话,很受感动。趁机会把李达在车上说的那些话转告毛泽东。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很动感情,他叫梅由教他英语中‘我亲爱的鹤鸣兄’怎么发音。然后说:‘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

唯心精神。你先告诉李达周志,改日我们再谈,感激他的帮助。’

梅白如实向李达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李达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李达这一番谏言,使毛泽东清醒了许多;但是,还没有完全清醒。他的‘左’的冒进的思想支配了中共全党和全国,全党和全国的‘左’的冒进的情绪又反转过来影响了毛泽东。他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固然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亩产几万斤麦稻可能有虚夸,但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是无疑的,粮食过关了是无疑的,看了那么许多地方,难道都是假的!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王任重、张治中等人陪同下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和珞珈山武汉大学之后,离开湖北前往安徽。仍偕张治中同行。张治中被请到毛泽东的座车上叙话,见毛泽东的书案上放置一本冶金学,就说:‘您也钻研科技方面的书?’毛泽东莞尔一笑:‘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书案上放的另一本书是《三国志》,书翻开,毛泽东正读《吕蒙传》。话就从吕蒙谈起。在座的除张治中外,还有毛每次出巡都随行保驾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打败产关羽的就是这个吕蒙。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吕蒙传》。’

车到安徽合肥,第一书记曾希圣来接驾。毛泽东在曾希圣陪同下视察了舒荣人民公社。当听到社干部介绍他们已做到‘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满意地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一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

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又视察了江苏、上海，于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北戴河会议公报，除公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产量指标外，还向全世界隆重推出了人民公社制度，公报是这样说的：

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舍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毛泽东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那时中共正在批判教条主义。林彪带头，贬低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在各方面都超过了马克思，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叫作‘洞察一切’。公平地说，毛泽东在有些领域，例如军事领域，确实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是不懂打仗，不会打仗的；但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大概相当于马克思在军事领域的水平。但毛泽东不谦虚了，也飘飘然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经济领域搞‘领袖意志’，那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关于公社问题，马克思早在《资本论》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成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账员，登记农业账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

护送到另一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过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问；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个特人，他在有些公社会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会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负责。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的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木匠、铁匠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九五——三九六页）

在十八世纪的印度存在过的这种‘公社’，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公社’何其相似乃尔！也是共同耕种土地，也是政社合一，也是工农兵学都有，只要把‘首领’换成‘党委书记’，把拘捕罪犯保护旅客的官吏换成‘公社武装部长’，把管占卜的‘婆罗门’气象预报员’，全套‘管理机构’可以原封不动地运转。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沦缅于《三国志》，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推到世界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印度公社是如何被历史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98 劳民伤财 九千万人炼钢铁 忍饿挨饿 五亿农民进食堂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钢铁翻一番下了死命令。他说：

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让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地、蒜、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党有头，责有主。……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走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以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去。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铜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和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

笔者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传出的记录稿，没有看到原始记录。但精神是不会错的。只对最后一句存疑，毛泽东似不应荒唐到下命令拆铁路送去炼钢，以凑数完成翻一番的任务！但记录稿上就是这么写的。他对自己说过的话能否兑现，看得

极重,实际上是暗示中央和省的领导人,强迫命令,铁腕政策,不惜代价,把铁轨回炉,也要完成翻一番的任务。

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戴河专门召开了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中央钢铁的头’、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向各省下达下指标。钢铁工业基础薄弱的山西省要在年底以前完成六十八万吨铁,五十五万吨钢。几乎投有钢铁工业的广西省(第一个五年计划该省共生产铁一点七万吨),受领的任务是四个月内完成二十万吨生铁的任务。全国在本年度后四个月,九月要生产二百万吨铁,一百二十万吨钢;十月要完成二百八十万吨铁,一百六十万吨钢;十月要完成三百二十万吨铁;二百万吨钢;十月要完成三百五十万吨铁,二百二十万吨钢。总计在一九五八年九至十二月,要完成一千一百五十万吨铁,六百八十万吨钢。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北戴河会议公报,用的是通栏大字标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按照今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六百二十万吨,比去年增产八十五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五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八百万吨至八百五十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开完北戴河会议回到北京,根据毛泽东‘要每星期抓一次’的精神,九月四日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委书记电话会

议，动员钢铁大跃进。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电话会议上说：‘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主席又提出来，一千一百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少了就是失败了。这个要求也不能不完成。这就势必要逼得我们又要拿出相当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办小高炉。’

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说：‘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说，钢铁上不去，其他就跟着上不去，你不能光吃粮食。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九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国跟得最紧，率先组织了本省钢铁大跃进。赶在九月十五日放了第一颗钢铁‘卫星’。据《人民日报》十七日报道，九月十五日，河南全省建成四万五千多座炼钢炉，动员三百六十万农民，出动四十万零七千辆各种运输车辆，‘打了一个日产生铁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三点九；吨的大胜仗。’而这个省在九月上旬，即九月十日前日产生铁只有七百八十多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比老钢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个省当时的日产量还要高。河南大捷证明，生铁这一关是一定能够突破的。要求各地像河南一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争取九月份内根本扭转土高炉生铁生产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力月份的产铁计划。

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这时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不相信河南的‘卫星’，派工业秘书顾明去抽查一个点。顾明曾留学日本，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过，是个内行。他到放了日产生铁一百

零二吨高产卫星的新乡，向干部和群众作了调查，看了现场；还带回了一块生铁样品，向周恩来汇报说：‘完全是弄虚作假。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两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要十多吨。日产一百零二吨生铁，原材料要一千多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动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总理请看，最上乘的产品就是这种海绵铁。’周恩来接过样品，良久无言，后来才掂量着那块铁说：‘这哪里是铁嘛？’后来这块‘卫星铁’一直摆在总理办公室的书架上。

某日，一个省的领导人给周恩来打电话：‘总理，邻省都放了卫星，我们压力太大了，让我们也放个卫星吧。’周恩来说：‘你们别放了，不要再放了。’周恩来在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炉子炼铁的农民不认识矿石，往往把较重的黑石头当作铁矿石，把一吨当成一担。周恩来下令调了一万三十多名化学系的大学生，派往各地指导。虽说杯水车薪，周恩来的力量只有那么大了。他无权下令把这种疯狂的大炼钢铁运动停下来。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封了‘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等于不要周恩来管钢铁的事。作为总理，周恩来还是每周开一次钢铁会议，以求加强领导，减少的损失。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竟不到会，周恩来生气批评说：‘大炼钢铁是你们提的，为什么不来开会？’王鹤寿也并不是故意藐视总理，他有他的难处。他要听周恩来的，就完不成毛泽东给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铜的任务；要想‘完成’毛泽东给的一千零七十万吨的任务，只好避开讲求务实和科学的周恩来。

周恩来虽然发现了河南的钢铁卫星有似，但当时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其实看出卫星产量有假的何止周恩来一人！因为‘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河南的钢铁卫

星,是这样应运而‘放’的。谁要敢对河南的钢铁卫星有怀疑,谁要敢否定河南的做法,就是反对钢铁大跃进,就是;跟毛泽东唱对台戏,就会使毛泽东发出的‘伟大号召’变成空话而下不了台!而毛泽东的威信和面子,这时候已被摆在了所谓‘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时候各级干部有一句自我解脱的话,就是:‘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质言之,所谓政治账,就是毛泽东的面子;所谓经济账,就是人民财产的损失。

河南这个样一树,各省、地、县的书记们就知所趋赴了。《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报道了第二个典型——湖南省邵阳专区。报道说:

在工业战线上也是这样,谁发动群众最彻底,群众运动的声势最大,谁就能飞得最快,跳得最速,奇迹也就出现最多。湖南省的邵阳专区,是一个生铁生产发展很快的地区。邵阳专区是怎样组织生铁生产大跃进的?最主要的,也就是彻底发群众,造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们组织了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使‘为什么要发展钢铁生产、如何发展钢铁生产’的遭理家喻户晓,从而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干部、九十三万群众投入炼钢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采。’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七万多人找到一百二十处铁矿和五十一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二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六千多吨焦煤,当群众发动州这样的程度,奇迹就一定出现。河北省武安县所以能在三天之内使生铁产量段一百多吨提高到一千多吨,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组织了十二万人投入钢铁战线。山东等省为什么敢于提

出万吨省的目标？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因而满怀信心。

为了在一九五八年年底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按月按日计算，九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三十日为止，钢的日产量必须达到六万吨，而生铁产量必须达到日产十万吨，‘否则是不行的’。要求从省、地、县到乡，各级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钢铁大会战。为了完成这样的指标，计划十月份在全国建起三十几万座小高炉。中央书记处要求安徽、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山东六省力争在九月底以前达到日产生铁万吨的目标。要求全国有三十个到五十个日产千吨铁的县。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南巡回京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层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一显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评的‘还有一些同志’，显然是指各级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王鹤寿坐不住了。十月七日至九日，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土法炼钢促进会。十一日，又在河南商城召开同类会议。据当时计算，在一九五八年最后三个月里，现代化高炉炼出来的好铁，只能满足钢产量翻番的四分之一，下欠的四分之三炼钢用的生铁，要靠土法冶炼。冶金部连续

召开两次现场会,就是要介绍、推广土法冶炼方法,宣传所谓小(小高炉、小转炉、小平炉)、土(土法炼铁、炼钢)、举(大搞群众运动),大破‘保守思想’、‘怀疑论’和‘条件论’。配合宣传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健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指出:

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怎样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通通调动起来呢?许多地穷的经验证明:大办土高炉最能把千百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最能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

九月一日到二十日生产出的全部生铁中有百分之五十左右都是土高炉生产的,这个比重还可能提高。可见土高炉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许多地方九月份的生铁生产上升得比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抓紧了土高炉。广大的群众,不管是五、六十几的老太太,不管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出一份力量,因而出现了男女老少一齐动手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几万座土高炉铁水齐流的兴旺局面。

有人认为是尚。炉耗费的劳动力太多,生产成本太高,不经济,不合算,是的,搞土高炉必须要动员很多人,生产成本是比较高,但是,问题在于速度,在于争取时开,就是汉必须保证今年拿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铜,少一吨也不行。

十月四日至十一月十四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认为:两个月来以钢为纲的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巨大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它的伟大的政治意义,找到了以钢为纲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道路。从此,我国工业化事业将由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来搞。通过运动,打破辨工业的神秘观点,打破消极平衡论,建立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积极平衡论。炼钢又炼人,使全国人民都

受到多种锻炼。会议要求今冬明春要广泛发动群众,把以钢为纲的群众运动引向更高阶段,要调整、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小、上、群’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工作,为迎接明年工业生产更大的跟进而奋斗。

组织生产本来是政府系统的事情,但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被抛在一旁了。毛泽东不断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书记挂帅,党的组织系统成为最有权威、最有效率的系统。两次书记虚电话会议,两次工业书记会议,首先把全党、进而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了,‘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而奋斗’成为全国同治经济生活中最强劲的主旋律。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钢铁元帅升帐’,其他一切都要让路。《人民日报》九月五日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势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实现‘一〇七〇’。

为了伟大领袖的面子,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疯了’。七月底,用在钢铁工业上的劳动力不过几十万人。八月底,增至几百万人。九月底,猛增到五千万人。十月底,增至六千万人。年底,达到九千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大炼钢铁的,全国投入的劳动力超过一亿以上。

随着人数的激增,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按比例增长。七

月,有三万多座。八月底,增至十七万座。九月底,增至六十多万座。十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不但公社炼钢,而且部队、学校、甚至外交部和文联,以至于孙夫人宋庆龄公馆的后院,都建起了炼钢炉。那时你若有幸乘火车在神州大地巡游,那真是空前绝后的壮观景象。铁路两侧,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标语醒目,红旗招展。昼夜三班倒,人停炉不停。新建的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还把砖瓦厂、瓷窑改成了小高炉、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遗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都改造成为土法炼铁的炉具。钢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的地方,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铲,庙宇里的铁香炉,铁鼎,殷家庭的铁门、铁栅等一切能搜罗到的铁器送到炉里去。炼出来的烧结铁,铁丝支支楞楞,半个门环镶嵌在铁疙瘩上。但这都作为产量放了‘卫星’。

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一〇七〇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钢产量一千一百零八万吨,生铁产量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但有三百零八万吨钢,四百一十六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两冶炼这些土钢铁,国家贴补了五十个亿人民币,还不算公社和农民自己为炼这些土钢土铁所付的代价。当时一吨生铁的市价是一百五十元,土法炼一吨铁的成本是三百四十五元,那真是赔本赚吆喝。造就是所谓‘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三年大跃进(包括大炼钢铁和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大陆官方认可的估计是一千二百亿元人民币。真乃图虚名得实祸。

一九五八年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大放异彩的一年。世界观察家看中国,难免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这一年,毛泽东除了提倡大炼钢铁以外,还提出在全国城乡大办公共食堂。七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农业社办食堂进生产发展和集本主义思想成长》的新闻,内容如下:

最近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部分地区的农业社,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劳畜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根据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经过试点举办公共食堂,受到群众欢迎。

福建安溪县委合作部总结公共食堂有八大好处,主要是:一、吃饭时间一致了,社员出工、开会和学习都不再互相等待了,可以节省出许多劳力用于生产;二、可以把妇女劳动力从做饭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增加了一批劳动力;三、解决了单身汉做饭、喂猪的困难;四、家畜家禽集体喂养了,社会的轻微劳动就多一些,稍能劳动的五保户都可以参加工作,这样就减少了五保户,减轻了社员的负担;五、有计划地用粮,就可以消灭吃过头粮的现象,也没有人闹粮食问题了;六、便于发展集体副业;七、过去夫妇、妯娌、姑嫂、婆媳之间,往往因做饭吃饭问题闹意见,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家庭和睦了;八、人畜分居,卫生情况大改善,社员心情舒畅。把这些好处归结起来,就是增加了劳动力,减少了粮食问题的矛盾,团结了群众,提高了社员集体主义觉悟。安溪县委合作部还专门总结了湖头乡高山社办公共食堂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

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提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

城市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河南范县要在全县吃食堂的基础上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十月二十八日县委书记向全县积极分子作报告说:‘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一个县委书记,不懂经济,不懂社会发展规律,作此梦呓,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伟大舵手’毛泽东竟然认为这是可行的,他于十一月六日在范县的报告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共的机关报传达的是党的号召,主席的号召。于是,在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到一九五八年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三百四十多万个。河南最彻底,到食堂吃饭的人达到社员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

一开始,食堂很‘红火’了一阵子,虽无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放开肚皮吃饭’;一个是‘吃饭不要钱’。据薄一波回忆:‘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发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看这种景象,真是‘君子国’的世界。

但好景不长。虽虽然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但有一个根本的缺点,这就是:大锅饭,养懒人。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赖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反正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勤劳的农民想:下多大力气起早贪黑,深耕细作,多产

多少粮食,也是全部归公,自己混个‘肚儿圆’;懒惰的农民原来还随大流出工,只是多歇几次,多吸几袋烟,队长看不见的时候早收工,今见啥也不干的二流子、甚至过路人都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索兴工也不出了。于是没有人关心生产,没有人下功夫把庄稼种好。社队干部本来都是种能手,如今忽然变得啥也不懂了,得听报上介绍的那些‘丰产’经验。些亩产几万斤的卫星田,据说有两条根本经验,一是深翻,一是密植。一九五八年夏种和秋种之时,各地普遍对耕地进行了深翻,深度一般在一尺五寸,有的地区深达三尺。甘肃武威北河公社的试验田为全国之冠,深翻达到了一丈二尺,下种七百万斤小麦,预计亩产要达六十万斤,实收了六百万斤,这是没登报的。登了报的徐水县漕庄公社是:‘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三十万斤;种籽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功夫播下,防止大粪烧芽;土地垒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灌溉,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一千万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八十粒小麦,就是亩产十二万斤。’有方法,有数据,硬是睁着大眼说胡话!据报载,说这番话的是当过中共漕庄乡党委书记的农民刘廷奎,务实的农民变态了。

一九五八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收获季节,全民炼钢铁正在节骨眼上,为了保钢,保那个国虚名得实祸的‘一〇七〇’,把青壮劳力都赶上了钢铁第一线。农村的景象就如湖南平江县一位伤残的老红军寄给彭德怀元帅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杀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当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比上年减少了三千八百一十八万

人,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十三点八比一下降到三点五比一。大量的运输工具和牲畜也被用于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的(当然是最保守的)估计,‘一九五八年农产物估计有百分之十左右未收回。’

一个虚报产量,一个丰产不丰收,一个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败象到一九五八年年底就逐渐暴露了。食堂由干饭变稀饭,而且越来越稀,由粮食而瓜菜代,终于难以为继了。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年高望重的朱德元帅视察广东,在同江门地委领导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八月十六日他在吉林视察时又对省委负责人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七月九日,他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的人以为愚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七月十一日,朱德在长沙同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

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道是个很大的教训。’

朱德讲话的精神,虽无文件下达,还是流传开了。一九五九年夏,发生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全部公共食堂的事件,他提出:‘三还原,两开放’,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体所有的渔塘开放,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的锅灶,这个县共解散了四千多个公共食堂。对无为解散公共食堂事件,毛泽东勃然大怒。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他亲笔写下了《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语》,说张恺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这个文件发到全党,全党惊骇莫名。承担分裂党的罪名,是要有点资格的,一个省委书记处书记解散了一个县的食堂,怎么能上纲这么高?当时大家不理解,毛泽东这则批语,是明批张恺帆、暗批朱德的。八月十二日他在庐山会议常委会议上讲,他担心‘总司令能随乱子’。就是指朱德对食堂问题说了几句实事求是但和毛口径不一致的话。毛泽东在巩固领袖地位问题上是非常敏感(甚至是神经过敏),见微而知著的。凡全局性的问题,他不能容忍别的常委先讲话,讲对了也不行。他认为这是谁当家,谁说了算的问题。

贵州省委书记周林。摸准了大方向,于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于二月二十四日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全省十三万个食堂,有百分之八十是巩固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不甚巩固。‘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

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扯垮食堂,为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围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批示‘贵州省委的报告写得很好……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不久,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文件,要求各省学贵州,粮食分配原则是‘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指明食堂的发展方向是‘向全民食堂过渡’。(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

实际上,公共食堂面临严重的危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情。毛泽东虽仍固执地不回头,但他也需要了解真实情况,知道人民还有多大的承受力。一九五九年二月他派自己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率工作组前往四川调查。

田家英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才子。原名曾正昌,一九二年一月四日出生在四川成都。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于他博闻强记,熟读经史,兼擅诗词,很得毛泽东赏识。田家英率工作组来到成都北面的新繁县崇义桥。这是田家英的外祖家,他的一位舅母仍健在。他到这里来,是希望了解到真实情况。

田家英结识了大队支部书记林功谦。

‘你们每亩田能产多少斤呢?’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两万四千斤。’

‘真有那么多种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都广播了的,那还假的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与林功谦这一问一答,是崇义公社对付上级调查人员的标准答案。田家英又问了许多群众,都是这么说的。隔了几天,林功谦知道了田家英的身份,为他急于了解真实情况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才悄悄告诉他:‘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每亩只有六百五十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个小队长马世才,问道:‘你们队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三万斤。’按照虚报的产量,完成上缴征购任务后,理应还剩这么多。马世才硬着头皮回答。

‘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马世才打开了仓门。果见一堆稻谷,像个小山。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谷堆,只觉松泡泡有弹性,用竹杆一捅,稻谷纷纷下落,原来是一个稻草堆,上面撒了一层稻谷。马世才惭愧地低下了头。田家英知道基层干部说慌作假均出于无奈,没有责备这位队长,只是幽默地说:‘这些稻谷恍壳太多了!’恍壳是当地土语,指无实的空壳。

每到开饭的时间,田家英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食堂内外

观察；大家打完了饭，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陈大娘来打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发软跌倒在台阶上，全家的稀饭撒了一地。这位老人大哭起来，全家人靠这一盆粥活命啊！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陈大娘抽噎着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五斤粮票，要陈大娘去食堂称米。陈大娘感恩不尽，接过粮票，为了多活几天，她称的连麸面。这是全国几百万食堂的一个缩影。田家英在崇义桥呆了六个月，中间曾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初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毫无疑问，田家英是把公社虚报产量、农民吃食堂忍饥挨饿的真实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的。毛泽东显然认为，农民的承受能力还没有达到极限，他把自己的威信、地位摆在了几亿农民的忧患之上，顽固地坚持错误，直到一九六一年五、六月，毛泽东看到人民的忍耐力已达到极限了中共中央在北甯召开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才羞羞答答地决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就在这一段岁月，许多善良的农民饿死了。

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一九五九年全国人口增加一千一百一十三万，净增率为千分之十点一九（10.19%）；一九六〇年，人口减少一千一百万，净增率为负千分之四五点七（-45.7%）；一九六一年，人口继续减少三百四十八万，净增率为负千分之三点七八（-3.78%）。如果是正常岁月，一九六〇年净增率同上年，应是一千一百一十三万，现在是负增长一千一百万，如此相加估算，所谓‘非正常死亡’——饿死人，当在两千万

以上。如果毛泽东采纳老战友朱德的意见,及早解散食堂,允许人民自谋生路,不说避免饿死人,后果总可以大大减轻。就在他坚持错误的这两年,许多拥护共产党,听共产党的话的善良农民活活饿死了。那些土地改革中的贫苦农民,他们至死不反抗,固然有不敢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共产党、毛主席给自己分了房屋和土地,叫办公社,叫办食堂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怎么能反对自己的恩人呢!他们到死也不明白,大救星毛主席为什么会出这种主意呢?

毛泽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按照中共党内的术语,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这时,毛泽东头脑清醒了,他想得很深、很远,他出奇的沉着冷静。如毛泽东自己说过的,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改也难。难就难在要自己否定自己。他决心与自己提倡了一辈子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决裂,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决裂。他要发明一套理论,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谁能为他的错误辩护,谁就是亲密战友;谁要准备彻底纠正他的‘左’倾路缆错误,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内的多事之秋从此开始了。

99 倡导读书 领袖纠左定基调 探求真象 元帅微服访故乡

李达犯颜直谏之后，毛泽东见一叶而知秋，有所憬悟。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他又南巡视察了。

十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彭真给湖北省委打来电话，秘书长梅白接的。彭真说：‘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毛主席的专列将在明天即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左右在湖北孝感站外叉道停车两三个小时，与十五军座谈。请通知廖冠贤同志，并要同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和一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告诉任重同志准备好。’梅白问：‘谈什么内容？’彭真说：‘毛主席对中央向湖北提的今年年产六百亿斤粮食要摸个底，究竟能搞多少？’梅白立即向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张体学作了报告。

二十六日下午，驻孝感的空降第十五军政委廖冠贤周密部署了专列外围的警戒，与王任重、梅白提前赶到孝感车站东段叉道迎接一号专列。毛泽东先接见廖冠贤和十五军的领导干部。这时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和大队书记都来了，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也来了，大家在外面等候。

送走廖冠贤等军队干部，叶子龙引导王任重等登上专列，进入一间宽敞的会议室。简短寒暄后，由梅白代表王任重（因王发低烧）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日子不好过，

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达。’梅白说:‘彭真同志说主席对湖北年产六百亿斤粮食要摸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毛泽东说:‘就是要你讲真话。’

梅白开始了他的讲真话的汇报:‘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六十个生产队。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四两二钱粮食(注:每两折合五十克)。李家湾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日四两四钱。黄冈地委还要从黄梅调出四十万斤粮食,老百姓就要饿肚皮。我提议取消这个决定,经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调粮。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一九五八年能搞到二百亿斤左右,至多二百二十亿斤。’

毛泽东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然后伤感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的实际情况。’

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民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一级一级压出来的。’

这时,被指定背见七席的妇女代表晏桃香来了。由于连口夜战,她感冒了。一到专车跟前就打了个喷嚏。叶子龙怕她传染给主席,不让她上车。她说‘是组织通知我来的。’正在交涉,毛泽东看见了,说:‘快让她上来。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来,小姑娘请坐’晏桃香怯生生地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主观上是想离主席远一点,别把感冒传染给他各人家。不料刚下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了毛泽东一脸。地方官员们面面相觑,顿时空气紧张起来。毛泽东脸都没擦,和颜悦色地说:‘不要紧,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

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这几句话，气氛顿时缓和了。

毛泽东问：‘你怎么感冒了？’

晏桃香答：‘报告主席……’

毛泽东一摆手：‘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接着说：‘昨夜我开通宵夜车锄棉梗，天亮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率点灯吗？’

‘三百瓦电灯，还有二十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泽东转向劳动模范官木生：‘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她委，地委压县，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我同意梅白同志的汇报，我们现在不实事求是，要求中央实事求是，事实上有的人已经开始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动了感情，流着眼泪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意给湖北六百亿斤指标。六百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毛泽东又叮嘱在座的人：‘不要同叶子龙说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呀！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这件事晏桃香回家说了，全家都流了泪。基层干部和群众离去了。毛泽东对省、地、县委书记们说：‘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然而毛泽东是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从十一月初到一九五九年六月，这八个月中他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武昌会议（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六中全会（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第二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上海会议（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八届七中全会（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等一系列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失误。每次会议，他都作基调性讲话。在这几次会议上，他的姿态是：‘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综合他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其要点有四：

一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笔者按：这完全是伪造民意！这和毛泽东在季感火车站说的‘对不起人民’、‘国有流亡愧此生’的话简直判若两人）这个事实，不

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作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决心固守的一条防线，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要在这条防线上与中共全党和全国人民作战。

二是‘一个指头’的错误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

‘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人民公社是人民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这是不断革命，我们只是提倡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人民就自发搞起来了。’（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在北戴河讲话记录）

举起群众运动的盾牌，毛泽东就避开了自己的责任。‘一

个指头’的错误没他的份儿。这又和他在孝感车站专列上说的‘始作俑者，其无盾乎？’判若两人。

三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给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以指导，纠正他们‘急急忙忙往前闯’所造成的偏差。

十一月九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给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四级干部写了一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领导与会者读斯大林的书，边读边发议论时说：‘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正确，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这里批的是陈伯达。陈伯达在会上主张产品调拨固然该批，但所谓‘理论家’陈伯达是没有自己的理论观点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自己的灵魂的。他是完全靠刺探、揣摸毛泽东的意图，得先机之利，拉大旗作虎皮，在党内冒充先知先觉的。在郑州会议上上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开始回头时，陈伯达按毛泽东原来的思路继续往前走，碰了个大钉子。其实，违背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主张产品调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本人。他在八十天前，即八月十九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计划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省委书记调东西的‘条子要灵’。

毛泽东又批评说：‘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是谁把三级所有的界限模糊了？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又是毛泽东。他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大二

公，’所谓‘一大二公’就是复生产队所有制为范围更大的公社所有制。他钦定的公社‘宪法’，《酷轿佬枪。缙鲁獭饭娑骸，鞞讪一岛献魑绾喜(10)%。纾经经莨膊饕宕协作的精神，应该将‘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一交哪里还有什么！二级所有’呢？后来的所谓‘二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毛泽东掩盖公社化运动彻底失败的一块遮羞布，队为基础公社就名存实亡了。但公社的牌子不能摘。

四是他对强迫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必要性所作的解释。他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钓鱼就钓鱼，谁愿画画就画画，谁愿唱歌就唱哥人，谁愿跳舞就跳舞，怎么行呢？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灭亡了。’他的这种新颖的思路，新颖的语言，当时在中共党内是很得彩头的。但如果冷静一想，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试问，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以后，没有强制几千万人大炼钢铁，哪里出现了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的荒谬现象呢？！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引导的一系列会议中，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对形势的认识，被纳入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放一炮，他综合自己在六个大军区和十个省、自治区的所见所闻。以他惯常的坦诚和直率在会上发言‘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

来讲是不错了昵？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担心彭德怀的意见感染别人，急忙插话表态：‘德怀同志，你总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仅仅是下面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彭德怀急忙声明：‘主席，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才这样讲，我应该讲。’毛泽东微微一笑：‘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洞察幽微的周恩来会后提醒彭德怀：‘彭总，我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人了，如今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都要随之转变过来。主席不是多次讲过，要树立党的威信和对待两种崇拜观点的问题吗？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娴于辞令的周恩来这番话的要害是‘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按照中共党内的语言习惯，中央政治局的‘班长’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怕彭德怀闯祸，也怕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将吃亏。作如此善意的提醒。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对总理的话理解了，但回了一句：‘我认为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稍顿，又说：‘总理，我是个臭嘴媳妇，免不了有失公公婆婆体面的时候，请主席和总理海涵。’

辞别周恩来，彭德怀回北京处理西藏叛乱问题。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十三日，他率军事代表团先后访问了

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虽是出国访问，但国内的形势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故乡之行的见闻给他脑海打上的烙印太深了，无论是坐在飞机上，还是坐在火车上。闭眼就又回到了湖南……

那是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彭德怀元帅在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他穿一身青呢子服，圆口步鞋，全然是乡下老倌模样。在湘潭县乌石公社，那是元帅的家乡，彭元帅到来的消息传遍村村寨寨，乡亲们沸腾了。按照接待中央首长视察的规矩，先由公社领导人汇报。当公社书记谈到他们的‘小、土、众’炼出了六百四十多吨铁时，彭德怀追问‘是怎么炼的？’公社书记说：‘为保钢铁元帅上马，我们是不惜血本的，劳力由公社统一调配，青壮男女齐上阵，县里还从外地调来劳力支援。燃料主要靠砍伐森林，还拆了一部分房子，挖了一些坟墓……’听到此处，彭德怀火了：‘砍森林，拆房子，挖祖坟，砸锅卖铁，真算得天下奇迹，哪朝哪代见过？’公社书记吓了一跳。彭德怀又耐着性子询问粮食的产量。公社书记说：‘今年是大丰收，亩产上千斤的队不少心’彭德怀接住话茬：‘附近有没有千斤队？’答复是吴公塘就是个千斤队。彭总叫把生产队长找来。队长听说公社书记汇报时碰了钉子，先就有些胆怯，支支吾吾地回答彭老总的问话说：‘亩产恐怕会有……千把斤。’彭元帅笑了：‘一队之长：连本队产粮数字到现在还有得底，不太好吧！’队长说：‘劳动力都炼钢铁去了，忙不过来，收回的谷堆在禾坪至今有晒，还有几丘田收都有收。’彭德怀一听，明白了，说道：‘你领我到有收的田里看看。’来到一片禾叶枯焦的稻田，彭德怀数了数一丘的禾莠数，又拔出一莠数了数棵数，然后对跟随的干部们说：‘你们看，禾莠这么小，种的

这么浅,能有上千斤的产量吗?我那时候在家作田,一亩田收上五百斤,就算好禾咧!’有人低声插话说:‘现在的产量都是喊出来的。’彭德怀接着说:‘我最近看了很多地方,都说亩产上千上万,我就不信那一套!你们是相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鬼话了吧?说假话,吹牛,有一点好处,既害国家又害百姓!’

这天,彭德怀被少年时代的伙伴拉到了幸福院。彭德怀进了这个小院,见锅灶正在冒烟,上前揭开锅盖,见是一大锅青菜,几粒米上下翻滚着。他黑着脸,坐在灶边个小凳上不说话。

‘老彭啊!你怎么不说话?’

彭德怀盯着这位少年时代伙伴的腊黄浮肿的脸,说:‘我看看锅里,看看你们的脸色就明白了。你们这名字好听:幸福院,饭都吃不饱算什么幸福院?’

这里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孤寡老人都围上来,附近的群众闻讯也来了,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

‘彭总啊!’一个老人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听就信。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乡亲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样子,每人每天二三两米,毛主席知道么?’

一个抱着娃娃的老婆婆说:‘年轻人可以勒勒肚子,老人们可以咬咬牙,娃娃们咧,他们忍不了饥,要叫哇!’

彭德怀上前看看这个孩子,骨瘦如柴,头显得特别大,不禁掉下泪来。脑子一闪,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自己饿死的小弟弟,想起了祖母白发苍苍,一只小脚,带着两个弟弟出去讨饭的情一景。可那时候,还能讨回一些剩饭,记得最多一次讨回了三升米,如今到处是揭不开锅的公共食堂,讨饭都没处去要。

三十二年前,因为贫困,因为没饭吃,带着穷人造了反,那是平江起义。南征北战,如今打下了天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自己被封为元帅,可家乡成了这个样,对不起父老乡亲啊!这样下去,江山能稳么?正是这种江山不称的责任感促使他在上海会议放炮,在庐山会议上书。

‘老彭啊,你回来就好了,快给我们出个主意吧!天灾我们能对付,现在兴的那些规矩,都说是毛主席叫这么办,我就不信,改一改不行么?’

又有人说:‘别的地方不是一亩几十万斤稻谷吗?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动员他们支援支援我们嘛?’

彭德怀苦笑:‘你们这里报纸上登的不也是亩产万斤吗?’

‘那才是哄鬼的!一万斤,在地上铺一层要占多少地?’在场的人忿忿然。

‘万把斤哄鬼,十几万斤就是真的吆?’彭德怀算是对那位要求从别处调拨粮食支援湘潭的答复。

大家不说话了,有的叹气,有的掉泪。

‘老彭,你说为啥搞成这样子?’

彭德怀不回答,他没法回答。

‘老彭,明年怎么过呀?’

‘老彭,这里的事毛主席知道么?’

彭德怀说:‘毛主席派我来,就是叫我了解真实情况,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离开乌石,彭德怀又去了韶山,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周小舟告诉他,这个大队吃了‘偏饭’,一九五八年也只增产百分之十四。彭德怀看到,韶山的百姓在食堂也吃不饱饭,苦不堪言。可半年以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回到韶山,看

到的景象却迥然不同,他看到的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到了平江。这是他领导平江起义的一地方。对于军事统帅来说;这比家乡还亲。平江县委书记王书记跟这位子江人引为骄傲的彭元帅说了实话。彭德怀掏出小本,一一记下。

平江一九五八年开始大跃进。九月,将九百五十三个高级社合并为十五个人民公社。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砸烂千家万户的锅灶,城乡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根据大跃进的精神,全县提出‘二一二’的口号(即稻谷亩产两千斤,红薯亩产一万斤,人均纯收入二百元)。同时提出四十天大办工业的口号,到年底建国营工厂二十三个,由手工业社组扩建的集体工厂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封县里的工业投资四百六十九万元,添置各种机器设备一百一十多台套,但由于土法上马,追求高指标,不顾质量,产品大都不能用。全县为支援大炼钢铁,发动十万劳力上山砍树烧炭五十万担,烧掉木材十万零五千立方米;另砍伐木材五十多万立方米。毁掉的木材,超过十五个正常年景的生长量。粮食亩产量最高的八百斤,年景本来不错,但丰产不丰收,壮劳力都被调上山去烧炭、炼钢,许多庄稼没收回来,因为虚报了产量,上边购销征调的多,全县年人均原粮仅二百七十四斤,大家吃不饱,还得继续苦战,继续跃进。

年底,他到了株洲,恰与薄一波总理相遇。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把在湖南的所见所闻,都对薄一波讲了。薄一波有同感。谈到粮食问题时,彭德怀说:‘上个月武昌会议时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谭老板(谭震林)的报告,建议公布数字可

定为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我就不赞成;又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哪有那么多!从头谭老板问我:“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你说怎么办?”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彭德怀迟疑了一下,又说:‘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农村会饿死人的。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一波同志,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薄一波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被整,一九五七年跟周恩来一起反冒进又挨了批评,觉得自己说话,毛主席不一定会听,或许联系以前的事情又批一顿。转念至此就说:‘彭总,还是你来打这个电报,可能会引起主席的重视,’彭德怀说:‘好,请你写吧。’于是由薄一波起草,彭德怀签名,给中央发了电报,建议统购粮减少三百亿斤。

彭德怀在上海会议上放了一炮就出国访问去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会议转成了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作出了一九五九年‘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钢产量一千万吨,粮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会议进行中,每天晚上有舞会、电影、戏曲等文艺节目。一天晚上,演出湘剧《生死牌》,因不是家乡戏,毛泽东专门去看了。演的是明朝的海瑞,秉公断案,大义凛然的清官戏。从剧场回到华山路二一四五号别墅,毛泽东即吩咐秘书借一部《明史》来。这天晚上,他专心阅读了《明史》中的《海瑞传》。五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工作方法十六条。但旁征博引,议论纵横,极有吸引力。他号召高级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毛泽东扫视现场,双目如电,接着

说：‘现在党内说假话成风，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看风转舵，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盛行。要学习海瑞。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批评嘉靖皇帝说：‘嘉靖，家家皆净也。’还把这个话写进上书里。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有一天，牢头给他端了酒菜来，他刚刚吃下去，从牢头嘴里知道嘉靖已经死了，便嚎啕大哭起来，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了。可见，海瑞虽然对无病嘉靖批评得很厉害，但他对嘉靖还是忠心耿耿。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做，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做到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用右手举起《海瑞传》说：‘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大家可以学习这本书，尤其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更应该学习海瑞精神。’

海瑞(一五一四——一五八七)，明嘉靖举人。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很生气。吩咐近臣，看住海瑞，别叫他跑了。近臣回奏说：‘海瑞上表前，连棺材都买好了，打发走了家中童仆，与妻子行了告别礼，现独居一室，就等万岁爷抓他杀头了。’海瑞坐牢半年，嘉靖死，新皇隆庆即位，赦免海瑞。隆庆三年，海瑞出任应天巡抚，令大官僚徐阶等退田，为贫苦农民作主，被誉为‘海青天’。

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急急忙忙赶回北京，找到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阿吴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两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吴晗对毛泽东素来敬重。一九四八年他出版《朱元璋传》特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选集》出版毛亲笔题字‘吴晗同志审正’赠送他精装本一套。这些文字交往使吴晗对毛泽东的信赖无半点保留。‘主席号召

宣传海瑞,我义不容辞而且尽快交卷。’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谈海瑞》;第二天,又用笔名刘勉之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这时候,彭德怀还没有罢官。一九六〇年底,他又完成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抓住不放。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料到他竟会死于《海瑞罢官》。而且他并没有直接得罪毛泽东,也没有得罪江青,仅仅是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的需要。使他家破人亡。此是后话,按下慢表。

历史人物海瑞,被毛泽东一表彰,在中国文化历史领域活跃了十来年。开始是被歌颂,后来又受批判,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动机何在?是真希望有人提批评意见,还是钓鱼?从庐山会议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是钓鱼。但他最初要钓的,不是彭德怀,而是周恩来。据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上将在军队系统传达:‘后人写了海瑞传,叫作《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订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这一段话很有深意。首先把他唯意志论的领导所造成的民穷财尽的后果,归咎于下面报喜不报忧,继则把报喜不报忧的责任推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但又鼓动周恩来对他‘大胆批评’。他深知‘大跃进’的失败说明,一九五六一—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反冒进是正确的,他多次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周恩来一定不服。他认为在领导核心层,朱老总是个招牌,挂不起帅来;刘少奇已在反高饶斗争中被制服;只有

周恩来,在国际威望,国内威望,党内追随者等等方面,都有资格出来挂帅与他抗衡,批判和清算他的‘左’倾冒进路线。斗争既然不能掩盖,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要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先发制人。这几年毛泽东读《三国志》,研究曹操,研究诸葛亮,研究司马懿,他胸中的丘壑机关越来越深不可测了。在几次中央会议上,他见周恩来态度含蓄、深沉,于是,打出了海瑞这张牌,以观动静。

100 炮打金门 解放军得心应手 乱起边陲 奴隶主出奔流亡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黎巴嫩人民举行反对本国亲美的夏蒙政府的武装起义。七月十五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五千余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登陆，进行武装干涉。七月十七日，台湾当局下令陆海空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公开宣称要在美国的支持下‘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

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集彭德怀、粟裕、萧劲光、刘亚楼等高级将领开会。毛泽东说：‘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炮打金门，就是支援黎巴嫩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要用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

随后，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又进行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令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治委员叶飞集中三十个炮兵营，部署于厦门和同安县莲河一带，准备打击大小金门的国民党军；调炮兵三个营又两个连，部署于连江县黄歧地区，准备打击马祖岛的国民党军。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抽调歼击航空兵第一师第一团、第三团，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第九师第二十七团，

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和海军航空兵第四师第十团,从原驻地转场至福州、漳州和江西漳树等一二线机场。在晋江罗裳山设立以聂风智骂司令员的福州空军指挥所。令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调驻上海的鱼雷快艇第六支队第一大队立即隐蔽南下,进入厦门海域。八月二十日前,参加炮击金门的各作战部队,共三十六个炮兵营四百五十九门大炮、八十余艘舰艇、二百多架飞机,都进入战位。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下令:‘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不打马祖)。把它封锁起来。’

八月二十三日十七时三十分,福州前线司令部发出:‘开始突击’的命令。随着红色信号弹的升空,成串的炮弹以地动山摇的威势飞向金门岛。由于情报准确,精密测定,第一次突击二千六百发炮弹,从不同的方向,准确地落在金门北太武山国民党军阵地上。击毙了前来视察的国民党军总参谋长赵家骧和守军副司令官吉星文以下官兵数百人,击伤停泊在料罗湾的货轮‘台生’号,破坏了金门的有线通信系统。

在二十四日的炮战中,金门国民党军炮兵向厦门、莲河地区猛烈射击,解放军以近万发炮弹还击十七时四十分,锚泊料罗湾的十七艘国民党海军长舰艇被迫出港逃窜。解放军隐蔽待机的六艘鱼雷快艇,在大队参谋长张逸民的率领下,立即出击,在金门以南海域,将四千吨的运输舰‘台生’号击沉,将‘中海’号运输艇击伤。

二十五日,台湾当局以F-八六型飞机四十八架飞临大陆上空报复。其中八架进至漳州地区上空。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九师第二十七团一个大队起飞迎战。孤胆英雄刘维敏在与队失去联系、没有僚机掩护的情况下,与四架敌机作战,击落其两架。但由于解放军陆空协同不好,当刘维敏追踪另一架敌机时,被已

方地面高射炮当作敌机而击中。

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日,平均每天从台湾运抵金门的物资,仅为以前的百分之五点五。金门岛基本被解放军炮火封锁,国民党守军处境困难。

九月三日晚,毛泽东决定:福建前线自九月四日起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

九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领海宽度十二海里的声明。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说:‘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从来不承认关于十二海里领海的任何要求’。

九月初,美国调遣其第七舰队主力和第六舰队一部,舰艇六十余艘、飞机四百三十余架在台湾海峡集结。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

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严正指出:‘最近,在美国对于阿拉伯国家发动武装干涉以后,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的骚扰和破坏也更为猖獗。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据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但是,美国为了转移世界人民对于美国在中东继续侵略、拖延自黎巴嫩撤兵的注意,竟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在台湾海峡地区大量集结武装力量,公开威胁要把它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这是对六万万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是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

威胁。’

美国政府为了帮助金门守军打破被封锁的状态,并向中国人民炫耀武力,竟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悍然决定派遣军舰为国民党军护航。九月七日,国民党军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及美军顾问,率领由国民党军两艘运输艇、五艘作战舰和美第七舰队两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组成的编队,驶入金门海域。

毛泽东处理外交、军事问题,头脑冷静清醒,仍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九月七日二十四时电令福建前线部队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一次惩罚性炮击,只打蒋军蒋舰,不打美军美舰。

九月八日上午,国民党海军‘美乐’号和‘美珍’号运输舰,满载弹药、物资和人员,在美军护航下驶入料罗湾。从十一时四十三分起,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四十二个炮兵营和六个海岸炮兵连,对停泊在料罗湾的国民党舰和金门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炮击,发射炮弹两万多发,将‘美乐’号击沉,‘美珍’号被击伤后向外海逃窜。护航保驾的美国军舰,丢下国民党军舰队,仓皇撤至料罗湾外五至十二海里处。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的:我军不打美舰,美军也不敢轻启战端。造就摸到了美国的‘底’。

美国从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出发,一直把台湾看作他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一直想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这次趁金门被封锁,守军补给困难之际,劝说台湾国民党当局放弃金门、马祖。这个意向由杜勒斯国务卿在九月三十日的谈话中表露出来,他说蒋介石在金、马驻兵‘是愚蠢的’、‘不明智的’。这是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发端。对于杜勒斯的劝告,台湾的蒋介石则表示‘我并无接受义务’。

毛泽东审时度势,采取了‘一个中国,拉蒋拒美’的策略,在

复杂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中，以高明的斗争艺术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十月五日八时，他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接着又指示对金门岛‘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即只打炮不登陆；又要封锁，保持适度的紧张局势，拖住美国不能脱身；又要使金门的国民党军能够生存下去，使其守而不撤。

这一套策略酝酿成熟以后，毛泽东起草一封《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并于十月六日晨曦初露的时候，在鼓浪屿前线广播站对金门军民广播。《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升。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

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单行。(引者按:把正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通过文告正式告诉台澎军民,是很厉害的攻心战)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火。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时

从签署的时间,这是毛泽东六日子夜的作品。胜利者的气概,大国的风度,溢于言表。金门的国民党军士兵们听了广播,从坑道里走出来,互相招呼,“高声叫好”。美国人看到文告则表示“欢迎”,并宣布从八日起也暂时好比护航,只是希望小共发展成为“永久停火”。蒋介石则表示:“宁愿冒继续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毛泽东“一石三鸟”,引起

了台湾当局上下的不一致,也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

十月十二日午夜,炮击暂停仁人的期限已满,金门守军又紧张起来,全岛黑灯瞎火。官兵们藏身在坑道和掩体中,整个晚上没有动静。十三日凌晨,福建前线广播站又播送了彭德怀元帅的命令。这个命令也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命令中说:‘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上述引文中有一个字眼值得注意,那就是‘敌方’。炮打金门是国共两党长期内战的继续,国民党方面本是共产党的敌人。但命令中的‘敌方’与下文的‘金门军民同胞’相连续,细观之,原来‘敌方’是专指美国人,是为了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

杜勒斯虽属美国的智者,但他永远理解不透毛泽东的东方式的策略。十月二十一日他访问台北,会晤蒋介石。正式建议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出驻军。蒋的回答是‘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杜勒斯退而求其次,以增加美元为代价,要蒋介石‘减少金、马驻军’,并明确表示对大陆‘放弃使用武力’。蒋同意了,发表了蒋杜《联合公报》。美国人援助蒋介石是为了控制蒋介石,不援助就失去了控制的资格,但援助以不或接卷入中国内战为限度,毛泽东愈和蒋介石套‘近乎’,美国人对蒋控制愈厉害。毛泽东对杜勒斯的棋路看得很清楚,对金门岛打打停停促成杜勒斯摆完了他的棋式。从此,美国以这个《联合公报》约束蒋介石,不许他‘反攻大陆’。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利的。特别在毛泽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一九五

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是毛泽东政权最危机的时期。美国以援助蒋介石为名，行控制蒋介石之实的政策。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毛利用东南沿海有惊无险的形势，大造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舆论，调兵进将，转移了国内人民对经济困难的注意力。美国人客观上帮助毛泽东渡过了危机。

一九五九年是中国多事之秋。台湾海峡局势报告和缓。西藏奴隶主又发动了叛乱。

西藏叛乱是由于奴隶主抗拒民主改革而引起的。西藏社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农奴制度，政治、经济、文化极为落后，使西藏人民长期陷于贫困的深渊，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

不了解西藏的西方人权论者侈谈西藏的人权问题。我们就从这个国际舆论的热点谈起。

古代西藏称吐蕃。从吐蕃法律开始一直到《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历代旧西藏封建法律都规定：

‘人有上、中、下三三等，每等人又分为上、中、下二级。’其中上等人包括藏王、大小活佛和贵族等；中等人包括商人、牧主、职员等；下等人包括农民、铁匠、屠夫等。

‘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王者的命价，法律规定：‘胡(尔)人杀害雅孜王，命价按尸量黄金；农民杀害格萨(尔)王，抵偿命价算不清。’中等人的命价，法律规定‘三百两至四百两黄金’。下等人的命价，法律规定：‘猎户、铁匠、屠夫等，被杀命价一草绳。’

在刑事法律关系方面，‘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十三法典》第三条）‘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毆仆致伤，无赔偿之说。’

(《十一二法典》第八条)《十三法典》第四条重罪肉刑律中规定有:挖眼、刖足、刘舌、砍手、推崖、溺死、处死等,这些残酷的肉刑都是用来镇压农奴和奴隶的。笔者进入过藏区,亲眼目睹过用人皮做成的鼓面,用十八岁女奴的腿骨制成的笛子,用奴隶的头盖骨镶金边制成的溺器。

一九五九年西藏有人口一百二十万。有两个对立的阶级:一是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农奴主阶级,即藏民称之为官家(封建地方政府)、寺庙、贵族三大领主,这三大领主在西藏广阔的高原上建立了上千个庄园和牧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绝大部分牲畜和全部奴隶;一是约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奴和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奴隶,农奴没有土地,只有依附在农奴主的土地上,被迫为农奴主进行繁重的劳动,担负着沉重的差役和租税;奴隶不仅没有土地和牲畜,而且没有丝毫人身权利。

农奴主将一部分肥沃的土地留作‘自营地’,利用农奴的无偿劳役进行耕种,或者由奴隶耕种;另将一部分土地作为‘差地’,以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的形式,租给农奴耕种。农奴被束缚在农奴主的土地上,除向农奴主缴纳苛刻的实物地租外,还要担负繁重的差役和捐税,许多农奴和奴隶主忍受不了剥削压迫而逃亡流浪,他们被抓回来就遭到剁手、挖眼、砍足、抽筋等酷刑。

西藏的高利贷是非常惊人的。据拉萨、山南、黑河、昌都、江孜等地区的调查,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奴都是欠债户,有的地区欠债户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寺庙是最大的债主。利率一般是借四还五(百分之二十五)。例如噶丹寺在多年以前把五十如克(注:如克为西藏官斗音谭,公元十七世纪西藏制定的标准容量名称,每如克约等于十四公斤)青梨贷放给十户农奴,后来变

成四十一万一千如克的债务。农奴称巴一九四一年借该寺一百如克粮食,还了十八年,已付息三千如克,到一九五九年尚欠寺院粮食五千六百如克,藏银七千五百两。东噶宗农奴旦增,一九四一年向哲蚌寺借了一如克青稞,十年以后,高利累进,欠债本利共达六百如克之多。旦增被逼逃跑,妻子被逼身死,寺庙把他的女儿捉去抵债,孩子在痛苦中编了一首歌:阿爸旦增啊,请你对我说:我未见一粒粮,怎么会欠千克债?这样的苦,这样的恨,何时见青天!简言之,西藏就是这么一个政治、经济制度。这种极端落后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能够允许继续存在下去吗?难道不应该进行民主改革吗?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在大会上,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大印授予达赖喇嘛。筹备委员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协商机构,不是政权机关,共五十一名筹备委员外,除五名共产党员委员外,四十六名委员都是藏族。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毫无疑问,筹备委员会将来要成为政权机关,以领导民主改革。

关于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陈毅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交换了意见。中央的设想是:坚持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由国家赎买农奴主的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对贵族、官员、活佛、上层喇

嘛在政治地位上给予安排,由政府把他们包下来,使其生活不因改革而降低。在改革的方法上,由达赖喇嘛决定,由西藏人民自己进行改革。只有当西藏民族的领袖和人民有了一致要求和决心的时候,西藏地方的改革才可以进行,而绝不能由别的民族去代替进行,也不能由中央下命令来改革。

陈毅回京复命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给达赖一信,信中说:‘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大家都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

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值达赖喇嘛在印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遂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在新德里三次找达赖谈话,代表中央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针,周恩来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以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决定,大量紧缩机构和精简人员。工委系统的地方汉族干部精简了百分之九十二,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减下来的人都撤回内地。‘六年不改’和西藏党政干部和军事人员大收缩的决定,表明中央人民政府是严格遵守十七条协议中‘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规定的。

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视中央政府的让步为可欺,提出‘永远不改’的口号,要全部赶走共产党和解放军,成立‘大西藏国’;这就违背了十七条协议关于‘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

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的条文,从根本上输了理。

西藏地方政府名‘噶厦,’相当于政府委员的‘噶厦’成员名‘噶伦’。一七五一年清政府规定,由噶伦若干人主持噶厦,秉承清廷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意志,共同管理西藏地方事务,遂成定制。达赖喇嘛是‘神王’,属精神领袖,西藏地方政权的实权操在组成噶厦的六名噶伦手中。六名噶伦中,阿沛·阿旺晋美、桑颇·才旺仁增是维护统一的爱国分子,其余四名,宇妥·扎西顿珠已离中国逃往印度的噶伦堡,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杰(又名夏苏)是西藏奴隶主叛乱的实际策划者。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拉萨以东八十公里的争莫寺,叛乱武装‘卫教军’伏击了解放军的一辆运输汽车,打响了在西藏噶厦管辖区武装叛乱的第一枪。接着又在麻江、贡噶、扎朗等地伏击解放军过往车辆,杀害副团长殷春和、营长杜效模、分工委副部长沈凤楼等军政人员一百零九人。到一九五九年初,武装叛乱活动逐步升级,叛乱武装不仅洗劫道班、袭击兵站、伏击车辆、炸毁桥梁、截断公路,而且围攻人民解放军驻地。泽当中共山南分工委、扎木中心县委、丁青中心县委和驻该地的解放军先后被叛乱武装围攻,山南分工委被围攻七十七天,丁青县委被围攻九十天。叛乱分子所到之处,劫掠财物、奸淫妇女、破坏寺庙、杀戮无辜。山南凯松溪卡,是一个仅五十户的村庄,‘卫教军’在村里设一粮站,家家被洗劫,妇女被奸污,从十来岁的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无一幸免,叛乱分子在这个村庄蹂躏达十个月之久。乃东县裁缝平措反对叛乱,被挖心处死;那曲地区巴青县的牧民布德向解放军报告情况,被叛军挖掉了双眼。

九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

华亲往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通报了叛乱情况，并告以一九五七年八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桑伊宗（桑日县）空降两名藏籍特务，携电台于今年（一九五七年）初潜入拉萨与恩珠·公布扎西取得联系，组织‘西藏抗暴运动’六月十五日，恩珠·公布扎西带领两名藏籍美特和部分叛乱武装离开拉萨到山南地区哲古宗建立叛乱根据地。二十四日召开有二十七股叛乱武装的大小首领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卫教军’。由恩珠·公布扎西任司令。‘卫教军’一成立，就得到外国势力空投陆运武器弹药的援助。叛乱加剧升级，与外国插手有关。噶厦对叛乱分子采取纵容、支持的立场是错误的，请达赖喇嘛责令噶厦转变态度。十一月二日达赖喇嘛曾召集全体噶伦、孜仲（僧官）、藏军总司令及三寺的堪布（寺院最高主持人）、堪苏（即卸职的堪布）开会说：‘希望全体官员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担负起平叛的责任。’十一月五日，噶厦召开全体官员会议，名为讨论传达达赖喇嘛的指示，实际开成了一个反对中央政府、准备全面叛乱的会议。

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达赖喇嘛邀请前往布达拉宫观看磅鬼跳神活动。达赖喇嘛在与邓少东、郭锡兰交谈时，主动提出他希望看军区文工团的演出，邓、郭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地点。达赖喇嘛说，具体时间、地点待传召后再定。当天，邓少东即把达赖喇嘛要看文工团演出的这一意愿通知了噶厦的索康·旺清格勒噶偷及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三月一日，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面见达赖喇嘛，请其确定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达赖说：‘现在传召完，‘格西’（按：宗教最高学位）也考完了，看演出的时间大体确定在藏历二月初一、初

二、初三(按:即公历三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具体安排可以和代理基巧堪布(按:基巧堪布即总堪布,或为首的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直接联系。三月五日,统战部副部长梁洪会见噶章·洛桑仁增,商量达赖看演出的时间,并将拟就的一个陪同看演出的人员名单交给他,噶章表示同意这个名单,具体日期待请示达赖后再告。三月八日噶章·洛桑仁增电话通知工委统战部:达赖喇嘛定于藏历二月一日(公历三月十日)下午拉萨时间一点(北京时间三点)到军区礼堂看演出。三月九日,统战部一位处长将接待计划交给噶章·洛桑仁增。噶章表示同意,当即发出请帖。

三月九日夜。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墨本(市长)洛卡娃。泽旺仁增向藏民宣称:达赖喇嘛明天要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喇嘛。奉噶厦命令,每户都要派人到罗布林卡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去。三月十日晨,藏军第六代本(按:‘代’相当于营,‘本’是长官的意思,每代本定额五百人)俊巴带着自己的部队和‘卫教军’穿梭奔驰在市内大街小巷,吆喝驱赶藏民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到军区去。上午,噶伦兼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乘汽车去罗布林卡,遭叛乱分子的石块袭击,车窗被砸坏,桑颇头被砸伤。十二时左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爱国人士堪苏帕巴拉·索朗降错去晋见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大门口被叛乱分子用石块砸死,并将遗体系于马尾,鞭马拖尸游街示众。此时,叛乱分子纠集一千余人在市区游行,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你们不滚出去,我们也有力量赶走你们!’等口号。

下午三点,噶伦索康、柳霞、夏苏三人到西藏军区会见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竟说:‘噶厦事前不知道

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喇嘛的近侍机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反对,事态发展到使噶厦无法控制,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了。’谭冠三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演出是他自己提出,并经一个多月的协商安排确定的,你们竟然说是噶厦不知道,怎能使人相信!希望噶厦负责保护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今天事件的主谋者,惩办凶手,抚恤、慰问受伤者,妥当处理善后事宜。’

索康等三噶偷回到罗布林卡,立即召集‘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与会者一百多人。会议宣布‘西藏独立’,由索康、旺清格勒、噶章·洛桑仁增、大惹·多阿塔青、凯墨·索安旺堆和藏军副总司令堪苏洛珠格桑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

三月十七日夜晩,达赖喇嘛和索康、柳霞、夏苏三噶伦、副官长帕拉、副经师赤江及达赖的家属、随员、藏军卫队六百多人,从罗布林卡附近南渡拉萨河出逃山南。三月二十六日,达赖喇嘛一行抵达隆子宗,召开群众大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宣布西藏已‘独立’,成立‘西藏临时政府’,隆子宗为‘临时首都’。尔后,达赖喇嘛一行经错那、沙则、仲既桥,于三月三十一月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占领区。四月十八日抵达印度提斯普尔,散发用英文书就的《达赖喇嘛声明》。

这就是西藏上层农奴主集团中的叛乱分子策划叛乱、挟持达赖出奔逃亡的经过。逃往国外的叛乱分子连同被里协的群众共约两万人左右。

至三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才下令西藏军区部队讨平叛乱,恢复秩序。截至三月二十三日止,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俘虏叛军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八千余枝,轻重机枪八十

一挺,八二追击炮二十七门,山炮六门,子弹一千余万发。

三月二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撤销了筹委会中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人的职务,增补了其他爱国人士。

改组后的自治区筹委会成了反映西藏人民意愿的政府机关,领导进行了西藏全区的民主改革。打碎了封建桎梏,百万农奴站起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牛羊,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政府为贫苦农牧民发放无息、无偿农业贷款五千二百多万元,其中无偿贷款六百三十八万元,无偿贷种子粮、口粮二千七百八十多万斤,扶持贫苦农牧民八万二千七百多户。

民主改革第一年一九五九年,西藏全区粮食总产量三亿二千三百多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八;一九六〇年粮食总产量达四亿一千一百多万斤,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一九六〇年全区牲畜存栏头数一千零五十多万头(只),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

一九六五年,粮食产量达到五亿八千多万斤,比民主改革前的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牲畜存栏数达一千八百多万头(只),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四。农牧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不少人家修了房子,有了余粮,添置了新衣。昔日的农奴和奴隶们称这一段时期为西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平息西藏叛乱,符合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广大农奴和奴隶的利益,是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一场最深刻的革命,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101 大地呻吟 万民诅咒大跃进 庐山诗兴 百官唱和小神仙

彭德怀在庐山上书中,说毛泽东‘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是公正的评论。

到庐山会议前夕,神州大地已经是饥民遍地。怨声四起了。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给中共中央写了个调查报告,题名《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于五月二日亲自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转发王绍飞的报告,认为所反映的情况‘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王绍飞报告反映的头一个问题,是分配问题。

‘由分散到集中,出集中到分散,账目算不清了。(按:这是指由农业社合并大公社,又退回去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闹共产,搞乱了账目。)地委最近规定了三道防线,一是扣留部分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五,二是消费部分出百分之五十(即余下的百分之五十五的一半,即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作工资《按劳动日分配》,三是积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但实际上公社化以来开支很大,把实际花出去的钱作为扣留部分已达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二,只有百分之四十八可以作为消费。这百分之

四十八有了吃饭没有工资,有了工资即不能保证吃饭(供给)。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分配,群众对一九五九年的分配也产生了怀疑。同时,群众还有这样一种顾虑。‘现在说按劳分配,谁知秋后又怎样变。’因而在生产上产生了消极情绪,出勤率虽高,但劳动效率很低。’

这最后一句,‘出勤率虽高,但劳动效率很低’,是毛泽东设计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不可克服的弊病,是农民对‘多劳不多得,吃大锅饭’的消极抵抗。农民用‘磨洋工’的办法对付大锅饭。‘效率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看看毛泽东的秘书的一个调查材料作为补充。据田家英在浙江富阳县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九六〇年,一个劳动日值,只有零点零三元二角,即是说农民干一天活,得人民币三分零二毫,买不了一支香烟。结果是,劳动一年,只分二元五角三分,换不回口粮。全队二百二十四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八百零三人,人均欠债四十八元一角八分。在历史上历来是鱼米之乡的富春江流域,农民苦到这般程度;由于虚报产量,增加征购,群众口粮不足,到野外自寻野菜野果充饥。公社干部认为是‘往人民公社脸上抹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些人进行严厉批判,还派民兵吊起来打。田家英知道这些情况后,悲愤满腔,在会上讲话时热泪横流。他说:‘我们来自北京。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不起各位父老,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没有欺压老百姓的权力!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了,诚恳地接受你们的委托,我们一定及时地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反映群众的呼声,反映这里的真实情况。’在这个会上。群众也都流了

泪。(以上见与田家英一起搞调查的马仲扬的回忆文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第一八三页)。

王绍飞报告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高指标压不下来。

‘生产指标:包括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对农业生产有科学的估计,人人心中有数。从果乡公社来看,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用最大的努力可以比一九五八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一——七十(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每亩可产四百五十一——五百斤(一九五八年三百零八斤)再多没有可能,但上面分配产量指标是一千二百斤,距实际很远。公社按县的指标包产百分之七十,即亩产七百多斤,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这种脱离实际太远的指标,非但不起鼓动作用,相反起了挫伤群众生产情绪的作用。群众认为:‘累死也达不到指标要求。生产多少要多少,不干也少不了三百六十斤的定量供应。’他们对‘没有千斤思想,不打千斤粮’的说法很有意见。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想一万斤呢?’干部则有一种说法,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说一千五百斤,我说二千斤,法不责众,免得被批判右倾保守。

‘但是究竟是谁规定的这样的指标呢?谁也不知道。县委书记们清楚地知道,达到产量指标根本不可能,也要硬着头皮分下去。’

县委书记的高指标是从地委领来的,地委书记的高指标是从省里领来的,省委书记的高指标是从中央领来的。各级干部为保自己的乌纱帽,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和群众负责,把高指标领回来,‘硬着头皮分下去’就完了。追根溯源,高指标来自中共中央,来自毛泽东。是他不认输,要组织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毛泽东主

持下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决议》认为‘我们不但有可能继续跃进，而且有可能跃进得更好。’按照这个计划，一九五九年粮食产时要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公布的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增长百分之四十。而一九五八年公布的产量有极大的水分，到庐山会议时‘核实’的结果是五千亿斤；一九六一年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进一步查清一九五八年粮食实际产量是四千亿斤。由四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增产百分之一百五十。当然是‘累死也达不到指标要求。’

王绍飞报告的第三问题是当时最尖锐的粮食问题。

‘食粮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顿稀饭（施谷庄、段店等）难以支持劳动，也影响干劲。据说最严重者为乐亭县，每日只能供应半斤，现农吃白薯秧的叶子，有些人到果乡公社的地方拣白薯干。’这是全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了一年，粮食减产六百亿斤，全国粮食产量由四千亿斤下降为三千四百亿斤；一九六〇年又‘跃进’了一年，粮食再减产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三年大跃进粮食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九百亿斤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

中共官方文献公布的资料：‘一九六〇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百分之十九点四；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七十。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升高，据正式统计一九六〇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

信阳地区,一九六〇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胡绳密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三六九页)

一九五九年五月,传达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实事求是,讲实话,反对‘风、马、牛’,江西省委党校八十多名县级干部,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讲了实话,其要点是:

△‘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

△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

△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就是农副院长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

△人民公社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地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

△人民公社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人民公社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

△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两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

△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三级应负责任,因为决议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统一核算,自负盈亏;武昌

会议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比苏联容易；北戴河提过工资制改为供给制等等。也有人认为：土下都应负责，风由上面刮起，到下面就越刮越大了。

△公社仍应以农业为主，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时过早，原料、技术、设备、产品、销路等等环节，问题极多，且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劳民伤财。

△公共食堂并非共产主义因素，有三大坏处：排队、抢食、浪费粮食；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

天津市各区党员干部说出了如下看法：

△否定‘大跃进’，认为是冒进了。

△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了盲目发展。

△大炼钢铁有四大坏处：一、影响秋收。二、影响整个工业生产；三、炼出的铁不能用；四、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结果是劳民伤财，全面紧张。

△粮食不够吃，市场空前紧张，生产是‘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

△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

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认为：

△办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急太猛。

△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

△‘全民大炼钢’的口号不对，‘小土群’可以不搞，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但也应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可以买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会使政治影响不好。

△‘五个并举’（按：工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

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按:每一个‘并举’构成两条腿,五个并举成了十条腿)成了多条腿走路。

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

△少数营团干部对经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

△有人认为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

△一九五六年好,一九五七年较好,一九五八年成问题。

△公社成立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苏联建国四十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十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

△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

△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有位排长听战士们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很反感,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

△海南军区一个政治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

△一位排长说:‘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

在国务院工作的党外干部和技术专家也议论纷纷,据统战部搜集的综合反映如下:

△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一九五八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

△有人：‘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

△有人说：‘现在物资供应紧张，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四位工程师谈论大炼钢铁，一个说：‘炼钢损失了二十三个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一个说：‘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一个说：‘去年炼钢到街上去挖砖，这叫做一面建设，一面破坏。’一个说：‘给钢让路提法不恰当，不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一机部的一位工程师说：‘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

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

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笱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送了《关于山西省各县人民公社问题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所谓‘五级干部’是指县、区、社、队、小队五级干部，每个县到会都有四五千。说是向大家宣布‘言者无罪’、‘不戴帽子’、‘放手发动群众，有二、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比较尖锐的意见是：

△有人说：‘你们十个指头都烂掉了，还说九个指头是好的。’

△有人说：‘共产党的工农兵学商相结合，还不如阎锡山的兵农合一。’

△有人说：‘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以上这些情况，通过专题报告、《内部参考》、《经济消息》等中共党内刊物送到颐年堂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他阅读后心情很沉重。一日，用毛笔挥毫，以他那别具风骨的毛体字抄写了鲁迅的一首

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他当时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他听到了中南海地下的隆隆雷声。他决定七月初到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然而一上庐山他换了另一副面孔：坚定、自信、决不认错、还要整人。他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顺应民心，改变错误政策，而是在庐山画符念咒，呼风唤雨，刮起十二级刮风和万钧雷霆把他听到的地下的滚滚惊雷压下去，坚决压下去！

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到湖南，二十四日下午畅游湘江，二十五日由周小舟陪同到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乘船到九江，二十九日上庐山。

牯岭的东谷河东路一八〇号，无论就所占地势，就建筑的气魄、风格，就室内的豪华讲究来说，均为庐山众多别墅之冠。这是一座二层楼房，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墙上爬满生长多年的凌霄藤。站在二楼阳台眺望，右有日照峰、左有吼虎岭，极目之遥是汉阳峰，庐山佳绝美景，尽收眼底。这原是蒋介石的别墅，那时叫‘美庐’，盖以夫人宋美龄命名也。山河易主，人去楼空已十余载，今日迎来了新主人，这就是打败了蒋介石，在中华大地主宰沉浮的毛泽东。

毛泽东进入一八〇号，那里的一切都由江东兴精心布置就绪，完全按毛泽东的风格和习惯对室内的陈设家具作了改造。席梦思撤走了，换上了宽大厚实的木板床；锦被毛毯撤走了，换上里面是白细布的棉被；要看的书籍已在习惯的位置摆好；写字台上文房四宝已备齐。

这天晚上，毛泽东坐在书案前。展纸挥毫，写诗一首：

登庐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湿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又抄《到韶山》一首。给胡木、周小舟二人写便信一封，附两诗征求意见。通过周二人，这两首诗在庐山流传开来。知诗者欣赏诗文，不知诗者抄在本子上，从字里行间之外去猜度最高领袖的微言深意。

刘少奇和朱德是七月一日上山的。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住东谷河西路一二四号。这原是中华民国时代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别墅。刘少奇下车后，服务员出来列队迎接，齐声说：‘刘主席好。’‘同志们好，’刘少奇说着进入客厅，坐在大沙发上。

一个服务受送一杯茶来。刘少奇说：‘你告诉同志们，以后就叫我少奇同志。我们党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

前不久，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请求同意他不再作下一届国家主席的候选人。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提名，选举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自一九五四年七届四中全会作了检讨后，小心谨慎，一步一趋，紧跟毛泽东。在跃进中，毛泽东发烧三十九度，他决不敢停留在三十八度半，北戴河会议后，有一天机要秘书刘振德给他送来一份《简报》，说是水稻亩产四千斤。刘少奇看了笑着问：‘你相信吗？’刘振德说：‘我对南方的水稻

不了解,北方的谷子、玉米、高粱这些作物,最高亩产四、五百斤。’刘少奇说:‘南方的水稻比北方的谷子、玉米产量多一些,也不会亩产四千斤。人家在骗我们,请你查实一下这份《简报》反映的情况。’刘振德奉命认真查了,实际亩产不到一千斤。这时报上消息越来越离谱,出了亩产万斤甚至几万斤的高产田。有一次他当着秘书刘振德、吴振英的面很激动地说:‘什么“放卫星”、“万斤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浮夸、大话,骗人就是了!敢想敢说教干也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嘛!’后来一打听,毛泽东一切都是肯定的,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肯定的,还跟李达吵起来了。刘少奇赶紧出巡,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在省长惠浴宇陪同下视察了江苏城乡。据《人民日报》九月三十日的报道,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的四亩试验田里,他弯下身子数了一下一亩多少棵稻谷,然后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公社书记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当政治家还得当两面派,真难、真累呀!听了假话不敢批评纠正,还要顺竿爬,说更大的假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他的内心的痛苦和难处是别人不能理解的。他深知就是毛泽东错了,也得和毛保持一致,在毛泽东自己认识错误、决心改正的时候,才能根据他定的步骤和分寸,协助作补救的工作。如果他当时就把窗户纸捅穿,把和平公社的书记批一顿,对一切高产卫星表示怀疑,并出来纠正浮夸风,他也许就当不上国家主席了。从当上共和国主席那天起,他更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警惕自己,一定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大事小事都要一致,同时要避免造成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印象。不许服务员称呼‘刘主席’,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

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牯岭东谷三五九号。这是民国时代另一位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朱德改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本来朱德是有资格出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恐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不让他做，还逼他作了检讨。虽然朱毛共事多年，毛泽东知道，就私人感情来说，朱德更倾心于周恩来。如果朱德当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手，权力中心就可能转移。朱德在党内的地位，不是毛泽东提拔；而刘少奇是靠毛泽东的提携，上升到第二号人物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的。在当时来说，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做，毛泽东更放心些。

上得山来，朱德醉心林泉，神游物外。他知道自己戎马半生，与战友们一起领导党、军队和人民，打下了这个天下，如今这人和平建设时期，作为总司令应该退隐了。只希望在经济建设上不要发生大的偏差，政通人和，使国家富强起来。七月七日，作七律一首，与董必武唱和。诗云：

庐山面目何难识，杨子江边一岭奇。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宛转创新陂。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元老林伯渠，填词《浪淘沙》一首，词云：

牯岭两声喧，气象万千。爱听东谷水潺。日照香炉知何处？雾里云端。智慧何人先？卡尔开山。重峦叠嶂更新鲜。一二三四大手笔，宝藏兴焉。

所谓‘一二三四大手笔’，指《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林的词落脚到对领袖的歌颂上。这同朱德的心境是一样的，他们反对大跃进，但又要歌颂大跃进；知道毛泽东犯了大错误，又要歌颂毛的伟大英明。当时许多级干部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矛盾状态

中。

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七月一日上山。他给自己挑选的住所是四四六号。这不是别墅小楼，是一幢筒子楼，原是英国人盖的一所医院，是平房，解放后加盖了一层，改为庐山交际处招待所，接待‘中档’客人，‘高档’的住别墅，‘低档’的这里也进不来。周恩来住楼上二〇一房间，邓颖超住对面的二〇七房间。在庐山会议的‘神仙会’阶段，周恩来受命主持会议。为了处理会务的方便他住在了这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也住在这幢楼。

陈云因为健康原因未上庐山。邓小平因运动中不慎腿骨挫伤正在疗养中。

秀才们特别活跃。一日，田家英、陈伯达、康生结伴同游。走的路线是从含鄱口经植物园到五老峰。陈伯达、康生结交田家英，主要是想通过田家英探听毛泽东的动向，他在读什么书，说了什么话，表扬了什么人，批评了什么事，以弄清方向，摸准气候，关键时刻表态，惊四座，立头功。他们预感到，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必有一场大的党内斗争。陈伯达在郑州会议摸错了脉，把话说反了，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为回无论如何不能再搞错。不料田家英口风很紧，只谈诗。但见云雾低迷，峰峦隐现，田家英提议联句。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成五言一首：

三人结伴走，同上含鄱口；不见鄱阳湖，恨无拿云手。鄱阳忙开言，不要拿云手；只因圣人来，羞颜难抬首。五老千马走，鄱阳紧闭口；东海圣人来，群山齐拱手。若请葛亮，西风去借求；晴日君再采，畅饮浔阳楼。

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是小有诗名的。他的一首初上庐山的纪事诗，比三人联句要高明些。诗云：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华至学仙家。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漫步随吟今古句，高谈且饮雾云茶。林中夜夜开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庐山会议前期(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部长，约百余人。一年多的大跃进，大家都心劳办拙，疲惫不堪。这次有机会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白天浪迹山水，晚上有戏看、有舞跳，自是一件乐事。‘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就是记的这个升平景象，‘弥撒堂尖’是指东谷中路的庐山俱乐部，原是个基督教堂，舞会就在这里举行。从江西省歌舞团、赣剧团中，经过严格的‘政审’，挑了几十名女演员来，再加庐山上的能上大雅之堂的女服务员，舞伴就算齐了。会议名前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也常在这里留连。

李锐和田家英、胡乔木，都是毛泽东的近臣，能在近距离观察、接触这位伟人。三人都是忠诚，耿介而又绝顶聪明的知识分子，彼此能谈心里话，不必担心对方卖友求荣。

在一次漫谈中田家英说：‘主席很任性，我和尚昆同志有同感。有时捉摸不定、莫测高深，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反右以前，主席有次同民主人士谈话，说发动群众鸣放，党内有阻力，我身边的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就不同意鸣放。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密斯’（按：这是田家英对江青的专称）是个很不安分的人……我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席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在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议；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李锐说：‘这次开会我感觉可以真正认真、彻底纠正一下

“左”的东西了。主席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

田家英：‘有次我和谭震林一起在主席处谈话，主席拍着桌子说“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去年由主席自己到前台来管经济，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该如何来转弯了。’

李锐：‘有些人邀功取宠，坏事不小。我认为关键在五八年五月的华东计划会议。那时柯庆施刚进入政治局，很受宠倍，头脑发热得厉害，对下骄横得很。上海工业基础较好，于是想首先在钢铁上大大跃进一番，李富春以及王鹤寿、赵尔陆、吕正操等工交部门主要负责人云集上海，来帮助华东订五九年的大跃进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会议，与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住隔壁房。华东钢的指标涨到六百万吨，各大区通电话，一起看涨，主席要钢铁翻一番的决心就是这么下的。’

胡乔木说：‘这也同对国务院的领导（按：指周恩来）不满有关，他想以抓纲张目的方法来带动其它工作。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各方面的大跃进。造成现在这种困难局面，计委当然有责任，但富春同志（按：计委主任）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在成都会议上，冶金部写的报告，强调小高炉、小转炉的作用。大大受到表扬，因此就更加迎合，后来就无法抵挡高指标之风了。’

田家英：‘看来必须遵守经济规律，不论如何政治挂帅，也不能违反规律。’

李锐：‘应当尊重苏联这方面的经验，而去年刮风以来，就都避免再提苏联经验了。’

胡乔木：‘主席讲经济发展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

衡是永久的、绝对的,对这一观点我表示怀疑。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必须经常保持平衡,不能以此来套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包括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

李锐:‘在上海会议上,主席提倡海瑞精神,希望大家直言敢谏。真要总结经验教训,必须端正指导思想。你这个观点很好,何不找机会跟主席谈谈。’

胡乔木:‘主席谈海瑞的意图很多,但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田家英:‘武昌会议主席决定公布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陈云同志不同意公布,叫你向主席报告他的意见,你没有报告,上海会议挨了批评,主席称赞陈云:“真理有时候在一个人手中,”’田家英想证明毛泽东此时是想听不同意见的。

胡乔木:‘我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同志;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少奇同志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少奇向主席转告了,结果主席大发脾气。自南宁会议后,柯庆施等一受了表扬,不久又进入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就登峰造极了。’

以上材料引自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并非笔者杜撰。

彭德怀没有参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不知道毛泽东在会上说‘彭德怀恨死我了’这句份量很重的话,也没人敢向这位老总‘吹风’,他只听说毛泽东大讲海瑞精神,号召大家直言敢谏,学习海瑞。于是,请参谋王承先借来载有《海瑞传》的那一卷明史,展卷细读。

他出国访问刚刚回来。接到中央办公听通知:‘中央决定七月二日至十五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

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他对总参谋长黄克诚说：中央要在庐山开会。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就请你去参加吧，因为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

黄克诚说：‘彭总，我想还是我留下值班，你去吧！’

彭德怀默然俄顷：‘好，我去就我去。’

过了一会儿，他唤来秘书郑文翰：‘你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替我请个假，我不上庐山开会了’

第二天，毛泽东亲自给彭德怀打来电话，一定要他参加庐山会议。他只好遵命。

他是和张闻天、贺龙等一起上山的。上得山来，彭德怀被安排住在一七六号，而张闻天住一七七号，二人成了近邻。

一日，二人闲谈。彭德怀说：‘我平生最服气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也是一个。’

张闻天脱口而出：‘主席他很英明，可是整起人来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他从中国历史上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略确不同看法：‘主席同斯大林晚年不同，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而斯大林是否认有敌我矛盾的，后来又把主次颠倒了。主席对我国历史很熟悉，是党内任何同志达不及的。历代开国之君都英明而厉害，无产阶级领导也要厉害才行，但同皇帝有本质不同。’

张闻天笑道：‘彭总你呀，地道的忠君大臣一个。’

102 子珍上山 幽怨满腔话往事 信阳绝粮 哀鸿遍野望中州

一九五九七月八日，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上山了。

这是毛泽东委托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秘密安排的。杨派夫人水静与省长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一起去完成这个特殊使命。方妻朱旦华曾经是毛泽民的妻子，与贺子珍有过妯娌的关系。水静和朱旦华到南昌，把贺子珍接上山来，安排她住在二十八号别墅，等候毛泽东的召见。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连田家英都不知道。这年春天上海会议时，毛泽东准备会见贺子珍，由于江青的干涉，未能实现。开庐山会议时。江青住在北戴河别墅。毛泽东想背着江青实现多年的一个宿愿。

贺子珍度日如年，等了一天。九日晚上，盼望了二十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她被领到一八〇号别墅。一见室内当代帝王的豪华气魄，她惊呆了。本来她应该是这里的女主人，像住延安凤凰山窑洞时那样，可是，由于一念之差，如今人事全非，自己成了被召见的民女……幕一幕不堪回首的往事涌上心头，她精神恍惚，心乱如麻。当她被引上二楼的时候，毛泽东正凝眸注视着楼梯口，也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

‘润之……’一声呼唤出口，贺子珍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与毛泽东夫妻一场，留给她的只是这样一点‘特权’。在当时的中国，敢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没几个人了。

‘子珍。’毛泽东站起来，抓了贺子珍的双手，然后带着负疚的心情轻声说：‘我对不起你。’

贺子珍接住话茬说：‘是我不好，那时太年轻，太任性，要是听你的话，不去苏联……’她太激动了，说到此处，抽噎不能成句。

‘慢慢说，慢慢说。’毛泽东动情地劝慰着。

贺子珍断断续续地诉说，由于心灵的创伤，有时显得语无伦次。

‘……那年冬天，我生了个男孩，很像我们丢在苏区的小毛，大眼睛，很有神。多可惜呀，你没能看一眼这个孩子，连个名字也没给起……’

‘听说孩子没了，我托人把娇娇给你送去，使你精神上有个寄托。’毛泽东时而插上一两句话。

‘苏德战争爆发后，我们避难到伊万诺夫城。每天只供应几两黑面包，大冬天没劈柴供应。娇娇吃不饱，又挨冻，得了肺炎……我恨死那个保育院院长，她不给孩子治病，送入了太平间，我急了，跟他大吵大闹，把孩子要出来，他们说我是“疯子”，把我送进了疯人院……’

‘我真感激王主任（按：红军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仲丽同志，是他们把我救出来了。仲丽是医生，她跟苏方交涉，说我不疯……’

‘后来王主任告诉我，说你来了电报，叫我跟王主任回国，我多高兴呀，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一九四八年我到了沈阳。后来组织上找我谈话，不让我到北京，又接到你的信，叫我顾全大局，我听你的话，在上海住下来……’

‘……贺怡被分配到古安地委当组织部长，她到广东接回寄养的儿子春生、女儿海明，还把古柏的儿子古一明找到了，她千辛万苦，跑了很多地方找小毛，但没有找到。谁知回来出了车祸，也有的说是敌人暗密……我们姐妹命真苦哇……’贺子珍又失声痛哭起来。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毛泽东一声叹息。

谈话约一小时，卫士搀扶贺子珍下楼，传唤陪同来的水静上楼。水静走进毛泽东居室时，毛面色沉重，沮丧地说：‘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泽东特别叮嘱：‘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过了两天，贺子珍上庐山的消息还是传出去。康生最为敏感，赶紧给住在比戴河八号楼别墅的江青挂了个电话。江青闻讯大怒，她以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姿态打上庐山，准备闹个天翻地覆。

这两年毛泽东生活在三个妻子的感情纠葛中。一九五七年五月，曾经是杨开慧的同学，时在长沙第十中学任教的李淑一（他的丈夫柳直荀是毛泽东的老战友，毛泽东在湖南搞农运时柳任农协秘书长，一九三二年在洪湖牺牲）给毛泽东写信，索要毛泽东给开慧写的一首词，并附了一首纪念柳直荀的词。调寄《菩萨蛮》，是一九三三年的旧作。词云：

兰桂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填词《蝶恋花》一首，覆信李淑一说：

‘大作读毕，感慨击之。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地古之游仙诗。’毛词全文如下：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李淑一接到毛泽东的信和词，如获至宝，同事争相传抄。后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在报刊上发表了，还影印了毛泽东的手迹，在文坛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江青读报至此，醋海波澜，闹了个天翻地覆，他跟毛泽东摊牌，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还怀念我的唐纳呢。毛泽东说她‘胡闹’，骂她‘混’。她说‘男女平等，你怀念前面的老婆登在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死，找到他我要跟他通信，也登在报上。我无官一身轻，怕什么影响。’

一怒之下，江青真的写了一封信，不过不是给唐纳——她不知唐纳在何处，而是给唐纳的好友、上海的名导演郑君里，请郑帮忙查找唐纳下落。这封信由一位可靠的秘使送到了，在大上海埋下一颗特级定时炸弹。“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大上海掀起了红卫兵抄家的风潮，被抄的又是三十年代文艺界同仁，兴师动众，天翻地覆，就是要收回那封江青要寻找前夫的信件。此是后话。

一九五七年夏天那次吵闹之后的第二天，江青搬到了玉泉山，从此和毛泽东分居。毛泽东的生活方式是比较简朴的，跟毛泽东住在一起，江青也不敢过分奢华。摆脱了毛泽东的‘金箍咒’，江青以‘皇后’的名分放肆地作威作福起来。她喜欢杭州西子湖边的刘庄别墅，下令翻修改建。按照她的设计，中间是个大客厅，紧接两端是两个办公室，然后是两个卧室，一切要和毛

泽东对等,只是毛泽东住的一间稍大一些。全部建筑材料都用进口货。别墅内各个房间,要一年四季恒温二十二度,室内家具、地毯色调一律苹果绿色。附属设施有洗相片的暗室、戏台、舞厅、乒乓球室、电影放映室。江青的专门卫生间有淋浴和坐浴两用的浴盆,有坐桶、蹲桶和专门冲洗用的又坐又浴的小池。窗户一共三层,要隔音,安装橡木和软木,关闭无声响。纱窗要铜丝特制,不生锈。这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旗手’早就爱看港台和西方电影,在电影放映室消磨时间较多,对放映室的沙发设计专门提出了苛刻要求:要使她后靠时胆囊不疼,一口气坐上三个小时臀部不麻。

她有些病,但无大病。据中南海保健局局长史书翰估计:保健局花在江青身上的精力,付出的代价、费用,超过了所有的中央领导人,超过了毛泽东。这位延安时期的老医生在文革中被江青迫害,含冤去世。

一九五九年伺候她生活的有六个工作人员,护士小莹、小黄、警卫员、管理员、厨师、医生汪大夫,专车驾驶员和专机(江青有了自己专用的飞机)的驾驶员随传随到,不算在内。

江青的一日生活是这样的:她早晨醒来,按电铃,按一下叫警卫员,按两下是叫护士,按三下是叫医生。如按两下护士应召而至,送上一杯又酸又甜的柠檬茶。然后,向她报告当天气象,天气阴晴,风力几级,气温多少度,决定衣服的增减。拉开窗帘以后,替她穿衣服。江青嫌毛泽东‘土’,她属洋派,一切都跟丈夫相反。只是睡觉不穿衣服,连内衣裤也要脱掉这一点相同。她的理论是睡觉时全身肌肤不能受衣裤的压迫。起床一切都由护士服伺,她像个高位截瘫的残废人那样,不扣一颗钮曲扣。她的丝袜特别长,穿慢了,她腿伸得时间长嫌累,要端人;穿快了。

袜子稍不周正、出现扭曲也要骂人。穿好衣服，到卫生间，洗脸盆和漱口杯已放好温度合适的水，肥皂盒已打开，牙刷上已挤好牙膏。只有头发她自己梳。她睡午觉的时间特别长，午休起床时像早晨一样，又折腾一遍。每晚洗澡，护士要用温度计量好水温，差一度都不行。入浴时她躺坐在浴缸中不动，除头部外，从脖子到脚后跟，全由护士用上等护肤皂擦洗。浴后用大毛巾揩身，躺在床上又穿一次衣服。穿好衣服伸出脚让护士修剪趾甲。江青右脚是六趾。十一个趾甲要剪齐磨光才算完事。睡觉前，要叫三个工作人员来陪她打扑克。江青打牌只能赢，不能输。给她吃过安眠药后，打几把，等她眼睛睁不开，出牌都要问别人‘出什么’时躺下，逐渐双目全合，入睡以后，三个陪打的人才能悄悄离开，千万不能把她惊醒。她睡觉室内不能有任何声响。连暖壶塞的丝丝声都不能有。因此暖壶要放在她的寝室外。夜里她又要吃药，又要喝水。听她传唤，护士起慢了不行，走路有声响不行，走快了她说带风也不行。后来她提出在寝室内不加床的前提下要护士陪她睡，但又不让睡在长沙发上，说睡长了沙发上有脚臭。她提出要护士睡在她床下的地毯上，说：‘这床下很宽，又是干净的地板，铺上一层厚毯子，护士睡在床底下，我要什么东西，你们顺手就可以递给我。’从此值班护士睡在她床底下，不能翻身，不能咳嗽，不能打鼾，不能说梦话。更不准放屁。

给江青做饭的厨师是个湖南人，给毛泽东做过饭。江青是山东人，照说齐钱风味才对口味。但她不用山东厨师，要用这个湖南人。因为这位厨师侍候过‘万岁爷’，非如此显不出她的‘娘娘’身价来。江青不吃猪油，要用奶油烧菜，说是味道鲜美可口。她爱吃虾仁，把大青虾去皮，用鸡蛋清里好，过油溜一下，然后放嫩笋尖。还爱吃牛蛙，牛蛙又嫩又鲜又不肥，超过鸡鸭之

味,当时是从古巴引进的。因为饲养牛蛙要用鱼虾,所以没有大发展,只在广州有个养殖基地。江青吃牛蛙要用飞机空运。她喝鸡汤,要用三只母鸡清炖。其他海参、贝类每餐必有。她吃的东西数量虽不多,但费事费时,要精工细做才行。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不吃肉的那几年,江青的伙食标准一点也不能降低。

为了慰藉她那空虚寂寞的心灵,江青养了三只猴子。在她住的院子里有讲究的铁丝围栏,里面有假山,水池,小树,三只猴子跳跃攀援打秋千,怡然自得。每天江青亲自喂猴子,离不了香蕉、桔子、面包。她喜欢猴子剥香蕉皮、吐桔子皮、剥花生、磕瓜子。猴子跟她混得很熟,懂她的简单示意。她到杭州刘庄别墅也把猴子带来。

刘庄别墅改建竣工后,毛泽东来住过几天。一次江青劝毛泽东到户外散散步。这一带是游人不能到的地方。西子湖畔,芳草如茵,湖光激艳。出了房门,毛泽东信步向左走去,已行数步,江青喊道:‘朝右进吧。’毛泽东踌躇了一下,还是趑足回头,跟江青向右走去。

这当然是一件小事情,但颇具象征意义。如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一起散步,毛向左,无人敢提议向右。别人向右,毛泽东也不会附合。

前不久,毛泽东回韶山。专车行驶在湖南空旷的田野上,他下令停车。要下车活动活动。下车后,见一松岗,信步穿过荆莽奔松岗走去。李银桥等卫士们跟随着。这时摄影记者胡秀云发现铁路基下面有条小路,蜿蜒直通松岗,就喊:‘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

‘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继续在荆莽里拔步,又加了一

句。‘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刘庄别墅外的回头路，是他们结缡以来，江青第一次左右毛泽东。江青不露声色，暗暗得意。在上海会议期间，我不同意他见贺子珍，他就取消会见的安排。今日叫他向右，他就回头。看来年迈的丈夫渐渐屈从了——她这样想。

接到康生的电话，她一时怔住了。再三叮问确实不确实，康生说：‘是方志纯夫妇当牵线人，贺子珍现在仍在山上住着。’江青气得要发疯了。半夜，她给毛泽东打来电话，宣布她要上山，安排人接她。毛泽东很烦，但没有理由阻止她，也阻止不住她上山。据江青自述：‘主席说斗争太尖锐了，不让我到庐山去，但我还是去了。’

江青神秘地访问了康生。康生对她细说庐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势，告诉她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

于是江青摇身一变。她这年四十五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在毛泽东面前，像小鸟依人那样随和。这天天在气晴好。毛泽东要去电站水库游泳，江青陪着去了。她尊贵高雅，又平易近人，和保驾的游泳运动员、量水温的、备茶水的以及警卫战士，一一握手。毛泽东游远了，她赶紧吆喝陪游的运动员追上去……

就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为捍卫自己的‘帝位’，将毕生的功业、勋劳、威望作赌注全部押上的时候，江青的配合是默契的。他向康生、柯庆施等传达密旨，组织‘左派队伍’。在毛泽东的近臣如田家英、李锐、翦乔木等正直的共产党人把忠于党和人民摆在了忠于领袖之上的情况下，江青起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了表彰江青，毛泽东在她拍摄的风景照片上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

光在险峰。’照片上题的时间是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那是第二次庐山会议。按诗的内容来说，所表达的是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心情。不要小看这首诗，这是江青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护照’。

庐山会议前——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七月二日正式开始的。七月二日，毛、刘、周、朱开常委会一次，通过了毛泽东出的此次会议的十八个问题。

一、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三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三版)。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说来，湖南省委有三句话：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三、任务。今年钢是否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以后年增四百万吨，二千三百万吨就超过英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三成、即一千亿斤，一九六四年达到一万亿斤。恢复农业四十条，还是十二年达到。十五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

四、体制。人、财、商、工四权下放了，现在要收潮，归中央、省市两级。

五、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能保持百分之三十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种多样。

六、学会过日子。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四千八百亿斤标准过日子。

七、恢复三定：定产、订购、定销，三年不变。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

十三、质量问题。

十四、对去年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十五、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一百二十万基层干部，四十万犯错误，三千六百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

（第三个问题，分述今明年任务和后四年任务，则为十九个问题）

这十八个问题，反映了毛泽东召开此次会议的指导思想。开始他是想纠‘左’他羞羞答答地对缺点的承认让了一小步，即由‘一个指头’变成了‘一、二、三个指头’，百分之九十、八十至少是七十的成绩和光明在。这是他让步的极限。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第二条‘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要坚持’，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左’。对于自杭州会议至‘八大’二次会议反对‘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周恩来等‘反冒进’，就是主张综合平衡，周在‘八大’作报告时就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思想。如今，毛泽东抛开哥伦布，第二

次发现新大陆。作为自己的一大发明。

为了引导会议方向,毛泽东基本按大区编了六个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编入各组,大区负责人为组长。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大协作区。各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东北协作区负责人欧阳钦;华北协作区负责人林铁;华东协作区负责人柯庆施;华南协作区负责人陶铸;华中协作区负责人王任重;西南协作区负责人李井泉;西北协作区负责人张德生。如果按大区编组,应该编七个组,但只编了六个组,只华中协作区负责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没当上组长,可能是因为王任重对‘大跃进’的错误看得比较重,纠‘左’的决心比较大的缘故。王任重被编在第三组(中南组),组长是陶铸。

王任重在小组会上说:‘回顾去年湖北的工作,心情是沉重的。成功与失败是尖锐,取得的宝贵经验,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说,都有长远意义。教训确实沉痛,比一九五四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五百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一九五四年没吃过十二两以下(按:中国的市斤,每斤十六两,十二市两相当于零点三七五公斤)。现在已死一千五百人,十五万人浮肿病,早稻下来才可好转。这是全党全民的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脑。粮食只产二百亿斤,却按四百五十亿斤过日子。今年一月还相信有四百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仍说有四百三十亿斤);三月还说有三百五十亿斤;四月再摸,不到三百亿斤;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二百三十亿斤。一九五七年是二百一十九亿斤。为什么增产不多?大跃进掩盖水旱灾情,五百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

有一百多万亩早稻失收。去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面说假话。假像掩盖了真像，芝麻一百斤可说一万斤。大半年冷不下来。大家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少奇插话说：不要轻信，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群众批评，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年底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出警告。今年不可乐观，无大灾荒，可增产，但也到不了三百亿斤。粮种得多，油料就会减少。努力于，从困难处着想。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有的要一两年才能好转。手工业搞掉了，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超高五亿，三万吨半成品，所赔的钱谁出？说大话，吃大亏。纱厂办钢厂，用掉流动奖金。各县盲目盖了些工厂，可以改办学校或变成仓库。总之，一九五八年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要作充分估计，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赂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说右倾，我也不怕。人的认识总有局限性，过程是曲线的。脑子发热，很少看到不利；困难时，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党内有互相埋怨情绪，不利于团结。’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发言：‘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者三千六百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等部算了细账，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谅解，已有百分之九十五干部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人均一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改革炊具，用磨面机。开办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百分

之九十可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的,全省有百分之十发工资,从六、七元到一元不等。百分之五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农业大胆实验,创造了一些经验。最大变化在水利。去年六百万人上山找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修配厂,车床多了。铁今年可完成六十至七十万吨,钢五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来。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不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的不讲;领导没讲过的不讲;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

吴芝圃可以说是吃透了毛泽东为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错误轻描淡写,严格限制在‘一、二、三个指头’以内,成绩是大大的,水利、钢铁都了不起,落脚到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左’的一套要坚持下去。

由于毛泽东这样一个基调统一了庐山会议,对于主张认真纠正‘左’的错误的代表人物彭德怀,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后果极为严重。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向后延伸,看看庐山会议。后的中州大地吧。

吴芝圃从庐山下来,回到省城郑州,立即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

一九五九年天时不顺,加之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河南全省实产粮二百一十亿斤。为了向伟大领袖说明河南在‘继续跃进’,而且‘跃进得更好’,吴芝圃硬是估产为四百五十亿斤。生产队交不出摊派的粮食,就开展‘反瞒产’的斗争。哪个生产队

完不成征购任务,那个生产队长就是‘小彭德怀’;就要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被捆起来吊打追逼。信阳专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光山县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将县委扩大会议开成斗争大会,众人见第一书记动了手,为表示义愤,上前拳打脚踢,将张洪福的头发连头皮一起撕下,活活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位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社员,打死四人。下面干部一看,不是被打,就是打人,挨了打还落了个右倾,于是打人成了‘革命大方向’。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估百分之九十三。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〇年七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动用专政机关逮捕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其中三十六人死在狱中;拘留一万零七百二十人,其中死在拘留所六百六十七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事发后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检讨也承认信阳专区‘一时间形成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在严刑拷打下,农民的种子粮、喂牲口的饲料都被掠走了,最后为救出自家的亲人或为乡亲们着想的干部,只好连口粮都交出去。一九六〇年春天,信阳专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见一粒粮食,普遍浮肿病,大量饿死人。为免一死,农民拉家带口逃荒。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这是给人民公社抹黑。因为受了‘皇封’的酷汀轿佬枪缇驮谩殍专区的遂平县。既然是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怎能容许有逃荒要

饭的！于是他下令公安机关，组织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不准收留农村来的人，以‘限期消灭外流’。信阳地区的老百姓真真是逃荒无路，讨饭无门，只有坐着等死了。于是酿成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息县自然村减少了六百三十九个，饿死十万人。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双亲皆死的孤儿有一万二千人。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以省委名义向北京报告：‘河南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〇年春季，以信阳地区为主，在全省百分之三十左右地区出现了大不好形势，发生了极端严重的情况……据最近统计，自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〇年十月，全省死亡人口达一百九十多万人，单信阳地区就有一百多万人，估计问题彻底揭开以后，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这是我省解放以来最大的惨案……’

奉命查处吴芝圃的，就是庐山会议上他所在的第三组的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陶铸讲话：‘在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九五九年春季发生的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第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虽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扭扭怩怩，不忠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王任重在会上说：‘西平县因为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七千人，打死三百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吴芝圃检讨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同志们无论如何责备，以及组织上无论如何最严处理，我都

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辱。（按：记录错字，应是：‘引颈受戮’）’。

河南事件，谁使由之？孰令致之？是基层干部吗？是县委书记马龙山吗？是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吗？是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吗？当然他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溯源，是庐山会议，本来应彻底纠‘左’，毛泽东来个‘坚决反右’。他驾驶着社会主义中国这艘巨轮，突然一个剧烈的‘左’转舵，从此，毛泽东的毕生事业，陷入了迷途。

103 元帅上书 为党为民为社稷 重臣议政 见仁见智见灵魂

在中共党内,真正把毛泽东的丘壑机关看透了的是周恩来。一九五八年四月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并把《海瑞传》送给周恩来看,希望周恩来像海瑞那样,挺身而出,再反一次冒进,底下毛泽东的文章就好做了。但周恩来唯唯谨谨受教,自己决不当海瑞;同时关照彭德怀,要‘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上了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应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但他不主持,也不委托分管党务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主持,却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大跃进以来,毛泽东亲自披挂上阵,把周抛在一边,现在出了严重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让周来主持,即是说让周去引导会议方向,毛泽东冷眼旁观,看周恩来挂什么旗,引什么路。还是等著周恩来出来反冒进。

老练稳健的周恩来,严格按照毛泽东划定的框框去引导会议。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北京来的部长们按毛泽东定的基调发言,大讲大跃进的成绩,然后讲一点缺点(而且已经改了),落脚到怎样继续跃进上来。田家英在西南组谈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了解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受到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批评和制止。比较‘右’一点的,如王任重,是以严格的自责为主调,绝不涉及中央的路线和毛泽东的领导。彭德怀在西北组

发过七次言,有些尖锐的话,如‘人民公社办早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炼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等等。但这些意见,整理印成《简报》后,被协助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棱角磨平了。以致彭德怀看了还不满意,私下对周小舟讲,有些意见在小组会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彭老总不理解这是周恩来和杨尚昆在暗中保护他。

毛泽东每天阅读《简报》,看每个人的发言和表态,但没有人跳出来。毛泽东心里很是着急。在八月十六日,即庐山会议闭幕的那一天,毛泽东不无得意地把他的这种心情表露出来,根据李说的会议记录,话是选样说的:

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总结经验要这样总结。会议头一段开得不对头,后来才出现对立面,十九个问题现在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是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锋芒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社会上,党内,基层,早已经发生右倾问题。(按:着重点是引者所加)

毛泽东登上庐山,带头作诗说是要开神仙会,造成宽松环境,动员大家学习海瑞,直言敢谏,原来是处心积虑要钓鱼。毛泽东在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后,对此也直言不讳。八月十一日下午,他在批彭讲话中言为心声:‘你讲我阴谋就是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

现在,让我们回到七月上中旬,看看毛泽东的钓鱼术。

七月十日晚上,毛泽东召开组长会,讲了一番话,他说:

去年四件事:五九年要搞三千万吨钢;基建一千九百多项;

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而实际产量不高，计划偏大，项目多了。引起各方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是说缺点，确实有，都承认。因为总不能说粮不紧张，肉多了，计划不高，基建不大吧。承认有些被动，但并非全面被动，也不会垮台。公社没垮嘛，垮一部分也不要紧，再办起来就是。食堂情况也并不比公社好，垮一大部分、垮一部分都好，我都支持。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

打仗，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年实践，抓了工业，取得这么多经验，同过去只听‘训话’，走过场，让签字画押，总算是不同了。

一年来有好的与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毛泽东说到此处，周恩来插话：‘扎夏连科副主席[按：指一九五八年来中国视察全民炼钢运动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扎夏连科]来，说了两条：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缺点、错误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我们发明“大跃进”这个词好。’）

毛泽东继续说：

大家要记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分析问题，脑子不要僵化，不要要求人家硬相信我们这一套。党的方针政策正确

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十年。有些得不偿失问题,要付一定学费。

这时,刘少奇插话:‘大办钢铁花了二十个亿,全民学了,值得。’

坐在会场上记录的李锐对毛泽东这篇讲话的观感是:‘从这篇讲话看到,当时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是要大家冷静下来,要承认去年确实出现了失误,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一个个解决。讲话中还提到彭德怀的看法,可见对彭尚无戒心。’

李锐的看法,代表了与会者多数的看法。毛泽东第一步表演成功了。

他还有第二步。七月十一日晚上,毛泽东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湖南人找到一八〇号,说是‘我们来开个同乡会’,进行了无拘无束的谈话。

周小哥在延安时代给毛泽东当过秘书,所以有幸被派到湖南当第一书记。在大跃进中,周小舟的主要德政是,全省修了五万个小炼钢(铁)炉。他下秘令,有两万个没让点火,避免了很大损失。毛泽东叫韶山,周小舟陪同。对形势的看法,周小舟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很为毛泽东欣赏,成了庐山会议的基调。周惠是湖南省委书记,主管粮食,没搞‘放开’肚皮吃饭,湖南后来饿死人也比较少。本来是第一书记参加的会,毛泽东看周惠头脑冷静,破例把他也带上山米。李锐当水电部副部长,一九五七年力排众议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大坝,不因毛泽东写了‘高峡出平湖’的诗句而改变初衷。毛泽东赏识他不随风倒,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缓建三峡工程。后来要他作自己的工业秘书,以便随时有所垂询。

在这次‘同乡会’上，毛泽东十分坦诚，引咎自责。他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哩！’说到这里，毛泽东本人和他的三位老乡都哄堂大笑一阵。‘万斤亩，主席怎么也相信了呢？’李锐插话。

毛泽东说：‘钱举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按：见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说植物如能利用照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就能亩产几万斤；接着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许多事情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

三位老乡说：‘下面乱传话，传的快，还是形成文字为好。’

毛泽东说：“讲的不对，文字也一样不好。钢翻一番，准知当成了法律，党比人代会厉害得多。北戴河规定翻一番，索性登报，是薄一波和乔木的建议。”

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按：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

毛泽东虚怀若谷地说：‘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周小舟说：‘农业是根子，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为，’““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谭震林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往下传。湖南的

密植，偏稀一些，故此没有失收问题。现在会议还有压力，还是不原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也插话：‘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

毛泽东欣然同意：‘那好。’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七月十六日以后，人员就打乱编了，但组长没动，仍分六个组。

李锐乘机进言：‘二五计划轮廓要定下来，否则不好办事。’

毛泽东说：‘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注：李锐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指客观规律不易掌握）。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计划搞乱。“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李锐说：‘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

二周也附议。

毛泽东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陈有长处，也有短处。’

这次召见，使周小舟、周惠、李锐如坐春风。他们简直忘记了毛泽东九五之尊的身份，忘记了‘伴君如伴虎’的宫廷戒律。周小舟信口开河，竟说出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在中国历史上专用于讽喻帝王的话。而毛泽东竟心平气和，不以为忤。三位忠君大臣得出了一个结论：主席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种种错误，很能听得进逆耳忠言。

周小舟等沿东谷而下，遇上了罗瑞卿。每次毛出巡都是罗保驾。前不久到湖南也是如此。周小舟和罗瑞卿也稔熟了。一

时忘乎所以，周小舟把主席召见的简要经过，他说了‘上有所好’的话，主席能够容纳，足见主席决心纠‘左’等意思告诉了罗瑞卿。罗瑞卿那时是坚定的‘左’派，又把这些话告诉了柯庆施。于是，柯庆施就开始组织队伍，保卫总路线、保卫毛主席了。

周小舟最不该的是，又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彭德怀。第二天（七月十二日）上午，周惠鼓动周小舟再去找彭德怀谈一次（七月五日，周小舟与彭德怀谈过一次）。周小舟进入一七六号别墅，向彭德怀介绍了十一日晚上毛主席召见的情况，关于会议多谈缺点还有压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及蒋干故事等都谈了。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总能去找主席谈谈，更能引起主席的重视。’彭怀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周小舟说：‘将那些发言加以整理充实，就很好了。’彭总说：‘你当我的参谋。’彭德怀思虑了一天，后来还是觉得当面谈好。这天晚上去了一八〇号，但被警卫挡回来了。就这样，鬼使神差，彭德怀开始写他的《致主席信》。

毛泽东的第二步又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他在十一日晚上所表现的姿态，‘左’派的主将柯庆施，‘右’派的主将彭德怀都知道了。周小舟也是封疆大吏，中央委员，精明过人的政治家，他怎么也没想到，他本人充当了钓彭德怀这条‘大鲨鱼’的鱼钩，而鱼钩一旦搭在鱼的身上，就再也不能解脱，自己的政治前程要和彭德怀一起葬送在庐上。

七月十四日下午，彭德怀的《致主席信》送上了毛泽东的书案。毛仔细看了两遍，提起毛笔在信上加了个眉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给大会秘书处，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与会全体

同志。

意见书分甲乙两部分。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当时公布的各种数字，说：‘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在全民大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第二部分的题目，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开头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啊关系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一面谈了两个问题：

‘1. 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的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要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铁、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2.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

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议事,决定会议延长,要评论彭德怀这封信的性质,通知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上山。薄与安都是‘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批评彭德怀的重要当事人。这时候毛已经下了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清算彭德怀的决心。

批完了彭德怀的信件,毛泽东利用各种形式召见一些人,首先是各大区负责人,实际上是‘打招呼’。例如,邀王任重一起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时,说:‘现在我不发官。’

七月十七日,从下午五时至晚上十时,毛泽东在别墅第二次召见周小舟、周惠、李锐,另外增加了胡乔木和田家英,一起吃的晚饭,还喝了茅台酒,气氛之融洽宛若家人。毛泽东在这天晚上的谈话,根据李锐的笔记,要点如下:

关于总路线,真有百分之七十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百分之三十也不得了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谈了(李锐注:大概是指组长会上):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李锐注:指贾拓夫、韩哲一,宋平),正面有富春一人,就够了。只让签发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和问题。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李锐

注：这是指管理经济比革命难。）

六个地区大组人员打乱，使之不成体系，免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问题展不开。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李锐注：之所以搞大跃进提出‘以下为纲’，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国务院工作不满的一种表现——抓不住主要矛盾。在成都一会议时，乔木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李锐注：指井冈山时期），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李锐注：这是说明自己为何要亲自抓经济的道理，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到吴起镇剩七个人。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了，因为干部经过这样艰苦的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李锐注：说这个话的意思，还是指五八年虽吃了亏，但取得经验，队伍得到锻炼。）

田家英说：‘在四川将近半年的调查，使我对农村五风的情况，有了更多的感性的了解。在西南组开会时，我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问题时，受到组长李井泉同志的批评，以致讲不下去……’

毛泽东说：‘他们（李锐注：指各省头头们）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派。’（引者注：田家英反对高度密植，在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有过很大的争论。）

周小舟说：‘全民炼钢，各种高指标，其根子在粮食估产高了。’

毛泽东说：‘真正高产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五，’一般水平的是百分之九十五。而我们做工作，只能立足于百分之九十五。因此，年增产百分之三十是不大可能的。’

针对国务院许多部长对业务外行的情况,胡乔木建议:‘各工业部长们应该下去当几年厂长。’

毛泽东说:‘这个意见好。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要下去代战,成为内行。孔夫子的职业为道士,作过会计,管过田地。’

李锐说:‘三委(计委、经委、建委)工作要统一,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好。’

胡乔木也插话说:‘少奇的意见,还是由陈云同志主管计委工作为好。少奇同志还说:有人在观测中央,仍有两派(李锐注:促进与促退或左或右)。’

毛泽东说:‘富春是依靠王鹤寿的。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

周惠说:‘要把群众生活安排好,不然会出乱子。’

毛泽东说:‘乱了才好。五七年汉阳学生闹事,当时估计全国各地市一、二、三万学生想闹事不等,也不过几百万人吧。大乱了才好大治。’

胡乔木不赞成大乱大治的观点,委婉地说:‘脓疮需要有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周惠说:‘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的好。’

毛泽东说:‘现象与本质有时不容易看清楚。去年《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反映了些真实情况。还应办个《经济动态》。’(引者按:《宣教动态》反映了知识界,大学生的真实情况,《外事动态》真实地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事态的评论,毛泽东认为,报道真实情况的刊物对他是有帮助的,他提议办《经济动态》,就是因为广大的经济领域没人给他报真实情况。《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及各省的省报,根据毛泽东的历次讲

话,在鼓吹大跃进、放卫星、浮夸风、共产风方面,争先恐后,推波助澜,进行所谓‘舆论导向’,不仅把各级干部‘导’糊涂了,连毛泽东本人也被‘导’糊涂了。如果有独立的舆论,吹点冷风,对于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国家和人民实行正确的领导,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

有人提到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正面评论,大谈抗日战争初期旧事,说:‘洛川会议后,华北军分会发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李锐事后才悟出道理:‘主席这次找我们几个人再次谈话,关于彭的信件没有多说,只是顺便提到洛川会议,应当说是含有深意的:让我们知道,彭德怀这个人同他在历史上不一路,启发我们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的那一边去。同十一日夜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在防止彭的信出来之后,形势可能向右发展。’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一九八〇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李锐应邀在国务院第十组介绍庐山会议,谈完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第二次召见后,大家插话说:‘这次谈话已经把你们几个人当作右派朋友了,你们还蒙在鼓里。’后来又有老同志说:‘上海会议时谈海瑞问题,就是“钓鱼”,就是“引蛇出洞”。’

毛泽东利用周小舟把彭德怀的信‘钩’出来了,把这封信印发给与会者,自己并不亮明观点,让大家去讨论,是拿这封信,再去‘钓’别人,当然,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任何时候都注意掌握多数。他跟一些他认为该打招呼的人打了招呼,其他的人,让他们去独立思考,考验他们对自己的忠诚。

从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各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讨论。

第六组(东北组,组长欧阳剑)一十二日上午讨论,关于彭信的意见是这样记载的:‘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有的人说,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对于后来被抓住不放,上纲不反对毛泽东的几处提法,即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影响城市各阶层的农民各阶层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问题;处理经济问题不如金门打炮、平定西藏叛乱那样‘得心应手’问题,大家也表示了看法。有的人说:‘从实际工作执行中,从一个时期发生的具体问题看,如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说它是政治性问题也未尝不可。’有的人说:‘有些问题热得过火,如有的县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算过分,但这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不要说成是普遍现象。’有的人说:‘说我们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不像平定西藏叛乱、金门打炮那样得心应手。指我们这方面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的。’

第四组的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作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很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必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的主要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来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

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一机部长赵尔陆也在第四组。他是带了一箱子‘海绵铁’上山的。大炼钢铁以来他和王鹤寿的关系很紧张。王是钢铁的‘头’，赵是机械的‘头’，这是毛泽东在北戴河封的。王把钢铁炼出来交给赵尔陆。赵尔陆原想展览这一箱子宝贝，后来一反彭德怀，没敢拿出来。赵尔陆在小组会上是这样说的：‘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的是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容易引起误会。’

四组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食堂问题上继续护短（因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揭了底）。他说：‘应当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四川实行包两头，对老人和小孩实行粮食供给制。公社经过整顿后，占人口多数的贫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食堂对组织生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出勤率可增加百分之十到二十，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半供给制和食堂尽管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李显然知道，田家英的‘御状’没有告倒他，他对彭信没正面评论，但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李先念也在第四组，跟组长唱了对台戏。他谈了四个问题：‘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食堂的好处是可以节约劳

力,但有三个问题要考虑:1. 是否多吃和浪费粮食? 三百六十斤口粮肯定不够,在家吃饭可以糠菜半年粮;2. 燃料问题,北方用煤要增加,今年预计要销八九千万吨;3. 副食品的商品率是否会下降?(有人插言:肯定要下降)二、公社问题,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这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经验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要注意三方面的平衡:各部门内部的平衡,如搞多少钢,不能只看有多少高炉、平炉和转炉,还要看矿山、轧钢能否跟得上;左邻右舍的平衡;最后集中在物资、综合财政和劳动力的平衡。去年计划工作在这个三方面都有缺点。四、小高炉问题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去年搞小高炉贴了四十个亿,也不可惜。但有些同志认为四十亿搞一千万吨铁的生产能力,比武钢用十五亿搞三百万吨并没有多大不合算,这一点要研究。小高炉的帐要细算。’

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的聂荣臻元帅在六组发言,委婉地反对‘两小无猜’(注:毛泽东把小高炉,小平炉称为‘两小无猜’),他说:‘大型企业的发展应当是向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前进,而不是搞土设备、土机床。今后必须注意提高质量。目前我们钢的品种只有三百多种,而世界上钢的品种已达三千多种。应核对钢的品种规定出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合金钢最低应占百分之十以上,而现在只有百分之三。现在有些特殊钢厂为了完成数量任务,在炼普通钢。’

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黄克诚十九日在第五组发言。他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公社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达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

套。要是只挂个牌子就好了。去年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铁情况，这是大放“卫星”的地方，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中央写了封信，提出看法。材料转到省委后，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现在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大跃进以来，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主席也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三组组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党内应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里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否可靠。’

二组组长、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发言中没有正面提及彭德怀的信，说华东一切都好，仍是太平盛世。他说：‘就得失关系，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就，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一九五九年华东四百二

十八万吨生铁任务,就是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洋群”设备完成的。农村粮食真正紧张一点的是山东济事,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它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作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的关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了不得。’

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二组表态:‘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很好的,把问题直接了当提出了,引起大家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至于信的内容,有些问题的估计,例如“基本证实总路线是正确的”,“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不能同意。’

贺龙元帅在第三组发言。他说:‘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就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鄂西苏区,被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陆冬生、厦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德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为过火了。’

从贺龙这个发言看,毛泽东给他交过底了。贺龙元帅虽然文化不高,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贺龙作为二方面

军的统帅,不是毛的嫡系,一般会采取‘疏不间亲’的原则,不轻易介入毛彭之间的争吵。如今不仅介入,而且调子比谁都高,毛泽东自己都承认有一个指头至三个指头的错误,他却说连一个指头都不到,又回顾历史,反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对彭德怀,不仅有批判,而且有揭发,这是对彭德怀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的一个信号。

毛泽东要搬倒一个元帅,总要借助其他元帅的力量。元帅们虽然都属功勋显赫,大智大勇者流,但都不是神仙。而是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凡人。因此,都有自己的弱点;在天下大定之后,都有固宠取荣之心。连为民请命的彭元帅也不例外。一年前在军队系统开展的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借助于彭德怀搬倒了刘伯承,终于报了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毛泽东得天下之后,最受猜忌的功臣就是刘伯承。刘在战略问题上的见解不比毛差,而在战役指挥能力上比毛要强,此其一。刘带的部队第二野战军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底子,许多高级将领对西路军问题不服,此其二。宁都会议有一箭之仇,此其三。有此三条,所以在刘伯承统率大军解放西南诸省打回四川接近成都的时候,毛泽东下令停止前进,让贺龙率十八兵团举行解放成都的人城式。刘伯承心中有数,当了几个月的西南王(军政委员会主席),就主动提出交卸兵权和政权,去办军事学院,满以为从此可以避祸。不料一九五年毛泽东在军队系统发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逼得刘伯承最后辞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在批刘斗争中,彭德怀是积极的。在彭的心目中,刘是元帅中的大知识分子,懂外文,有理论,领导现代化建军比自己条件优越。刘任军事学院院长,还是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对彭的国防部长职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所以彭德怀积极参予领导了

‘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刘元帅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公开检讨,而后辞去军队教育训练方面的领导职务而告结束。仅仅过了一年,厄运临到了彭德怀元帅。贺龙积极参与了倒彭,后来当了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案组组长,但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

104 疾风劲草 论平衡而谈民主 文过拒谏 君为贵兮民为轻

在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一个星期之后，即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华东组作了长篇发言。在众多高级干部猜度毛泽东的心理，窥测会议的方向，以求作分寸适当的表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张闻天说话了。他仿佛又回到了遵义会议时代，想唤醒全党的迷狂，端正会议的方向。他说：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的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午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的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备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表

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但是,人家那样说,我们也不要生气。这些说法可以研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即使说是三七开,也是肯定它基本上好的。

以上是张闻天发言的基本观点。如今评价历史人物,公正地说,张闻天也罢,彭德怀也罢,他们既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也不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英雄，更没有推翻毛泽东，取而代之的野心。

彭德怀说的是：‘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张闻天对缺点和成绩的估计是：‘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

在承认总路线基本正确和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前提下，他们希望毛泽东正视这两年发生的问题，认真地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是这样说的：

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遗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人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之间的正常的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

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如当然，我现在

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的。总之,我们承认全民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食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粮食浪费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准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结余

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

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并不是一篇一律的。

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对于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就更不会了。至于有些人不怀好意,企图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把我们说成漆黑一团,那就要同他们辩论、斗争,也不是泄气不泄气的问题。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列主义

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讲，不要怕泄气，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计’。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着，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中，‘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地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

讲缺点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账。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是不行的。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仍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

总之,民主空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张闻天发言长达三小时,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以上是他发言的重点。通篇发言摆事实,讲道理,逻辑严谨,充满作为执政党一员的主人翁的善意。当天晚上,华东组的组长柯庆施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是主席要是再不明确表态。人都被他们拉走了……。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深夜,一八〇号宽敞的书斋他仍觉得憋闷,到外面竹林里去踱步,边吸烟边走,走完一圈又是一圈,吸完一支又是一支,脑子里三十六计想了个遍,仍无妥当对策。

他知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在挨饿,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各级干部都在向上面追究责任,公社埋怨县的领导,县的领导埋怨地区领导。地区怪省,省怪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都在看着自己,怎样收这个局?

要是周恩来跳出来多好啊!那时可以将一切罪过归启于政府,自己以正确路线代表的资格,反对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偏偏这个周恩来拒绝扮演海瑞的角色,只

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整顿被搅得一塌糊涂的国民经济，无半句怨尤，更不提‘反冒进’的旧账。回想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公社化运动、全民办食堂等等，都是自己在大庭广众之前拿的主意，周恩来既没有建议，也没有反对。在保持一致方面，我说一百，他不说九十九，也不说一百零一，实在在无辫子可抓。

跳出来的这两个人，一个彭德怀，一个洛甫（张闻天），彭是管军事的，洛是搞外交的，经济建设上的失误，怎么拐弯也落不到他们的肩上。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看法，都是实情话，有根有据，实事求是，但危险也就出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上，他们的观点一旦统一了上下的思想，自己的地位还能保持吗？虽然彭德怀承认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洛甫说缺点还是一个指头，但遵义会议时不是也说博古的政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的思绪集中在一个点上：当前形势是反‘左’还是反右？彭洛要求彻底纠‘左’，参加庐山会议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主张纠‘左’，全党全国人民要求纠‘左’，提反‘左’的口号，顺乎党心人心，让整个国民经济从‘大跃进’的颠狂中退下来，休养生息，但自己呢？当反‘左’成为汹涌的潮流的时候，自己还能在这象征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的昔日的‘美庐’、今日的一八〇号发号施令吗？

一条‘左’倾路线是要有代表人物的。反‘左’反到最后不就是引火烧身反到自己头上来吗？！自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大半辈子，千辛万苦，家破人亡，前不久大儿子死在朝鲜战场上，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吗？不能！绝对不能！

保住自己的‘帝位’是高于一切的，这就是结论。鉴之于历

史,为巩固帝位,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是不择手段的。他想起了庐山锦绣峰下面的‘御碑亭’。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洪武十三年杀丞相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又杀大将蓝玉,其家族、同僚、部属,因胡蓝党案牵连被诛者达四万人。最无道理的是杀韩国公李善长。因占是官报告:‘会有星变,其占为大臣当灾。’‘勋臣第一’的李善长,为此全家七十余口满门抄斩。朱元璋几乎杀尽了为他打天下的功臣,然后,建造了这座御碑亭,说自己做皇帝是天意,流传至今。历史从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毛泽东得到历史启示后回到了现实。

毛泽东又点燃支烟,一个亮点在竹林中游荡。新一轮踱步,新一轮思考开始了。

要从根本上扭转会议的方向,扭转全党的方向,扭转全国人民的方向。当前形势不是反‘左’,而是要反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保卫这三面红旗,要组织队伍同一切反对派作战,把这股汹涌蔓延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压下去,坚决压下去。然后,在实际政策上,悄悄地纠正‘左’的偏差

看来要牺牲老彭了。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第二号元帅,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英雄,这样一个人物倒下去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是有相当震撼作用的。谁再提反‘左’谁要再翻腾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就看看彭德怀的下场。

还有那个洛甫,在延安当过十年‘开明君主’,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扳倒他可以防止在三‘左’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干部(这个数量不小)重新在他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二十二日天亮以后,一八〇号值夜班的一位老工人在竹林里看到数不清的足迹和几十个烟头。毛泽东下了决心了。该纠

‘左’时他反右，这一念之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入了绝境，只要他活着，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他不再是中共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在他一念之差的后面，是亿万生灵涂炭，上千万人活活饿死。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兵燹。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会议秘书处通知大家开会，九点听毛主席讲话。连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不知道毛泽东要讲什么。这是毛泽东对全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会议在庐山交际处招待所西餐听举行。

毛泽东提早几分钟来到会场，坐在铺着白桌布的台子前吸烟。他吸的是一种特制的熊猫牌香烟，据说尼古丁含量很少。又新开了一包，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他的讲话提纲。他有这个本事，靠一支香烟引路，有不尽的才思，足以使他的听众目瞪口呆，像接受催眠术一样入其彀中。

等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们都到齐了，毛泽东自拉自唱，也不用人主持会议，平静地开了腔。这是一篇‘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代表作。以下是李锐的记录全文：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列立的，正

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柬。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岢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

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个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表情，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

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时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得延长。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按:梁朝的曾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茄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按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帮叫我们做秧歌王相。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

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一九五六年、五七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丰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

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一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顺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等省有一半食堂还在，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赶，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五六年就有办的，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现在散

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自己开脱一下: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对建设也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没有领导,哪来英明。五八、五九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钢铁指标柯老讲六百万吨,我六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我,一个儿子在朝鲜战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补贴八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啜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就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那些意见就是驳。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发现酷秣殄毙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个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党讲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

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我也放了三火炮:公社、钢铁、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点,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说是就要来了,又没来,反反覆覆,他死了好多年,到列宁时候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一九二七年那样的失败?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了?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如果讲责任,富春、鹤寿有点责任,谭老板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你要搞六百万吨,是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九个万人上阵,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说到此处,毛泽东嘎然而止。

105 林彪出台 左嗓一声定基调 润之理短 宣讲七发作高深

毛泽东的讲话,真如一声惊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观望者总算摸到了底,知所趋处,知所依归了。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阅历尚浅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却怎么也拐不过弯来。二十三日傍晚,他们在周小舟的住处放言高论。

周小舟说:‘我怀疑主席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的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

周惠说:‘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覆变化太快。’

李锐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

周小舟说:‘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一趟,问问到底为什么?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劝阻说:‘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

周小舟提议到黄克诚那里谈谈。随即拨通了电话。黄克诚为了避嫌,开始不同意他们去,因周小舟坚持要去,黄认为周、李是毛主席的心腹近臣,或许不要紧,就答应了。黄克诚上山后,为研究军务方便,也住一七六号,与彭德怀住一幢房子。听了毛泽东上午的讲话,黄克诚思想极为沉重。

三人进入一七六号客厅,惯常的让座倒茶这一套全免了,就站着说话。

周小舟说：‘主席可能受了蒙蔽。袁世凯称帝前，筹安会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李锐说：‘主席也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闻言大惊失色，在他这里说这种话还得了吗！连忙截住话茬：‘你们是主席身边的人，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想想，可以作检讨。’

这时是九点多钟。彭德怀手持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车辆的电报推门进来了，他是来找总参谋长黄克诚处理军务的，周小舟上去打招呼：‘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又谈了几句，三人告辞出来了。偏巧又在归路上遇见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罗瑞卿回去向毛泽东报告：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于是，由思想批判深入到追查反党集团。

七月二十六日傍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在彭德怀的观念里，君臣的关系很淡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好像还停留在井冈山时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毛不称‘主席’，直呼‘老毛’。

对于毛泽东在二十三日的讲话中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他反感极了。谈话中二人各不相让，顶起牛来。彭德怀骂街了：‘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位元帅指的是‘七大’前的华北座谈会。因为打了‘百团大战’，你组织人批了我四十天；如今你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庐山会议开了二十天，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给你提了点意见为什么就不行？’这个话没有录音，没有记录，但原版保存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三年之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

的娘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搞乱了,工作受了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话是有录音,有记录的。

谈话谈崩了,彭德怀大不敬,辱骂了‘今上’,这样一个事态发展,恰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于是彭德怀的问题‘升级’了。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继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刘清界限,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毛主席说彭德怀与他长期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将原来的六个小组,合并为三个大组,每组五十多人,任务包干。第一组组长李井泉,领导批彭德怀;第二组组长张德生,领导批黄克诚;第三组组长柯庆施,领导于比张闻天和周小舟。

也在这天上午,汪东兴召集各中央领导人的保卫人员和秘书及江西省接待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宣布:

一、这儿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及其追随者)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住地。

二、这儿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

三、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另外不能把这几个人的名字传出去,这是纪律。

七月三十日,聂荣臻和叶剑英奉命劝说彭德怀检讨认错。叶剑英流着眼泪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然后二人又劝彭,不管‘事实’,抛开‘细节’,要从‘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的高度去认错和检讨。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意思是说,维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而揭露和批评毛的错误,即使是有事实根据的。从‘细节’上看批评的是对的,但‘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不利,因而也

是错误的。林彪于七月二十九日应召上山‘勤王’。他一上山就参加了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常委会。两次常委会都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四常委出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在党内的地位实际上是副总书记）上山后，从七月二十二日起接替周恩来领导会务工作，所以彭真被吸收参加常委会，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贺龙因为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彭德怀，也被吸收参加常委会。在当时，能列席常委会，是受到主席特殊信任的标志。贺龙列席常委会，不能不对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全体与会者发生影响。大家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在路线上坚定地支持他，就有希望升入党内更高的层次。于是各大组的批判会迅速出现一边倒的局面，批判发言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彭德怀是以受审判的身份参加常委会的；另外还有四个人列席：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是来受教育，以便与彭划清界限的。彭真指示李锐兼作会议记录。

在八月一日的常委会上，朱德总司令发言，他希望彭德怀的认错能够得到毛泽东的宽容；从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起，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奋斗了一辈子，不要从此分手，所以说了几句‘合稀泥’的话。

突然，毛泽东将左脚抬高，超过了面前的茶几，他右手拿着烟，用左手去抓圆口布鞋的鞋面。与会者一看就懂了，这是说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脸一红，停止了发言。

林彪以他那特有的尖刻的湖北嗓音，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一语惊四座，一下子就把网提上去了。然后缓缓地展开他的意见：

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

舍我其谁。入党后，在党内藐视一切，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根本问题要从世界观解决，你是经验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有个人野心，没有脱胎换骨，是个不驯服的党员，危险在此。入党后独立为王。滕代达是个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独立性。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全为群众服务？这种成份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是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炮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少奇）谈不上。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如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彭德怀：就是一稿），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矛盾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东插话：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期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写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

纷,你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作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的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我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的是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

林彪的发言。通篇以‘野心’二字立论,抛开具体的是非,大合了毛泽东的胃口,频频插话,形同唱合。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各路英雄哪个没有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种雄心大志,换个贬义词就是野心。从这里下手,能诱导彭德怀承认错误;而一旦彭承认了这个错误,就被打中了要害。一个有野心的元帅,在朝中还能立足吗?接下来的会议记录是:总理:‘一改二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

少奇:‘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

回去。’

主席：‘两次声明，要收回信，《简报》上说的，我不相信。’

彭真：‘三七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三七年十二月传达王明的东西，我强调夺取领导权。这次在火车上谈匈牙利事变。（主席：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么能同匈牙利比？）信是个纲领，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主席。’

主席：‘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少奇：‘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彭总：‘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每回唱三个歌……，总理：‘感情问题。’彭真：‘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大当个唐生智、程潜。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德路线正确，也应服从。（少奇：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同志在一起，应肝胆相照。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张飞，能换心的。归根结底，是宇宙观和党性的根本分歧。’

黄克诚：‘这都是赤胆忠心的帮助。我们相处久了，被另外一种感觉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过意见。今天这样讲，谈及个人品质，使我队识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够解决。个人英雄主义有感觉，也感到想表现自己。华北同志意见很多。我们之间谈话交心，扯过很多问题。如历史上中央苏区的问题。关于主席的问题没谈过。谈过请毛主席出来领导。六

中全会放炮(引者按:指七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被模糊了。三八年后,觉得对毛主席态度有改变。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也谈过。我要他到主席处谈谈。心是否都对我交了?还不敢说。对罗瑞卿,我批评过他(按:指彭)。对贺老总,没同我讲过好或坏。对干部一拉一打,有些个别现象。是否整个如此,还难判断。交心问题,从前考虑过,不能完全讲出来。(林彪:是伪君子。)也可以这样批评,装模作样,并非完全内容与形式发那么一致。(主席:全部伪不是,有真有假,寄希望于两面,有一面有希望,有做工作的可能。)常委这样苦口婆心,应当感动。不是主席领导,怎么能有今日局面。这样教育、帮助,应当感动,是帮助。’

主席:‘历来估计两面。好的一面扩张,可能改。也有可能不能改。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众,关系好一点,改改,一时改不好不要紧。’林彪:‘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彭总:‘改造思想赞成。总路线拥护。工作有消极面。’主席:‘我们党是三山五岳,是个联合会。’彭总:‘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军委应当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来。提议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务。’主席:‘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彭总:‘也不是以此来抵抗。从朝鲜回国后,就不想干。军队复杂,科学技术,不摸不行,不好下决心。早有此意,并非不服从,希望谅解。承认要思想改造,学点马克思主义。看书没看通。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三十二年来,没有真正坐下来读过一本书。英雄主义思想还有根源。今天讲的事,好多忘了,当年事,容易忘。军队要培养新人,准备打仗。我这个人随便,越熟越马虎。这次会本不想来。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

想。华北会议作过检讨。洗脑筋不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没同别人谈过，是否是备个案，是否如大家讲的如此系统，现在还难接受。说我想发表，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这两个东西，没有的事。这样说，发展下去就危险，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二十三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主席：‘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彭总：‘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谢，不抵触。’

烈火金钢的彭元帅，在毛泽东和林彪的一打（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三顶致人死命的大帽子）一拉《‘还是你干’不撤军委和国防部的差》之下，终于软化了，由进攻变成了防御，由原告变成了被告，由提意见的人变成了被清算的人，由斟酌给别人戴个什么帽子合适变成斟酌自己领那一顶帽子合适，从此走上了漫长的检讨认罪的道路。

毛泽东在治服了彭德怀之后，腾出手来收拾张闻天。八月二日深夜。他提笔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怎么答覆张闻天在发言中论列的十三个问题，毛泽东是费了一番思考的。就事论事，叫洛甫牵着鼻子走，和他讨论经济形势和大跃进的得失，自知心虚理短。洛甫发言后也曾很自信的对秘书讲：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但毛泽东想起了他的运用纯熟的军事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根本不着经济问题的边，却议论起汉代学士枚乘的文章《七发》来，嬉笑怒骂。把张闻天奚落一番。这封信也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于是，张闻天变成了‘旧病复发’的楚太子。连自己也得认得了病。信

是这么写的：

闻天：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贵！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真难过。’

同志，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丰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坦然汗出，霍然疼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七发》，真是一篇妙文。

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毛泽东

八月二日

张闻天接信，对这种文不对题的论战虽然不服，但这时庐山会议的气氛、他的处境，已不允许他再说什么，只有‘谢主隆恩’，按毛定的调子作检讨。

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们，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见到主席给张闻天的信及随信附件枚乘《七发》原文，反覆研读，相互切磋，以求领会其中的要言妙道。他们的思想离开了将要破产的经济和正在挨饿的人民，离开了前几天还在争论的大跃进的得失和

经验教训,一下子被毛泽东引到了汉朝,更加敬佩毛泽东的博学和高深。

毛泽东见此计见效,兴致更高,润笔挥毫,写了一篇评介性的文章,题名《关于枚乘〈七发〉》,印发给大家,文曰: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买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熬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引者批注:此时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们由于粮食定量降低,缺油无肉,大量地患浮肿病,医生嘱咐少活动以保藏热量,苟全性命,谁还有精力去游水、爬山呢?!毛泽东的思古幽情雄现实生活太远了。)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做工、种地那样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令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潘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姿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威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象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

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引者批注：由楚太子宴饮纵欲致病，联系到‘左’右倾，生拉硬扯，文不对题。毛泽东离开实事求是，输了理之后，尽管架势还是那么高屋建瓴，但毕竟显露出了江郎才尽的虚弱。）‘客曰：令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坦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引者批注：毛泽东没有回答张闻天发言中摆的那些事实，更没有讲出一条道理来，只是下‘圣旨’以势压人。）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出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城，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引者批注：枚乘天上有灵，大概不会接受毛泽东的褒奖。）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挽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

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采‘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大员们读了毛泽东对《七发》的解释文章,才算弄懂了楚太子和张闻天的关系,原来是楚太子‘右倾’,张闻天也‘右倾’,但还是觉得这个比附不是那么恰当,不过没人敢提出质疑。

张闻天于八月十三日上午在全体大会上检讨。按照毛泽东来信定的调子,承认陷入了,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疟疾原虫’复活。从张闻天的检讨中可以看出人性、党性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张闻天说:‘我是六月间开始陷入军事俱乐部,七月二十三日以后逐步退出,我为什么会陷入军事俱乐部呢?’

‘一是思想上右倾,过分看重重大跃进中不可避免的缺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按劳付酬,共产主义萌芽等等,认为太多太过火,只愿意看到缺点,不愿意听说成绩,把马克思主义统统忘记了。看不出彭德怀有野心,内于我对中央有不满情绪,就视他为同道,埋怨人家不听彭的,以为中央不愿听反面意见,完全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俱乐部这几个人,思想都右,是资产阶级俱乐部,资产阶级的工具;要站到中央、主席方面来。

‘二是教条主义老原虫复活。我的教条主义思想根源很深,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我就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还攻击过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邵式平等同志,现在我要再一次向他们道歉,那次错误造成很大损失,我负有很大责任。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我对毛泽东同志有一定

的尊重,但还有点分庭抗礼,对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唯一领袖还没有深刻认识。延安整风以后,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领导,开始信服,只对整风审干中“左”的现象有些不满。现在我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主席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的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上结合起来,我也就由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走到反党。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意的学生。

‘三是教条宗派主义的原虫复活。延安整风后,教条宗派主义的毛病有所克服,但原虫并未灭绝,在一般情况下,它是潜伏着的,但是遇到中央某个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批评,我就容易产生怀疑和不满,影响工作积极性,也影响到个人同中央不那么通气,再加上本人还有高傲情绪。党中央处理干部错误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央过去对我的处理是宽大的、公正的,分配给我的工作也是合适的。事实上不是中央不信任我,而是我对中央不够信任,有宗派情绪,碰到有同样情绪的人就结合起来,不顾团结,为人利用。这不但损害党的利益,也损害自己。我对彭德怀也有不满,可是由于宗派情绪,终于陷进了军事俱乐部了。我现在认识到了:毛泽东同意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就是损害全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

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全党达成的共识竟然是:上千万百姓饿死事小,保全毛泽东的面子事大。呜呼,悲哉! 呜呼,痛哉!

106 忍辰蒙羞 彭德怀违心检讨 助毛为虐 刘少奇当众失言

在庐山人民剧院,从八月二日起,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断断续续地举行。开大会就在这里,开小会则分散在几个会场。八月十三日下午的大会是斗争‘反党集团’的头子彭德怀。积极分子们都发动起来了,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批斗会的主持者是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政治局常委,彭真、贺龙、林伯渠、刘伯承等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前排的藤椅上。

首先由彭德怀作检讨。他经过倒海翻江的思想搏斗,决心听从二位老战友的劝告:‘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的利益来作检讨。’也就是离开实事求是按毛泽东定的调子来作检讨。支持彭德怀作贱自己的信念是:‘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见《彭德怀自述》第二七七至二七八页)昔日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以低沉悲怆的语调发言:

一个月来会上的批判,对我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

然后,按照毛泽东在小会上算的历史旧账,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或者支持不力,贯彻不力,上纲为几次路线错误。

谈到现实问题,他无可奈何地承认:‘七月十四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知道,不认这条罪名过不了关,而认了这条罪名自己就完了。可怜的彭德怀像溺水的人挣扎着抓住一把草那样,他咬文嚼字地用了‘事实上是’四个字,意思是说主观动机不是:‘事实上是’就够定罪的了,谁管你的善良的动机呢?!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夸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九千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更错误的是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这次攻击,正是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于是,彭德怀逐一交代了他和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按照中共党内生活程式。彭德怀还深挖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上纲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这样的高度。检查了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检查了‘这次犯错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着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

在检讨的最后,彭德怀这样表示自己的决心:‘我坚决地、

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人民解放军是党的有力工具，由我这样的人来掌握，是非常危险的，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并愿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求党分配我去做党认为合适的工作。’

这时候彭德怀对毛泽东还没有完全失掉幻想。他清楚记得在八月一日的常委会上他说请罢兵权的话时，毛泽东当着众常委的面说：‘还是你干。’林彪也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你，工作要你做。’彭德怀幻想用自己的深刻检讨换取毛泽东的宽容大度，毕竟我为你打江山三十年，你老毛要是真能宽容我，再说一句‘还要你干’，我肝脑涂地也一如既往，保你的江山。政治上的翻云覆雨，彭德怀还是个小学生。毛泽东阴险地微笑着。他要一步一步地收拾这位杰惊不驯的元帅。

彭德怀检讨后，李井泉第一个发言，说彭‘态度有所进步，但没有交代新内容，而且对野心家、伪君子的问题，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问题，都回避了。主席在公社化和全民炼钢这两件事上，有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不是两条大罪状，而是两条大功劳。’

康生说：‘彭德怀还在耍两面派手法，只承认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下去会成为野心家，而不承认已经是野心家、伪君子，共产党内的野心家必定是伪君子，最后采取阴谋手段分裂党。彭不承认这一条，就不能使全党相信你不会造反。’

谭震林说：‘我看彭德怀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刮共产

风,是我要负责的,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当的。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又有许多人急于表现,站起来慷慨激昂,对彭上纲很高,同时表白对毛泽东的忠诚。为追逼彭德怀,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还拍了桌子。

只有朱德、刘伯承等少数人保持冷静的态度。面对此情此景,两位元帅内心非常痛苦,不由地由心底生出了‘离鸟尽,良弓藏’的悲凉。一年前,彭德怀蛮横地整了刘伯承。熟读经史刘元帅此时此地没有一点幸灾乐祸之心,他只为功臣们的命运担心,下一个倒下去的该是谁呢?!

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彭德怀元帅,因为和毛泽东主席发生意见冲突倒下去了。麦克阿瑟也和他的总统杜鲁门有过激烈的顶撞和争吵。他在朝鲜前线公开批评杜鲁门总统的亚洲政策,杜鲁门总统下令撤了他的职。更使他觉得丢脸的是总统竟没有事先打个招呼,麦氏是收听新闻广播时听到自己被解除一切指挥权的消息。政府是有权威的。军人,包括麦克阿瑟这样卓越的军人,也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对麦克阿瑟的处分,仅此而已。麦克阿瑟不服,回到美国后,在国会和全国各地演讲,坚持自己的观点,反对杜鲁门的亚洲政策,尔后又参加总统竞选,企图取杜鲁门而代之。虽未当选,但体面地渡过了晚年。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一切活动,都被视为正当,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并没有被认为是野心家,更没有加诸什么‘篡党篡国’的罪名,进行‘批倒批奥’。

彭德怀和麦克阿瑟晚年的不同遭遇,反映了两种历史传统、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政治制度的不同。制造彭德怀冤案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但又不仅是毛泽东,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一种

制度所形成的历史的合力。强化这种历史合力的人,如刘少奇、贺龙、陶铸、李井泉、谭震林、罗瑞卿等在后来的几年中,又都被这种由他们自己强化越来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合力整得家破人亡。中共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必须进行以扩大党内和党外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和改革,这是保证不犯大错误,实施对国家、对人民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八月十四日,黄克诚在大会作检查。他说:‘我七月十九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检查之后,还在大会的压力之下,对彭德怀进行‘揭发’。他讲了这样几件事实:‘我过去和彭德怀同志相处很久,他一贯地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近几年在军委一块工作期间,常常听到他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满言论,甚至指桑骂槐地谩骂。例如,他对各地‘给毛主席‘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员,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上是骂毛泽东同志。’

这最后一件事,所谓‘选妃子’是怎么一回事呢?五十年代初,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组织专场舞会,舞伴都是从部队文工团临时挑选。后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决定在中南海警卫团成立文工团,经过严格政治审查,挑选年青貌美的女子,专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伴舞;文工团的乐队则是为专场舞会伴奏的乐队。彭德怀刚从朝鲜前线回来,主持军委工作,见此报告就发了脾气,大骂罗、萧,说:‘这不成了封建皇帝选妃子!’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的批文如下:

刘、朱、彭、罗瑞卿、周阅，尚昆处理。

根本不应设此文工团，三反后又发生此事是不应当的。萧华只负批发电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公安机关。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是谦虚谨慎的。毛表态后，中央警卫团的文工团就解散了。从此，罗瑞卿、萧华与彭德怀结怨。

划入反党集团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没有在大会上检讨。并不是毛泽东对他格外‘开恩’，而是因为他态度不‘端正’，与彭德怀划不清界限。

在大组会上，当许多人为了与彭划清界限，翻出历史上的陈赓烂谷往彭德怀身上投掷的时候，四十七岁的周小舟讲了两件事，他说：‘彭德怀同志跟我说过：对主席的正确、伟大是逐步认识的。一是井冈山会师后，毛主席不准井冈山的人议论湘南失败，以利团结。彭总说，可见毛主席的伟大深远精神。二是抗战初期运动战与游击战之争，彭总说，很久以后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这就证明彭总从心底敬佩毛主席。’

小组会上逼他揭发彭德怀与他说的‘私房话’，周小舟没揭发彭德怀，只交代自己在彭面前说过：‘毛主席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周小舟就这样‘无可救药’地陷入‘反党集团’不能自拔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向党内宣布：‘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

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决议》最后说：‘当然，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竟然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在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一光荣的胜利的道路勇往直前，为新的伟大胜利而奋斗。’这段话表面看来是些中共惯说的套话，实则不然，它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它以中共文告的堂而皇之的名义，宣告中国共产党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决裂。错误可以说成正确，失败可以说成胜利，六亿人民深恶痛绝的‘三面红旗。’硬说是他们的‘伟大决心和伟大

智慧的表现。’党的认识、党的决议完全和人民的良知背道而驰。从此，中共的路线走入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死胡同。为了改变这条错误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左’倾路线，继彭德怀之后，一大批为民请命的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人牺牲了性命。单一个包产到户、多少想要老百姓吃顿饱饭的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

通过两个决议和全会公报之后，毛泽东以一次党内路线斗争胜利者的姿态在会上讲话。除了与彭德怀翻腾历史旧账之外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承认他处心积虑地要抓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整人以立威，以把全党全民的‘右倾’情绪压下去。他说：‘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总结经验要这样总结。会议头一段开得不对头，后来才出现对立面，十九个问题现在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是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锋芒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社会上，党内，基层，早已发生右倾问题。’

第二、他提出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新论点，为整海瑞式的直言敢谏的干部制造理论根据。他说：‘海瑞搬了家。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是右派海瑞。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主要侧面，揭露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忧虑。当前形势要搞清楚，主要是反右，庐山一百八十度太转弯，空气变了。’中央委员们这才闹明白，原来柯庆施、康生才是海瑞——主席喜欢的‘左派海瑞’。

八月十七日,清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还是在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中央委员和上山的高级干部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刘少奇大讲个人崇拜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他说:

这一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我想,革命的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正常的革命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或者是八分成绩两分缺点错误,或者是一分,一个指头,总而言之会有的。回顾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都是如此。有人建议不要再搞运动了,彭黄张周就反对搞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顶住这种议论。

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

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政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恩格斯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

要在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间建立威信,被六亿五千万人口所承认,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是经过几十年斗争考验才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威信的党,这个党又是由多少固定的被称为领袖集团的、最有威信的、最有经验、最有影响的那样的集团来主持,这是几十年形成起来,才有可能把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起来,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才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后战胜资产阶级,动员几亿人口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没有这种威信,特别是没有多少个人的威信,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破坏这种威信,就等于破坏革命和建设,为反动派效劳。

刘少奇煞费苦心,把‘领导威信’混同于‘个人崇拜’,而且曲解恩格斯的话,说谁反对个人崇拜谁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自‘七大’以后,刘少奇在党内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理论权威,他这么一讲,给“个人崇拜”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从此,个人崇拜的祸水,在中共党内,在中国人民中,一发而不可遏,终于酿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始作俑者刘少奇,也被这股祸水淹

没了。

在紧跟毛泽东这一点上,刘少奇与周恩来不同。如果说,毛泽东说一百,周恩来绝不说九十九,也不说一百零一;刘少奇则不然,他总要过一点,说一百零一,甚而至于一百零二。所以文革中他被打倒时多了一条罪名,叫作形‘左’实右。这次讲话是三天前毛泽东交代的,说是:‘大约在十七号,我将讲“班有班长”,不讲多了。我讲过了,你接着讲。’这天,毛泽东果然讲话很简短,他说:‘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须的。’毛没讲什么有分量的新话,只讲领袖的必要,留下‘崇拜领袖’的文章叫刘少奇作。这次刘少奇又来了个‘一百零二’,毛泽东是叫他讲对毛一个人的崇拜,他却大加发挥,说‘还要搞林彪同志、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这是个最犯忌讳的问题。刘少奇要对三个人‘搞个人崇拜’,有窃弄名器之嫌。因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他没讲到以后的接班人立谁。刘少奇如今讲要搞对林、邓的个人崇拜,俨然是把毛泽东尊为太上皇,自己就皇帝位,指定自己身后的接班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名字的进出,名次的上下,这个权只能操在毛泽东一个人手中,这就是具体化的‘名器’,这个权是不容分割的、不能转让的。毛泽东在政治局、在政治局常委中,任何时候都能操纵多数,其秘诀就在于他掌握着这个权。这个权如果丢了,他就失去了控制多数的能力,不能控制决策机构的多数,下一步就会丢掉政权,被赶下台。刘少奇奇出言不慎,

以为是按毛泽东示意的方向，多发挥几句，但在毛泽东心头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不料，刘少奇还有惊人之论，仿佛是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在发挥，但来了个‘一百零三’。他说：

揭穿底，我看是这样的：彭德怀同志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他要反对；对于彭德怀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那就很难说。实际上，我看他是高兴那个东西。这几天揭露的也是这个事实。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的同志搞‘个人崇拜’好。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就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要篡，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庐山人民剧院悄然无声，寂静得可怕。与会者凝神静气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毛泽东一声咳嗽，弹掉手上寸把长的烟灰，打破了全场上的宁静，也掩饰自己心头的微微一震：‘难道我搞掉个彭德怀，是在为一个赫鲁晓夫扫平道路？！人心难测呀！’这是毛泽东的内心独白。他面带微笑，无任何外露。

庐山会议闭幕了。

在中共全党和全国，一场保卫三面红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所谓‘路线斗争’的大幕又拉开了。毛泽东召示全党和全国人民：‘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这段话以进攻的姿态，反映了毛泽东内心的虚弱。他清醒地知道，在庐山打倒了彭

德怀,在高压之下暂时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但这个胜利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彭德怀等人说的那些问题并没有解决,饥荒在蔓延,人民的失望和不满在增长。但他横下心来,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压服一切反抗。

毛泽东在与彭德怀作战的时候,始终用一只眼睛盯着周恩来。他所以在“大跃进”问题上,横下心来顶住不退,就是因为退下这一步来,跟着就要承认周恩来的“反冒进”是正确的,于是党内正确路线代表就转到了周恩来身上。庐山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示编了一本哲学小辞典,书的主体,那些条目实际上是附件,真正的主体部分是毛泽东定的书名和作的序言。书名定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序言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给彭德怀也是戴的经验主义的帽子,说是为了深入批彭,也说得过去。但中共党内中层以上干部,即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人,都知道延安整风时,经验主义这个名词,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庐山打倒了彭德怀以后,毛泽东仍坚持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其潜台词就是告诉全党的骨干分子,与他争夺领导权的主要人物是周恩来。他要不断地念‘经验主义’的紧箍咒,才能控制住周恩来。而周恩来以他在国内外的巨大声望来支持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和政策,又是毛泽东所不可缺少的。”

周恩来反冒进,是以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现综合平衡为立论根据的。毛泽东在庐山上承认了这一条,尽管他把发明权抓在自己手上,但毕竟是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他在给会议出的讨论题目的第九个说:“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

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回到北京,他又后悔了,觉得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会被人从这里打开缺口,否定大跃进。于是,九月六日,毛泽东写信要陈伯达回家统计局的人员开一次座谈会,讨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比例是否失调的问题。据说,七日上午陈伯达召集统计局有关人员进行了讨论。下午又召集经济专家与统计局的五人一起座谈。八日下午,陈伯达给毛泽东回一封信,说:‘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全部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恰当的。第一部类内部,第二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国家统计局座谈会的材料在《内部参考》(发给地委以上党员干部阅读的秘密刊物)上发表了。国家统计局虽然衙门不大,但在评论大跃进是否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上,是最权威的机关。这个材料一发表,像猫盖屎一样,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掩盖起来了。毛泽东知道,这是自欺,也是欺人,但斗争需要,只好如此。

这一切文章都做完后,毛泽东又吹响了新的大跃进的法螺。一九六〇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是‘根据最近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一月七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〇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一九五九年更好。会议规定,一九六〇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会议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

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会后,各省纷纷响应,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为继续大跃进、为提前实现过渡创造条件。一九六〇年三月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说是‘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应该一律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到七月底,全国一百九十个大中城市,建立了一千零六十四个人民公社,参加城市公社人数五千五百多万人,占这些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

毛泽东铤而走险了。他要办的事,一定要办成;他要走的路,一定要走通。然而,经济规律是不接受任何长官意志的,等待他的将是更惨重的失败。

107 血口喷人 草包飞升当司令 功高震主 元帅息影挂甲屯

毛泽东清楚知道彭德怀在中共的份量。只在中央委员和党政机关高级干部中把他搞臭是不够的，他的个人影响主要是在军队，红军时期的三军团军团长，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建国以后抗美援朝时期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当了多年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搞倒彭德怀，主要的要在军队中消除他的影响。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一百四十人，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一时都转不过弯来。人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和黄克诚大将，都是打江山建立共和国的功臣，从庐山下来怎么就变成了反党分子？细读彭德怀的意见书，觉得符合实际，用意也是好的，或许有一两个词儿尖锐一点，但也说不上是反党。大家发言都很谨慎，对彭、黄批不起来，也恨不起来。

八月二十日，侦察军委扩大会议动向的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作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康生跑到颐年堂，建议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

当晚十点,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决定扩大会议规模,大军区班子留一人值班外,全都参加;野战军军长、政委参加,每个师来一名正职干部;各军兵种正副职干部都参加,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备来一名;总参二级部部长、军委办公庭处长全部参加。出席会议人数增加到一千零六十一人,另增五百零八人列席会议。会议由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组成大会主席团领导,下设大会秘书处,罗瑞卿任秘书长(罗是公安部长,已内定出任总参谋长,尚未完成任命手续),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萧华任副秘书长。

八月二十二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

在小组背靠背揭发彭黄反党罪行的阶段,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总参谋部与军委办公庭是一个小组,因这些单位的干部与彭、黄接触最多,会议领导对他们抱的期望很大,秘书处特意派员督战,要求总参的副总长、部长们,军委办公庭的主任、副主任及处长们,从日常工作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提到原则高度上分析批判,与彭黄划清界限。会议开了两天,大家眼观鼻,鼻观心,谁也不发言。为引导大家发言,组长提议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大家反来覆去地研究了意见书,军委办公厅一个干部开了腔。

‘这浮夸确实最重。那次军委办公庭组织机关干部去天津郊区新立村参观水稻丰产田。下了交通车一看,卫星田果然稻子长势喜人,稻穗密集,上面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人问:“这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公社负责人说:“少说十万斤。”“这样密植能通风吗?”又有人问。“我们用鼓风往田里灌风。”“长在中间的日照也不够哇!”军队干部中有许多作田能手,一位行家又提出新问题。“我们用大水银灯补充光照。”

公社负责人指着地角两盏比汽车灯还大的水银灯。“这成本怎样校算？”有人看得认真，想的仔细。这一问，公社负责人语塞，脸也红了。经过进一步了解，全是假的，是把十八亩地的稻子开镰前集中移栽在一亩地里，小孩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太阳灯。

又有总参一位干部响应组长实事求是的号召讲了下面一件往事：总参机关组织大家到河北省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和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参观人员整好队，一阵急促的钟声过后，‘老黄忠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腓的儿童团依次走过来接受总参首长的检阅。不到十分钟的检阅，有几位瘦弱的老人突然晕倒，有的妇女下身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哭起来，这使公社干部大丢面子，立即下令把队伍轰走了。参观队伍行经一间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红薯干的社员被锁在里面，正在大把吞食有人偷偷送给他的棉籽谷。在生产队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屉红薯干，一大锅稀稀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大伙一阵心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天堂’吗？！待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包子被偷光了，大家惊讶不已。突然，又有一衣衫褴褛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汉说：‘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跟前几个人慷慨解囊，把身上的零钱掏出来。几个民兵跑过来，说这个老汉是疯子，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

这就是与会者看到的大跃进、公社化、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

在另一个组，军长唐金龙揭发了‘二十根黄瓜’的事件：分析上纲，说明彭德怀是。伪君子’、‘冯玉祥’。一时成了各组的样板。发言者画蛇添足，说：‘此事有人证，当时的经办人高克恭就在大会上。’原想为自己的发言增加几分权威性。

高克恭在总参管理局工作，在大会的后勤组，他见二十条黄瓜成了打倒彭总的炮弹，十分愤怒，不顾别人劝告，一定要站出来澄清这件历史事实。

那是在一九四七年夏，彭总指挥西北野战军收复三边。（即陕西北部的定边、安边、靖边）地区。七月十三日，野战军司令部进驻靖边县张家畔，彭总决定十五日在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要王政柱副参谋长做好准备工作。高克恭是司令部的管理科长，负责安排会议伙食。他和炊事员杨应国上街采买，先买了一只羊，让来开会的领导干部开开荤。后来小杨看见一筐黄瓜，一问价钱每条要两千块边币。高克恭很费踌躇。两千边币是半斤小米的价钱，他知道彭总的脾气，要买了准得挨批；但又想到指战员几个月吃不上一口新鲜蔬菜，就豁出去了，下决心买了二十条，嘱咐小杨包好，别叫彭总看见。杨应国用围裙包着黄瓜回到司令部，绕道进的后门，偏巧一进门就遇上了彭总。

‘小鬼，你抱的什么呀？’杨应国那年十八岁，参军不久，见首长还有些害怕。彭总一问，他默默站在那里，不知怎么说好。彭总上前一掀围裙：‘噢，黄瓜！哪来的？’

‘买的。’小杨回答。

‘多少钱一根？’

‘两千块。’

‘啊！两千块一根，一根两千块！真舍得呀！摆啥子阔哟。’彭总像是自言自语，没批评小杨，说着就走了。

在第二天的干部会上，彭德怀说：‘你们常说我艰苦朴素，可是，昨天一下子买了二十根黄瓜。一根多少钱呀？两千块。二十根要多少钱呢？四万块。同志们，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老百姓舍得吃黄瓜吗？舍不得。仗打得这样苦，二纵

队过沙漠时渴死了人。我们应该多为战士们着想。可是，我们司令部大手大脚，买黄瓜招待大家，难道我不应该检讨吗！一到吃饭时，每桌上了一盘凉拌黄瓜，他又说：‘我们在陇东、三边走了一大圈，确实够辛苦了。今天到这里来开会，改善一下也是可以的。吃点黄米饭，喝点羊肉汤，也就很不错了嘛，偏要买什么黄瓜。战争年月还不是讲口味、图新鲜的时候。我们革命还没有成功，还需要艰苦奋斗啊！’在场的人们听了都很感动。

这就是所谓‘二十条黄瓜’事件的始末。怎么能分析出个‘伪君子’来呢？

在大会批判时，空军副政委吴法宪，经过一番感情酝酿，把麦克风拿在手里，矮胖胖的身驱象一座迫击炮，用很重的鼻音说话：‘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一语惊四座。林彪坐在主席台上，满意地看着吴法宪。吴法宪接着说：‘彭德怀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的血债！是他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

林彪插话：‘他恨不得一口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军团一军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

‘胡说’台下一声断喝，跳上一个人来，大家定睛一看，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这位耿直的将军，由红小鬼成长起来，长期的党内、军内生活，各级领导、各级组织长期对他的教育就是实事求是，绝不说假话。打仗歼灭多少敌人，就说多少；缴获多少枪炮，就说多少，对上级、对组织要忠诚，对同志不能有害人之心。他对于共产党内部、解放军内部在政治生活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反传统的变化，一时还不能适应。他抢过吴法宪手里的话筒，高声说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

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 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 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敬我们! 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那个连长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发言者面向林彪)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怪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 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

会场乱了起来,人声鼎沸。有表示义愤的‘左’派,他们的意见附合会议的宗旨,受到会议的保护,所以音调激越,格外放肆和大胆;大多数互相耳语,窃窃私议者,是基于对批判彭黄的不理解,对钟伟仗义执言的敬佩和同情,交流彼此的看法。

会议主持者一看走了方向,断然扭转,钟伟发言后不到五分钟,总政保卫部一位领导干部奉命率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咋的一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会场。钟伟,这位耿直的将军,没有丝毫的退缩和翻悔,边走边喊:‘毛主席啊,你可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你要警惕呀……’他像一切追随毛泽东多年的老干部一样,认为这种绝情悖理的事情一定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他受了蒙蔽、受了欺骗。钟伟被捕后,降职降级,转业到安徽省当农业庭副庭长。血口喷人的草包将军吴法宪以这个‘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行动,得到林彪的青睐。空军司令刘亚楼死后,他当了空军司令员,人称‘草包司令’。‘文革’中又当了政治局委员,很是风光了几年,此是后

话。

为了挽回钟伟事件的影响,林彪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讲了一番话:‘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与他们决裂,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上一刀两断,你感情上恨不起来,认识就上不去,觉悟就提不高。’

在黄永胜主持下的一个小组会里,正在追邓华是如何参加‘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读者当还记得,抗美援朝选派部队和将领时,周恩来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第十三兵团入朝参战,但周认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打仗不行,调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代替他。于是邓华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十三兵团司令员,成为彭德怀的主要助手,回国后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如今时移势易,打仗不如邓华的黄永胜,在党内斗争上比邓华‘高明’,黄永胜说:‘高(岗)彭就是个反党联盟,彭黄也是个反党联盟,高彭联盟中你是个成员,彭黄反党集团中你是个重要成员。你的错误性质就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邓华就是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彭还是有功劳的,希望中央能宽大处理。说彭德怀‘伪君子’,他清楚记起一件事。在朝鲜前线,有人知道彭德怀爱吃狗肉,送来一条狗,但又不敢直接送给彭老总,就送到邓华那里,邓叫宰了,炖熟煨烂,吃饭时将一钵子狗肉端上餐桌。那时志司的几位领导人在一个桌子上用饭。彭德怀闻到了狗肉香,问是哪来的?战士们有没有?邓华如实相告。彭没

再说话,低头用饭,但一筷子不动那钵子狗肉,他不动筷,邓华、洪学智,解方等人也不好动。后来,这是把这钵子狗肉进到侦察连去了。在几十年战争中,彭德怀跟战士们同甘苦,是表里如一,首尾一贯的。怎么一个人一犯了错误,优点也变成了缺点呢?说了几句公道话,就算参加了‘军事俱乐部’,没完没了地追逼。男儿有泪不轻弹。打了一辈子硬仗的邓华上将被逼哭了,委曲地说:‘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要说我反对中央和毛主席,说不过去嘛,我自己本心产生不出反对毛主席的念头……’

前志愿军副司令员、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在小组会里陷入重围。

万毅本和彭德怀没有历史关系和个人交往。他从东北军加入八路军后,更多的是在林彪领导下的四野工作。建国后出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参装备部部长。二机部部长是宋任穷。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万毅和宋任穷一起上庐山,找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工作,正赶上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万毅在六组参加了几天讨论。在七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他说:‘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不是搞精神第一性嘛!’对彭总的意见书,他说:‘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主要问题提出来,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话,多加分析就清楚了。’就凭这几句话,万毅就算参加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

查彭德怀的反党罪行,实在揭不出有份量的东西来。揭出来的几件,经当事人一说明成了进行政治陷害的代表性作品。没把彭德怀搞臭,倒把揭发人搞得臭哄哄的。于是有人出主意,

查他的‘里通外国’问题。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出访八国，军队高级将领王树声、张宗逊、萧华、杨得志、陈伯钧、陈熙、张学思、路扬、朱开印随行。罗瑞卿受命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深入揭发。但揭来揭去，一无所获。

在‘军事俱乐部’成员问题上，彭德怀坚持按庐山定的彭黄张周四个人的口径检讨，绝不牵连别人。但追出一个反党集团来是此次会议的任务，若没有，毛泽东岂不是错了？！没有，也要硬追。许多积极分子围着彭德怀大呼小叫，彭被逼急了，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最后只好和庐山会议的战果一样，定了四个人，彭德怀多了四个追随者，他们是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简称邓洪万钟，反党集团问题到此为止。

为了萧清彭德怀在军队几十年的影响，使大家相信中央（即毛泽东）的正确和彭德怀的‘反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讲了话。用三位最有成倍的中央领导人的影响，去冲销彭德怀的影响。这个目的暂时地、部分地达到了。全军将领看这形势，在毛主席和彭总之间要选择一个人跟，两个都拥护是不行了，那就只好跟毛主席、拥护毛主席吧。

力图保护自己副手的朱德总司令，在这个会上受到林彪这个后生晚辈的指责。林彪竟直呼自己的老长官的名字，尖刻地说：‘朱德，你当过一天总司令吗？没有，仗都是毛主席指挥打的……’其实，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深入敌后作战，朱德都是名副其实的总司令、指挥战斗的司令官。在解放战争中局面扩大，对各个战区由战役指挥变成了战略上的指导以后，朱德才退到次要地位，但仍是战略决策者之一。

林彪这样贬低朱德,是有毛泽东这个后台。林彪看准了,他就搞一个人的个人崇拜,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完全信任。

朱德在被逼之下,只好检讨:‘对彭黄张周的反党野心家的本质认识不够,光从好的方面去想,认为他们已经改过了,同时和他们在思想上又有共同点,所以这次我同样表现出嗅觉不灵,没有及时识破他们反党阴谋的本质。’‘有几位同志指出我有个人野心。我本来是不同意这种批评的。但是再想一想,我既然同毛主席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的同志在思想上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上,曾有六七次没有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方面……既然如此,那么,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我愿意接受这个批评。’会后,中共中央将朱德的这个发言,连同他一九五五年三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检讨发言,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党的机关。连朱总司令因与彭德怀划不清界限都作了检讨,谁还敢不划清界限呢?

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份。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

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备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覆。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接信非常高兴，彭德怀自己都认了罪，别人还打什么抱不平呢？立即作了如下指示：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二年历史关系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够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

上是适当的。读几本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中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工作会议(那是批斗张闻天的一个战场)上讲话。为了有点理论色彩,以提高他的追随者的认识,他发明了‘同路人’的理论。他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批评教条主义者‘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如今把这八个字的评语用在他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然而,一对是非在于力。权力的力。九月十二日,彭德怀从心地作了书面检讨。同日,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把彭德怀、黄克诚定性为‘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这次向党进攻完全是有意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他们个人野心发展,利令智昏,不听党的劝告,无视党的纪律性必然结果。’要求在全军‘彻底肃清彭黄在军队中所散布的毒素的恶劣影响。’

会后,在全军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许多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说过一两句不满意的话的干部被斗争,受处分。截止至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九日,全军受到重点批判的党员干部达八百四十七人。

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作为对朱德的处罚，是由头一名元帅降为第四名，并不再是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常委。

九月下旬，彭德怀搬出了住了多年的中南海永福堂，在北京海淀区挂甲屯住下来。这个村名据老人们说是杨六郎征辽时在此歇过战马，晾过铠甲。彭德怀元帅在这里永远挂甲了。彭德怀住的这个院子叫吴家花园。前后两重院子。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住前院，警卫班住后院。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属忠义之士，不嫌元帅落难而另奔前程，情愿跟着他们尊敬的彭总过软禁的生活。

彭德怀的组织关系放在了中央党校。他是个党性强的人，亲自去党校报到。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在宽敞的校长室热情接待彭德怀，出言不落俗套：‘彭总，普列汉诺夫说过：在历史和现实的一堆疑惑面前，不哭，也不笑，而是去理解。’

彭德怀似有憬语：‘好，我现在是你的学生，你要给我一把理解的钥匙啊。’彭德怀坐下来认真读书。他读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还读了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下册),越读越觉得自己冤枉。

第二年秋天,他又看到了杨献珍,激动地握着杨献珍的手说:‘杨校长,我真感激你的指点啊!通过学习,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在庐山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

‘斯大林讲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我在开会前调查了很多地方,事实证明了工农业比例失调,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我犯的这个错误真冤枉啊!那些弄虚作假吹牛皮的人倒成了正确的,毛主席反倒很赞赏,这公平吗?现在我感到后悔的是,我不该作那个违背良心的检讨。’彭德怀说着说着又激动了。

杨献珍叹了一口气说:‘彭总啊,你不要性急,历史会慢慢地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的。’

108 撤退专家 赫氏制华加压力 转移视线 毛公反修逞英豪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代表团成员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苏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共候补中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塔谢涅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尼古拉耶娃，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第一书记契尔沃年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阿希波夫，苏联飞机总设计师图波列夫院士，苏共中央部长安德罗波夫以及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上午十时四十五分，代表团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毛泽东破例到机场欢迎。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庆典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七个国家的代表，除赫鲁晓夫外，其他国家的国家元首、党的首脑都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迎送的。

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以及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刘伯承、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谭政、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

尚昆等众多高级领导人组成的张大阵容，陪同毛泽东去迎接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他这次来访，中国有意慢待他，这不是事实。

赫鲁晓夫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陪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少年儿童向贵宾献了鲜花。赫鲁晓夫在机场发表了讲话。十一点四十分，赫鲁晓夫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陪同前往宾馆。

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用半个版的位置刊登毛泽东（居左）刘少奇（居右）两位主席的标准像。照片同等尺寸。直到一九六五年，每年‘十一’国庆日都是如此安排。

十月二日下午，在毛泽东的书房颐年堂举行中苏两党、两国的高级会谈。

中方参加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东诺夫。

首先由赫鲁晓夫介绍苏美首脑会谈情况。他把苏美会谈的成果概括为大卫营精神。大卫营是美国故总统罗斯福的别墅。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里举行了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和平会谈。赫鲁晓夫要求毛泽东同苏联制定共同路线，步调一致，创造条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他说：美国总统‘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大卫营会谈‘开关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没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一九六〇年要成为‘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一年。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慢条斯理地回了一句话：‘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大卫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

赫鲁晓夫眼睛眯成一条线，也放低嗓音笑嘻嘻地说：‘你们没接触不会知道，美国人还是很想缓和关系的。他们确实很富，我这次可是亲眼看到了，真的，我亲眼看到了美国的工人，很富，很富。’

毛泽东眉头锁起：‘怎么，你只带回这些东西？’赫鲁晓夫见找不到共同语言，有些着急，空气凝结了几十秒。

‘艾森豪威尔总统让我带来口信，希望中国释放被击落的美国间谍飞机飞行员唐奈和费克吐。’赫鲁晓夫说。

‘将来可以放，现在不能放。’毛泽东一口回绝了。

在苏美首脑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几次提到中国！赫鲁晓夫坚持不讨论第三国的问题，这是因为他知道他当不了中国的家。但美国不依，国务卿赫脱说：‘只要苏联自称是共产主义集团的领导者，它就应当对中国的举动负有一定的责任。’想到这里，赫鲁晓夫不得不把美国人提到的中国妨害世界和平的几件事提出来。

一是台湾问题。赫鲁晓夫说：‘你们金门打炮，正当中国军队能够跨过海峡去占领那些岛屿的时候：你们又停止了攻势。结果整个仗等于白打了。以后又搞双日不打，单日打，在国际上制造紧张局势。如果不想把金门拿下来，就声明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你们的做法我真不理解。’

毛泽东说：‘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力量。不是拿不下来，是不想拿下来。我们不希望蒋介石退到离我们太远的地方，我们想让他们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打打停停，这是中国的内战！不让美国插手。美国人要我们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就是不能听美国人的。’

‘这真是奇怪的逻辑。’赫鲁晓夫摇摇头，又接着说：‘你们

不该和印度打仗,为了那块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和尼赫鲁冲突起来,很不值得。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你们应该团结他,不该发生冲突。’

毛泽东说:‘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外交部长陈毅接过话题:‘中印边境的事件,不是冲突,是印度军队的侵略。’

周恩来说:‘印度人先进入我国国境,打了十二个小时,怎么能说我们错了呢?’

赫鲁晓夫说:‘我打过仗,不管谁先开枪,反正印度死了人。’

陈毅说:‘中国的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是英国在一九一四年用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是英国人把它从我们手里夺走的。印度是继承英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你们为什么用塔斯社名义发表声明,站在印度一边?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理屈,气得脸通红,嚷道:‘干什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是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对的意见我们会听,不对的,第一书记的意见也不行。’

周恩来补充说:‘如果苏联与芬兰发生了边界事件,苏方将采取什么对策?’周恩来暗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芬发生冲突,苏军越过芬兰边界造人芬兰的卡雷里亚地区。

‘你们不成该让达赖逃走。逢赖在西藏,印度就放心。西藏问题你们处理不慎重。’毛泽东双臂张开作漫长的手式,说:‘那么长的边界线,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

‘你们就该看住他么!’

‘我们看不住。也不能像你想像的办法把达赖看住。’赫鲁晓夫说：‘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意见，你们一条也不接受。’

毛泽东说：‘你批评我们很多，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金门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说我们是“左”倾机会主义。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压制着盛怒，脸部肌肉一阵抽搐，然后说：‘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赫鲁晓夫很沮丧，看来说服中国配合苏联的外交路线，发展大卫管精神。是缘木而求鱼。你毛泽东欺人太甚了。我给你经济援助，给你派来技术专家，让你强大起来。你羽毛未丰就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批评我右倾机会主义，你的大跃进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以为我不知道么？赫鲁晓夫暗暗下了撤退苏联专家、中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决心。又一转念，先一步一步来，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平静地说：“现在国际形势缓和了。苏美正就禁试核武器进行谈判。苏联有原子弹就等于中国也有。关于这个生产原子弹，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撤回去。”

他是要把派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撤回。在这年六月他去美访问以前，下令停运已经装箱准备运往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如今干脆提出撤回原子弹专家。他要用这个压中国屈服，压毛泽东屈服。

不料毛泽东冷冷地说：‘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稍顿，又补充一句：‘我们说的话都要记住。我们需要是需要，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毛泽东话说得分寸适当，没有乞求，没有惊慌，也没有埋怨，还留有转圜的余地，不失大国

领袖风度。

十月四日，毛泽东率领一大批高级官员为赫鲁晓夫送行，让赫鲁晓夫风光体面地离开中国。回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挺胸一挺，把肩一侧，作顶天立地的姿式，对卫士们说：‘你越压我们越要顶。你们敢不敢顶？’

李银桥等依稀听到了中苏首脑会谈不顺利，知道毛泽东说话的涵义。就齐声叫答：‘敢顶。’在外国人面前，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中国领袖人物最可宝贵的性格。尽管毛泽东有时有些不适当的骄矜。有所谓‘天朝大国’的皇朝遗风，但中国人看了提气，高兴，骄傲。毛泽东巧妙地利用这种民心，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把全党、全军、全民吸引到自己周围，产生一种一致对外的巨大的凝聚力。而国内的困难和矛盾，人们不知不觉地就摆在次要地位了。

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成员国高级首脑会谈。拟通过一个共同宣言支持苏美首脑在大卫管达成的谅解。毛泽东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央委员伍修权和驻苏大使刘晓，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声称：‘苏联在联合国十四届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反映了华约缔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二月六日，康生发言表明中国的立场，他说，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中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内部的矛盾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这使赫鲁晓夫大为恼火。

在华约国首脑会议闭幕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即席讲话，公然

嘲弄毛泽东,说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充满怪念头的人,倒像一只老式的鞋,样子刚好足以摆在角落里供人观赏。’这进一步刺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斗的决心。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是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毛泽东决心抓旗帜,做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他抛出了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第八期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一篇是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长文《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一篇是要陆定一出面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列宁诞辰大会上作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越来越来》的报告。苏共的‘祖师爷’被请到了北京,莫斯科对列宁的纪念倒显得冷清寂寞。赫鲁晓夫被动应战,请出列宁时代的老战士库西宁和列宁遗孀克鲁普茨卡娅出来讲话,为赫鲁晓夫的政策转变作辩护,那声势和影响比起北京来就差得多了。

五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作弥补行将破裂的两党两国关系的最后商谈,毛泽东拒绝了。

六月二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利用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中央覆函建议扩大成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延期召开,以作充分的准备。六月七日,苏共中央覆函同意,提议在布加勒斯特一般地交换一下意见。

中共中央派出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为团长的代表团,成员有康生、伍修权、许建国。在赴罗途中,六月十七日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接待代表团,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开法未作任何通报。中共代表团于十九日到达布加勒斯特,会见了罗共总书记乔治乌·德治、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都没谈会议的安排。彭真专门问赫鲁晓夫：‘会议怎么开法？’赫答：‘我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苏共代表团给中共代表团送来一份《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译本长达八十四页。这个文件显然在莫斯科就准备好了。下午七点，又送来了苏共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彭真一看《通知书》，充满了对中共的批评和指责，说中共在时代问题上重覆列宁的论述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说中共在国际群众组织中采取‘宗派主义立场’，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指这年六月五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的工会活动家、世界工联副主席刘长胜在讲话中谴责现代修正主义，使一些国家的代表由支持苏联转而支持中国）；说中国公开发表康生在华约会议上的声明是‘向帝国主义送情报’；说中共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动’等等。彭真通过中国驻罗大使馆迅速将苏方的文件报给了毛泽东。

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举行五十一党代表会议。

赫鲁晓夫以纯粹意气用事的语言对中共和毛泽东本人进行了放肆的攻击。说中国‘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捡起来’，‘要发动战争’。指责毛泽东‘忽视除自己外任何人的利益，编造脱离现代世界实际的理论’，是又一个斯大林；说毛泽东是‘极左派、极端教条主义者、真正的左倾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还借彭德怀的意见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说：‘彭德怀元帅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挂他的像。’后面的话给彭帮了很大的倒忙，成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佐证。

多数与会的共产党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转，或长或短，或

深或浅地批评了中共,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三国的代表团没有参加对中共的围攻。

彭真以‘更高稚更有力量’的姿态和语言回击了赫鲁晓夫,他说:‘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关系。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在这个会上,彭真还散发了国内送来的《中共代表团声明》。

赫鲁晓夫与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交锋后,决心进一步采取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回到莫斯科,于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他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批准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从中国撤退全部苏联专家的决定,并内定假如年底世界各国党的会议不能解决争论,将要公开宣布两党关系破裂。

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自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一千三百九十名,并终止派遣专家九百名。这些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科研和文教各个领域,涉及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着重要的任务。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同时,苏联政府还中止执行三百四十个专家协定和补充协定,中止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的关键部件。送别这些苏联专家时,陈毅外长为他举

行了宴会,祝他们回国后身体好,工作顺利。

赫鲁晓夫完全不理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撤退专家的结果固然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但同时也分担了毛泽东的错误。一个时期毛泽东把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说成是‘天灾人祸’,‘天灾’是水旱自然灾害,‘人祸’是苏联撤退专家、停止经济合作。(后来刘少奇才把‘人祸’解释成主要是中央领导人在领导经济建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团结全党和全日人民,决心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建设自己的国家。第一个目标,首先是要造出原子弹来。

七月,毛泽东找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等谈话,说要持续跃进,今冬还要组织全民大炼钢铁。彭真从布加勒斯特回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以后,毛泽东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说:‘实力地位,实力政策。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十年搞一亿吨钢,上天。’他给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下达的具体任务是:‘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今冬要动员七千万人来干。一九六二年搞到三千五百万吨,可能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二千二百万吨,如果今年有二千二百万吨,后年可以达到三千八百万吨。第二个十年可能搞到一亿吨。’

一九六〇年七月毛泽东同李富春等人这次谈话,暴露了两个问题:一是庐山会议后,各省以及中央各部不敢给他报告真实情况,他对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一无所知。还没有从大跃进的迷狂中清醒过来;二是他对经济建设的知识太缺乏,不懂得没有综合国力的提高,光钢铁一马当先是上不去的,而没有综合工业

技术的进步,炼出那样多的钢铁来也没有用,笔者曾在四川的某钢铁基地看到巨大的仓库堆满了几吨重一块大钢砣子,完全不能利用。许多合金钢、特种钢的钢材、钢板、钢管,还得从国外进口。炼出的钢铁有许多不合格的,只增加了国家钢铁的吨位产量,拼了设备,压了资金,工业报喜、商业报忧,劳民伤财,毫无意义。

毛泽东说:‘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反映了他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愿望。他希望大家迅速富强起来,要粮有粮,要钢有钢,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出钱出粮出武器,援助世界各地正在造反的共产党和游击队,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拿不出东西来支援各地的革命者,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物质上的后盾,就没有追随者,这叫做‘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跟苏联、跟赫鲁晓夫彻底闹翻以后,他要像列宁成立第三国际那样,成为又一个革命中心,先把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吸引过来;过些年再把欧美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吸引过来,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时代。

那时,在中共党内,悄悄地半公开地制造一种舆论——革命中心转移论。据说十九世纪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德国,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到了俄国,这以十月革命为标志,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指挥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革命中心在从俄国向中国转移,苏联共产党的变修和赫鲁晓夫的反叛(以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的党’所谓‘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为标志),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高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使这种转移得以完成。

从一九六〇年五月起，毛泽东频繁接见亚非拉美的各种代表团，发表谈话，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对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表示支持。五月七日，接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各方面代表和人士；五月八日，接见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五月九日接见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的朋友；五月十四日，接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的朋友。在十四日这次接见中，他借苏联击落美国的U—2间谍飞机不指名的批评了赫鲁晓夫，他说：‘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在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他还以世界革命领袖的姿态说：‘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八日，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典礼，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十一’国庆日在全国各大报上并列发表两位主席照片，大大提高了刘少奇在中国的地位和声望。毛希望收到投桃报李的效果，刘少奇能将对他的‘个人崇拜’推向世界，把他送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舞台，使他成为当代的列宁。但刘少奇这次在八十一党代表会议上对苏共和赫鲁晓夫斗争‘不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妥协了。例如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写上了这样两段谴责‘个人迷信’的字句：

各国共产党队伍的成长和它们在组织上的巩固，一些国家共产党在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加强，这一切都在为胜

利地解决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开辟新的前景。

严格遵守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根据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重视党的领导机关在党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不倦地关心加强这些领导机关同党员以及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不允许有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思想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大力发扬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在自己队伍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两段在别人看来无疑是正确的话，与毛泽东所追求的目标是南辕北辙的。这使他感到失望。

又有以下既反右又反‘左’的文字，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失望。

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要求在今后继续在两条战线上进种坚决斗争——反对仍然是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映资产阶级思想，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压迫的斗争中、在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使工人和劳动群众解除武装，使他们涣散。

如果不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它们使革命政党不能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根据具体条件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使共产党人脱离广大劳动人民阶层，使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消极等待或者采取左倾冒险行动，使他们不能及时地正确地估计变化中的局势和新的经验，使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反动派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不能利用一切可能性以有利于工人阶级和所有民主力量的胜利,从而妨碍各国人民在他们的正义斗争中取得胜利。

这些文字的表达,虽谈到‘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是中共坚持写上去的)。但又用较大的篇幅论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这是苏共坚持写上去的),等于是双方打了个平手。

八十一党代表会议闭幕后,副团长邓小平率剧员彭真、康生、胡乔木、廖承志于十二月三日先期回京。刘少奇和部分团员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的陪同下,又访问了列宁格勒和明斯克。刘少奇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演说,歌颂十月革命,称颂中苏友谊,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苏共为首的地位,感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把中苏友好的气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局外人很难相信苏联已撤退援华专家和中断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使中苏关系出现了一段虚假的‘和缓’时期。毛泽东对这一切是不满意的,但他隐忍未发。十二月九日下午六时四十分刘少奇和代表团成员李井泉、陆定一、杨尚昆、刘宁一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亲自到飞机场欢迎。

还有一个敏感的招致毛泽东疑忌的问题,是刘少奇曾向赫鲁晓夫建议,请赫退出处理中苏关系问题的第一线,如同毛泽东已退出第一线一样,让第二、三人物出来改善两党两国关系。刘少奇离苏前,还邀请勃列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访华,对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毛泽东陡然产生了可能被‘逼宫’,被‘废黜’的危机感。他提防、警惕的主要人物由周恩来变成刘少奇。

正在这时候,林彪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闭幕了,会议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精华的几

句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

在这个决议里，林彪还提出了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三八作风’（即毛泽东给抗大题写校训的三句话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说这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实际上是把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提了出来。

一九六〇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批示，对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作了高度评价，批示说：决议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中央批准这个决议，希望能定期检查，贯彻执行。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

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可以给地委以上的机关阅读。

林彪还在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通过决议和讲话，林彪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推向历史时代的高度，推向了世界革命的舞台，大合了毛泽东的心意，于是毛泽东又反转回来高度评价这个决议对全党全国各项工作均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个‘二人转’一唱，使中共最高层发生了微妙的但关系重大的政治变化。刘少奇尽管在庐山会议、在北京清算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都宣称要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一不小心，把崇拜毛泽东的旗帜丢了。这一丢可非同小可，这是刘少奇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开始。林彪审时度势。巧妙地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抓到了手，为后来取而代之打下了最初的根基。毛泽东利用林彪牵制刘少奇，利用军队的支持牵制党政系统可能因大跃进失败而出现的反毛倾向。从此林彪和军队处处主动，经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刘少奇和党政系统招招被动，经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且愈来愈严厉。刘和党政系统不能不跟林彪和军队大唱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调子，但又永远跟不上、超不过这个调子。在这种权术的运用中，毛泽东使自己发生动摇的领袖地位重新稳定下来。

毛泽东发现，高举反帝反修的旗帜，可以转移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经济困难的注意力，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从积极方面说，树立自己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从消极方面说，保护自己中国领袖的地位不受任何侵犯。他要用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来掩盖自己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失败。于是，从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坚

决反对苏共领导人所谓‘修正主义’的道路。赫鲁晓夫和苏联共产党进行了反击。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实际上是通告全党与中共决裂。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苏联报刊广播发表反对中共和毛泽东的文章、资料一千一百多篇。毛泽东指定彭真、康生组织秀才班子，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起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论战的气魄宏大，影响深远。在七评中宣布：‘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在八评中号召全世界共产党人跟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领导人划清界限，‘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俨然把自己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要树旗帜，组织队伍。问题又回到毛泽东忧虑的那个老问题上来：‘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互争领袖地位的大论战中，只有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定地旗帜鲜明地与中共站在一起，于是霍查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为要维持这盏明灯不灭，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几乎把阿尔巴尼亚整个国家养起来了。据阿利雅说，从一九〇年至一九七五年，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比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〇年苏联对阿的经济援助多十倍。再就是亚非拉美许多背景十分复杂的小组织和个人，他们宣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和‘拥护者’，来中国朝拜。国高规格的接待这些人，让他们住在高级饭店里，用十天半月的时间听中国教官讲授毛的游击战理论，然后毛泽东接见，给钱给物，满载而归。毛泽东宜读

实行国际主义。支持世界革命，‘经援不要利，军授不要钱’。有许多假革命者要钱要物后并没有回国搞什么‘革命’，而是花天酒地挥霍享乐去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苏联《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访华回国后撰文说：‘苏中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种情况造成的’，双方都有过错……但是，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在之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这是苏联人的自我批评。中国人也应当说：毛泽东要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也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中苏论战，胜利者是美国。

109 十年总结 羞答答泽东认错 八字方针 乱纷纷恩回天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了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的补充计划问题。

六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以《十年总结》为题目，羞答答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前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

但是乱于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三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头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限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到两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根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一千六百五十万吨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了反击胜利。

一九六〇年(一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个子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采自

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进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了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两个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张对一平十二调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如此之类。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长时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东西了。但是我们对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通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于中国如此，对于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这篇讲话,据毛泽东自己说是用了两个多小时写成文字的讲稿,问题的提法、分寸都是经过斟酌的。这是大跃进失败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承认自己有错误。这次毛泽东没再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是充满感情地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二五’计划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提出来的,会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认为‘右倾保守’、‘消极平衡’等等。如今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迂回地撤消了原来的批评。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八月以来大炼钢铁问题上的失误所作的回顾和检讨,是避重就轻的。‘杰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语是坚持要在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一番,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他不提‘一〇七〇’万吨,大谈不该提出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而后又一次一次递减,直减到一千三百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如此说来,在大炼钢铁问题上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批评下边,‘管农业的’,‘管工业的’,‘管商业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忘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县、社、队的同志’,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是把自己摆在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贯正确的位置上,强调‘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这种说法下边是很难心服的。

毛泽东非正式的给周恩来‘反冒进’的问题平反,恢复名誉,似乎是让他放手整顿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机敏地接收了毛泽东的信号。在八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八月底,李富春等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同意

计委的意见,并加了‘充实’二字,变成‘整顿、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的范围则由计划部门的工作方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大跃进的终结。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三年大跃进,后果是极端严重的。各种比例失调,可以说整个国家乱了套。

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九、百分之四十三点九、百分之三十九点六,大大越过了‘一五’计划期间平均积累率百分之二十四点二的水平。

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钢铁工业畸形发展。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重工业增长二点三倍,而农业却下降百分之二十二点八。第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

第四是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基建规模盲目扩大,增加了几千万职工生活保障的开支,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最后是商品粮的供应能力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失调,以农立国的中国,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周恩来做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总算弄清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历年粮食的实际产量。

一九五八年。庐山会议上‘核实’为五千亿斤,经再次核实是四千亿。

一九五九年,原估产五千四百亿斤,比庐山会议‘核实’的一九五八年产量增加百分之八,实际上不但没有增加,还大幅度减产,实际产量为三千四百亿斤。由于估产偏高,这年征购粮食

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各地饿死人的事情时有所闻,日趋严重。告急求援的绝密电报来到政治局常委的案头上。

一九六〇年由于农业上的调整政策不落实,粮产量进一步下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又减少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一九四九年的水平。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首先要夸大一番灾情。然后宣布:

一、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淮河以南到珠江流域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六十斤,其中灾区应当更低一些,丰收地区可以稍高一些,但最多不能超过原粮四百斤。淮河以北地区,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高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

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三百斤以下。

二、城市的口粮标准必须相应降低。除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二斤左右(商品粮)。

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农业生产,左的高调再不能唱了。他亲自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加上‘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

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已的原则(毛泽东加上‘至少二十年不变’);恢复农村集市等等。

当时妨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大的问题是‘穷过渡’的政策。‘共产风’是它的表现,共产风的出发点是穷过渡,落脚点还是穷过渡。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亲自规定‘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到一九六〇年一月上海会议他还‘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如今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紧急指示信》中加上‘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是对上海会议八年完成过渡的否定。《紧急指示信》在全国的贯彻,起了稳定人心,恢复农业生产的作用。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中委和候补中委一百七十人到会,还有二十三名高级干部列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的一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羞羞答答地承认前三年没搞实事求是。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羞羞答答地承认大跃进不对,是图虚名得实祸。毛泽东终于清醒了。但只是半清醒,没有完全清醒,例如发表的会议公报说:‘在一九六〇年,全国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伟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他不承认自己在根本指导思想上,在路线上犯了

错误。谁要企图从根本上纠正他的错误，他就要批你的‘右倾’。他打得是‘醉拳’，似醉实醒。以半清醒的姿态纠正错误，以半清醒的姿态掩盖更深层的错误。他要完全清醒，就得引咎辞职。

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直接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们也纷纷下去了。

这时候，农村的集体食堂还被当作‘社会主义阵地’艰难地维持着。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在四川农村搞调查研究的朱德亲笔给毛泽东写信，为民请命，再次建议解散食堂，说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毛泽东还是不听。

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刘少奇在湖南省长沙、宁乡两县农村作了四十多天调查。他在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同农民和干部谈话时说：‘社员的生活比一九五七年差了，生产比以前降低了，旱灾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对此，上边要负主要责任，根子还在中央。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户不行。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问题仍不表态。直到这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的亲戚韶山农民贺凤生，以不解散食堂不走的顽强态度，才把毛泽东说动了。这位农民比国家主席和委员长面子还大。他办了一件大事，少饿死了许多人，因此应该载入史册。

那是，一九六〇年的夏天，贺凤生患了骨髓炎，来到省城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门诊部就诊。

‘有县里开的介绍信吗？’医生问。

‘没得。’贺凤生回答得简洁。

‘当什么干部？’

‘生产队，今年提拔的。’

医生笑了，告诉他：‘这种慢性病，附二医院一般不收，除非是县级领导干部或持有县以上单位开的介绍信。’

贺凤生直运气：‘毛主席的亲戚你们收不收？’

医生吓了一跳，找来了院长和书记来应付这个有特殊背景的患者。贺凤生拿出一扎信件，其中有毛泽东的亲笔信，书记拿着端详，难以断定真伪。其中有一封加盖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公章的信，信文用打字机打的，上写：‘贺晓秋同志：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三百元钱，作为令郎治病费用，此款另交邮局汇去，请查收。’私凭文书官凭印。凭这封信，贺凤生住进了省城大医院。

贺凤生的父亲贺晓秋与毛泽东是表兄弟，青年时代追随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在毛泽东被追捕的时候，贺晓秋曾掩护毛泽东脱险。

一九六一年农历十月初八，贺晓秋连饿带病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对儿子的遗嘱是：‘一定要上北京，把家乡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毛主席，要让毛主席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

贺凤生葬了老父，登上火车，来到京城。

凭毛泽东给他父亲的信件，他闯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很慈祥地说：‘寄给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收到了。一次三百元，一次一百元，感谢主席救

命之恩。’

‘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毛泽东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贺凤生想到了父亲的遗嘱，忧伤地说：‘父亲临终前没留别的话，只让我一定把家乡发生的真实情况告诉你。’

‘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骂娘的话也告诉我。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

‘你怕没人骂娘？下面真有人骂娘呢！主席我想清你到我们那里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你不答应解散食堂我不回去了。’

‘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住居民点，土墙要捣碎了沤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公，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

‘家里的拆了积上肥，做饭的锅砸了炼钢铁，筷子碗碟全部归公，你不知道下边干部的作风有多坏！只允许一个生产队开一个食堂，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顿顿是萝卜菜，没几个油花花，吃得男人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

‘饥荒起盗心。总不能眼睁睁饿死，一些人跑到队里的田里偷萝卜吃，要是被民兵抓住，一根麻绳吊起来就是半夜。’

‘你这个生产队长呢？’毛泽东问。

‘队长也是普通社员，跟大伙一样。只有食堂管理员、大师傅不饿肚子。有饱饭吃我就不来找您了，反正食堂不解散我就住在这里不回去了。’贺凤生越说火气越大。他喝了口茶，抬头

看着毛泽东的脸,问道:

‘你不是说党和人民是血肉相连吗?为什么要老百姓饿肚子?是中央要这么搞的?还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发水?’

毛泽东心思沉重地说:

‘不是腰河里发水。责任在中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全国就化开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备了条件,有些只是为了跟形势,还有些没有具备条件的是一阵风刮起来的。下面这些情况,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贺凤生接着说:‘华容县动员那么多人去围垦钱粮湖,几十万亩芦洲说要改成良田,想一口吃个胖子。四周要担土方垒起几十米宽的大堤,横直要开十几米宽的排洪沟,说是为华容人民创造财富挖金山,不论晴天下雨,白天黑夜,刮风下雪都要干。口号更不得人心,说是“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无雨,落雪当晴天,冰冻当好天!”俗话说,吃不得半斗米莫来担河泥。可这里偏偏是担堤的没得饱饭吃,一餐不到半斤米,还要先完成任务。一个劳动力,一天的任务是十几方土,饿着肚子也要干。晚上睡在芦苇搭的工棚里。又脏又潮,下雨漏雨,下雪漏雪,刮风进风。干部作风坏,冰天雪地叫大伙打赤膊干活,说只有这样才算鼓足了干劲,你说缺德不缺德?’

‘前几年放卫星,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是英雄,还可以升官。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了几千斤,为了蒙骗上边的检查,把好几块田里的稻谷移栽到一块田里,说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掉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升官受表扬的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干部作风坏极了。老百姓吃不饱,水肿病,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由于愤激,贺凤生哭了。日理万机的毛

泽东，党国大事全放下。静静地听这个家乡来的农民没遮没拦地讲了三个小时。然后，安排贺凤生住下，派一个卫士，带着他逛北京城。过了几天，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贺凤生。贺凤生说：‘主席，我过了年就回去。’

‘你不是说食堂不散不回家吗？’毛泽东告诉他：‘你上次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和刘毛主席、周总理交换了意见，认为食堂要解散，生产要恢复，浮夸风要制止。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真实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呀！中央领导干部下去，下面是“三十吃年饭，尽捡好的搬”，很难得到真实情况。’

‘食堂真的要散吗？’贺凤生最关心的是这件事。

‘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还是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饱饭。’贺凤生临别前，给毛泽东鞠了个大躬，说‘临来家里人也不放心，怕我惹祸，怕你治我的罪。我说，毛主席寄钱给我治病，说明跟我爹的情分不薄，我说的不对他也不会治我的罪。’毛泽东拉着这个青年农民的手说：‘贺凤生，那我给你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由于毛泽东的授权，周恩来总理在中共总书记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支持和其他各位副总理的辅佐下，对农业、工业、商业、文教、知识分子政策等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工作，澄清混乱思想，制定条例规章，艰难地使国家由癫狂的大跃进状态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前周恩来和邓小平派出十一个工作组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得到会议的批准。指示说：‘现

在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所有工业部门,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九月五日,总书记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的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工业集中力量加强煤炭,农业主要是粮棉。要宣传提倡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会议决定:基本建设投资由一百六十七亿元降为八十七亿元,钢由一千九百万吨降为八百五十万吨,粮由四千一百亿斤降为二千七百亿斤。当年年底计划执行结果,与这些降下来的指标大体相符,粮食产量二二千九百五十亿斤,比一九六〇年略有回升。

一九六一年三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穷过渡’的空想,由公社所有制退回到生产大队所有制,即口是说在所有制问题上,由人民公社巡回到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水平。在中共的文件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的含意是不同的。在这以前是指生产。

九月二下七日,毛泽东在河北邯郸找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和管农业的候补书记,山东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周兴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以及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书记,征询对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意见。大家认为之‘农业六十条’规定的大队是经营核算单位,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仍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张实行大包干制,即生产队承包农业生产任务,除了土缴给国家、大队的部分外,剩下的全归生产队支配,绝大部分分

配给社员,实行这种办法的,人心稳定,生产都比较好。毛泽东口问手写,亲自作如下调查记录:‘三包一奖制度是繁琐哲学,你看,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会后,他给常委们写了一封信,说道:‘我们对农业方面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即生产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从此,在所有制问题上又退了,退回到一九五五年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水平。所谓‘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度名存实亡了。毛泽东要面子,公社是他提出来的,名存实亡可以,但不能说搞快了。更不能说搞糟了,公社的牌子要继续挂着。所有制放在哪一级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农民自己能够解决好的问题,被毛泽东弄得十分复杂,十分玄虚,好像全党都不明白;如果一九五五年听邓子恢的话,不批‘小脚女人’,根本不会误入人民公社这个迷宫。也用不着费那么多的脑筋,既要说明进入迷宫是正确的,又要从迷宫里走出来。

工业生产战线几年来打破条条框框,不要平衡,造成管理工作混乱,经济核算制废弛,设备损坏,产品质量和数量降低。副总理邓小平提出工矿企业要治乱。在他和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的主持下,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发给各地区、各部试行。条例规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人员和机构,定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

来源,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在指令性计划的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

在副总理陈云、薄一波等主持下,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试行。

‘商业四十条’规定:‘现阶段我国的商品流通应该有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营,是商业的领导力量。供销合作社商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农村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农村集市贸易是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领导和管理下的自由市场。’

‘手工业三十五条’规定:‘我国的手工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在这三种所有制当中,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它对于大多数手工业来说,最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手工业工人的觉悟程度。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过多地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于生产反而不利。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

这些思想在周恩来和陈云在‘八大’的发育中都可以找到。这几个文件的制定,是八大路线的部分恢复,其重要意义在于:重新明确允许农村集市贸易和个体手工业存在的必要性,纠正了大跃进以来取缔农村集市贸易和把城市个体工商业者都改造

光的错误；也制止了急于把集体性质的手工业和商业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

在副总理聂荣臻的主持下，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试行。‘科研十四条’纠正了科研工作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和妨碍知识分子积极性发挥的极‘左’政策。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不能‘把个人钻研、承认个人作用、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批评‘保密的项目越来越多，用人的圈子越来越小。针对运动多、空谈多、劳动多的情况，规定今后二八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

在副总理邓小平、陆定一等主持下，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六十条’），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试行。以后又制定了‘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使学校减少繁重的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的干扰，让教育走上按部就班的正轨。宣布高校的领导体制，是在校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文化部和文联党组提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间见（草案）》（即‘文艺八条’），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试行。‘文艺八条’指出：‘近年来，文学艺术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缺点错误。某些文化艺术部门领导、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害了

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忽视同党外作家艺术家的团结合作，在党内外的思想斗争中，以及在学术批判运动中，发生过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广州召开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话，毅然从实质上恢复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他代表中共中央对中国知识分子二的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副总理讲话说，经过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许多知识分子感动得热泪盈眶，决心与中共同舟共济，报效国家。周恩来在广州会议所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一九五一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要承，是中共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周恩来讲话后，希望毛泽东给以肯定和支持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那时毛泽东正在支持林彪在全军全国范嘲内制造新的个人崇拜，推行愚民政策，他始终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异己的力量和潜在的敌人。毛泽东同意‘八字方针’，同意或默许各种调整各方面关系的政策，是迫不得已的让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整个国家要是翻了车，他到哪里去当伟大领袖？但当人民有了饭吃，整个国家局势稳定下来，他就要组织极‘左’势力反攻倒算。

110 千夫所指 三面红旗皆褪色 迷途知返 八大路线指航程

大跃进造成的生声萎缩,民生凋敝的局面,由于庐山会议不能正视,硬说形势大好,反右倾,鼓干劲,一九六〇年又组织新的跃进,使国家经济进一步恶化了。一九六一年岁末,亿万中国百姓,饥民流离道途,饿殍死于沟壑。以贺凤生为代表的善良的农民们企盼着曾经是他们的大救星的毛主席,改弦更张,调整政策。毛泽东还在迟疑,弯子转得陡,实在下不了台。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急了,他大声疾呼:‘照这个趋势,不采取坚决的措施,拖下去要灭亡。’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中央局(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决定在原协作区基础上成立六个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会议,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了,另外还有厂矿企业的一些领导人、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到会共七千多人,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毛泽东出现在大会主席台的时候,他的这些忠实的追随者、他统治这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所依靠的县级以上的各级骨干,仍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还是那样一副刚复自用、凛然不可冒犯的气概。但近距离观察他,眉宇间含有淡淡的一缕忧愁,那种真理化身的绝对自信没有了。领袖的光芒暗淡了许多。那些鼓吹相信和紧

跟毛泽东就不会犯错误的人，如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等也有些尴尬，他们紧跟毛泽东犯了错误了。

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刘少奇。先印发了他的书面报告（当然要经毛泽东认可）交大家讨论。书面报告罗列了十二条成绩，四条错误，十六条经验教训。报告的基调调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进。’羞羞答答地承认‘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继续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为方针路线问题上的严重错误文过饰非，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批评下边说假话，不实事求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这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反感，甚至于愤怒。后来就开成了‘出气会’。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于一稀，大家满意。反映了会议的气氛。一月三十日上午，各省召开全体会议，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向上级提意见重点是批评省委的缺点错误。县委书记和县长们是这次会议上的基层干部，大跃进以来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是说了假话，是强迫命令，拆房，扒坟，砸社员的锅，共生产队的产，强迫老百姓吃食堂，强迫农民搞深翻，放农业‘卫星’，放钢铁‘卫星’，浮肿病，饿死人，他们都有责任，但难道不是上级硬逼着叫这么干的吗？如今怎么上级那么马列，把屎盆子全扣在下级干部身上呢？地委一级的干部也不服，给省委提意见；省委领导人心中当然有数，他们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的指示，贯彻一次又一次中央会议的精神，他们给中央和主席提意见就谨慎得多了，许多事情只好自己担走来；但也转弯抹角给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各部门、给中央提了些意见。许多事情是应当毛泽东负责的，但没有敢点名，只提到他划框框定调子的一些著名论点。

大多数与会者强烈要求要搞清楚这么大的困难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大跃进’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日减少了？通常解释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是天灾，二是苏联逼债，三是工作中有缺点，三者哪一个是主要的？

一直对干部和群众解释‘大跃进’以来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国家到了这一步，全国人民饿肚子，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公式怎么能服人？一个指头的错误造成全国人民饿肚皮，那九个指头的成绩表现在哪？

有的尖锐地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倒犯了严重错误呢？‘三面红旗’到底正确不正确？这比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还要尖锐。

对这些尖锐的问题，装聋作哑不回答是不行的，再搞一次反右倾办一批人，就要冒政权崩溃的风险。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被推举出来代表中央常委又讲了一次。这次讲话在实事求是问题上大进了一步。

对于形势的估计，他讲了实话：‘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

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把苏联通债那一条取消了，剩下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我们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生产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乍着胆子突破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也突破了毛泽东在庐山规定的三七开的极限。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听了这一番话，心中不悦：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是我说的，即使要纠正，过两天我讲话自己纠正，你刘少奇抢这个头彩什么意思？把我的威信打下去？把你的威信树起来。而且说有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就要动摇总路线。他心中暗暗记下一笔账：‘黑暗风’。后来在十中全会才出来算账。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问题。’毛泽东听到这里抬起头来看着刘少奇。只听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耐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你刘少奇要从根本路线上否定我，好，走着瞧吧。毛泽东心里又记下一笔账：‘一九六二年的右倾。’

刘少奇这次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记恨，却得到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家感到中央讲了实话，不再戴着假面具教训下边了。

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毛泽东觉得有必要讲一次话。他不能脱离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这七千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县以上各级政权的四梁八柱，他要使大家觉得：毛主席的心是和我们相通的。毛泽东在会议的压力下，以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姿态讲了如下一番话：

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列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尽管毛泽东的检讨仍然羞羞答答,笼笼统统,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们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纷纷争着检讨,争着承担责任。‘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这是许多人当时的心情。

二月六日下午,总书记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从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角度,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二月七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对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也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有的还把自己的检查印发各大组。各中央局、各省的负责人,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检查自己的错误,听取地、县干部的批评意见。

与会人员都敞开了思想,指名道姓地提批评意见,把压在心里三、四年的怨气都讲出来了。许多人说:‘这次会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是反右以来所没有过的。’

县委书记们说:‘中央把责任承担得太多了,工作没做好,在下边工作的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原来有埋怨情绪的干部感到:

‘这样讲责任‘公平’，听了心情舒畅。’

邓、周两位一讲，基本上把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失误的责任包揽了。但根本的路线错误他们包不了，也不敢包，因为毛泽东还在坚持他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正确的。他在讲话中针对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犹豫动摇’，转门讲了一段，他是这样说的：

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套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选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

简言之，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还是正确的，是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没及时制定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来，因而下面干部没有统一的认识和行动。这样就不可彻底纠正左的错误。

毛泽东不提‘八大’，总是从‘八大’二次会议谈起，是因为‘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推翻了‘八大’的路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推翻了刘周陈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路线。如今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把国家带入了绝境，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想恢复‘八大’路线，但毛泽东坚守‘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不退，刘、周、陈、邓只好通过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条例等办法，暗中恢复‘八大’的路线，挽救国家的危机。因为非如此不能渡过困难，毛泽东电足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恕一些调整政策的出台。中共党史界说七千人大会‘真正贯彻

了“三不主义”(按:即所谓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保证了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进行。’只是就会议上的几十天而论,其实,哪有什么‘三不主义’,清算只是延期而已。君不见,文革中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数刘少奇的罪行,其中有一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算这次会议的账。

毛泽东要把中共全党各级领导班子都打倒的荒谬念头大概也是滥觞于七千人大会。他听了许多人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看了各组的简报,看到了党内正在汹涌着的一股批评、否定,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潮,这股思潮一旦成了气候,将彻底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或云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将彻底清算他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将作为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被狼狈地赶下台。他认为,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大多数已不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和追随者,而是将来可能‘逼宫’的异己力量。打倒彭德怀是为了惩一儆百。这么多的反对派,该怎么对付?怎样战而胜之?这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日夜萦怀的中心问题。

刘、周、陈、邓想的是如何恢复生产,渡过困难,让人民吃上饱饭,使国家摆脱危机,毛泽东想的是,等眼下困难渡过去,不能等你们清算‘三面红旗’的错误,我要先发制人,发明新的理论,组织新的力量,批你们的右倾,使你们措手不及地陷入被动地位。

新的斗争在表面一致的掩盖下已经开始了。当然,刘、周、陈、邓只见他们的领袖离开了第一线,让他们放手干,孤独的领袖息影在江南的别墅里,作深沉的思考,或许是在考虑世界革命和反修防修的大计吧,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第一

批被打倒的修正主义头子。当然,这几个人毛泽东是要区别对付的,先打倒谁?后打倒谁?把最重的打击落在哪个人身上,全盘的理论、策略和部署都在酝酿之中。

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讲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上再放异彩。林彪在一月二十九日大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争得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一不鼓干劲,不争上游,少慢差费。人民翻了身,党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正应该迈开大步向前进,这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当然在执行中,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离开,它是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拣一个,丢一个,那就错了。说明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该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说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因为那种指标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的,用它衡量大跃进,首先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根据现实

情况来比,根据历史情况来比,根据各国情况来比,这是大跃进。即使去年今年和明年的数字低,仍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人民公社在实践中更加证明它是正确的,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往下听,这个林彪,还有精彩的: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同志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同志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左’拉,执行主席思想走了样,精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右的问题,党内外都是有的。

如彭德怀就算一个,庐山会议暴露得很清楚。凡是‘左’的右的,都楚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

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比之我们某些同志的只是一股蛮劲不同，也与某些同志没有劲、不振作、没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中，最主要的是唯物主义，这就是尊重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综合起来办事，而不是按照主观意志办事。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才能更好起来。

这一段话如醍醐灌顶，把个毛泽东说得五体通泰，六神皆安。他底气更足了。只要有林彪支持，就不怕你们——刘、周、朱、陈、邓联合起来反对我；刘少奇你胆大包天，把你培养成为第二号人物，你竟然企图从路线上清算我，要否定三面红旗，好吧，走着瞧吧。现在是困难时期，一些棘手的难题先要你们去解决，账将来再算。一九六六年江青道出了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这口气。’由此可知，毛泽东在会上的自我批评，他的请求大家批评的高姿态，全是假的。

刘、周、陈、邓——这些能臣，忠心耿耿，殚心竭虑，支撑着这个国家，支撑着这个政权，支撑着毛泽东的‘江山’，免于在‘三面红旗’的破坏中陷于崩溃，他们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表彰和勋勉。林彪——这个奸雄，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大、最离奇的谎言：一个是饿死百姓两千万（饿死人的电报常委们是都看到了的），他还硬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严重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这两大谎言受到毛泽东的表

彰。会后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际们作得出来吗？’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到武昌东湖别墅休养去了，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地址在中南海西楼，因而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西楼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陈云和林彪的风格迥然不同，没有假话、空话、大话，对形势的分析切中时弊，提出的办法切实可行。他讲话后，国务院司局长以上的干部自发地报以掌声，说是多少年没有听到这样实事求是的精彩报告了。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二月二十四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建议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力荐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统一领导恢复时期的财正经济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七千人大会由于以毛泽东为后台、以林彪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干扰，没有解决纠正的问题，调整的政策贯彻不下去。据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记载：‘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又错过了近半年的时间、’单等毛泽东一反右再来个大干快上。

针对这种情况，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云请病假）。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共一百零五人。针对全党普遍存在的恐右病，邓小平说：‘现在是有个右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信心，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拖下去，无

非是拖垮。拖垮是什么东西呢？拖垮是‘左’是右？拖垮是右。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丧失信心，就是见困难不采取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见到了，不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毫无办法，恐怕真正的右是这个。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报告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减人、平反和恢复农业生产问题。

所谓减人，是下决心减少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

会上印发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把裁减一千万职工和缩减两千万城镇人口的方案，作了详尽周密的说明，细致地规定了各系统减人指标、对象、具体办法、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处理职工待遇等问题。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是三年大跃进‘大办’各项事业的直接结果。工业上到处铺摊子，到处‘大办’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七千亿斤粮食、七千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实际上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三，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供养不起这么多职工。以棉纺工业为例，一九六二年棉纱的计划产量只有二百六十多万件，加上下一年增产的需要，保留五百万纱锭，一百个以下的纺织厂就够了。可是当时棉纺工业有一千万个纱锭，二百三十六家纺织厂。许多机器没有原料（棉花），工人没有粮食，停产下马裁减工人势在必行。陈云在西楼会议时说：‘去年压缩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

吃四十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村征购四十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大办教育还多招了一些学生，办起了许多根本不够规格的所谓‘大学’。刘少奇特别叮嘱：‘减少学校的学生，我看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要准备出乱子。……我想，是不是准备一种戒严性的维持秩序的办法。大乱子已经出了，秩序已经乱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我们要有所准备，讲清楚，先要开会研究一番。在这些大城市、中小城市也不要乱来，开枪打死人不行的。’

刘少奇还说：‘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除开这样搞，还有什么积极措施呀？你说还要搞多少万吨铜，多少万吨煤，那才叫积极，这叫消极呀？恐怕提出那样的指标是最消极的。在当前情况下，减速样多人，关这样多厂，应该说，这种措施是积极的，而且是最积极的。（周恩来插话：‘是加强农业战线，’）是拉长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

所谓‘平反’是给在三年大跃进中被拔白旗’、‘反右倾’，受批判受处分的上千万干部平反。不给这些人平反，那些颇带‘右倾’嫌疑的各项政策上的调整就很难推行。人们心里有顾

虑。想当年每个县办多少个工厂是有指标的,要求少办几个厂受了批判,犯了右倾错误;如今要关厂下马,比当年的罪过严重的多,中央政策一变,再来一个反右倾还不得进监狱?干部有这样的痛苦经历,你批他观望等待也不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锚案翻过来。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主持下,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的问题,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影响群众,实际上是影响很大量的的群众。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比如河南四十万,实际上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有几千万。……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刘少奇插话:‘不要一个一个去甄别。’)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听到,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这件工作,请各个中央局告诉各省,凡是做了的,继续做;没有搞的,用迅速的比较简便的办法。凡是这样做的,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不只是当面,不只是对干部,一定要对群众。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使六亿五千万人民摆脱饥荒,是国家的大政。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发言：‘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问题尚未完全落实，耕畜、自留地等均有不少遗留问题；房权、林权等也没有定下来，均应尽快解决。看了几个县，不管气候怎么样，凡是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这说明，在一定范围之内，小自由有它的优越性。个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来造成阶级分化，危险在那个时候，在将来，危险不在当前。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是会满意的。我认为，平均土地在二亩以下的，可以百分之十，二至四亩的百分之七，四亩或者六亩以上的不超过百分之五。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冬闲田等，总数不要超过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小自由就变卖本主义呀？……广西龙胜县的小区有十万人人口，土地不多，这个地区，现在单干百分之六十。原因有多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我告诉他们，这样的地区不要集体，就让他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粮食），有什么不好？’

朱德说：‘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现在下去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分自留地，人没有地不行。我们北京为什么要搞机关生产呢？就是因为吃靠不住。赚钱是小事，吃要紧得很。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农业和副业结合起来，社员的收入就增多了，生产队也就富裕了。国家把生产资料统统拿到手里，不分给他，你有什么法子不让他偷？他不偷得不到东西。你分给他，他就不偷了。’

包产到户，兹事体大，刘少奇不敢决断，说：‘邓子恢同志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再讨论。’其时，上上下下都明白，包产到户

能救荒,能治穷,但是,这违背毛泽东思想。饿死百姓事小,违背‘思想’事大。各级干部,大多数信守这一条官箴,看住社员,不许单干。但在活活饿死的威胁下,仍有庭而走险的人。一九六〇年安徽省宿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带着生病的儿子进了深山,做了桃花源中的化外之民。父子俩开荒十六亩,秋收后留下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一千五百斤,给公社交了一千八百斤粮食和六十元钱,以赎单干之罪。被合作化道路教育的麻木了的农民闻之红了眼,想起祖辈人都是这么种田的,如今怎么大活人被尿给憋死?于是兴起了单干风。生产队为应付上级,叫‘包产到户’。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跃进中跟得紧,使老百姓遭了难、觉得对不起父老乡亲,就冒着丢官的危险同意了下边的做法。为了应付中央,他又在名词上动脑筋,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起,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分田单干即‘包产到户’即‘包工包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四。尽管生产有了发展,百姓有了饭吃,曾希圣还是被毛泽东撤了职,派李葆华接任安徽第一书记。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李葆华主持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说‘责任田’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倾向’必须坚决彻底地改回去。

这当口,太湖县委一个当过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的下级干部,此人名叫钱让能,‘位卑未敢忘忧国’,直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保荐责任田,发了一通大议论。他说:‘太湖是安庆专区盼一个三类县,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这段期间,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一九六〇年冬贯彻了中央一系列的政策,‘五风’停止了,但人民群众奄奄一息。

一九六一年三月，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真所谓它一出现，就以它的显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们（包括邻县邻省边界地区）广泛注意，迄今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众总认为是“好了”，“对了”。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一次调整，没有哪一次不都说是适应。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不过与省蚕常委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决议是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倒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怕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众的道理呢？’

毛泽东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看了钱让能的信，未予置评，只批了一句‘请大家研究。’安徽责任田是对是错的官司打到中央书记处，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七月初，陈云经过深思熟虑，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使国家渡过非常时期。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

前面谈到过，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退让的极限是保留人民公社的牌子，退到初级社的水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

位)。这样,他的合作化主张是正确的,公社化主张也是正确的。倘若退到包产到户,尽管能富国富民,但他要检讨两个错误,一是合作化是错误的,二是公社化是错上加错。这关系到领袖的一贯正确的问题,他无论如何要死守既定的防线。由于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包产到户’这一正确的农业政策推迟了二十年才得以实行。

一九九二年二月五日(农历大年初二),邓小平与陈云在上海见面。邓小平说:‘你我过去都有几顶帽子,我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后来升级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你也是党内的走资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当时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路线对中国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不是少数,但是却容忍了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通过,所以我们都是有很大责任的。’

渡过三年困难时期,靠的是刘、周、陈、邓‘八大’时总结的一整套科学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基本否定了毛泽东的所谓‘线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一整套的乌托邦空想。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和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战略,他不再为‘三面红旗’辩护,讲什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那样老打被动仗,他退出了不熟悉的经济领域,转入轻车熟路的政治领域,他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逐渐用这条所谓

‘基本路线’代替了那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所谓总路线。毛泽东抓经济失败了，要在政治上赢回来。从此以后直到死，他再没有抓过经济建设。果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一路反攻倒算下来，他的‘左’倾路线又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在六亿神州酝酿着。

111 中枢分裂 泽东另立司令部 后党崛起 江青秘下上海滩

三年大跃进的失败成了毛泽东的一块心病。饿死两千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人民币)。这无论如何是盛德之累。无论过去如何英明伟大，做出过多么大的贡献，也不能弥补掩盖这个大失误。在领导中共和人民走出困境摆脱危帆的日子里，站在历史舞台中心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毛泽东或在武昌的东湖，或在杭州的刘庄，或在其他什么地方别的别墅里，遍游名山大川，自称‘做了徐霞客’，他的政治活动明显地减少了。只有林彪在军队发动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方兴未艾。一九六〇年秋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全党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来歌颂他过去的伟大英明，来填补这几年的不那么伟大，不那么英明。这给毛泽东带来一些安慰，也给他带来只有他才能体会到的危机感。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些场景，那是全党的一个缩影，对他的信赖，对他的拥戴，明显地动摇了，只要刘少奇振臂一呼：三面红旗是路线错误，全党全民会闻风而动，跟着声讨。他不能消极地等待声讨，他要积极主动地发起进攻。他要运用自己历史形成的巨大威望和超人魅力，把亿万群众发动起来，挥如椽大笔，扬东海之波以为墨，展神州大地以为纸，改写那三年失败的历史。如果是别人，毛泽东会说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历史怎么能改写呢？轮到

毛泽东自己,他却充满了自信,一整套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和部署在他胸中已经形成了。这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想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这历史的一幕在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然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盖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有人说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但他把打击对象搞错了;有人说毛泽东仍在执着追求一个公平理想的社会,他的方法有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搅乱了,等等。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贻笑天下。明朝方孝孺《深虑论》有云:‘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信哉斯言!所谓天,今天作唯物的解释。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例如:‘包产到户’这件事情,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动用了舆论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要把它压下去,与此同时尽一切可能要把公社制度维持下来,但公社还是灭亡了,包产到户还是争得了自己合法存在的权利。人民拥护的事情就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真实内容。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反对改革的势力打起毛泽东的旗帜,特别是打起‘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并以‘走资派’的罪名声讨改革派的时候,特别需要实事求是地搞清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

继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大幅度调整退够,年底经济形势开

始好转，一九六三年又取得了全面好转的成就。这表现在：粮食产量达到三千四百亿斤，比上年增加二百亿斤；棉花产量达到二千四百万担，比上年增加九百万担；钢产量七百六十二万吨，比上年增加九十五万吨。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两年半中，精减职工和吃商品粮人口二千八百万人，没出什么乱子。粮食增产和城市减人，大大缓解了全国性的饥荒。城市供应也有了改善，居民‘有队就排，见货就买’的紧张心理基本清除，储蓄存款额开始上升。一九六三年八月，国家给百分之四十国营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调整了工资。职工的年均工资由一九六二年的四百四十元上升到五百零七元。农民的平均年收入由上年的九十九点一元提高到一百零一点三元。

全国人民吃上饱饭了，毛泽东又出来折腾了。一九六四年二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访华，会见毛泽东时。毛几乎是全盘否定了困难时期的各项调整政策，他归纳为‘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说‘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按：一九六二年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长王稼祥针对国家的严重困难局面，向中央上书，主张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不要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引到中国来；对苏联的斗争，要力图避免孤立自己；中印关系要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的敌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这些主张被毛泽东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主义要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日共领导人袴田

里见时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去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一九六二年很猖狂。’

作为中央常委的陈云，看到毛泽东这些讲话记录稿，心里一阵一阵发凉。知道困难渡过了。毛泽东要清算领导渡过困难的几个人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了，而自己首当其冲，乃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动检讨，承认右倾，从此不再管事。陈云其人也，‘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中庸》）他见毛泽东如此，知道无法共事了，但求免祸而已。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不能够退，一个国家主席，一个总理，一个总书记，顶在第一线，他们退不下来。遇不下来，就要跟，而且要尽量紧跟。这三个人情况又各有不同。周恩来在中共领袖集团中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但他的地位不是毛泽东提携造成的。遵义会议前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因此之故，周从来没有进入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行列。延安安排座次以后，他就一直是以党内第三号人物的身份发挥作用，中间隔着刘少奇（文革开始后是林彪）。这个二号阶梯，成为毛泽东的安全系数，也成为周恩来的保险系数。周恩来绝不觊觎二号，因此也就威胁不到一号。刘、邓在历史上属于毛派，曾与毛泽东共损共荣。刘少奇在‘七大’就被定为主席的接班人。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说

不仅要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还要搞林彪和邓小平的个人崇拜,向全党公开了毛泽东、刘少奇以后的接班部署。后来林彪竟代替了刘少奇,这是刘始料不及的。邓小平处在预备接班人的地位,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没有直接的威胁,却有间接的加强。所以在文革初期,刘邓被打倒后,毛对刘和邓是区别对待的,对刘的打击逐渐升级,逐渐加码,直至置于死地;对邓却交代周恩来保护越来了,不许公开点名批判(林彪集团几次跃跃欲试要公开批邓都被毛制止了),更不许人身伤害。毛泽东是把邓小平作为对付林彪的秘密武器保存起来的。一旦林彪反叛,邓小平立即派上了用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是在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逐渐决裂的。刘少奇要‘跟’,但‘跟’不上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上批示,全国有三分之一地区是不好的形势,‘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他把主要是自己政策上的失误造成的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归启于基层干部,说是‘坏人当权,打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为此,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十条,对农村困难形势作了转嫁于基层干部的极左估计(部分农村干部确有作风不好,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错误,但不是造成全国困难的主因)。引用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的报告说:‘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要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教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强调要‘组织革

命的阶级队伍’，‘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在文件中加了一段话，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全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危险的情景啊！’

刘少奇没有参加五月杭州会议，他于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六日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陪同下，以共和国主席的身份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回国后看到了‘前十条’等文件。刘少奇认为有些政策界限还不够明确具体，为了紧跟主席，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彭真的协助下，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被称为‘后十条’。‘后十条’高度评价‘前十条’‘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但重点放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问题上，提出了‘四个区别’，即：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在‘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干部’问题上，提出要作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上中农成份的干部和地富

家庭出身的子女,表现好的还可以分配适当工作。刘少奇、彭真怕又把农村搞乱,想在政策上作些规定。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刘少奇还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社教工作队队长。

一九六四的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与会者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然后又自问自答:‘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紧跟,配合毛的意思补充说:‘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以造反。’但刘万万没有想到,毛所谓的中国赫鲁晓夫竟是指的刘少奇本人。

在这次会议上,毛还说:‘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为了证实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七月五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会议上作《(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说桃园大队原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并总结了一整套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对敌斗争经验。刘少奇写信将这个经验总结报送毛泽东。信中提到‘陈伯达极力主张印发各地党委和工作队员。’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把桃园经验发全党,推荐说:‘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

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只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探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在十一

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惜乎刘少奇竟没有听出弦外之音来，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和 research 社教运动中的问题。照例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汇报情况，曾好意地对毛泽东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不满意，但隐忍未发。十二月二十日会上，毛刘意见分歧，这成为毛刘决裂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四清’运动的重点指向哪里的问题。

毛泽东主张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看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他说：‘有三种人：计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

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坚持：‘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就凭毛泽东这一句话定性，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张霖之没触犯过毛泽东，就是在一九六二年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言无隐地反映了井下的煤炭工人生活的困苦状况，提议给矿工增加粮食定量和肉、油、烟、酒的补助。为民请命者就是走资派，彭德怀是，张霖之也是。与会的常委们面面相视。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桌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派。’

会场的气氛冻结了，难耐的沉默。

散会后，组织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面见刘少奇进言：‘你们两位主席发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跟毛主席发生矛盾啊！’

作为补救，开了一次中央生活会，刘少奇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毛泽阴沉着脸，他已下定了彻底

搞倒刘少奇的决心。

中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问题》，共二十三条。文件按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突出毛刘争论的问题。在第二部分‘运动的质’后面是这样写的：

几种提法：

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这个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一了问题趣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按：部门二字是周恩来加的）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毛刘的争论半公开化了。上层干部和了解情况的部分中层干部，忧心忡忡。毛刘分裂对中共震动太大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表面上刘少奇继续主持一线工作，作为国家主席从事日常国务活动，但毛泽东不再同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暗地里指使江青等少数人进行新的斗争的准备。

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决裂，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个人当然有极大的能量，但独龙难布雨，他需要助手。林彪和军队只能起战略上的配合作用，在中共党内进行这一场大斗争，他需要在战役、战斗上冲锋陷阵的斗士。毛泽东手里丢了真理，单凭权势压人，就很难找到政治上志同道合的知己了。政治局、书记处那么多才识超群的政治家竟没有什么人可用。多数跟着刘邓走了，成为自己的对立面。于是他决心培养江青，以江青为中心在党内形成一个派系，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己站在她们的背后，将大大加强这个派系呼风唤雨的力量。

翻开大陆出版的有关书籍，都说是林、江两个反党集团怎样干扰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背着毛主席干了这样那样的坏事，毛主席怎样批评他们，跟他们作斗争，甚至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把粉碎江青反党集团也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在政治上是极不严谨

肃的。因为正是在毛泽东的卵翼下，这两个反党集团才能生成和发展起来。许多事情是毛指使、纵容或默许他们去干的，毛假作不知，甚至事后有所批评，扮演受害者保人的角色，让林、江集团代毛受过。林、江集团推波助澜，进馋诬陷是有的，但大主意还得毛泽东拿。例如害死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都是这么回事。总之，林、江两个反党集团是毛手中的得力工具，而不是反毛的异己力量。这是事情的基本的一面。但毛与林、江两个反党集团确实也有偏见不一致和尖锐冲突的时候，甚至林彪反党集团要置毛于死地，这只能说明非正义的关系、互相利用的关系，必然是脆弱的和暂时的，根本没有什么‘三忠于’（即：忠于毛，忠于毛的思想，忠于毛的路线）、‘四无限’（即：对毛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林、江两个反党集团被粉碎，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毛泽东违背中共的政治生活的准则组织阴谋集团反对中共的领导集体的失败。此是后话。让我们回过头来叙述江青后党的崛起。一九三八年毛江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据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的笔记，其内容如下：

第一、毛泽东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岁月悠悠。二十七年过去了。江青终于盼到了出头的一天、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开展一场大斗争，她将踏

着文革的风云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想到这里，江青心醉了。毛泽东给江青的第一个任务是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就势把活着的海瑞——彭德怀揪出来。关于这件事情，大陆的有关出版物，按着‘奸臣祸国，皇上英明’的定式，莫不是说江静建议要写，毛泽东开始还不同意，几次建议之后，毛泽东才被说动了。总之，毛是被动的，江是主动的。细读毛泽东本人谈话，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中说到组织写文章的经过，他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毛泽东自己承认批《海瑞罢官》是他的主意。江青在法庭受审时则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咬谁。’这是毛江之间真实的关系、何必替毛泽东粉饰呢！

一九六五年元旦刚过，江青乘坐专列沿津浦路南下。按中国的制度。乘坐专列是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的高级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她原是个九级干部（相当于地委一级），林彪给提到五级。相当于部长级。江青敢这样张扬，当然也是毛泽东同意的。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到上海站亲自迎接江青。安排他住在华山路一二四五号豪华的别墅里。这所宅第极大，松柏错列，假山掩映，腊梅盛开，

虽是冬季并不显得萧瑟。进到里面，尽失大都会的喧嚣。真如世外桃源。毛泽东和江青都有别墅在这里。江青的别墅是一座二层西式楼房，建在一个孤岛上，四面环水，虹桥接岸，别有洞天。

柯庆施是著名‘左’派，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正觉得这几年日子不好过。听说毛泽东要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进一步清算彭德怀，不禁眉飞色舞。他向江青推荐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张春桥又推荐了市委宣传部处长姚文元。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不无得意地回顾此事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江青所谓‘对外保密’，这个‘外’是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们。这是毛泽东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是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原则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揭开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指挥打仗是讲究序战（初战）必胜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政治大仗的序战，毛泽东是作了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领导文艺界整风和文化革命事宜。姚文

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很大震惊。领导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不知道后台是毛泽东,不仅彭真等被蒙在鼓里,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没有得到一点风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民盟领导人、国内外有名望的学者,公开点名批判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不跟北京市委打个招呼?! 彭真困惑不解,曾令《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负责人询问情况,谓‘如果姚文元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转载,如果是姚的个人文章则不转载。’对方‘答覆:‘无可奉告。’在外地的彭真听了北京市文教书记邓拓的电话汇报,指示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说。

消息逐渐渗透出来。十几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三十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专栏全文转载了姚文,并加编者按:‘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力图把问题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彭真主持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制定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文件的基调是防止‘左’的偏向,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并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八日彭真一行到达武昌东湖宾馆,毛泽东接见他们,问了些情况,表示认可。彭真异常兴奋,趁热打铁,责成中宣部副部长胡绳、许立群就在武汉东湖对《汇报提纲》又进行了一次修改,把毛泽东的指示尽量体现在文件中。并代中央草拟了《中央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用电报发给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征求意见。取得一致同意后，便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三月十一日，彭真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责问：‘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毛泽东转移到了杭州徐庄别墅，冷眼旁观，看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做完了这一切。《二月提纲》正在全国层层下达，层层学习，层层贯彻。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谈了一次话，说‘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造，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他文革初期进攻和打击的方向告诉了江、康等人，江、康领了‘圣旨’，回京煽风点火，组织队伍去了。

四月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央主席的名义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书记被扩大进来。毛泽东赫然震怒，主要对着彭真，说：‘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然后宣布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

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在两个司令部决战的前夕，毛泽东把彭真抛出来，让他在中共全党面前出乖露丑，是有深意的。他要让党政大员们知所趋处，跟刘、邓那个‘司令部’走的，就是彭真的下场。毛泽东手里没有真理，只能用政治上的高压手段，分化高级干部，离开中共中央的路线跟着他走。其次，他要告诉全党，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多数决定的事情是不算数的，他的决定才算数。毛泽东指责别人另立司令部，他有这个权威，别人也不敢分辩，至多辩解一下说是没立。其实毛泽东才是个大分裂主义者。中共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是他不尊重中央领导集体，封锁中央，背后搞地下活动，在南方另立司令部。本书承认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一九九〇年陈云针对个人崇拜的小回潮说：‘前一个时期，又’在宣传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不仅不符合中国革命史、而且是反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的一员。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那可不可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的厄运？文革时期党内不少关键决议，毛泽东都是处于少数，甚至是孤立的。但他搞的是家长式，一人独霸，或突然袭击，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这是国家、人民灾难的根源，当时我们的常委和委员们有没有责任呢？应该说有，而且不轻。这是我党的最惨重的教训，党和人民血和泪的教训。’如果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大多数、元帅的大多数一致起来制止毛泽东的胡作非为，文革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但毛泽东利用了每个人的弱点，招他们各个击破了。后来发生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分散的抗争，遭到了共同的失败。毛泽东规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为了避免江青拉帮结派之嫌，毛泽东要

求中央机关和各中央局提名。中央机共提出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屠《光明日报》社)、尹达(属中国科学院),中南局提出王任重,华东局提出张春桥、姚文元,军队系统提名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文化部长谢镗忠。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和西南局报的名单未被批准。

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是江青。为了叫全党明白这一点,八月三十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了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陈伯达是个没有独立人格只能依附江青的迂夫子,他在的时候也是听江青的;康生早就是江青的私人顾问了。以后几经淘汰,把江青看着不顺眼的人都弄走了,剩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江青的后党就这样形成了。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多么大的重视,但到后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体部分,江青爬了权力的峰巅。江青感激自己的丈夫。想想自己的身世恰如漂泊的柳絮,能有今天,真像《红楼梦》中薛宝钗作《柳絮词》所描述的:

白玉堂前眷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进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价力,送我上青云。

112 罗织罪名 彭罗陆杨下冤狱 张为幻 康陈张上舞台

根据毛泽东在上海、杭州与林彪、康生等人秘密策划，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约八十人。按毛泽东的规定，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都不参加。毛泽东指定仍由刘少奇主持会议，但会议的开法和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向刘交底，所以刘少奇只起司仪的作用。毛泽东坐镇杭州通过康生指导会议进行。一次打倒中央书记处四位书记，这是一场小改变，会不会变出一场反政变来？毛泽东也没有绝对把握。

他躲在杭州遥控，又不让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大区中央局及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是为了留有转圜的余地。一旦林、康失败，他可以发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声援林、康、讨伐叛乱；倘刘、邓占了压倒优势，不可动摇，他可以牺牲林、康，说康生假传圣旨，说林彪急着夺权，说这次会议根本非法等等。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权谋家，在中共党内确实是没有对手的。刘少奇亲自主持通过了打倒自己的文件（此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亲笔写了一段话：‘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就是指的刘少奇），则显得太书生气了。

五月五日下午、六日上午康生以传达‘圣旨’的神秘身份在

会上讲了八个钟头。康生其人，战场上披坚执锐，和平时期治国安民，他百无一能，唯独有搞阴谋权术的天赋。从延安整风他离开王明投到毛泽东麾下，只在促成毛江婚姻上起了点作用，其它方面寸功未立。毛泽东豢养着他，‘八大’给安排个敢治局候补委员，无任何实职，一九六二年九月让他进书记处，作为牵制邓小平、彭真的一颗棋子。在这次会上，康生挑大梁，起了沟通南北、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是得意非凡。康生传达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来，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来毛泽东批评彭真、陆定一，要解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历次谈话。特别炫耀一九六六年三月毛与他个人的两次谈话和一次集体谈话。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去，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这次会议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在主席直接领导下，伯达、春桥等同志起草的。一开始主席就指示。这个通知不直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主席亲自作过多处修改和增补。比较重要的地方确。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求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

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这
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还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
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
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
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接班人,例如赫鲁夫那样的人物,他们
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康生停顿几秒,叫与会者体味这些话的含义和份量,咳一声
嗽,然后说:‘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
始。’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党内这么重要过,通过近视镜片,
他的一双小眼睛放着光芒,扫视全场。

此时此地,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的,知
道毛泽东决心搞倒刘少奇的,只有四个人,他们是江青、林彪、康
生、陈伯达。一九六五年底在上海解决罗瑞卿问题时,毛泽东与
林彪有过密谈,实际上达成了交换:毛支持林搞倒罗瑞卿,
林支持毛搞倒刘少奇。毛泽东在杭州单独与康生谈话,当然交
了底。陈伯达是《五·一六通知》起草人,但毛泽东没跟他交
底。是江青告拆他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几位
常委像听天书一样不得要领。一般地讲反修防修,警惕赫鲁晓
夫式的人物,他们又不便于反对。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
误问题的报告》,有这样的批语: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
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
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
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

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罗瑞卿大将是毛泽东的大‘卫士长’,对毛耿耿忠心绝无二念。他是在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被罢官后与林彪一起上台的,林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任总参谋长。林表面忠于毛,但阴蓄异志。他用的助手必须是绝对忠于他的人,而不是绝对忠于毛的人。这是林罗齟齬的根本原因。但摆在桌面上的事情不是这个。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罗瑞卿和叶剑英元帅总结推广了南京军区第十二军连某连连长郭兴福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干部以身作则,会讲会作,让战士带着敌情练兵,从严从难要求,大大提高了练兵质量。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中央军委转发叶剑英的报告,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十六日,总参谋长罗瑞卿组织全军大比武,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都被请去检阅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比武表演。对于部队的龙腾虎跃的场面毛泽东非常高兴,当场给予表扬。大比武推动了全军的练兵运动,全军获优等成绩的步兵师比一九六三年多了四倍。

林彪一看全军随罗瑞卿的调子练兵比武,认为自己的军权不落实。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林彪召见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等人,心里的话当然不能说,摆在桌面上的话是‘四个第一不落实’的问题。又把‘四个第一不落实’说成是‘突出政

治不落实’，把‘突出政治不落实’说成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落实’。按照这个思路让叶群到兰州军区某师作了一番调查，回来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请毛裁决。以毛的聪明睿智，当然知道军队练兵乃天经地义，罗瑞卿无大错，况且自己在检阅大比武时是表了态的。但他当时思想上考虑的压倒一切的大事是扳倒刘少奇，倒刘必须有林的坚决支持，林这一票又必须非常强大有力，要强大到无人敢拂逆的程度，才能压住其他常委。在这种大局下，牺牲罗瑞卿，就变成了加强林彪以推倒刘少奇的一颗棋子。于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叶群，在叶群的报告上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于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败在了林彪手下，具体的说是败在了林彪的影子——叶群的手下。

为了彻底整垮罗瑞卿，叶群和吴法宪还捏造了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对叶群谈的篡军夺权的四条，内容是：

一、林总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护好林总的身体；

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背靠背地揭发批判罗瑞卿的问题。林彪叫吴法宪到会上去放这颗‘原子弹’。吴法宪干这一类事情已非初次，依计而行，在会上发了言，写了材料，一口咬定罗瑞卿对前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了那四条,要刘跟叶群去讲,刘又告诉了吴法宪。但刘亚楼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去世了,由吴法宪替死人说话,就显得不那么硬梆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听了吴的揭发都不表态。有人说:‘这是死无对证呀!’叶群出主意叫吴法宪去逼刘亚楼遗下的俄籍妻子翟云英。连吓带诱,翟云英说:‘没听刘亚楼说过四条,只见他去世前伸出了四个指头……;’秘书写了下来,叫翟云英签上名,这就成了说过四条的旁证材料。于是罗瑞卿被‘彻底’打倒了。

林彪一九六〇年撤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谭是参加秋收起义的毛的亲信将领之一),一九六六年又撤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在党内,军内达到了权势盖天的程度。指鹿为马都无人敢反对了。

所以,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通过了关于罗瑞卿问题的文件后,毛泽东指定林彪讲话。应该承认,林彪的思想和语言是非常犀利的,甚至有些吓人。《五·一八讲话》是林彪风格的代表作,下面是精彩的片断: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要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引者批注:毛泽东住在杭州,说是要给六本马列著作写序言,把艾思奇、胡绳等学者召去,几次发表谈话,造的声势很大。结果,一个字没写;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是毛林在策

划政变。)

然后‘林彪耸人听闻谈政变,从周朝谈到民国,从中国谈到世界,又拉回话题,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条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引者批注:七千人大会像梦魇一样压着毛泽东。他感到刘、邓将来主持召开‘九大’可能不选他做领袖,大家可能不投他的票;所以先声夺人,制造别人要搞政变的舆论,主动进攻,打倒整个的党,要重新建立一个新党。毛林中共‘九大’开成时,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整党建党,事实上是需要重建。’)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几,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引者批注:这最后一句话,说出了毛泽东的心病。毛泽东所谓的‘反修防修’,其特定的内涵就是反对和防止揭发和清算他饿死两千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的重大路线错误。刘少奇在七个人大会上说了,三面红旗先悬着,看几年再做结论,毛泽东认为这是留下了清算‘三面红旗’的伏笔。七千人大会前夕,刘少奇、邓小平命彭真组织一个班子,集中住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壹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制定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损害群众利益的极左政策。彭真说:要冷静地研究:‘三面红旗是红旗?还是灰旗?白旗?’研究的结果,成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七个人大会上代表中央承担责任的依据。毛泽东多疑,认为这是准备‘赫鲁夫那样的秘密报告’文革初期,查彭真的反毛活动,‘畅观楼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要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即席发言中说过:‘我们动不动就给自己的同志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其实,人家只是对某一个具体领导有意见。反对某一个人,怎么能

说就是反党？你反对毛主席，也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嘛！’作为一个民主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刘少奇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林彪那段‘共诛、共讨’的高调，是针对刘少奇的。）

林彪讲话第二天，五月十九日上午，彭真在会上作检查。他讲了约五分钟。略谓：‘什么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

五月二十日，陆定一作检查。林彪抓住不放的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骂名叶群的问题。这本来应该是街道居民委员会调解的纠纷，却拿到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很有些滑稽意味。事情的缘起是，严慰冰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去看望自己的儿子，发现林彪与前妻生的女儿林小琳受后母叶群虐待，连普通人家孩子都有的毛衣、毛裤都没有，寒暑假不准她回北京的家，在学校患了肝炎，无人照料，很是可怜。出于一种义愤，从一九六〇年三月起，写信谴责叶群，化名‘基督山’。叶群报告公安部，立为‘五〇二专案’。后来严慰冰去王府井九十八号内部商店购物，因高度近视，一进门踩了一个人的脚，被踩者有强烈反映：‘你没长眼吗？’严慰冰仔细一瞧，冤家路窄，竟是叶群，把想说的道歉的话又咽回去了，回了一句：‘你不要盛气凌人，谁也知道谁的！’吵了一架后，严慰冰又写了几封匿名信，把延安整风时叶群的假党员问题以及嫁给林彪前的一些生活隐私都端出来了。公安部六局顺藤摸瓜，查到了写匿名信的是严慰冰。林彪来个‘好男不跟女斗’，跟严慰冰的丈夫陆定一算账。在小组会上，林彪问陆定一：

‘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

‘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陆定一作如是回答。

‘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吗?’林彪不依。

‘丈夫不知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陆定一语义双关。

林彪失态,咬着牙说了一句:‘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严慰冰发现叶群虐待前房女儿,可以光明正大地调解、规劝、批评,写匿名信的办法不妥;后来吵了架又揭人隐私,更属理屈。但这构不成什么罪行,连损害名誉罪都构不成。如果严慰冰向别人写信披露叶群的隐私,或贴传单或向报界发表这些材料,尚能损害叶群名誉(实不实另作别论),她给叶群本人写信,只是给叶群添点‘腻味儿’,气气叶群,别的什么作用也没有。但夫人们之间的矛盾;扯不到军国大事上来。林彪故弄玄虚,说有很多材料,有鬼现象,要发生政变,要杀人云云,手里捏着的真正的‘材料’,就是几封严慰冰写给叶群的匿名信,杯弓蛇影,吓唬别人。

‘彭罗陆杨’的杨尚昆,没有在大会上检查。大概是因为诬陷他的材料更站不住脚。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印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个文件指控杨尚昆的主要错误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事实真相又如何呢?是公开的录音机而不是‘私设窃听器’,在这次会议之前有关工作人员都已作了证明。

在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意气风发,口若悬河,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反右倾,鼓干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时与人谈话身边没有记录的人;有的记录速度跟不上,只能记下个要点来,记不

全、也不准确。中央办公厅负责会议工作的秘书到吉顺就提议买个录音机。经过秘书主任叶子龙同意,就买了一台,那时候的录音机体积较大,放在三屉桌上要占半张桌子,如果打开盖处于工作状态,则要占一张桌面。完全是公开的。在接上麦克风调试时,毛泽东问:‘这是什么东西?’机要秘书高智回话:‘先进设备,录音机,给首长讲话录音好整理材料。’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身边左右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脾气,谁也不敢违背这一条。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回想起有很多话讲得不妥。下令把各党政军系统所有传抄的他的未公开发表的讲话一律收回,要求非常严格。对这些录音、也很后悔。将来刘少奇要算账,这些录音带就是证据。又听说彭真等在畅观楼调用所有文件、档案、录音,更为恼火,所以政治局文件指控杨尚昆的第二条错误是:‘他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露党的核心机密。’这算‘别人’,一不是外国人,二不是一般人,而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如果党内生活正常,这算什么错误呢?一切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毛泽东另立的司令部向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夺权的一次会议。康生拿着尚方宝剑,林彪以军队实力人物的姿态作了杀气腾腾的讲话,陈伯达、张春桥也在会上讲了话。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谁也没有讲话,其他政治局委员更是忐忑不安,政治局和书记处处于自身难保的地位,只能接受林、康的一切提议。在这样情况下,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

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传达到县委以上,军队传达团级以上。

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已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免去。由汪东兴接任中办主任,另一副主任田家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即作出上述决定的同一天,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他的办公室自缢身亡。杨、汪、田都是忠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是杨、田同时还忠于其他常委,努力维护毛和其他常委的团结,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连长出身,只忠于毛一个人。中办主任这个职务相当于清朝‘大内总管’,汪东兴主政,其他常委的安全就失去了保障。后来出现了在中南海斗朱德、斗刘少奇、斗邓小平的事情。

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杭州遥控,康生、陈伯达在北京组织指挥,在舆论界发起了对‘三家村’的大围剿。田家英死前敏锐地指出:‘这是一场文字狱,是整知识分子的运动。’

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拒(代表江青)文章:《向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及动本质》。新华社当天转发,第二天康生下令全国各报转载,转载时排错一个字唯总编辑是问。

‘三家村’的弥天大罪是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毛泽东对邓拓有特别的恶感是因为邓是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主稿人,这篇周恩来授意并最后定稿的社论,是周事前预言‘大跃进’之不可行和事后证实‘大跃进’之错误的界碑。毛泽东既要整个改写三年大跃进的历史,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树立自己的一贯正确的形象,自然不能放过邓拓。从五月八日起,报纸电台、机关的大小字报,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台风向邓拓袭来。妻子丁一岚正在中南海电讯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然受到牵连,失去了组织上的信任。上学的孩子在学校受到侮辱,回到家里和父亲划清界限。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邓拓事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作最后的抗争。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凌晨,这位‘笔走龙蛇二十年’的才子吞服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他给妻儿留下遗书说:‘你和孩子们离开我是对的……,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他在致市委遗书中表白说:‘我的这一颗心,永达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据说毛泽东看了邓拓遗书,神情淡漠。他的构成已达到了封建皇帝的高度,下诏赐死大臣,大臣要叩头谢恩,三呼‘万岁’。转念至此,

他的脸上有了一丝别人难以察觉的笑容，转瞬消失。

吴晗被害得家破人亡，妻子袁震、长女吴小彦和他本人受尽凌辱先后自杀。这位历史学家的祭日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

许多为吴晗鸣不平的人以言取祸，遭到株连。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不赞成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对吴晗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是‘莫须有的罪’，惨遭迫害，受尽屈辱。

上海历史学家李平心教授，不赞成姚文元‘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被大会小会批判，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他不堪凌辱，愤然自杀。

北京历史学家翦伯赞说：‘这样搞，岂不是现代的焚书坑儒，祖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将毁于一旦。’批斗、抄家，接踵而来，最后老夫妇二人在北大寓所跳楼自杀。

北京一青年徒工遇罗克给《文汇报》寄去一篇文章，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说了句‘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竟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姚进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身陷囹圄，后被判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西安市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名叫朱曦亭，写了一篇反驳姚文元的文章，被押到万人大会上批斗，定罪为现行反革命，遭受严刑拷打，失去了一只眼睛。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由青年毕生组成的红卫兵抄了北京市文化局，把集中在这里保存的戏装、道具堆到国子监孔庙大院烧毁。揪斗北京市文化局领导人：赵鼎新、张梦庚以及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白芸

生等三十余人,给他们脖子上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游街后押到孔庙大院。全部剃了阴阳头,命令他们跪在火堆四周,一面用火烤,一面用皮带抽打。炎炎夏日,受此奇耻大辱,六十七岁的老舍头被打破。当场晕倒在地。八月二十四日深夜,一代文豪,人民艺术家老舍投太平湖自尽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个‘黄钟毁弃,瓦甌雷鸣’的荒谬时代!

当‘三家村’的第三号人物、北京市委统战部长、著名文人廖沫沙闯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一九九一年初去世后,诗人熊鉴有诗凭吊,诗曰:

三家当年并无村,留在人间却有痕。

一自黄钟遭毁弃,遗音唤醒万民魂。

113 口蜜腹剑 彭德怀入川上当 心毒手黑 戚本禹小丑跳梁

彭德怀元帅自从庐山罢官、挂甲屯挂甲之后，一面潜心读书，一面密切注意国内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一个倾盆大雨的黄昏，从山东逃来两个难民，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带着她女儿，来到挂甲屯找在警卫连服役的儿子。母子见面抱头痛哭。母亲哭诉着：‘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各奔东西地逃荒。你可说啥也不能回去呀！在队伍上有饭吃，娘就放心了。’尽管各有各的定量，彭德怀叫炊事员做饭招待他们，就吃彭总和浦安修的定量。没过多久，一个安徽籍战士的父母也来了，河南籍战士的家属也来了……灾民们见了彭元帅就问：‘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咱庄稼人过的啥日子吗？’‘下边的干部见粮食就收走，比过去的保长、地主还凶，日子怎么过啊！’彭德怀阴沉着脸，不知该怎么回答。

当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看望彭德怀时，彭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请求回家乡再去看看，作些调查研究，托杨带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彭德怀信，颇费踌躇，不让这个老信子乱跑乱说吧，不妥，因为只是削去了彭德怀的兵权，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彭总理的职务并没有免，他是在‘休息’而不是坐监牢。于是，毛泽东批道：‘可以，去什么地方都行。’杨尚昆特意派中央办公厅的金石做彭总的临时秘书（蔡英

魁秘书被分派留守吴家花园), 还从北京医院抽调一名护士做保健工作, 又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了电话, 告以彭总要回湖南看看, 地方要提供方便, 保证安全。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彭德怀一行南下了。在萧瑟的秋风中, 彭德怀穿一身打了补丁的黑制服回到了故乡湘潭县乌石寨。乌石轰动了。乡亲们不势利眼, 还叫他彭老总, 比上次还乡时还要热情。彭德怀一躬到底, 对大家说: ‘不要喊我老总的了, 我过去是砍柴出身, 如今还是个普通百姓, 乡亲们好吧。’

‘彭德怀回来了!’ 一传十, 十传百, 湘潭沸腾了。农民们从四乡八寨赶来, 有的走几天路来到乌石, 就是要看一看, 问候一声这位敢替老百姓说话而罢了官的彭总。一连四五天, 彭德怀自己花钱买了五百斤米和三百斤面, 招待大家, 很快就吃光了。

十一月九日, 彭德怀从锰矿回到湘潭县委。看到听到的事情使他满腹惆怅。这天傍晚为排遣胸中郁闷, 他来到湘江边散步, 见一收网的打渔人。

‘老信子, 你好啊!’ 彭德怀上前搭讪。

渔夫抬起头, 盯了一眼彭德怀, 信口答道: ‘好, 好! 谁个敢说不好哟。老信子。’

‘老信子, 你是在发牢骚吧?’

‘牢骚? 哼, 谁个敢发? 寨里那些龟孙子打了点粮食都上交了, 上级给他发块大红布, 他披着大红布站在大桌子上一讲就是半宿, 胡吹现在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倒吃甘蔗节节甜。呸! 孽种!’

‘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嘛。’

‘反映有屁用? 堂堂彭德怀元帅说了真话, 结果怎样? 惹了一身祸, 把官都给撤了!’ 渔夫凝视江面, 抬手指着一条满载

难民的船,对彭德怀说:‘老信子,你看,又要扯崽拉女出外讨饭了,这和过去有啥子两样嘛!有哪个当官的出来管哪?那喇叭里唱得蛮响:‘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叫人民吃饱了,江山坐得牢……‘哼,这样下去还能坐得牢吗?!’

彭德怀无言以对,心如刀割。

近四十天,他走访了四个公社,九个生产大队和一座矿山,在煤油灯下写了四份共九万字的专题调查报告,告诉秘书金石,誊写清楚,交湖南省委转给中央。金秘书劝他别报了,他说:‘要明人不做暗事,有话我我要说。’十一月十六日他返回了北京。

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召开了,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没接到开会的通知。会上对‘反右倾、拔白旗’受打击的干部一律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刘少奇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在于彭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动有关。’这就是说,信可以一风吹,‘反党集团’‘里通外国’的案不能平。七千人大会开完,彭黄张周又作了区别对待:张闻天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周小舟降为湖南省委副书记,黄克诚被派到陕西省当副省长,唯有彭德怀罪不能免。在毛泽东心目中,彭德怀是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有这面黑旗在,他早晚要否定‘三面红旗’,彻底翻庐山会议的案。问题是怎么处置这个‘老信子’,既不能关,又不能杀,批准他回趟家乡,他又上了九万言的调查报告,把个社会主义的湖南,说得‘漆黑一团’。

彭德怀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自己的耿耿忠心被毛泽东所理

解、所谅解，七千人大会有关彭德怀的信息使他怒发冲冠，眦眦欲裂。他在没有档案材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凭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写了八万言书。就是后来传世的《彭德怀自述》的主体部分。其中有《人物评价》一节被删去了。在这一节，他揭露了林彪，说林有战功，但今天搞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的。《毛选》里面《星火燎原》一文是批评林彪的。他还提请毛泽东注意。对柯庆施、康生这两个人要特别提高警惕。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彭德怀把自述历史，辩护自己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里通外国的‘八万言书’上送，请中央审查。

八月五日，毛泽东与柯庆施谈话。柯庆施说：‘《海瑞罢官》的戏影射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彭至今不服气，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毛泽东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了解，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在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所谓。‘翻案风’，明确表示：‘彭德怀不能平反，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子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此，彭德怀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泽东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竟然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金日成怎么也没想到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军把美国侵略军赶过三八线以南的彭德怀元帅和组织战争后勤支援的高岗，成了朝鲜人民的‘敌人’。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旬，江青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正在上海紧张地炮制着，彭真又奉到毛泽东的命令找彭德怀谈话。

谈话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彭真向彭德怀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去，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彭德怀说：‘我这个样不好出来工作。三线建设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也不想再搞与军队有关的事情。要让我出来工作，我就到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去。’彭德怀回到挂甲屯又给毛写了一信，强调‘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不便出来工作的。’

九月二十三日早晨，彭德怀散步回来，电话铃响了，拿起耳机一听，竟是毛泽东打来的。彭德怀激动不已。

‘德怀吗，你现在来吧，我等你。’

‘主席，你工作了一夜，休息吧，我还是另找个时间去吧’

‘你这个人，叫你来就来嘛，我们好久不见面了，你快来，我们好好谈谈。’‘好，我马上去’

彭德怀放下电话，兴奋得像个孩子，立即吩咐‘备车，去中南海！’秘书、司机认为彭总出头有望了，跟着高兴，帮彭德怀换了身衣服，刮了刮胡子，上车登程。

到了丰泽园，毛泽东在院子里踱步，显然是在等着彭德怀。彭德怀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叫了一声‘主席’。

‘昨天下午接刘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里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毛泽东把彭德怀请进书房。

为了存真，现在把彭德怀事后追记的这次谈话，实录如下：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采。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

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产华。

‘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情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主席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中午时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来到颐年堂。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谈了多时了,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刘少奇说:‘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呀!主席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话,主席和大家都希望你振作起来。’

然后,一起吃中饭,毛泽东向彭德怀敬了酒。

下午三点,彭德怀辞别出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送他上汽车。坐在车里的彭德怀一回头,见毛泽东站在丰泽园门口,目送他的车绝尘而去。

彭德怀委实受了感动。在车里对参谋景希珍和司机赵凤池说:‘主席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庐山会议,真理可能在你那边……既然主席这样说了,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呀?我能不高兴吗?’

又过了几天,物尚昆打来电话,通知彭德怀立刻去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开会。彭德怀按时赶到了。这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有中央部分领导人和西南局、西南建委和四川省领导人参加的特别会议。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井泉、程子华、吕正操、阎秀峰、钱敏、李大章、任白戈等出席会议。李井泉等介绍了西南大一二线情况。毛泽东亲自宣布:‘西南三线要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同志。’他转头向着李井泉说:‘德怀同志以后给我写信,你们要快点给我送来。对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他要到哪里去,要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们要对下面说,多创造条件,方便他的工作。德怀同志这个人你想让他有职无权是不行的,他不会干的。要叫他有职有权,这样才好干工作嘛。光有职没有权,那是养

老,怎么能叫工作呢!’

西南同志纷纷发言,欢迎彭总去大三线工作。

会议开得很认真,但只凭口讲,没有任何文字的命令、通知、决定。没有新闻记者参加,当然更不会登报公布

一个多月过去了,彭德怀还没有动身。

十一月十二日,侄女彭梅魁来看望彭德怀。见伯伯闷闷不乐,就问:‘又怎么啦?’

彭德怀抬起头,愤愤地说:‘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前天我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没想到就在这一天,杨尚昆的办公厅主任给撤了,由汪东兴接任。主席说叫我到西南工作,我的行期一直定不下来,中央办公厅说那边房子没准备好。不知你看了《文汇报》没有,十日那天发表了一个叫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把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吴晗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树碑立传。虽然没有点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说我嘛?真扯他娘的蛋!’

梅魁说:‘伯伯,您不要多心哪,既然主席让您出来工作,下面的人谁敢反对呀?再说,文艺界今天批一部电影,明天批一出戏,不是常见嘛,不就是那么一篇文章吗?有什么了不起。’

彭德怀说:‘话是这么说,可也不能不提防呀!像这样的文章,没有中央大人物的许可,敢发吗?’

梅魁安慰伯伯,心里也有疑惑,就问:‘伯伯,中央在最近的一些会上,讲过您没有?’

彭德怀摇头:‘到目前为止,除了主席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参加过一次西南三线有关人员的会议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要出来工作。咳,两人说的活有什么用?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

向外透露,有什么证据?谁能知道?’

梅魁说:‘伯伯,您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复杂了。’

彭德怀说:‘梅魁呀,伯伯我一生胆大包天,可也有时心细如发,事情本来就不简单哪!’

十一月二十五日,彭德怀终于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他可以于近期赴川。

彭德怀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离京赴川。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党校的代表前来为他送行。挂甲屯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地都来了。当汽车开动时,送行的队伍里传出哭声,似乎在预示彭德怀这次入川凶多吉少。随他一起入川的有参谋景希珍、秘书荣魁英和司机赵凤池。他的夫人浦安修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和他分手了。

三十口,彭德怀一行仆仆风尘到了成都,住在永兴巷七号。第二天,即十二月一日,他被晚到一天的《人民日报》吸引住了,那上面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切都像是有意的安排。

赵凤池义愤地说:‘有些人就是靠整人起家,要阴谋,设陷阱,杀人不见血!这边让人出来工作,他们同时在那边又来一套。’

彭德怀越烦越抽烟。他深吸了一口又急于说话,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等平复下来才平静地说:‘我早就知道我的事没完。哎!无非是再一次把我搞臭嘛,我等着。’彭德怀思想上有些准备,但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他不知道这次调虎离山——应该说是纵虎上山,是为了要他的命,开在北京动物园的老虎无人敢伤害,倘若把老虎‘放’到四川大山里,便成了任人捕杀的对象。彭德怀不是消极等待,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他以毛泽东口头

任命的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身份,跑了二十多个县市,视察了十五个工厂、矿山、水电站,拼命工作以不负毛的期望。他希望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与他的谈话是真诚的。他不敢想像那是一个把他调离北京任人宰割的骗局。

民国以来,自从有了新式学校就有了学生运动。从北洋时代到蒋委员长时代,学生运动都以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力量。还没有哪一位统治者能利用学生干坏事。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他利用青年学生去打倒他往日的战友、今日的政敌。这也是他‘高’于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的一个方面。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一九六六年五月初,清华附中一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红卫兵’,立即得到同学们的响应。毛泽东闻知这一‘新生事物’,立即写信支持。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很快,红卫兵在北京和全国就成了气候。八月十八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一个叫宋彬彬的女学生将一个‘红卫兵’袖章,献给毛泽东,并给他佩戴在左臂上,他问了这个女孩的名字,当听到是‘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时,他说:‘要武嘛。’从此,女孩改名宋要武,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还将‘造反’最凶的五个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航空工业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与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群众队伍。他还命令将一千五百名各地红卫兵代表安排在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上。笔者那一天作为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在金水桥东观礼

台上,目睹耳闻了‘红卫兵’代表们那种疯狂的‘造反’热情。既然‘造反’就能上天安门,文革胜利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大的官可以做呢!这在青年学生们当中引起了无穷的幻想。当学校讲唯成份论,分配工作时许多好位置都被干部子弟占据,广大平民子弟气愤难平的时候,毛燕席号召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要打倒那些包揽好位子的同学的老子,平民子弟出身的学生们把毛看成了贴心人,立即起来‘造反’了;干部子弟为了摆脱被动,以更‘左’的姿态出现。他们不好直接揪斗自己的父亲,但‘大方向’又要造走资派的反,于是去揪斗父亲的上级、同级或下级,揪斗外单位或外地的走资派。不管是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全疯了。上天安门,这诱惑力太大了。这种‘造反’,虽然高呼‘舍得一身刚,敢把皇帝拉下马’,但‘皇帝’是指刘少奇,毛泽东支持并下令军警保护这种‘造反’。成群结伙,揪斗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名作家、名演员,他们没有还手的力量,因此,绝无危险而有说不尽的好处。这就是红卫兵运动深层的思想基础。从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全国来京串连的红卫兵一千三百多万人,对毛的个人崇拜的狂热达于沸点,毛作为‘风眼’,使造反的‘红色风暴’形成气候,席卷六亿神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江青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江青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呀!’他看了一腿林彪,又高声朗朗地说:刘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对他说:‘如林身体不好,还由你当国防部长。’他要是再当国防部长,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十二月十五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代表。戚本禹看了造反派整理的打倒叶剑英的材料,对韩爱晶说:‘你们的攻击点没有选对。你们先不要搞叶剑英,‘海瑞’还没有斗嘛!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这是首长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会后,戚本禹也学着操纵派系的手段,分别给地质东方红的朱成昭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打电话,下达赴川揪彭出击令。地质学院组成了‘专揪彭德怀战斗团’,由一号头目王大宾率领;航空学院组织了‘赴川揪彭敢死队’,分头出发了。

戚本禹被中央文革抛出来入了大狱后、一九七九年写了如下供词:‘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戚本禹不敢再往上供,或者他供了没有发表出来。

两支揪彭红卫兵在成都经过一番争夺较量。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北航的红卫兵绑架了彭德怀元帅,后又被止过天安门城楼的王大宾率领地院红卫兵抢走了。秘韶綦魁英报告了北京总理办公室。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都军区派某师参谋长谷正岭率少许警卫部队和景希珍、綦魁英一起监督地质学院红卫兵护送彭德怀回京。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彭德怀乘坐的火车抵京。车一进二号站台,一个军人登车,向谷正岭参谋长行礼,交出卫戍区信件,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参谋王金岭,奉总理指示接彭德怀同志。’周恩来巧妙地挫败了江青、戚本禹加害彭德怀的阴谋,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安排彭德怀住在五棵松东北角五团团部,给保护起来了。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彭德怀没遭什么罪。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当晚乘车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第一站先到郑州，第二站到武汉。十四日周恩来乘飞机先到武汉，因原来的党政系统和接待机关都乱了套，周恩来要亲自面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各有关方面的临时负责人，安排警卫部队，保证毛泽东的生活供应。毛泽东抵武汉后，见周恩来亲自来双检查布置一切，心中不无感动。周毛在东湖宾馆见面时，周恩来有意识地谈到了几位；巷帅韵处境，特别讲了彭德怀。毛泽东逐个表了态：‘聂荣臻同志，那可是个厚道人。徐向前同志过去的事情不能搞了，河西走廊失败，他要饭回延安；在草地时，他反对红军打红军。’唯独对彭德怀不置一词。周恩来心中一凉，彭德怀是保不住了。

大凡毛泽东离京，就是让江青后党放手干坏事。周恩来心中明镜一般。他要摸到毛泽东的底。知道哪些事情自己可以干预，干预到什么分寸，哪些事情根本不能管。看来彭德怀的事毛已下了决心，根本不能管了。

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选登的解放军战士的批判文章公开点了彭德怀的名。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彭德怀’，名字上划上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绑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是最熟的时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红卫兵的口沫横飞的所谓‘批判’。大会结束前，要两位老人从由人组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吐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又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大卡车，由红卫兵押解在北京城

游了街,北京市民们惊愕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八月四日下午,经过江青、戚本禹精心策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央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有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二人此时此地见面,太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了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而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结,又是抛上汽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游斗汽率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

领从车上下下来拦住了迎面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联络员。你们这样搞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他的权力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一百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捺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脉搏加快，血压升高。

在韩爱晶主持的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提问：‘彭德怀，你说，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

彭答：‘打死了几万日本兵！’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百团大战暴露了我军企图，招致日寇疯狂大屠杀，充分证明你是假抗战，真护蒋，假功臣，真罪魁！是彻头彻尾的盲动主义！’

彭德怀愤怒了，答辩滔滔：‘不对！说暴露我军企图，是敌人的话。至于说招致日寇疯狂大屠杀，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是谁招来的？‘七·七’芦沟桥事变是谁招来的？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同胞实行修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难道是在百团大战以后才开始的吗？至于说百团大战是不是盲动主义，你们去问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打完仗，我给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打得好，以后还可以再组织打几仗。’

“胡说，你在欺骗我们。”

‘不是我欺骗你们，是有人欺骗你们，你们不懂历史，你们

可以去问问毛主席嘛!’——

在中共党内,功过是非被颠倒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浩叹!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但删去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后面的‘同志’二字,这是昭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彭德怀是敌我矛盾。其实,敌我矛盾的话,毛泽东早在三年前会见金日成时就讲到国际上去了。后来让彭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谈话、会议,完全是骗局。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审阅了专案组的报告,签署了这样的批文:‘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一九七三年春,彭德怀患直肠癌。四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关怀下,让他住进了三〇一医院。这时候,林彪已折戟沉沙,黄永胜等四员大将也进了监狱。如果是林彪集团执意要害死彭德怀,而毛泽东的态度不是如此,这是一个转圜的机会。宣布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的批文是‘背着伟大领袖’干的,一切推到林黄身上就算完了。反正彭已失去工作能力,沉痾在身,也活不了年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迫害如果中途罢手,这是个机会。但毛决心置彭于死地。

一九七四年九月,彭德怀处于有时清醒有时昏迷的状态。一次医生来查房,问:‘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说:‘医生,听我说,庐山会议上我没有错!不是不怕提意见吗?不是让说真话吗?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就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不让我革命啊?我要见毛泽东。’

癌扩散了,彭德怀疼得厉害。打打止疼针,减轻痛苦,原属

普通的人道主义治疗。但医院奉命：治疗要为敢治服务，不给用。专案人员和医卫人员在病房监视着。

他的病房北向，把玻璃窗户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没有光，不通风。彭元帅忍受着人间最后的苦难。他疯了。给他输液，他把针头拔掉，说：‘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食，他把饭碗推到地上，说：‘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高声咒骂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五时三十五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表里一致言行如一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彭德怀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火化后，专案组奉王洪文之命将彭德怀的骨灰运往成都，只让省委领导人刘兴元、段君毅二人知道，骨灰盒上的名字改为王川，暂存成都殡仪馆。

114 囚贺防周 满城风雨说兵变 揪王倒陶 后党权势欲盖天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赶下台，撤销他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为争取与苏联缓和关系，这年十月革命节，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伍修罗、刘晓、乔冠华为团员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联新领导人探讨改善两国两党关系的可能性。

在十一月七日阅兵之后的国庆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贺龙元帅正同崔可夫元帅交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带着翻译走过来，贺龙迎上去握手马礼。国防部长出现了，崔可夫自然退居第二位。马利诺夫斯基说：‘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赶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解。’贺龙敛容变色，当场提出抗议。马利诺夫斯基讪讪而去。贺龙当即找到周恩来总理，报告这一严重事件。周恩来当场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以后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后失言’，他代表苏方表示道歉。

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于十一月十三日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一大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向毛泽东和常委如实报告了宴会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以及代表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处理虽然表示满意，但心底留下了一个永久不去的阴影。他作出判断：在中国党内如发生推翻他的政变，起码是可以得到苏联支持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是周恩来使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全国大混乱的形势下艰难地维持运转，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是周恩来使中国政府在世界面前保持了稳定、完整的形象，并打开了外交新局面，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人望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党内和党外，干部和人民，惧怕毛泽东，爱戴周恩来；是周恩来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寄托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寄托着实现‘四化’、强国富民的希望。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强化党的系统，弱化政府系统，在强化党的系统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与他的主要助手刘少奇、邓小平发生分歧；在周恩来不厌其烦地检讨‘反冒进’的错误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冒进’路线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异议；在毛泽东决心将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嫡系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他的新的支持者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又没有治国安民的能力的时候，他只能依靠周恩来支撑住国家局面，使林、江集团有一个稳固的地盘大闹天宫，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作战。所有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的支持与合作。毛泽东愈要依靠周恩来，也就愈要防范周恩来。

毛泽东和林越认为，刘邓是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

有能力发劲军事政变的是周恩来。马利诺夫斯基游说贺龙使毛泽东和林彪念念不忘。周恩来在贺龙的心目中有极高的信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已持续了四十年。周恩来如果来个新版的‘南昌起义’，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五个元帅会跟着走；徐向前对西路军问题心怀怨望，也会跟着走；叶剑英是参谋长出身，没有自己的山头，他在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时投毛的票，如果毛泽东与周恩来摊牌，他很有可能投了周恩来的票。彭德怀被打倒了，他要站出来也会支持周恩来。罗荣桓过早去世了。这样一算活着的九个元帅有八个会跟周恩来走，毛林无论如何难以抗衡这一巨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将军们跟着走的会更多。党政干部、知识界会出现闻风景从的局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最危险、最可虑、最担心的。

当然，周恩来从历史上一贯忍辱负重，没有争夺领袖的野心，他不会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异军突起，加重中国的政治危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根据多年对周恩来的了解，有相当的把握，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把相当多的党政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毛泽东崇信‘法家’，把韩非子的‘自恃勿恃人’，‘恃术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作为巩固君权，驾驭臣下的基本原则，他要谨防万一。就是说毛泽东把基点放在从根本上破坏发维新版的南昌起义的任何可能性上，而不是放在相信周恩来的忠诚上。

在这个国际国内背景和毛泽东的复杂心理背景下，贺龙元帅的厄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南昌起义诸帅中，别人或转到了政府部门，或政治上受过伤，或兼而有之。如朱德、陈毅都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过检讨，刘伯承经过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已一蹶不振。只有贺龙，在政治上没有伤痕，庐山

会议后他与林彪共掌兵权，成为主持常务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当罗瑞卿对林彪说：‘毛主席看你身体不好。要贺老总多管一点军队工作’时，林彪说：‘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南昌起义时，贺龙是军长、总指挥，林彪才是个连长。林彪与自己的老长官共事，虽然自己更受毛的宠信，但总觉得如锋芒在背，坐卧不安。贺龙还兼任彭德怀专案组组长，这个组长虽非显职，但代表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毛林看来也是‘闹事’的政治资本；而且贺龙有自己的亲信将领和亲信部队……。不管贺龙有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必须先褫夺他的兵权，把他打倒（可以制造任何理由），这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中是秘而不宣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先放倒，新版的‘南昌起义’就搞不起来了。

倒贺的藉口终于找到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发表讲话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此，‘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在北京市各学校、各机关。在街头，在巷尾，辗转传抄，闹得风雨满城。

八月，吴法宪、李作鹏受林彪指使写了诬陷贺龙的材料，说贺龙要在空军和海军夺权；九月七日，叶群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诬告信，说贺龙领导的体委‘私自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九月八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趁风纵火，危言耸听地说：‘贺龙私自调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贺龙去苏联与苏修的将军共谋推翻

毛主席的领导；贺龙在体育部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安在什刹海，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还有无线电俱乐部等等。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把贺龙召到他的新住所‘游泳池’谈话。先把吴法宪的揭发信给贺龙看了，然后宽慰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击群众。’并说：‘我当你的保皇派。’十九日，毛又找贺谈一次，开门见山地说：

‘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毛泽东当面保贺龙，曾使贺龙激动不已，贺龙的夫人薛明至今对毛感恩戴德，认为是林彪害死了贺龙。

检验毛泽东保一人是真是假？有两个办法。一是看毛泽东的谈话是否印成中央文件正式传下去，如传，是真的；不印不传，则是假的，如同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召见彭德怀的谈话一样。与彭谈话尚在西南地区部分干部参加的会议上又说了一遍，与贺的谈话，仅仅是毛知贺知，别人根本不知道。再一个检验的办法是看毛对诬告材料的态度，如真保贺龙，就会对吴法宪等人的诬告信采取严厉态度。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在外事口鼓动打倒陈毅，夺外交大权，毛泽东在王力的讲话记录稿上批上一句：‘大、大、大毒草’，王力就被踢出中央文革，进了监狱，陈毅就保住了。吴法宪第一次诬陷彭德怀，第二次诬陷罗瑞卿，第三次诬陷贺龙，其人可恶，其心可诛。毛泽东对吴法宪当能看透，但他对吴法宪没有任何责备，这就说明保贺龙是假的。其目的在于稳住贺龙，弱化贺龙斗争反抗的决心（如果贺准备有所行动的话），抱着‘毛主席会给我做主’的幻想，一步一步进入林彪的牢笼。

在一九六六年年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正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江青突然出语惊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我有大堆的材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来，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这个文不对题的发言使与会者大惊。

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

江青以爱妃兼爱卿的身份，半嗔半恼地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宣布散会。

众人心疑。江青如果不摸毛泽东的底敢这么胡来吗？如果江青说错了毛泽东能这么善罢干休吗？

一九六六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姚文元到清华大学，专门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不久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一般认为，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动贺龙，光是林彪，份量是不够的。江青讲话后，贺家的家就被抄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李作鹏接见为查清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问题的装甲兵两个干部。装甲兵干部问道：‘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吧？’李答：‘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又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李答：‘去年二月兵变，贺龙要×军（贺龙的老部下）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龙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至此，‘二月兵变’就由空穴来风变成了全须全尾的事实了。

说‘二月兵变’是空穴来风，这个‘穴’需要介绍一下。一九

六六年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二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覆：由你们找有空房子单位，找到后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派人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毕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卫戍区干部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给部队暂住。但是卫戍区一个领导人知道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一九六六年七月，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见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出尽了风头。遂捕风捉影地贴出了《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那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倒，他出面说没有二月兵变。但林、江集团对于‘二月兵变’这件事，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他们要抓住这件事情，先把贺龙轰倒。

贺龙被抄家以后，周恩来把贺龙夫妇接进了中南海西花厅暂住。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谈一次话。为解除毛泽东的疑心，他约江青参加；为防止江青造谣生事，他又约李富春陪同他谈。到时候，李富春来了，江青没有来。她组织红卫兵把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呼‘打倒贺龙！’的口号。在这样的气氛中，周恩来对贺龙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毛主席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这种情况说明，周恩来已无力保护贺龙

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凌晨三点，周恩来派人把贺龙夫妇送往京郊山区。周恩来精心安排，像在上海搞地下工作那样，中间还换一次车，以甩掉跟踪者。他把贺龙藏起来，过了几个月的平静生活。到了夏天，贺龙的住处被林彪集团‘侦察’到了。九月七日，叶群在中央碰头会上利用武汉市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的诬告信，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这件事的真相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贺龙在众多指战员面前，杀了前来策反的国民党政客熊贡卿。当时就报告了中共中央。这段本来清楚的历史又被搅混了。叶群代表林彪，建议立案审查。九月十三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贺龙专案组，专案组组长由康生担任。十月，周恩来冲破阻力，又两次派人看望贺龙，来说：‘贺老总，今年缺煤，总理想到山区冷得早，怕你感冒，要我来告诉他们提前给你烧暖气。’但林彪控制的贺龙专案组，根本不理睬周恩来的关照。不仅不给烧暖气，竟收走了床上的被褥枕头，借口供水困难，连续四十五天，限制用水，每天只给一壶。薛明决定，不洗脸，不漱口，保证贺龙饮用。贺龙患有糖尿病，限制饮水等于慢性杀害他。为了能够喝上水，赶上雨天，他们就把洗衣盆、洗脸盆都摆在檐下接雨水。一次接满了一大盆。贺龙与薛明去抬这盆水，七十一岁的元帅又重病在身，他气力不支摔倒了，扭伤腰胯，十八天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贺龙望穿秋水，希望周恩来能在秋后派人来接他。白天听到汽车喇叭声，他说：‘总理派车来了’。晚上看见远处的路灯摇曳，他说：‘那是总理派来的汽车的车灯，你看，越走越近了。’夫人薛明抬头望去，知道这是年迈丈夫的幻觉，但不忍把事情说破，让他多几秒钟的幻想，就是多几秒钟的慰藉呀！贺龙终于作

出了结论：‘如果总理不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这是糖尿病酸中毒现象。直到晚上八点才来了两个医生，治疗方案是输葡萄糖液，吊上瓶子就走了。这一切都是在专案人员的监视下进行的。整整输了一夜，输入葡萄糖液二千毫升，血糖高达一千七百度。这不是庸医杀人，是在‘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的原则下，给患者输入了足以致命的大量葡萄糖液。六月九日，贺龙被送进医院，下午三点零九分，这位英雄一世、叱咤风云的元帅与世长辞。

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三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彭德怀、贺龙和后面将要谈到的刘少奇。建国后，贺龙小心谨慎，很意迎合上意（如庐山会议）。对毛泽东没有不忠的表现。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提醒了毛泽东，必须除掉贺龙，防止一场新版的南昌起义。毛泽东有点像曹操，‘宁使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但他唱的是红脸，当面说要保贺龙，背后纵容林彪一夥下手，置贺龙于死地。贺龙没有反毛，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清楚；先害死再平反，这也是他的‘战略部署’。

江青后党弄权，大大小小，害死的人就很多了。最大的是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陶铸的急升陡降都和江青密切相关。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后期，在多数常委不知道的情况下，毛泽东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提出了十一个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让中央委员们投票选举。选举后名单的排列几经改动才正式公布。

最初的名单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邓小平因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周恩来之后，居第

四。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能反而上升到第四位呢？不行，这样排不行。”然后，去找林彪提意见。林彪一直认为邓小平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与江青一拍即合。由林彪向毛泽东建议、将陈伯达调在邓小平前面，成为第四位，邓小平排第五位。江青看了调整后的名单，仍不满意，她找到毛泽东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最后固定的常委名单成了这样：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江青还提名陶铸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她的恩师康生齐名。陶铸当过省委书记，大区书记。江青想在后党中网罗几位有根基的政治家，以当大用。陶铸是其一。但光明磊落的陶铸不上江青这条船。江青认为我能把你提上来，也能把你打下去，又与陈伯达合谋，打倒了陶铸。毛泽东对这一切是默许的。他要借助于陶铸的升沉，树起江青后党的威势，让政治局委员以及政治局常委们对江青刮目相看，使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以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陶铸调北京工作。毛泽东给他的职衔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是毛泽东为打倒刘邓、抑制周恩来、加强江青后党所布设的一颗重要棋子。

陶铸一到北京，江青极事拉拢，让他住进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办公。但不久就薰莠冰炭难以相容，他搬出钓鱼台，

住进中南海写字廊,那是杨尚昆住过的一所房子。

六月三日,受毛泽东委托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参加了这次会议。鉴于学生们起来造反,各大专院校党委均已瘫痪,为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刘邓提出往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陈伯达这时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刘少奇打开一看,写的是:‘不要搞工作组。’刘把条子传给邓小平,邓小平把条子念了,然后问道:‘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陈伯达陷于自相矛盾的状态,无法解释。带工作组进《人民日报》是毛泽东派他去的,但陈伯达通过内线,知道毛泽东不主张往大专院校派工作组。他写这张条子,意思不在于让刘邓接受,而在于挂上一个正确路线的‘号’,立此存照。六月九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大局。毛泽东对派工作组不置可否地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支持刘邓的意见,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也一。’陶铸到中央工作,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表态,就站错了队。但这次毛泽东、江青没怪他,因为没向他交底。

到八月中共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他那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与刘少奇、邓小平摊牌。会议期间,毛泽东主持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组织批刘、批邓。这次江青找陶铸谈话交底,要求陶铸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打头阵,立头功,向刘邓开炮。陶铸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到了会上沉默不语。结果谢富治打的头炮,立了头功。但陶铸作为常

务书记主持会议秘书处，竟没有批准在会议简报中刊登谢富治的发言。这使毛泽东和江青很感失望。

陶铸也想拍江青的‘马屁’，平衡一下关系，不料拍在了马腿上。陶铸向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均无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这个意见如果在五十年代提出，江青会很高兴的，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此时江青当女皇的野心已经萌发。她的中央文革小组要代替书记处，代替政治局，给个副部长的官等于限制她大展宏图。所以，江青不仅不领情，而且气得要命，找到陶铸说：‘你们碰到鬼了！’

这年国庆节，新华社要发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陶铸审稿时发现没有刘、邓的照片。他认为刘少奇尽管下降到第八位，但还是政治局常委，还是国家主席。就令新华社补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又在一组领导人照片上作技术处理，加上了邓小平，因为邓还是中共总书记，陶铸认为，对人民群众，对外国人，还是要是显示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这和毛泽东要公开和刘少奇的矛盾，把刘邓作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群众打倒的所谓‘战略部署’是南辕北辙的。

陶铸公开和江青闹翻是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主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瞪着陶铸以皇后的威风把一个政治局常委、党内第四号人物当作大太监一样的训斥：‘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有历史问题，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

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这一条原则,只有康生跟得上。北京大学聂元梓写了第一张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后,调查组向康生汇报聂元梓政治上、作风上都有问题,康生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陶铸这位正人君子哪懂这个,坚持认为吴傅启是国民党员,不能支持这样的‘左派’。不料江青冷冷地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再也忍耐不住了,反驳江青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革命军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傅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江青自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以来,没有人敢这样顶撞她,她认为假如败在陶铸手下,还怎么向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发号施令?!立逼陶铸必须立即去学部宣布吴傅启是左派。陶铸勃然大怒,霍地站起来说:‘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于是江青大哭大闹,说她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江青决心倒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会上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按照中央常委各单的排列,陈伯达前面是陶铸,康生前面是邓小平,略去这两个人不提,意味着将陶铸置于邓小平那样的地位,不属‘亲密战友’,是可以‘炮轰’,可以打倒的。瞪着眼睛观察上层动态急于立新功的造反派们,一读《人民日报》上登的江青谈话立刻就懂得了。

偏在这时候，陶铸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允许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目前主要是治病。王任重也是江青要笼络的地方大员之一。怎奈王任重封疆大吏当惯了，在江青面前怎么也低不下头来，硬是不入这个后党。所以江青指责王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其他人商量。’王任重心情不舒畅，肝病又发作，天天低烧，到十月份就去广州养病了。不料毛泽东在陶铸的报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于是王任重抱病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这个‘联席会。’

‘联席会’出周恩来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员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政治局委员们沉默着，只听中央文革的人激昂慷慨，充满了少壮的气概。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张春桥、姚文元为中锋，江青、陈伯达、康生作总结性发言。先是批王任重，后来谈锋一转成了批陶铸的会了。说陶铸支持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刘邓反革命路线的代理人……。政治局委员就两个人发言。李先念说：‘陶铸同志工作方式方法上跟不上形势。’李富春说：‘我看让老陶也回中南算了。’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进会议室，毛泽东就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着又对众人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又转头批评江青：‘江青太任性，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

的。’

十二月三十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下通令要见陶铸。陶铸马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耐心做工作，他提了三条：一是不要摘录音，会后双方商量搞一个会谈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同志参加（他是被造反派从广州揪来的）；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造反派有意寻衅，一头头说：‘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要老实问答。’陶铸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造反派受了关锋、林杰的支持，哪里肯罢休，竟‘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大怒，说：‘我以个人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于是双方谈崩，引起混乱，造反派上前要揪陶铸，警卫人员当然要保护陶铸这位还是常委的中央首长，警卫战士身上当然有枪，于是弥天大罪由此铸成：陶铸武力镇压革命群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下午一点四十分至二时四十五分，江青、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陈伯达唱主角，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当晚九时,住在中南海十字廊的陶铸夫人曾志听到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广播车一遍又一遍重复陈伯达的讲话。陶铸,这位中共第四号人物,就这样被揪出来了。

一月七日凌晨一点钟,‘批判陶铸联络站’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周对陶铸问题表态。周恩来郑重表示:‘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

是真保陶铸还是假保陶铸,问题尖锐地提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若真保,就支持周恩来的讲话,若假保就支持陈伯达的讲话。形势逼着他非表态不可。一月八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陶铸被打倒之后,宣传由谁接替问题。出席者有江青、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人民日报》总编)、胡痴(《解放军报》总编)。毛泽东指定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毛泽东十天前保了陶铸,如今又承认打倒陶铸这个既成事实,他怎么解释呢?他说: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自己揭穿了自己。十天前的常委扩大会上,他对解决陶铸问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周恩来主持的‘联席会’上,只文革小组的人猛攻陶铸,政治局的人多数不发言,发言的两个还是袒护陶铸的。这种情况说明,要开政治局会议停陶铸

的职,是不会得到多数支持的。江青后党,除陈伯达、康生外,少壮派多数人还不是中央委员,离进政治局还远,他们在政治局暂时还不能掌握多数。所以毛泽东言不由衷地保了陶铸,要江青另出奇招,撩倒陶铸。一旦撩倒,他马上承认。

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本来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毛泽东在这个领域确有伟大的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都被扭曲了。许多违反党纪,违反国法,甚至于伤无害理、祸国殃民的事情都是假手于‘群众’的名义干出来的。毛泽东假手红卫兵小将,打倒了第四号人物陶铸,解决了他‘没有解决得了’的问题。当然,这些‘红卫兵’背后是林杰(《红旗》杂志编辑),林杰背后是关锋,关锋背后是江青,江青背后是毛泽东。

提陶铸是为了‘压住’邓小平;陶铸有自己的是非观,不参加后党,不‘压’邓小平,陶铸又被江青抛弃了。

陶铸被打倒后,蒙垢忍辱,在十字廊过了两年多的囚禁生活,对他政治上、生活上的折磨和迫害步步升级。一九六八年底,他患了胰腺癌。一九六九年三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和直接干预下,请上海第一医学院董芳宗主任主刀,三〇一医院陆准善主任做第一助手,为陶铸切除了发生癌变的胆囊和十二指肠。在他以重病之身最需要照顾和治疗的时候,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早晨七点钟,中南海‘大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找曾志谈话说:‘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第二天,中直机关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又来雪上加霜,他来到病榻之侧告诉陶铸:‘正在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

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以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作出说明。’

陶铸拒绝妻子曾志陪同他去合肥囚禁终生，希望她活下来，能有个自由之身，争取与独生女儿生活在一起。生离死别之际，有诗一首相赠。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诘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离京，十一月三十日在合肥去世，只活了四十三天。

115 冒死谏言 谭震林大骂武则天 朕即文革 毛泽东图穷匕首见

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因患肺癌逝世。由陈丕显接任市委书记，曹荻秋接任上海市长兼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市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在王洪文的领导下，根据毛泽东一月二日的指示，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权，发布《第一号通令》说：‘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把曹荻秋绑在消防车云梯上游街示众。陪同游行的还有一大批市委、市政府的‘当权派’以及著名的学者、教授、戏曲、电影演员，有的高帽子长达三尺，演员一律穿上戏装，作家们捧着自己的‘黑书’，这一幕历史丑剧，被称为‘一月革命。’

据张春桥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主席批准夺旧市委、旧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赞扬了上海的夺权。一月二十二日《人

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有这样精彩的段落：

一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群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之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上海夺权的样板一树立，《人民日报》社论一号召，全国大乱。何谓‘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从横的方面说，包括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共产党掌权的地方（台湾和港澳不是共产党掌权，不能夺，也夺不了）；从纵的方面说，要‘炮打九级司令部’，这是湖南造反派提出来的，九级者，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之谓也，即各级的权都要夺，除毛泽东继续当最高领袖外，整个的改朝换代。

一月十四日，山西夺权。

一月二十二日，广东夺权。

一月二十五日，贵州夺权。

一月二十六日，江苏、安徽夺权。

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夺权。

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夺权。

二月三日，山东夺权。

……

昨天还是平头百姓、基层干部，一旦夺了权就能当省市级领导人，就有专车，就有花园洋房，这太有诱惑力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以疯狂的一热情投入了夺权斗争。但这派要夺，那派也要夺，夺权反夺权，一颗市府大印几易其手，于是为夺权展开了全面内战，开始是木棍铁棒，后来动用了自动步枪、手榴弹以至大炮。

毛泽东是不是疯了？这样自毁江山，他到底为什么？他没有疯。他心目中的目标就是要整个的打掉七千人大会上那一批人，以及那一批人的各级同僚。给他们安上‘走资派’的罪名，统统打倒。他要把饿死两千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这样一笔历史债转嫁到他们身上，转嫁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走资派’身上。是他们歪曲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事情搞糟了。如今毛泽东要直接领导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革命造反派’，打倒各级‘走资派’，把人民群众从‘资本主义复辟’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于是毛泽东更加英明，更加伟大，他还是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毛泽东发动从上而下大夺权的背景。

在全国全面夺权造反风中，军队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省军区以及介入了当地文化大革命的野战军，无不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央文革唆使军事院校的学生要求开十万人大会，批判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在怀仁堂开碰头会。周恩来坐在中间主持会议，右边坐着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和谷牧，左边坐着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反文革派和文革派，或者说，以周恩来为首的重臣老师 and 以江青为首的后党，两军对垒，摆开了

阵势。

江青伙同陈伯达打倒了陶铸，虽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但毛泽东又觉得中央文革组长权力太大了，这样下去他有大权旁落之虞。二月十日，开了一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毛泽东在会上发火了，他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他又转过头来批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了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纪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消除这件事的后果本来很简单：让陶铸复职就完了。但这样做，中央文革必然威信扫地，他还要通用这个机构做很多事情；况且从根本上说他也是同意打倒陶铸的，他怎么能够容许提上一个新人来加强‘资产阶级司令部’呢？！所以，对陈伯达和江青只限于批评一下，并要求中央文革内部开会，陈伯达、江青要作检讨。陈伯达受了毛泽东的批评，感到事态严露，萌生了自杀的念头，被王力劝住了。江青也宣布病了。这次怀仁堂交锋，是在后党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老帅和副总理们气比较壮。

陈伯达坐定后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规定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

叶剑英一听军委的事中央文革也要管，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

么？’

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元帅拍了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说刘志坚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通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

叶剑英质问张春桥，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又嘲弄了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嘛？’

中央文革的人不回答问题，张春桥等刷刷地作记录。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点，碰头会继续举行。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怀仁堂门口相遇。

谭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嘛？’（陈丕显是华东局书记，毛泽东、周恩来关照把陈丕显接来北京，保护起来）

张答：‘群众不答应啊。’

进到会议室，谭震林接着刚才的话茬，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他坐在沙发上继续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就是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谭震林指示担任海上捕捞的渔轮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只能轮流回港学习。陈伯达说这是生产压了革命，逼谭震林作检讨。谭震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我就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谭震林站起来，挟起皮包要走，他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说：‘不要走，你回来。’

陈毅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折回，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好，我哪也不走。’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正被计委造反派‘勒令’检讨，气愤之下也拍了桌子：‘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

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注:联动全名‘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北京八一中学为首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因为干部子弟较多,主张保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江青指使蒯大富等组织一万多大学红卫兵,砸了八一中学,抓了許多人。)

聂荣臻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

谢富治又插话:‘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一听不耐烦,马上顶了回去:‘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

怀仁堂会议,由于江青没有出席,后党占了下风头。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回到钓鱼台,三人对笔记,由王力执笔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会议记录,就到十一楼找江青汇报。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次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电话是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话说:‘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他们。’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都去了。谈了大约两个小时。

谭震林这次担当了与后党斗争的主将，回到家中他余怒未息，提笔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信。

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注：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的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在信上批了这样几句：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坠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此致敬礼

林彪十九日

林彪很聪明，他通过江青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叫江

青知道有人骂她‘武则天’了。

毛泽东见谭信倒很冷静,批示:

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当信转了一圈退回的时候,林彪见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勃然大怒,将毛泽东的批示撕成碎块,抛墙角的痰盂里了。秘书见状大惊,心想如再找这封信自己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趁林不在的时候,又把信的碎片捞起晾干,拼凑修补复原,交到了中央档案馆。

倘是别人写这样一封信,肯定过不了关。毛泽东独对谭震林谅解,一方面固然是从井冈山起追随多年;更重要的原因是谭是‘三面红旗’的拥护者,大跃进中农业上搞虚夸、放卫星、高指标、共产风,‘谭老板’跟得很紧。到了庐山会议,他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发言中主动承担责任,替毛掩护。他是这样说的:‘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作过的检讨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当的,我毫不推托这个责任。这一条,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左”倾错误,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其次,去年农村工作确实有一个大错误,就是估产偏高,又没有抓好过日子问题,相反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个错误我应该负责任,要批判,要处分,应该由我承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打击对‘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干部。如果谭震林这样的干部多起来,对于毛泽东改写三年大跃进的历史是有帮助的。全国各级干部,从刘少奇到公社书记,都要实事求是,跟他分责任,多一点不愿承担,是为了这个才下决心把他们打倒的。对谭震林格外开恩,其奥秘在此。尽管江青气得咬断银牙,鼓动农业大学的造反派要‘油炸谭震林!’毛泽东说声‘保’,还是把谭震林保下来了。

陈毅十六日那天下午离开怀仁堂,又于晚上九点在外交部会议室接见了归国留学生代表,他激昂慷慨,一气讲了七个钟头。他说: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现在把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人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子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嘛!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二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拂晓,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者名单是他亲自定的。他们是: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没让陈伯达、江青等中

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毛泽东天威震怒,他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让刘邓上台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泽东虽然气壮如虎,但底气毕竟不足了。他知道他已与全党处于对立地位,在政治局,能说得出口跟他走的,只有林彪一人了。他与全党作战,只靠林彪这一把刀子了。毛泽东发完脾气,周恩来出来转圈。主动承担责任,说怀仁堂风波是由于自己没掌握好会议,并建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毛泽东同意了,要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从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了七次会,由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检讨,江青率领中央文革的人围攻批斗。与上层的会议相配合,北京市贴满了‘打退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标语、大字报;声讨‘四帅三副’的游行示威,每天不断。三月十四日,中央文革组织了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喊出

‘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

批判‘二月逆流’使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七位政治局委员处于‘半打倒’的状态，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是‘半打倒’状态，刘伯承沉疴在身，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再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从三月份起，‘中央文革碰头会’代替了中央政治局，这个‘碰头会’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主持，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军机处’。

因王力和谢富治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酿成两派群众组织全市性大武斗。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进行武装游行，扣留了王力和谢富治；王力并挨了打。这就是所谓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周恩来亲自到武汉处理，并安排飞机把在东湖休息的毛泽东安全转移到上海。王力、谢富治于七月二十二日回到北京。王力挨了打，等于打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组织几万人到西郊机场隆重欢迎。周恩来的专机比王、谢专机晚到半小时，江青下令王、谢专机北京上空盘旋，等总理专机降落后，造成一个周恩来亲到机场迎接王力的既成事实，再让王、谢专机降落。当王力腿上缠着绷带一瘸一拐走出机舱时，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当天晚上，林彪召集会议，听取王力、谢富治的汇报，将‘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二十五日中央文革组织号称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大会声讨武汉‘百万雄师’，诬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搞‘反革命暴乱’。陈再道是第四方面军的蒋介石徐向前的老部下。据此推论，说徐向前是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四方面军保存下来的老骨干多，出的高级将领多，分布在各大军区和各军担任重要职务。林彪抓住

‘七·二〇’事件大作文章,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是要清除异己,为他全面控制军队扫清道路。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撤销钟汉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将领曾思玉和刘丰。毛泽东看穿了林彪的阴谋,在北京高呼‘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打倒陈再道的‘黑后台’时,七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的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武汉军区党委复电,称陈再道为‘同志’,保了陈再道。这年‘八一’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让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参加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元帅都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这样一来,追‘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也追不下去了。

一九六七年以来,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斗倒了第四号人物陶铸,接着又斗倒了七个政治局委员,使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正在志得意满。北京街头的大字报透露了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打倒‘彭、罗、陆、杨’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打倒刘、邓、陶,反击‘二月逆流’是文革的第二个战役;第三个战役是以武汉‘七·二〇’事件为突破口,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

第三战役的头一炮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在六、七月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多次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该是‘八一’南昌起义,应该是‘九·九’秋收暴动。以突出毛泽东的‘伟大统帅’地位,否定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对创建人民军队的贡献。毛泽东如同意此议,就意味着

和周恩来、朱德彻底决裂，他既已同刘少奇、邓小平彻底决裂，又同周恩来、朱德彻底决裂，这个政治风险太大了。毛泽东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今见社论的新提法，脸顿时拉长了，‘原来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军队呀？’再往下看，落脚到‘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这样一揪，意味着军队分裂，搞得不好真的打起内战来。他濡笔挥毫，在《红旗》社论上写了‘大毒草’三个字，又批：‘还我长城’。毛泽东把军队比作长城，揪‘军内一小撮’意味着毁掉这个长城。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王力被毛泽东当面封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后，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处在昏昏然的状态。八月七日他窜到外语学院代表中央文革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夺陈毅的权。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就被夺了权，被红卫兵押着到王府井卖《批陈战报》，外国记者纷纷拍照，消息传到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八月二十二日外事口各路造反英雄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周恩来忧心如焚。派杨成武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带去了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毛泽东考虑两天，把杨成武找去说：‘我考虑好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杨成武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话。临回京前，杨成武去辞行，毛泽东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杨成武记了，又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回到北京，按毛泽东的交待报告总理，由周恩来通知中央文革小组，于是，钓鱼台陷入一片惊恐之中。

江青找到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传达，你回趟上海，要摸

摸主席的底。’

风风火火,姚文元从上海赶回来告诉江青:‘主席说,这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三时,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中央文革内部生活会。周恩来被请来参加,坐在会议主席位置上,陈伯达和康生左右相陪。江青主持会议,由王力、关锋检讨,大家作批判发言。最后江青宣布:‘根据主席批示,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给了江青面子,事情办得漂亮。

毛泽东居中操纵,左右开弓,先打了‘二月逆流’,又打了‘中央文革’,是为了保证实现他的主要目标:彻底打倒刘少奇。

对于林彪,毛泽东开始有了警惕,他不许林彪彻底打倒徐、陈、叶、聂各帅,不许掀‘军内一小撮’,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没有彻底摧毁,打倒‘九级司令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还要借重林彪的支持,所以对林制约的同时又有所让步。他批准林彪成立军委看守小组的建议。军委看守组于八月十七日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组成,吴法宪为组长。军委看守小组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处理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徐向前、陈毅、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诸帅不再过问军务。

116 制造伪证 看后党天良丧尽 元首屈死 叹法制荡然无存

经过一系列的周密的铺垫和准备？毛泽东与刘少奇正式摊牌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

八月五日这天，毛泽东在书房里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是用铅笔写在这年六月二日一张《北京日报》的边角上。这张报纸止载有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毛泽东显然是从这张报纸上得到了某种启示，写出了他的一张大字报。最后写上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秘书徐业夫在两张信纸上用毛笔抄正。毛泽东翻来复去地看。整整思考了两天，改动了几个字，加上标题，于八月七日晨三时批给大会秘书处。

当天，这张不是大字报的‘大字报’，由大会秘书处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参加者。八月十七日，又作为红头中央文件，印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

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这篇讨刘檄文,指出了刘少奇的三大‘罪行’:第一,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第二,一九六二二年的‘右倾’;第三,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

占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十分之九篇幅的第一桩‘罪行’。根本就不能成立。派工作组(队)是中共历史上,多年常用的工作方法,土改中不都是工作组(队)去领导吗,怎么那时候是革命路线,这时候就成了反动路线呢?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一个派往(人民日报)社的陈伯达工作组,是毛泽东派的,怎么毛泽东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刘少奇派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叫以势压人,不讲道理。笔者也曾在某大学当工作队,学生、职工都造了反,原来的各级领导都不管事了,工作队进去就是建立起码的生活、工作、学习秩序。首先是生活秩序,食堂开不出饭来抓食堂,厕所不通了去掏厕所,扫院子,看大门,全是为学生服务,哪里有什么‘白色恐怖’,学生们听了工作队的话,不胡作非为了,就说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给打下去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关键是第二桩‘罪行’,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这一句是重点,其它都是陪衬,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七千人大会上发生的一切。

第三桩‘罪行’,一九六四年‘形在实右’,发明权归毛泽东,是他一而再地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紧跟也说过类似的话。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当然也不对,但她只是要证实‘伟大领袖’的一个观点,说桃园大队的领导权就

不在‘我们’手里。

凭这么三件事就能打倒一个国家主席吗？毛泽东也知道份量不够，所以后来又江青在‘叛徒、内奸、工贼’问题上制造伪证，大作文章。

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接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有一篇讲话。第一个问题是所谓一线、二线问题，别有深意。值得一评。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一九四九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十七年来，她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两千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家庭家破人亡，就是要

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天下,以谢国人。从今以后,毛泽东又亲临第一线,他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重新干起。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刘少奇看清楚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冲他而来。刘少奇住在中南海一个普通的院子里,这个院子清朝时候叫福禄居,是两进院。前院正房是刘少奇的办公室,秘书和公勤人员在前院两侧厢房办公和居住。后院是刘少奇全家居住的地方。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派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来接刘少奇去谈话。共和国主席的专车——苏制吉斯牌防弹高级轿车已被封存了。刘少奇随秘书来到人民大会堂。这是刘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关切的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回答:‘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平平是刘少奇二女,王光美所生。一月六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受江青操纵冒充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腿被车轧断要截肢,需请家长签字。刘少奇、王光美闻讯赶去,才知是个骗局,红卫兵将王光美劫持到清华园批斗,并出小报宣传‘智擒王光美’。毛刘开始谈的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刘少奇向毛郑重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吸着烟，呆了一会儿才说：‘认真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器人》值得一读。’临别，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从刘少奇以后的遭遇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次见刘少奇多么样的伪善。

一月十六日子夜十二点过后，周恩来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王光美很激动，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这个电话，看来被窃听了。第二天，中南海造反派奉命来拆电话。刘少奇抗议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造反派回去请示汪东兴，又过了一天，还是撤了。

对刘少奇、王光美的批斗也愈来愈升级。四月十日，在江青的精心导演下，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资派’拉去陪斗。这天早晨六点，清华大学红卫兵开着车到中南海揪人。中南海的森严的警卫制度，分区管理的通行证制度，如无内线密切配合，莫说揪国家元首的夫人，连大门也进不去。清华红卫兵神通广大，直奔刘少奇住的院子，把王光美揪走了。她被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强迫她穿上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时穿过的旗袍和高跟鞋，并用乒乓球串连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项链给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斗会会场。这一幕丑剧完全是江青导演的。一九六三年四、五月，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几国，重点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与夫人隆重接待中国元首。雅加达繁华的街道上并排悬挂刘少奇和王光美巨幅画像，中外报纸、电视、记录片，都作了突出的报道。王光美雍容华贵、

落落大方出现在各种宴会、酒会和晚会上,把个江青气得妒火三千丈。出国前江青曾劝告王光美,要穿黑丝绒旗袍,不要带项链,这会显得独具一格。但在缅甸访问时,奈温将军的夫人赠给王光美一条项链,王光美就佩戴上了。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她心想:中国的第一夫人应该是我!毛主席把国家主席让给 T 刘少奇,你就敢对我大不敬,走着瞧!这就是乒乓球项链的由来。这次批斗会闹腾了一天,中间还在堵住零晨六点、下午一点、下午五点四十分穿插了三次审问。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批斗会场面的照片和《三审王光美》的记录,都上了红卫兵小报,成为轰动中外的新闻。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了。

毛泽东对这种有失国家体面的事情没有一句微词。于是,造反派得寸进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六月三十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等十几个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架起帐篷,安营扎寨,宣告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到七月初,中南海西门、北门直至故宫北护城河沿岸,连营结寨十几里,树起了七百多面旗帜,代表七百多个造反派,除北京的以外,据说还有黑龙江、辽宁、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安徽、新疆等省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歌声、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广播声,昼夜不断,沸沸扬扬,像开了锅一样。七月四日凌晨三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来到‘揪刘火线’,钻进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红卫兵的帐篷,声称‘代表中央文革向你们表示支持和慰问!向小将们学习!向小将们致敬!’

七月四日晚,汪东兴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到少奇,向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书面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立即遵行。五天以后,即七月九日他交出认真写出

的检查。他在检查中说：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都去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经过研究后，到建工学院去的。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大会。

八月三日晚，我分别向“八一团”、“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在去年的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所以，我的几次讲话，都没有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

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的革命师生表示赔礼道歉！

在揪斗刘少奇的前夜，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巡游去了。

两天以后，即七月十五日，红卫兵给国家主席一道《勒令》，这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文，有实录下来千古流传的价值。《勒令》文曰：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仗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作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是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像你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二十五日零点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

不得有误！！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新八一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代表作。

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刚开，江青就向中南海的造反派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揪斗刘少奇？一点造反精神也没有？怕什么，等什么，还看不出来吗？斗！现在正是时候！’

中南海的造反派，是一支真正御用的造反派。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研究了批斗方案，于十四日上书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他们于七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批判刘少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的行动计划。十五日，报

告送到了戚本禹手中，戚本禹批了一句：‘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转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陈伯达在报告的标题上勾掉了‘少奇’二字，加上了‘邓陶夫妇’四字，批斗会就变成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江青和康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陈伯达时，把当时的报告和批文都摆出来，经过笔迹鉴定，陈伯达供认不讳。于是法庭认定：‘被告人陈伯达被指控伙同江青、康生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对‘四人帮’的审判是‘大快人心事’，人民是高兴的，拥护的。审江青，实际上是审毛泽东，对这一点人民心里也是清楚的。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当时审判的基调是‘奸党祸国，皇上英明’，要保护毛泽东的所谓‘威信’。实际上，没有毛泽东这个后台的支持，就陈伯达来说，借给他点胆子，他也不敢动刘少奇。一九六四年是他坚决主张印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当时他对王光美的尊敬并不小于对江青的尊敬。那个康生，一九六二年毛遂自荐主持编辑《刘少奇选集》，如今也成了天生的反刘英雄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这天，中南海的批斗会分为三处，乱烘烘、闹嚷嚷，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所住的院子里进行。

就在这一天，江青直接掌握的刘少奇专案组，派人去沈阳，查阅伪满时期档案。一九二七年作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在沈阳被捕过。根据江青的密令，组织四百人，历时两个月，查了十六个档案馆，也没有发现刘少奇叛变的材料。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住在武汉东湖宾馆，中办主任汪东兴接到了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说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了刘少奇。毛泽东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

不搞面对面。’让汪东兴把这话传给在京主持工作的林彪。林彪和江青是知道毛泽东处置刘少奇的腹案的。自然知道毛泽东这个温和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离开北京，就是要造反派放开手脚。

八月五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在天安门组织了百万人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又分别在各家院内批斗刘、邓、陶。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亲临现场组织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这一场批斗会下来，把刘少奇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丢了，他穿着袜子被押回办公室。他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国家。’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最小的女儿潇潇（六岁）交给阿姨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主席办公室，成了囚禁他的牢房。他老是站在后窗前睁大眼睛盯着后院，侧耳细听，想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从那天起，他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又过了几天，来了两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诸君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并没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在被转移到开封之前，一直住在这里，他没有进秦城监狱，但比进入秦城监狱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们

还要悲惨。

毛泽东还顾及到宪法和法律的。你们看：我并没有下令逮捕刘少奇把他关入监狱，也没有派人暗杀他，更没有下令处决他。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呆在他的主席办公室里。至于群众不拥护他，要造他的反。那是自发的群众运动，怪得谁人？！如果彻底追究共和国主席受迫害致死的案子，你还真抓不住毛泽东什么把柄，很难定他的罪哩！然而，道德的法庭他是逃不脱的。刘少奇专案是在江青的一手控制之下，刘少奇的人身自由是在汪东兴的一手控制之下，这两个人是毛泽东的两只手，谁都知道刘少奇的命运是掌握在毛泽东的手掌之中。

迫害在步步加紧。一日，江青的爪牙迟群代表中央文革来给昔日保卫共和国主席的警卫队训话，明确告诉他们：‘现在，你们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要肃清流毒，划清界限。’

刘少奇这年六十九岁了。几次揪斗身心受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臂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已不能自由运转，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堂吃饭，短短三十米距离，他拖着伤腿一步一步蹭，要走五十分钟，看守的战士们被告知谁要上去搀扶一把就是失掉阶级立场。后来他根本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了，改由看守人员打饭，打饭的战士被称为‘保皇兵’，因此谁也不愿于这个差使，后来就打一次饭，让他吃几顿，馊霉变质不管。刘少奇只有七颗牙齿，这样的伙食，使他常拉肚子，又不能洗换衣服，室内秽臭难闻。

就这样还要每天接受批斗，室内贴满了打倒他、辱骂他的各种标语，他的名字被写成‘刘少狗’，打上红叉。他气愤满腔，但又不能发泄；他需要休息，又不得安眠。他有病要看，但每次看

病之前医务人员要先开批斗会，跟他划清界限，用听诊器抽打他。逐渐地，他神志恍惚，精神崩溃了。

看看那些押战犯的监狱吧。沈醉先生写了一本《战犯改造所见闻》，盛赞在共产党监狱里所受的人道侮辱。他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些是由军队看管，所以各个地方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十六元一月的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带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当时四川物价低，十六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当然，这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政策。毛泽东可以宽容和共产党打了一辈子死仗的杜聿明、王耀武等，却一定要将替自己打下江山的彭德怀、贺龙等置于死地。

毛泽东还泽及废帝溥仪。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对章士钊说：‘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边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多元薪水，怕是太少吧。我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钊传达给溥仪，溥仪感激涕零。

毛泽东这个人真是千面佛，令人难以认识，难以理解。刘少奇的罪怎么也超过溥仪吧！末代皇帝溥仪，被推翻了，后又在日本扶持下正儿八经地复辟帝制再做皇帝，卖国求荣。刘少奇主席，照毛泽东给定的罪名，至多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吧，而

且还没有复辟,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宽容呢?!你做过溥仪的民不能忘,你正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拥戴下成为中共领袖的,难道就忘了吗?吗?

要解开毛泽东处世哲学中这个似乎不可解释的矛盾,只须吃透他一句话:‘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对溥仪和战犯们他能够宽容,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反对他反对错了,他是胜利者;延安时期,他也能团结张闻天、秦邦宪等党内同志,历史也已证明这些人反对他反对错了。但历史、实践如果证明谁反对他反对对了,他一定要将这个人弄死,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属于这种情况(贺龙是另一种情况)。换句话说,毛泽东手里有真理的时候,是能够容人的,是能够团结反对派的:他一旦输了理,发现自己错了,对反对派绝不容情。刘、彭对他的‘三面红旗’提出质疑,提出要重新估价。毛泽东本人也知道这一套政策祸国殃民,后果极端严重,确实错了。但认错就得下台,与其我下台,不如叫你们下台,不仅要你们下台,而且要置你们于死地,以免我死后翻这个案。《三国演义》上有个田丰,袁绍的谋臣。袁绍在官渡与曹操决战,别驾田丰上书袁绍:‘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袁绍不听,将田丰下狱治罪。后果大败。狱吏来见田丰:‘与别驾贺喜。’丰问何喜?狱吏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田丰说:‘吾今死矣。’狱吏问何故,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狱吏未信。忽使者赍剑至,传袁绍命,欲取田丰之首,狱吏方惊。’毛泽东‘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这一点很像袁绍。

与中南海汪东兴管辖区内对刘少奇的迫害相配合,那边厢

江青为彻底打倒刘少奇正在制造着伪证。

根据康生的高见,王光美与刘少奇是一案。只要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刘少奇就是内奸。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王光美当过军调部共产党代表的英文翻译。突破口就选在这了。谁介绍王光美进的军调部呢,中共地下党的崔月犁。文化大革命初期崔月犁是北京市副市长。于是,祸从天降,崔月犁被关起来了。对他的审问是这样开始的:

问:‘你知不知道美国在北京的特务机关所在地?’

答:‘不知道’

问:‘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

答:‘我也不知道。’

问:‘你数数字,从一数起。数!’

答:‘一、二、三、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

叭!一个嘴巴,把崔月犁打了个趔趄。

崔莫明其妙,问:‘为什么打人?’

答:‘你还装糊涂!东四六条三十八号,你不知道怎么能说三十八?你早知道三十八号,为什么不说不!’然后又拿出一张照片,叫崔月犁辨识。崔说:‘不认识。’‘会背《百家姓》吗?背!’崔月犁像个启蒙童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

审问者又开打。把刚才那张像片翻过来。叫崔月犁念写在背面的名字。崔念:‘杨承祚。’审问者:‘你知道是杨承祚为什么不早说?’杨承祚,解放前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承祚夫妇有亲属在美国,就变成了美国特务,被投入监狱。要杨承祚承认是他发展王光美成了美国情报局的‘战略特务’,但这

还需要旁证,关键是要张重一证明老朋友杨承柞夫妇是特务。

那年张重一六十七岁,患着肝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专案组给江青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的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迫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审讯录音带有八十多盘。最精彩的是最后的对话。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答:‘我……有这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答:‘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这是江青领导的刘少奇专案组制造伪证的一个断面,掐头去尾地运用这些口供,内幕之黑暗超过‘军统’。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应出席中央委员八十七人,候补中央委员九十八人,因多数被打倒了实到中委四十人,候补中委十九人,不足法定半数,所以来个‘扩大’,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委自治区革委员会负责人、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七十四人列席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

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毛泽东和江青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他们是胜利者，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是铁案难移。

刘少奇并没有及时听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直至二十四天以后，即十一月二十四日，刘少奇七十岁寿辰这一天，江青安排专案组人员，给他播放《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录音。刘少奇听完，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 260/130，体温升高到四十度。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摩顶放踵的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人，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自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后，竟然是这样一个离奇、荒谬和悲惨的结局。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七点，奄奄一息的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针，用一条棉被裹身，被抬上了担架，由专案人员监督着，让共和国主席的卫士长李太和和护士护送，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秘密送往开封一座有电网高墙的特别监狱。十一月八日，专案组下令，北京陪送的

人立即撤回。李太和十一月回到中南海，给领导自己多年的老首长、中央办公庭主任汪东兴挂了个电话，要求汇报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你先休息一天。但深夜两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老李叫醒，他拿起听筒。是熟悉的老首长的声音：‘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回去。’刘少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点四十五分去世的。李太和卫士长赶到时，停尸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被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扭曲变形，口角流出一片淤血……。他保卫了多年的共和国主席，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白地死了。他带来一把剪子，给死者剪去一尺多长的白发，剪短了胡须，穿上衣服和鞋子。专案人员照了像，以便向江青和毛泽东交代。深夜十二点，连个临时的棺木也没有，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短身长，小腿伸露在外面，拉到了火葬场。一个排兵力警备森严，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姓名是：刘卫黄，无业。办完以后，专案组宣布：谁也不许透露出去，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

直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月，刘少奇的子女们要求看望父母，毛泽东在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刘少奇的死讯才透露出来。

历史应该用浓墨重笔记下：毛泽东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非法囚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并将其迫害致死。

117 宣讲天才 老夫子庐山失宠 谋杀领袖 副统帅折戟沉沙

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早生嫌隙，只是在刘少奇还没有彻底打倒，‘九大’还没有召开之前，维持着一种表面一致的互相利用的反刘联盟。

这种嫌隙起源于‘四个伟大’。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着，以为是一般的颂词，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到了一九六七年五一节，《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用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毛泽东穿军服的照片，照片下面是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落款是‘林彪一九六七年五一节’。从此，林彪的题词如影随形，从政治宣传用的毛的标准像到各大机关、院校门前树起来的比真人还高大的毛泽东塑像，下面都有林彪题词。毛泽东有些警觉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南巡住在武汉东湖宾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侍在侧。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见各种报纸，中央的、地方的、红卫兵小报，今天的、昨天的、前天的，反覆出现‘四个伟大’的题词，翻着翻着，他抬起头，又像是自言自

语,又像是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在场的人,从杨成武以下直至卫士,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回话。本来,谁对的,报纸上印得明白,毛泽东心里也清楚,不需要谁告诉他。只听毛泽东又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这里针对连为一体的两句祝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也是当时报纸上每天必见的。

毛泽东站起身,目光炯炯,对在场的人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说罢要杨成武陪同他到外面散步。在修葺整齐的林荫道上,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回答。

‘他会反对我吗?’毛泽东又问。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杨成武回答得体。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这时候,林彪正在北京对中央文革推波助澜,要打倒陈再道,‘揪军内一小撮。’

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毛犯了全局性的、路线性的错误的时候撑住了他的地位保住了他的面子,对此毛泽东是满意的。但个人崇拜的进一步恶性发展,好像毛泽东的威信全靠林彪撑着,好像毛泽东的权威来自林彪的支持,甚至于,好像毛泽东的权力是林彪给‘封’的。这就犯了大忌。林彪对叶群说过:‘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得一人而得

天下’的奸雄策略，被毛泽东识破了。这就埋藏下了毛林分裂的危机。

毛泽东是无神论者，反对君权神授；但更反对君权人授。这一点他又很像拿破仑。一八〇四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为拿破仑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按照传统的仪式，应该由教皇庇护七世给拿破仑戴上皇冠，表示君权神授；而教皇是代表神的，比世俗的皇帝更高一个层次。当庇护七世举起皇冠的时候，拿破仑突然上前一把抓过皇冠自己戴上，然后他又抢过皇后的皇冠，给他的妻子约瑟芬扣在头上。这使所有的贵族、大臣、将军和官员们目瞪口呆。拿破仑此举是要向人们说明，他的王位是自己夺来的，不是任何人恩赐的。他不承认有比世俗皇帝更高的神权。毛泽东认为林彪给他封四个官，无异于企图扮演高于世俗皇帝的教皇角色，他的反感是出此而来。一九五五年实行军衔制时，拟议中要授给毛泽东大元帅军衔。毛泽东坚持，其奥秘也于此。真要接受大元帅军衔谁给他授呢？那时候毛泽东自己当国家主席，自己给自己授衔，这不像话；代表民意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授，委员长是刘少奇，毛泽东绝不愿意从刘少奇手里接过大元帅军衔。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话是这么说，又不能推举一个工人或一个农民来给伟大领袖授衔，所以他干脆不接受，他宁愿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扮演给朱德以下的十位元帅授衔的角色。‘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是法家帝王南面之术的核心思想。‘名’是什么？皇帝赐给臣下爵位、封号谓之‘名’；‘器’是什么？泛指帝位、权柄，具体代表是‘尚方宝剑’。受宠信的大臣，捧着这把剑，如皇帝亲到，可以便宜行事，处分一切人。这是皇帝兵权的象征。不经毛泽东同意，林彪封他四个

官,这是要夺他的‘名’;不经毛泽东同意,林彪要把陈再道打成反革命,这是要夺他的‘器’。这两件事,引起了毛泽东对林彪的高度警惕。因此志放,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军委看守小组,改名军委办事组,成员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由杨成武担任组长。这是对林彪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林彪不能容,半年以后,即一九六八年三月,他伙同江青制造‘杨、余、傅’事件,逼毛泽东同意,打倒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这三位将军被打倒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奉了毛泽东的‘密旨’,有些事情既不向林彪报告,也不向江青报告,只向周恩来报告。毛泽东不露声色,作了让步。林彪提名自己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战士,毛泽东同意了。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至二十七日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中共‘九大’预备会议。这时候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即是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夺了权,有一百二十八位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和各方面负责人出席会议,分配了代表名额,规定了代表条件。毛泽东亲自指示要陈毅等老革命家‘以右派代表的资格’出席会议。‘九大’前夕,陈毅接到上海市革委会的一封公函。上面写着:‘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急速退回。’杜秘书非常气愤,要给退回去。陈毅说:‘老杜,不要退,等我填好表再寄回去。’就这样,朱德以下的元帅们,李富春以下的副总理们,以‘右派’资格出席中共‘九大’。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主席台上,‘左“右”两派营垒分明。毛泽东、林彪居中,右首是

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左首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但林彪作政治报告时，声嘶力竭，老百姓看了电视，窃窃私议：林彪可能活不过选毛主席。林彪集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四月二十四日进行选举。选出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在这二百七十九人中，八届中委、候补中委继续当选的只有五十三人，占九届中委、候补中委总数的百分之十九，许多功勋卓著的领导人被淘汰了，大量造反派头头涌入中央委员会。选举后‘九大’闭幕。

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结果如下（毛林之外，以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讲：‘有些外圈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

党。事实上需要重建。’

江青的后党陈、康、江、张、姚，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都进了政治局，加上毛、林，共占十二席，在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中超过半数，本可以左右政治局的。但由于刘、邓为代表的中共正统势力已被打倒或打散，毛林的共同敌人没有了，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在‘九大’选举时，叶群布置军队组一些人不投江青的要，结果江青少得六票，闹着要追查；而张春桥控制的华东组，又安排一些人不投叶群、吴法宪等人的票，引起叶群、吴法宪等人的不满。陈伯达自上次受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闹着要自杀以后，就投入林彪幕府，作为后路。在‘九大’期间，黄永胜和陈伯达多次商量‘九大’以后还要不要中央文革的问题。林彪告诉陈伯达不要听江青的话。毛泽东又和林彪谈话，提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的问题，毛泽东提名张春桥，林彪唯唯，没有明朗表态，他心目中的接班人是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所以，‘九大’一结束，毛林之间新一轮斗争就开始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三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决议，并决定由康生、张春桥主持修改宪法。

四月十一日，在苏州休养的林彪一反‘不建言’的方针，他口授三条书面意见，由秘书于运深记录，并电话报告中央政治局。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党政治纲领’的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转述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的面明确表示：‘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林彪及其一伙积极鼓吹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是假，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是真。他们想用劝进的办法换毛泽东一句话：我不当，让林彪同志当吧。但毛泽东就是不说这句话，他已想好了，林彪的地位安排，‘九大’党章为止。这下叶群急坏了，她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七月中旬，毛泽东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上说：‘没有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明确表态。

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林彪的人不好再提设国家主席公然和毛泽东唱对台戏，改在三个副词问题上大作文章，迂回进攻。修改宪法，康生是原则抓总，具体条文的斟酌推敲落在了张春桥身上。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在宪法总纲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不要写上三个副词？原来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张春桥照抄了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定稿时，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给勾了，如今再写上，毛泽东不会同意；不写上，林彪那边不好交代。经过和康生反覆权衡，还是要听毛泽东的，就没写三

个副词。八月十三日在怀仁堂讨论宪法修改稿，吴法宪拍了桌子，说张春桥否认毛泽东是天才，‘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林彪得知，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十三日晚上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的和‘四个伟大’的语录。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场举行。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两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接下来应该是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林彪却抢先要讲话，这出乎毛泽东和周恩来意料之外，原本没有这个安排。林彪这次讲话，不像《五·一八》讲话那样锋利，那样思想连贯，那样高屋建瓴。这次讲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欲止又言，思想显得也不那么连贯。这是因为那次讲话是毛泽东授意，这次讲话是和毛泽东摊牌。因为事先没通气，底气不是那么足。这是一种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斗争方式。毛泽东勾掉了‘天才地……’三个副词，林彪则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泽东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则说：‘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林彪想说的是：毛泽东当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是宪法的灵魂，如没有这一条应该写上。林彪讲完，康生果然老辣，还按原来准备的稿子讲了毛泽东历次封修改宪法的意见和修改宪法的过程。毛泽东没有吭气，他在静观事态的发展，考虑对策。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各组讨论。

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

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难道这些话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李作鹏在中南组也都作了煽风点火的发言。

会议的发展方向被扭转了。这表现在八月二十四日大会秘书处印发的第六号简报上（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华北组组长是李雪峰，见林彪和陈伯达两位常委亮了旗帜，以为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领导全组紧跟。他们的简报是这么写的：‘大家听了伯达同志、雪峰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并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

江青一看要揪出张春桥，千刀万剐，急了。二十五日上午，她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芦林一号毛泽东的新别墅去见毛泽东，进屋就大喊：‘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组长参加）。没有多余的话，没有花絮和插曲，毛泽东严肃地宣布了三条：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会议又一个急转弯。毛泽东当然清楚发难挂帅的人物是林彪，但他稳住林彪，拿陈伯达开刀。一方面是因为陈伯达原是他的‘驯服工具’，如今他的船还没‘漏’，陈伯达改投新主，意味着林彪的‘行情’看涨，他要把这种颓势扳回来；另一方面，林彪在他的别墅架设六条电话专线，指挥着全国军队，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不能一下把林彪逼急了。为防不测，毛泽东把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召去谈话。据说一见面，毛泽东把手放在许世友手上，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注：意思是没有发烧，不是说胡话。）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当然，还说了别的，许世发将军回去不会传达。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继续保林打陈，表明毛泽东政治斗争手腕的高超。他说：

这个材料（注：指陈伯达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几条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

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要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人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这一番大议论,固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大道理。但我们要问毛泽东:您早干什么去了?林彪鼓吹天才论,谣言和诡辩横行,于今十年矣!这十年,毛泽东靠‘天才论’

的支持,靠谣言和诡辩,压服中共全党和全国人民。‘三面红旗’祸国殃民,饿死了两千万人,硬叫全国人民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该纠‘左’时他反右,否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造了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了所谓‘文艺黑线’、‘教育黑线’、‘体育黑线’,等等,罪在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毫无道理地打倒和整死了那么多忠心耿耿’的各级领导干部,那么多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什么罪?有什么错?所依据的是不是谣言?是不是诡辩?毛泽东知道,人们对林彪鼓吹的这一套早就厌倦了,不仅是厌倦,是一种厌恶的逆反心理。如今他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反对天才论,当然是得人心的,说出了大家想说不敢说的话。这样,毛泽东既从纵容天才论横行中得到了好处,又从批判天才论中得到了好处;既从个人崇拜中得到了好处,又从反个人崇拜中得到了好处,真所谓左右逢源,炉火纯青,搞政治搞到这个份儿上,手段当然是极高的,但他没有想到,既今是而昨非,人们必然要把过去十年的事翻过来。此是后话。

八月十六。二十七日,周恩来、康生连续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作检讨。吴法宪于二十八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萌发了武装政变的思想。

九月六,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宣布对陈伯达进行隔离审查。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这就把彻底否定‘亲密战友’林彪的想法捅到国际上去了。毛林彻底摊牌只是时间问题了。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今年二十五岁。被吴法宪任命为空军司

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和办公室副主任,虽然是个副师职干部,吴法宪把他作为林彪的代表,在空军宣布:‘立果同志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群众中流传打油诗一首:‘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在林立果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王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给自己的组织命名为‘联合舰队’,自己的代号是‘康曼德’(commander 即司令官的谐音),并建立了‘战斗小分队’,配发枪支,规定联络密语,进行突袭暗杀等特种训练。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在上海秘密据点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按:指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可能逐渐消弱。‘文人力量’(按:指张春桥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接班;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摘掉 B 一五二(给毛泽东起的代号),实行武装起义。结论是争取‘和平过渡’,做好发动军事政变的准备。为此在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由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为武装起义的谐音)。

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林立果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原南京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驻上海)政委王维国、七三五〇部队(驻杭州)政委陈励耘和南京空军副司令周建平秘密开会。这次会议确定了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周建

平为头，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毛泽东似乎察觉到了林彪集团要闹乱子的蛛丝马迹，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他又南巡了。他此行的目的是要顺说各路诸侯与林彪划清界限。八月十六日，他到达武汉，停留了十天，于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先后找刘丰（武汉军区政委）、王新（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谈话。他指名道姓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他说：‘我看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介绍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讲，几位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是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他还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毛泽东在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在长沙时，毛泽东当着各方负责人的面，点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一方面是叫丁、刘与黄永胜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是叫在座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与丁、刘划清界限。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南昌到了杭州。西子湖边有它常住的

刘庄、徐庄别墅，但他宁愿住在专车上，以策安全。他召见了林立果指定的杭州的，‘头’陈励耘，严厉质问：“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大惊失色，狼狈不堪。

这时，躲在北戴河海滨别墅的林彪和叶群，千方百计地刺探毛泽东的南行路线，在各地行止时间、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以便选择动手的时机。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毛泽东同丁盛、刘兴元等谈话内容整理成文，派他的老婆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到北京，交给了‘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于新野随即密报叶群，九月六日凌晨六时，陪外宾（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来武汉的李作鹏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密谈。当天返回北京，将刘丰密告毛泽东在湖北谈话的内容报告黄永胜，黄永胜用保密电话转报叶群。

九月七日，林彪指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八日晚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件，乘坐二五六号三叉戟专机，星夜飞回北京，让王飞将密件送给黄永胜。晚上十一点三十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向江腾蛟、李伟倍等传达林彪手令，研究行动计划。林立果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 B - 五二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 B - 五二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林立果命令江腾蛟：

‘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林立果又骂江腾蛟鼓劲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指林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油库，越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再一个方案是，在专列行经上海与苏州之间硕放桥时炸掉该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周宇驰规定：江腾蛟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与林立果约定：‘如果B-五二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但他色厉内荏，迟迟其行，却不到上海去。

在杭州笕桥专列上过夜的毛泽东，好像有第六感官似的，突然在午夜下令专列趁夜转移到绍兴。在林立果传达林彪手令，准备谋杀毛泽东的时候，他恰在此时令专列转移，这也许是巧合，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在林彪集团的内层有自己的情报。这个情报来源则有诸多说法。有人说是在武汉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向毛泽东透露的。也有说是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兼革委会主任程世清透露的。林办让江西制造了一辆水陆两用装甲车几天前拉走了，程世清把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九·一三’事件后，程世清被关押审查，喊冤叫屈说：‘别看你们关我，我还是有功的呢！’这些人反映一些林彪集团的政治动向是可能的；但何以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在北京一动，远在杭州的毛泽东便知，仍然是个谜。

九月十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又突然决定专列从绍兴返回杭州笕桥，给汪东兴交代，不要陈励耘等送行，风驰电掣，专列奔上海去了。

九月十日晚，毛泽东到上海，仍不下车，住在专列上。令汪

东兴打电话通知南京的许世友立即来上海。十一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与王洪文一起被引到专车上与毛泽东见面。王洪文这时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负有谋杀使命的王维国好像被识破了;不允许他接近火车。中午,毛泽东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一起去吃饭,王洪文特意把王维国也拉上吃饭去了。

九月十一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上海沿津浦路疾驰。经过南京时停了十五分钟,许世友在月台上保卫专列通过。

十一日晚上十点多钟,毛泽东的专列过了苏州。就在林立果派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在硕放桥组织第二次攻击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时候,毛泽东的专列安然从桥上通过。

兵贵神速。毛泽东成竹在胸。

‘主席,前面是蚌埠,停不停?’汪东兴问。

‘不停。’毛泽东果断回答。

‘济南快到了,停不停?’

‘不停。’

‘快到天津了,停不停?’

‘不停’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丰台。饱经忧患的毛泽东,头脑一点儿也没有衰老。在斗争中还是那样敏锐,机警,高人一筹。他安然回来了。因不摸北京虚实,毛泽东先不进北京。他在车上把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李是第二野战军刘邓的部下,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叫他参加军委办事组是为了‘掺沙子’)、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晗去。询问了北京情况,说:‘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傍晚,在最密的安全保卫措施下,他在北京站下车。

林立果闻讯大哭：‘首长（他称自己的父亲从来是叫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

在北戴河莲峰山九十六号别墅里，林彪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像个泥塑木雕。

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决定实行第二个方案，带上黄、吴、叶、李、邱五个政治局委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九月十二日上午，林立果与叶群通了电话，接受了林彪安排的南逃新任务。决定：十三日上午八时，林彪、叶群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黄、吴、李、邱早上七点到八点起飞，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保证他们安全撤退。

林立果和他姐姐林立衡（即林豆豆，《空军报》编辑）对于林彪的政治出路有一场争论。林立果说：‘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搞封建割据，到广州另立政府；下策是逃往苏联。’林立衡三条都不赞成，他提出：‘父亲能不能像朱老总那样，靠边站，什么也不管。’林立果说：‘像咱们老头子那身体，住三个月监狱就得死。’

林立衡很关注家里的动向。九月十二日下午三点，叶群让林立衡和男朋友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让父亲高兴一下。’林立衡顺从了。晚上八点在九十六号楼放映室放映香港电影《假少爷》和《甜甜蜜蜜》，把不值勤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吸引到那里去了。林立衡和未婚夫也在那里看。八点十分，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背着手枪，献给姐姐一束鲜花，作为祝福。然后，林立果就急忙到林彪房间去了。林立衡悄悄出来，找到林彪的贴身内勤小陈说：‘你快进去，无论如何要偷听到首长和老虎（林立果小名）谈话的内容。’小陈十分为难，站在那里犯愁，小声说：‘万

一出了事,你千万要替我说清楚啊!’林立衡频频点头,推了小陈一把:‘你快去想办法,一定要快。’小陈转身端了两杯茶,经过走廊,进入林彪的卧室。不一会见,小陈出来了,对林立衡说:‘首长正流泪呢,林立果和叶主任都跪在首长面前,他们说话声音很小,我只听首长说:“我起码是个民族主义者”……’林立衡紧张地攥着小陈的手,这时猛地放开走了。

九月十二日晚上八点半,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接到林立衡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把首长弄走,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首长。’

天一样大的事情,姜作寿那敢怠慢,立即报告了北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十点三十分,正在任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接到汪东兴的报告。

过了一会,见周恩来又接到汪东兴第二个电话,说林立衡报告: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周恩来要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开会的吴法宪、李作鹏查明情况。得到肯定回答后,周恩来果断指示:‘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

当晚十一点半,周恩来接到叶群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呀,林彪同志想动一动。’周问:‘空中动,陆上动?’叶答:‘空中动。’周问:‘你们调了飞机没有?’叶答:‘还没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周说:‘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从空军方面得知,停在山海关的那架二五六号专机要有周恩来等四个人的联合命令才能放飞,知道南逃计划暴露了,第二天早晨可能就走不了了。十一点四十分,林彪的避弹专车不顾警卫的拦阻,冲出莲峰山别墅区,以时速一百多公里的速度

呼啸而出，穿过海边大桥，直奔山海关机场。林彪一行包括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迅速登上二五六号三叉戟专机，在没有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的情况下，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一十二分命令强行起飞，向苏联伊尔库茨克方向飞去。山海关机场属海军管。李作鹏下达命令时把周、黄、吴、李四人联合下令才能放飞，歪曲为四人中一人同意放飞即放飞。二五六号强行起飞时山海关机场报告了李作鹏，李作鹏没有采取措施，把二五六号放走了。

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后，发出全国禁空令，即：任何飞机都不准来北京；没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合命令，任何飞机都不准起飞。周恩来派李德生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坐镇，监督执行禁空令。

‘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我要对驾驶员潘景寅同志讲话，请给我接上。’周恩来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吩咐。

‘接上了，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值班人员说。

‘请你告诉他们，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迎接。’

值班人员大声呼唤，重复周恩来的话，但没有得到回答。

监视雷达屏幕的人员报告：‘二五六向蒙古方向飞行。’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下令把‘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打下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怎么解释呢？毛泽东每临大事有静气，方寸不乱。

九月十四日下午。周恩来接到外交部转来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的报告：九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

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中国民航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一架坠毁。机上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118 紫气东来 毛泽东会晤尼克松 慎终虑远 周恩来扶持邓小平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防止各种突发事件。周恩来还亲自给全中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叛逃，要求各地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局势。十月三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杰、张才干、刘贤权十人组成。逮捕了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国家的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二十六届联大？毛泽东过去说：中国不怕孤立，不急于进联合国，中国自己就是个‘联合国’。这种思想影响着外交部的领导人，所以竟然提出了回电联合国

秘书长吴丹,感谢他的邀请,中国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的意见正在这时候毛泽东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周恩来汇报了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因‘九大’以后,陈毅只是中央委员,没进政治局,经毛泽东批准,追悼会降低规格,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因此之故,西哈努克亲王、宋庆龄副主席想以陈毅生前友好的身份参加也奈难同意。

一月十日午饭后,毛泽东不睡午觉,烦躁不安。这天下午要开陈毅的追悼会。他想到了反对所谓‘二月逆流’那一场斗争,为了江青,他与陈毅等元老们几乎全部闹翻了,还说过要和林彪上山打游击等过头的话。如今林彪摔死了,历史已对谁忠谁奸作出了结论,要挽回人心,今天下午是个机会。转念至此,他下令:‘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周恩来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后立即决定:通知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参加陈毅追悼会。

毛泽东这年七十八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林彪的背叛给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临时要出门,秘书张玉凤、护士长吴旭君帮助他换衣服,他下身穿一件薄毛裤,要给他套上制服裤子,他嫌罗嗦,说:‘不要换了。我在睡袍外面套件衣服就行。’结果就在睡袍外面罩了件灰色中山服。张玉凤和吴旭君觉得不行,

这像个什么样子呢！就又给他穿了件大衣，才算把睡袍盖住了。然后，张玉凤搀扶他上了那辆吉斯牌防弹轿车。因他行动突然，到了八宝山门口，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汽车直驶灵堂外面的小院。毛泽东进人大休息室，周恩来、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都到了，上前向他问候；江青、康生、张春桥也不得不来参加。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是唯一的外宾。不一会儿，张茜率四个子女来晋见毛泽东。毛泽东握住张茜的手。张茜泪如泉涌，她努力控制感情，收住泪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的意外出现，当然给死者增加了极大的哀荣，所以张茜有此一说。毛泽东也凄然泪下，让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个好同志。’张茜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不让她说下去，接过话茬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同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毛泽东又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向他通报了林彪去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的简要情况。又对着大家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二月逆流是陈老总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又说：‘邓小平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是何等机敏，他密嘱张茜和陈毅的子女，把‘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传出去。’他知道，起用邓小平的时间不会很远了。

追悼会仍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改由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向陈毅遗像行三鞠躬礼。追悼会结束，周恩来等送毛泽东上车。张茜搀扶毛泽东走到车前。毛泽东下肢开始萎缩，迈了几下竟上不去车。秘书张玉凤

上前扶一把才上了车。

回来不久,就在一月份,由于肺心病及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找来心脏科专家胡大夫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经过紧张地抢救,毛泽东又醒。这次重病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

这时候的周恩来真是中国的擎天一柱。他日益削瘦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国家。这正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前夜,一切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尼克松是一位著名的反共分子,同时又是一位具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总统。他在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上采取主动,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的。在中苏交恶,特别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在黑龙江边境珍宝岛两国军队发后武装冲突后,尼克松知道毛泽东的‘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双打方针是不能持久的,必然要向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方针转变。这年八月十四,尼克松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讲话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勃列日涅夫在珍宝岛事件后也想缓和中苏关系。他曾通过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专线电话进行一次试探,结果碰了一个人钉子。当线路接通后,小南海的话务员问:‘你是谁呀?’苏方回答:‘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南海的话务员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这样一骂,电话断了。话务员的这种‘造反派脾气’据说只受到关首长的批评。毛泽东知道后,没有责备这位话务员,也没有采取补救措施。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了美国作家斯诺，明确表明了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关于美国他是这么说的：

他（按：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呀。他时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到和苏联共产党的争论，他对斯诺说：

他（按：指苏方）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我说，你说我们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走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

毛泽东嬉笑奚落，关上了与苏联和解的大门。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经过巴基斯坦的巧妙安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中国。

七月十五日，一则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全世界人吃一惊。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

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为了进行这次访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的诗词，他都有所涉猎，并请教了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本国的埃德加·斯诺、罗斯·特星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等。

马尔罗是与毛泽东直接交谈过的一个中国通，今年七十岁了。他从三十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五年前他以法国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了新中国。马尔罗告诉尼克松：“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

“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五年前，我见到毛的时候，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五十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讲：“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我不懂毛这句话的意思。毛接着又讲，“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遍，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

“有一次我还问过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

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阁下，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带有一点巫师的味道。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在对死神说话……总统，你去中国跑一道是值得的。’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十一点二十七分，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舱门开启，尼克松总统和穿红外衣的尼克松夫人缓步下机。其他人被命令暂留机上，以突出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握手的历史性场面。美国星条旗和中国五星红旗在机场迎风飘扬，太阳冲出云层给机场铺上一片金光三百五十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整齐列队。周恩来率领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中国官员沉着冷静。当尼克松步下扶梯走完一半的时候，周恩来像个乐队指挥一样开始鼓掌，其他中国官员随着发出一阵掌声。尼克松也以鼓掌答礼。尼克松回忆说：‘我知道，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随后下机是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平格等代表团成员。

乐队奏两国国歌。尼克松总统周恩来总理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随后，周恩来陪同尼克松登上一辆防弹红旗轿车进城。尼

克松被安排在钓鱼台宾馆六号楼下榻。这是清朝隆皇帝住过的地方。奇花异木,假山怪石,小桥流水,匾额对联,集中国园林的精巧构思,尽东方帝都的皇家气魄。

午宴是丰盛的。尼克松和夫人帕特熟练地运用筷子得到了主人的赞许。帕特说,这是他们半年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后休息了片刻,中南海给周恩来打来电话:‘主席要会见尼克松总统,请基辛格博士也来。’

一辆高级红旗轿车,由钓鱼台驶过西长安街,从金碧辉煌的新华门驶入中南海。四个门卫行庄严的军礼。这座门具有最高国家机关的神圣象征,平常是没有人出入的,在中南海上班或开会的中国官员走进右街西门。汽车绕过影壁,但见苍松翠柏,宫殿巍峨,汉白玉石栏玮绕着南海。尼克松想通过认识毛泽东所生活的历史氛围认识毛泽东。汽车在中南海西岸‘游泳池’门口停下。这是外表看来很普通的一个院落。里面有个游泳池。因为身体缘故,毛泽东早不游泳了。池子子盖上木板,又加了个顶棚,成了一个大厅。这个院落是毛泽东最后十年居住的地方,不像‘丰泽园’那样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响亮名字,工作人员习惯地称为‘游泳池’。毛泽东没有迎出院中,并非有意慢待美国总统,他的腿力不从心了。细心的基辛格博士是这样描写中国统治者会见他们的这间房子的:

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节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

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色的 V 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在周恩来陪同尼克松进来时，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上前一步把手伸出来，紧紧地握着。尼克松将左手搭上去，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二人相视而笑。接着毛泽东又跟基辛格博士以及专门来担任记录的洛德握手。担任翻译的是唐闻生小姐。经过基辛格博士亲自面试，她的英语水平是无可挑剔的。在座的另一位女性是王海容，她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的孙女，这时的职务是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周恩来挑选她参予接待尼克松总统，一方面是她可以在毛周之间起一个很好的联络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有一个可靠的渠道了解中美会谈的一切细节详情，可以免除误会和猜忌。

分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毛在这里自称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这就把苏联勃列日涅夫排在后面人了。中苏论战，引经据典，义正辞严，说到底所争的就是这个‘头号’。毛在这时仍在追求允当世界革命领袖，首先是第三世界的革命领袖。

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说：‘是巴杜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汗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

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太喜欢从杜鲁门列约翰逊你们前任的几位总统。中间有八年中共和党人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继续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只能在这间房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只对日本问题中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保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行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你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毛泽东和任何人谈话都是紧紧掌握主动权的，他决不跟着别人谈话的思路走。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当译员介绍，总统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时，毛泽东露出了笑

容。在中国,引用毛的话是表示对他的尊重。

尼克松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晤。’

毛泽东说“‘只争朝夕’,我这个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微笑着引火烧身。

‘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毛又指指基辛格:‘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您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們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在美国总统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这次会见,原计划十五分钟,实际上谈了六十五分钟。毛泽东仍大病未愈,但思想敏捷,谈锋甚健。临别,毛送客到书房的门口,他脚擦着地毯慢慢挪动脚步,要是在前几年,他会送客到院子门口目送客人登上汽车的。

尼克松也学会了中国式的奉承：‘看上去主席先生气色很好。’‘那是骗人的。’毛泽东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全中国各大报都在头版上用半个版的版面，刊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大幅照片，以及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总统面带微笑伸着右手走过来的照片。八亿中国人民才从林彪叛逃的惊诧中镇定下来，一看这天的报纸，有一种天朝大国的自豪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不承认中国凡二十五年，如今它的总统来到北京，像是来朝觐一样。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在这一天老百姓这种感情特别强烈。林彪算什么，叛逃也罢，摔死也罢，无关大局；我们有毛主席，我们有周总理。这两个人在，中国人民就有主心骨。毛泽东巧妙地通过尼克松来访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威望。马尔罗的观察是敏锐的：毛周邀请尼克松访问北京，‘是它国内需要的反映。’

美国人是另一种感情，另一种价值观念。当周恩来总理回拜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和基辛格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很自然地帮助周恩来脱下呢子大衣。周恩来微笑着感谢总统的友好举动。这个镜头被随团访问的美国电视记者摄入镜头，霍尔德曼安排在通过卫星的电视转播中连续播放好几次。美国人民看了电视，十分赞赏尼克松的做法。好凡家人报在头版刊登这张美国总统为中国总理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在尼克松游览故宫、长城和杭州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关在宾馆为中美联合公报字斟句酌，斤斤计较。最难通过的是‘台湾海峡’，中美立场尖锐对立。

周恩来定下的基调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十五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与乔冠华，态度时而严峻，时而和缓，争来争去就卡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强调：‘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所以，想了多少个措词，都因涉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而为中方所坚决不能同意。最后，基辛格终于在他的助手洛德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基辛格对周恩来和乔冠华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周恩来重复、回味着这段话的每一个字，脸上露出了笑容：‘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秘的发明。’僵局就这样打开了。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了协议。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个公报被称为‘上海公报’。

二十八日早晨，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送别了尼克松。

在返回北京的‘伊尔一十八’总理专机里有位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比

分来比喻,中国对美国,二十一比二。可以报道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又有记者说:‘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功则归君,过则归己。这就是周恩来。当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中方主角是周恩来,但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任凭周有多大能耐,这件事也不能办,如果违背了‘功则归君’的原则,也许在往后的某一天,周恩来会成为‘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继承者。曾几何时,毛泽东由历史进步的推动力量变成了牵制力量。这是毛的悲剧。

回到北京,周恩来又把主要注意力转到内政上来。一九七二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工资总额突破了三百个亿,‘粮食销售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是个警号,不注意解决就会出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总要有几个助手啊!然而,副总理们、部长们,几乎都被打倒,或被半打倒,不能工作了。一九七二年月,周恩来患膀胱癌。谁能砥柱中流,撑住这个局面呢?周恩来想到了邓小平。他根据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说过的话,开始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流放’到江西的。离开中南海之前也是汪东兴谈的话。作为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林彪和江青都想把他置于死地。但毛泽东不松口，连报纸上点名都不行，所以他们就谁也不敢动邓小平。周恩来对于哪些人不能保，哪些人能保，保到什么分寸，和毛泽东的配合非常默契。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八时，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打电话，是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接的。周恩来要江西安排邓小平夫妇的住处和‘锻炼’的地方，并要他们办好了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江西报上来的方案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十九日周恩来又在电话中明确指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按照总理指示，江西省革委会让邓小平住上南昌市郊望城岗南昌步校原校长的房子，二层楼，独家独院。‘锻炼’就在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省革委会保卫部长陈昌奉（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亲自管理，严格保密。没有造反派的各种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看管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也还对邓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劳动活不重，只干半天，分配他当钳工。年轻时留法勤工俭学，邓小平干过这个活，所以很熟练。工人们称赞：‘老邓起码有四、五级二的水平。’劳动之余，还可以读读书，在院子里侍弄蔬菜，或散散步。夫人卓琳和继母夏培根仍跟邓小平生活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虽然子女们受牵连，跟着吃了不少苦，长子邓朴方摔成残废，但他的‘流放’生活，比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来，就有霄壤之别

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邓小平是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和工人们一起听的传达。厂长罗明知道他耳背，叫他坐在前面，和县工业局长坐在一起。邓小平身板挺直，两手扶在大腿上，两眼平视，聚精会神，给他斟了一杯茶也没顾上喝一口。回到‘将军楼’住所，他只对卓琳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送上去。八月十四日，毛泽东作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

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列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几次，现在再说一遍。

八月十五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就邓小平来工作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纪、汪向周恩来建议，邓小平仍任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各机关。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重登政治舞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提前举行。修改了‘九大党章，对林彪反党集团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由于江青后党的阻挠，邓小平没有进政治局。

‘十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部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王洪文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副科长，造反起家，于一九七二年九月由上海调中央工作，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会议、中央军委会议，这次在‘十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是毛泽东新立的‘接班人’。虽然周恩来名列第一副主席，但周已确诊患了癌症，是处于交班人的地位。

为了削弱周恩来作为名义上第一副主席的影响，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这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中方谈判各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的问题。周恩来接见了。美方强调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可能性。当然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对美国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七日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开会，对前段批林运动中周恩

来主张批极‘左’表示不满,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还根据王海容的汇报批评周恩来,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

根据毛泽东提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当党的主席。’周恩来被迫检讨。这对周恩来是极大的打击。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话时,一方面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一方面又批评江青,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十三日、十四和十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敢议。’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毛泽东重用邓小平是有很深的用意的。‘刘邓资产阶级司

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以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超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希望在他和周恩来都谢世以后，邓小平能够与江青、王洪文等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依靠江青、王洪文等监督治理。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目前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这支军队，尤其需要邓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邓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叶剑英当了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这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确实是把邓小平当作代替林彪的‘秘密武器’，如今用上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命令：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任命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任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任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 辛子陵作品集 ·

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任命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陈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任命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119 评儒论法 批孔子暗批周公 治理整顿 为百姓不为君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为了掩盖三年大跃进的错误，推卸饿死二千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在文革中他的乌托邦理论有了恶性的发展，由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封建社会主义，公然把落后的平均主义的经济思想同反动的专制独裁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他在国际友人面前宣布：‘我也是秦始皇。’虽然有时候还用马列作一点点缀，但他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十万八千里了。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单独谈话。他说：‘郭老（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等于连他自己说了一辈子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条也抛弃了。他又跟王洪文、张春桥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他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着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

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外交部长陈毅已亡故,代部长姬鹏飞,连中央委员都没选上,周恩来总理亲自管理外交工作。这一番份量很重的话,是针对周恩来的。

八月五日,江青来看毛泽东,谈论儒法问题。毛泽东口授七律一首,江青手记,传出中南海。诗曰:

读《封建论》——呈郭老

权君少羈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船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王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发下了江青等起草的一九七四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家大事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史上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批判。毛泽东的治国之道简直荒谬绝伦。从此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拉开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刘邦等所谓‘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螭如螭,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古人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

面。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跟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贵的屈辱地位。

迟群，这个中南海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这个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敢在大会上含沙射影批一国总理周恩来。江青坐在主席台上，他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迟群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给主席看一看。……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仔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还谈到了奉江青之命到驻浙江的第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材料的事，他说：‘我们当天到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江青致二十军防化连的信），并且把材料发给大家。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

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

谢静宜还嫌不够，又补充说：‘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

迟群说：‘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躺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这部片子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抽的，安是共产党员，与中国友好，是周恩来总理批准他来华摄制这部影片的。周恩来一番苦心，想借一个外国人的手说明一下‘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毁灭中国的文化，给毛泽东、江青粉饰一下’结果呢，照迟群信口雌黄：安东尼奥尼成了‘间谍’，周恩来成了‘汉奸’，批林批孔，联系实际，要清算周恩来！’

迟群接着说：‘教育战线上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

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昏脑。’这是怎么回事呢?死者是该校初二学生张玉勤。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下午,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在试卷背面写打油诗一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校长罗天奇十二日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也批评了张玉勤。张当日离校,十四日在水库中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江青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审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关押判刑二年,唐河县层层抓‘罗杨式的人物’共批斗了二百八十余人;并在全中国‘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教师被打成‘复辟’典型,下放、撤职甚至判刑。造成学校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不敢进行考试,学生纪律废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打骂老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八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们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喧圣旨一样:‘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江青是念的一张纸,看来她有准备,把毛泽东这段话抄来宣讲,以壮声势。

二十五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

‘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的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动，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丞相’，拉郭加入反周恩来总理的行列，郭沫若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持文唱和，友谊甚笃。今至耄耋之年，无权无势，毛泽东连这样一个人都不能容，在中国知识界失尽了人心。为了过‘批林批孔’这一关，郭沫若写了一首骂自己的诗，书呈毛泽东。诗曰：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仙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视归趋。

二月十日，江青到郭沫若家，当面逼郭沫若作检查。在这样一位史学泰斗面前，江青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什么儒法斗争，她懂个屁！郭沫若被折腾三个小时，当晚住进了医院，幸得周恩来保护，毛泽东也不为已甚；过了这一关。

毛泽东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甚至一天不如一天了。一次，他的表亲王海容去看望他，他说：‘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又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皱了一下眉头，若有所思，说道：‘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个人，他也总是要去保哪个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手持尚方宝剑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是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那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整个中国的事情翻过来，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施行人身残害，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登出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注：一九三九年夏，周恩来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骑马返回杨家岭时，江青作为毛的新夫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策马和周恩来并辔而行，她突然扬鞭疾驰，使周的坐骑受惊，周恩来坠马摔伤右肘，治好落下残疾，周习惯似的端着右臂，别其风采。）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敢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架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也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的大儒是指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恃革命暴力者昌，恃反革命暴力者亡》，公开为秦始皇的暴戾、残忍和滥杀作辩护。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为秦始皇辩护是虚，为毛泽东辩护是实。文化大革命中的惨绝人寰事件已无法掩盖，于是，用歌颂历史上惨绝人寰事件的办法为自己壮胆。

报刊上还发表了《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又说：‘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六万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经是路人皆知。

一九七四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把江青的后党比成是‘法家领导集团’。文章说：‘西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儿们，王洪文，张春桥再加上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毛泽东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民主，也背叛了资本主义民主，说变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家君王。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工会系统造反派头头）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十一月十九日江

青又向毛泽东写信：‘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个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二十日毛泽东批覆：‘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不久，江青又托王海容带口信给毛泽东，建议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这样，朱、董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递补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接管‘议会’。毛泽东对王海容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段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的理论根据。但笔者认为这段话应该反着听。这实际上是告诉继承者们，将来怎么安排江青。毛泽东嘱咐江青，不要着急出山，要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就差说出来：‘我不能封你，要到人把你推举上来。’何以见得：

第一，这话不跟周恩来说，不跟叶剑英说，也不跟邓小平说，跟自己的表孙女王海容说，就不是要除掉这个‘野心家’，是要王海容去散布，去造舆论；

第二，要除掉江青，易如反掌；即使不杀不关，也可以让她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如铁托发现妻子约婉卡干预党国大政，宣布和她离婚，贬为庶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如铁托明智。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游泳池的房子是用我的稿酬建的，我死了以后，江青可以搬来住。’这话是很有政治深意的。

第三，法家、吕后、武则天，舆论造得那么大，毛泽东并没有批评制止，是默许的。是暗中支持的。

毛的做法，给江青留下了当主席的希望，也给她留下了造监狱的祸根。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和二十七日，毛泽东同他们作了

四次谈话。应周恩来要求,其中有一次是毛周单独谈话。这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重要摊牌。周谈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毛表示已经知道了。周恩来不掌握大量的证据,是不敢碰江青的,特别是在毛泽东表露要让江青做党的主席的意向的时候。这次摊牌,保证了四届人大国家领导权没有落入‘四人帮’手中。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是真诚的。他希望王洪文能从‘四人帮’中分化出来。他想把王洪文培养成为年轻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左’派领袖,在党内起制衡作用。他高度评价邓小平,说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他(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张春桥是叛徒还作此任命,说明他要捂盖子。如果张春桥、江青再一倒,文化大革命中所依靠的几乎都是坏蛋,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就更加令人生疑了。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同时批准李德生关于免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李德生是因为得罪了江青被免职的。

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样，在党、政、军各界满朝文武之中把邓摆在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一九七五年二月一日；周恩来在医院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除十二位副总理外，还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明确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然后，扩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并宣布：‘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二月二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副总理的分工，其中说到：‘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也提出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〇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使出以后，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毛泽东在观察他，周恩来也在观察他；‘四人帮’和造反派们在观察他，老干部和党内的正统派也在观察他。以上这段话是邓小平的施政纲领。请读者注意，邓小平的大局既不是‘反修防修’，也不是‘批林批孔’；既不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不是‘坚持法家路线’，他的大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他所根据的是周恩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而不是‘最高指示’，自从刘少奇被否定、被打倒以后，周恩来就是坚持‘八大’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如今周恩来重病不起了，邓小平接过了接力棒，成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在会上一讲，在座的领导干部听了耳顺心服，觉得国家有救了，不抓生产成天研究儒家法家，全国人民非喝西北风不可！经过十年折腾，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周恩来、邓小平所坚持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所坚持所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误国误民，害国害民，所谓‘反修防修’，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为后党篡夺政权制造舆论。这是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思想基础。

当时的国民经济，百业待理，百废待兴。邓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就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这个决定即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周恩来、邓小

平选任万里当了铁道部长。万里所面对的铁路形势是严峻的。造反派们阻拦火车，中断运输，制造事故，哄抢物资，挑起武斗，停工停产，猖狂极了。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七百五十多起，比文革前增加了八点五倍。全国二十个路局不能完成运输计划。非遇盘根错节无以畏利器。万里是不是‘利器’，这次整顿铁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率领工作组先到了徐州。徐州造反派不是好惹的，用停工停产迎接他。刷出大标语来：‘万里不倒，火车不跑！’有邓小平撑腰，万里豁出去了。在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仍不奏效时，他下令抓了挑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的造反派头头，召开十万人大会公审。结果，万里没有倒，徐州这个联结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被打通了，火车也跑起来了。然后到太原、郑州、长沙，反覆宣传中央九号文件，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对坏头头坚决打击，逮捕法办。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全国铁路形势改观。到四月份，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二十个路局除南昌路局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运输计划，列车正点率大大提高。

邓小平上台，第一板斧劈到铁路上，铁路通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这个老邓，听说他有本事，以前没看出来，这下看出来了。整顿这个乱局，非他莫属。’这是笔者当时听到的街谈巷议。

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了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十一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座谈会。邓小平在李先念等陪同下一进入会场，与会者都站起来，在前排的负责人都在准备一一握手。只见邓小平满脸严肃地说：‘不拉手了，等钢铁生产搞上去再拉手。’大家一看这架势，这回是真要抓生产了。万里在会上介绍了铁路整顿

的经验。邓小平两次发表讲话。在二十九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当然是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科学的说法应该是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主张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执行毛的错误主张中的正确部分。在当时四人帮正在大批‘唯生产力论’，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是不可能的。‘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心目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才是纲，其余都是目；后来毛泽东号召批邓，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恰恰说明邓和毛是两条路线，互不能容，调和是不行的，掩盖也是不行的。

经过邓小平大刀阔斧几个月的整顿，一九七五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十月十七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抓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所谓‘肿’是月臃肿、庞大，要减人；‘散’是不统一，派性，有山头主义；‘骄’是骄傲；‘奢’是奢侈；‘惰’是懒惰。军队领导班子要‘解

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邓小平抓工作像个高明的针灸大夫，每一针都点在了穴位上。会后把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把一些追随‘四人帮’闹派性的人调开。叶剑英还分头与各大单位司令员、政委谈话，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叶帅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他还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毛去世后，军队不分裂，同仇敌忾对付‘四人帮’，这次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从一九七五年七月中旬起，国家计委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在八月八日国务院会议讨论这个文件时，邓小平指出，要在《工业七十条》的基础上制定这个文件，《工业七十条》是大跃进失败后。一九六一年九月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主持制定的，是‘八大’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恢复。如今邓要求在《工业七十条》的基础上提出加快工业发展的措施，是要自觉地与‘八大’路线相衔接。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提出：‘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要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有，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正当邓小平带领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包括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整顿文革乱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发表谈话评论《水浒》，说宋江‘擗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姚文元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将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在

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一场评《水游》的飓风又吹遍神州大地。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文化部长)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游》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游》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经济刚有点起色,毛泽东又出来捣乱,中国老百姓把鼻子都气歪了。不敢骂毛泽东,大骂‘四人帮’。

120 天怒人怨 四人帮难承大统 机关算尽 毛泽东撒手尘寰

毛泽东晚年患有多种疾病。下肢萎缩,双脚浮肿,行走困难;因过量吸烟患有肺气肿,心脏病日益加重;眼睛患白内障,近乎失明。但他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党国大事都得他最后拍板定案。他谁也不相信。从一九七五年九月起,让侄子毛远新(毛泽民的儿子)当他的联络员,传达他的口论,给他读政治局、国务院、军委各机关送上来的报告。江青没有儿子,从小笼络毛远新。文革兴起后,毛远新成民后党的特殊成员。他来毛泽东身边之前是辽宁省委书记。

一九七五年九月底至十一月初,毛远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十一月一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一股风,主要地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情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毛远新又说:‘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

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顶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覆。’

毛远新这一番话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在自己百年以后，邓小平会不会出来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邓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为了考验邓小平，摸清邓对文革到底抱什么态度，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人开个会，把上述一些看法说出来，作为一个探测气球。为什么把汪、陈拉上？毛泽东认为他们二位不同于‘四人帮’，‘四人帮’对邓一肚子成见，汪、陈可以和毛远新一起客观地考察邓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陈锡联原是邓的部下，文革中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和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这位准太子挂上了钩，受到特别的垂青。第二天，十一月二日，毛远新照办了。邓小平果然提出异议，他对自己不批十七年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解释是：‘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对于自己二次上台以后所做的工作，他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还说：‘昨天（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主席说

对。’

整个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把各条战线都说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说可能否定一些不该否定的成绩，但最重要的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二千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这笔历史大账转到刘少奇头上，毛泽东兴师动众，绕了那么大的弯子，花样翻新的大批判搞了十年，就是要做这个文章。这个邓小平是真不开窍呢？还是硬要跟我对着来呢？毛泽东作如是想。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指示由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邓小平。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仍采取‘拉’的政策，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只要答应这一条，邓小平就有了和江青后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毛泽东还要做工作，把他们捏在一起，江青监国，邓小平执政。

这对邓小平确是一次重大考验。只要他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高官厚禄，安富尊荣，终此一生。想想江西流放的日子，用汽油去洗那些锈迹斑斑的零件，照顾年迈的继母，给高位截瘫的儿子翻身擦澡，经纶满腹，报国无门，重返政坛，不易啊！一般的政治家都会屈从的。但邓小平属于大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不否定，别人会否定的，子孙后代会否定的；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他不清算，别人会清算的，子孙后代会清算的。想一人掩天下人的耳目是不可能的，违背人民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他下了决心，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毛泽东的条件。话说得还是婉转的，他在会上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汉，何论魏晋？’意思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打倒的人，你那些决策，我一概没参与，一概不

知道,我不能稀里糊涂出来给文革唱这个赞歌。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乃决心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报上登的邓小平向毛泽东递转了一封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告迟群和小谢的信,引起毛泽东的不满,那是一个由头,转封信算什么问题呢?! 第三次打倒邓小平的真正原因,是毛邓这次摊牌。

十一月二十六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所谓‘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百三十多名驻京党政军机关的负责人。王洪文宣读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共三条,主要是第二条:

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病逝。康生死前有一个大动作,他向毛泽东揭发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问题。

章含之(章士剑的女儿,在外语学院工作,与王海容、唐闻生是同事)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概述了此事的经过。

去年(按一九七五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

接打电话与他们联系的时间。小唐说他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他们才去的。

接着，他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毛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生要王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

康生老奸巨滑，两面投机。他于一九七五年夏天看邓小平主政风头正劲，估计最后收拾文革局面的可能是邓小平，乃向邓小平揭了江青、张春桥的底，以求将来写历史时把他列入反后党的行列。邓小平要避嫌，说江、张的事他不便向毛进言，要康生另觅上达渠道。二人商量结果，想起了经常能接近毛泽东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康生要做和江青、张春桥作斗争的正人君子，借重于邓小平，请他带话给王、唐，说‘康老想见她们’。康生揭发的事情是真的。王观澜是介绍江青进入延安的那位‘徐姐’的丈夫；吴仲超是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处理过张春桥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决心解决江青的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但他接到王海容、唐闻生的报告决心继续捂盖子。他借重于叛徒江青把不是叛徒的刘少奇打成叛徒，而把真正的叛徒保护下来，作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受蒙蔽，不是失察，是不可原谅的。应该打破‘奸臣祸国，皇上英明’的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九七五年冬，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十月二十四日他再次进行手术。进手术室之前，他躺在手推车上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两位老战友的心是相通的。邓小平无愧于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点五十七分，周恩来逝世。老干部谷牧在一九九〇年发表一篇文章中对周恩来的历史作用有公正的评价：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屡建启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人民共和国的建筑大师，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的干扰，他真的退居二线，垂拱而治，没有三年大跃进，没有十年文化大革命，让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放开手脚执行‘八大’路线，中国早就腾飞了。

要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周恩来去世在中国党政军各级干部及亿万百姓心灵中所引起的巨大震撼，笔者的答卷是：恩来去世，神州陆沉。当时笔者正在武汉，街头所见，那真是：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只有‘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先是在追悼会的规模上，在宣传报道上，压低规格。一月九日，新华社向姚文元请示：‘怎样组织亿万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姚文元的回答是：‘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映仍应再请示。’在‘四人帮’的禁令下，从一月九日到十五日追悼大会以前的六天中，总共只发了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人民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两条消息。十一日周恩来遗体送侏宝山火化，记者真实地记录了

那个‘灵车队,万众心相随’的感人场面。记者的新闻稿这样写道:

下午,周恩来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火化了,灰暗的天空压着沉沉的云层,整个北京城是那样肃穆宁静,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人们伫立在几十里大街的两旁,冒着严寒等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傍晚。悲壮的哀乐送来了总理的灵车。人们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着,从心底里呼唤着:‘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您啊!’总理灵车在泪雨纷飞的行列中缓缓行驶。灵车啊,你停一停,让我们再看一眼周总理亲切慈祥的面容!司机啊,你刹住车,让我们再向总理诉一诉衷肠!夜深了,风紧了,总理的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归来的更车。但是,只见灵车回,不见总理归。止不住的滚滚热泪再一次洒满数十里的长街……这是古今中外从没有见到过的送灵场景啊!

这样一篇报道,被姚文元‘枪毙’了,不许见报。一月十三日,姚文元一天三次向新华社下达指示,说:‘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人民对‘四人帮’的仇恨在积累着。

周恩来去世后,一月底,经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宣布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政治局通过后,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全国县团以上机关。二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家在‘批邓’问题上转弯子,‘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从此,批邓公开化。

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个省、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

他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他是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要共同对敌，就是对着邓小平。’她又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当女皇大造舆论，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毛泽东知道后，因说话困难，用笔写下：‘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一省谈话。’这个批评是很轻微的，仅说不该召集会，对‘诽谤’吕后、武则天，等于‘诽谤’江清，‘诽谤’江青等于‘诽谤’主席的说法不表示异议，实际上是默认了。

上海《文汇报》紧跟‘四人帮’。三月五日在刊载新华社一篇新闻稿时，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在三月二十五日的一篇新闻稿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一看，一箭双雕，要把死去的周恩来和活着的邓小平都打成走资派。人民愤怒了，《文汇报》数日内接到抗议电话一千多次，抗议质问信件、电报四百二十一件。

在追悼会前后，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发生群众自发地抬着周总理巨幅画像的示威游行。

在北京由于不许各单位设灵堂祭奠，人民群众发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最好的祭奠场所。三月十九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小学生在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随着铺天盖地，越聚越多，成了花圈山。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诗文悼词，贴在纪念碑上。四月二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们制作了第一个搬不动，撕不坏的铁花圈，用起重机送到天安门广

场。中国科学院一〇九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立起四块巨大诗牌,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直指《文汇报》的后台——‘四人帮’。

四月四日是清明节。愚蠢的市政府当局宣布要移风易俗,清明是鬼节,不许纪念,等于是火上加油。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二百万人次。上午七点,青云仪器厂职工,分四路纵队共一千多人抬着三十四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曙光电机厂三千多名工人,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北大、清华、人大等学生队伍开过来了,中国科学院的队伍开过来了,国家机关干部的队伍开过来了,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也送来了花圈。朋友,如果您对‘历史潮流’没有具体的感性的认识,请看看这截不断、堵不住的人流吧!这就是历史潮流的活生生的体现!据公安局统计,那天在纪念碑前送花圈二千零七十三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诗词、悼词、小字报不计其数,有四十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上午十一时,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丧歌颂周总理、揭露‘四人帮’的演说:北京铁路分局工人王海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示血书,誓死保卫周总理的英名不受玷污。还有不知名的作曲家为一首诗词谱曲,在天安门广场教唱:‘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还有暗含寓意的诗文,别具一格。其中有一首《向总理请示》: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 文革悲剧 ·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有题名《赠某女士》的新诗，直指江青：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也有突破颂周兼颂毛的框框，直批毛泽东的诗词：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斗争是全国性的。杭州、南京、武汉、太原、西安、郑州、洛阳、天津、合肥、成都、广州、兰州、银川、昆明、贵阳、抚顺、上海以及青海、西藏都出现了群众性的自发斗争。三月二十八日深夜，安徽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芜湖一中的一位教师和芜湖缝纫机厂的一位工人，用‘党的儿女’落款，在安徽师大附中墙壁上刷出三条大标语：‘周总理革命精神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日思总理，热血更沸腾！’‘小平小平，为党为民，何罪之有？遭此不幸！’还有三条没贴完，就被当作罪证把他们抓起来了。后三条更厉害：‘全党全军

团结起来. 保住邓小平同志, 挽救我们伟大的党, 挽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春桥春桥, 放屁造谣, 诬陷总理, 罪责难逃!’ ‘江青! 江青! 毒蛇妖精, 残害忠良, 祸国殃民!’

四月四日晚, 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 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问题。认定: ‘性质是清楚的, 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决定 ‘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 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 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 抓反革命。’ 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得到毛的批准。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二十五分, 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开始反覆播放北京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 宣布 ‘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 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动员群众离开, ‘不要上当’。晚九点三十五分, 卫戍部队五个管、公安干警三千人、民兵一万, 对尚未撤离的群众大打出手, 当场逮捕三十八人。‘四·五’前后共逮捕三百八十八人, 收走花圈, 刷掉了大小字报。

四月七日上午八时零五分至九时十五分, 毛泽东躺在病榻上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根据毛远新的手记, 毛泽东指示: ‘开除邓的一切职务, 保留党籍, 以观后效。’ ‘华国锋任总理。’ 后又补充说: ‘华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的这些 ‘最高指示’, 需要政治局在形式上通过一下才算合乎组织原则, 他特别叮嘱, 不叫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参加会议, 以保证决议一致通过。由此可见, 毛虽沉疴在身, 但头脑清醒, 大事决不含糊。有人说对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处理, 是 ‘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 让重病的毛 ‘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是为尊者讳过。四月七日晚上, 中央政治局开会, ‘一致’ 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决议》在四月八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人心硬是不服。十二日报社收到署名‘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群众来信，寄回了八日的《人民日报》，在决议和社论旁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并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北京部队某部副营长王勤，听完广播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营房附近十字路口一棵白杨上，说：‘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

当局为了壮胆，下令北京和各省省会，组织大规模群众游行，表态拥护两个决议。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他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说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话是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年，十七年建国他没插手、什么事也没管，什么事也没干。把十七年的一切错误、罪责，包括大跃进饿死两千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全部推给刘少奇。这个大的历史框架，文革之初他就想好了，一以贯之，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希望后人这样写他的历史。

他死了以后，谁接他的班当党的主席？这个最重大、最急迫的问题，他没讲，不是疏忽，是有意不讲。至于四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给华国锋写的条子：‘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怎么也得出这是立华国锋为党的主席的‘遗诏’的结论来；甚至也不能说暗示了这个意思。据说张春桥和别人手里也有毛写的纸条。

毛泽东当然知道定名份的重要。秦始皇的相父吕不韦说：‘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来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吕氏春秋》·《慎势篇》）

对于法家的‘君人南面之术’烂熟于胸的毛泽东当然知道他留下的第一把金交椅可能引起争夺，甚至预料要‘血雨腥风’，但他终于没讲出立谁。在毛看来，华国锋‘厚重少文’。根底浅；没有自己的班底，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叫华国锋当总理，当第一副主席，是给他一个说话的身份，在他自知当主席不能服众的情况下，必会向‘四人帮’屈服，由他代表中间势力拥立江青做党的主席，由江青监国，而由华国锋执政。利害使然他们必会走到一起去。这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交班部署。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失算了。华国锋有华国锋的想法，江青有江青的想法，使中国政局的发展出现了华叶合作，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结局。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朱德元帅辞世。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天怒人怨的一九七六年。

八月二十八日，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来‘游泳池’看望父亲。毛泽东紧紧地攥着女儿的手，泪水盈盈，闭目想了想，准确地说出了娇娇（李敏乳名）的出生年月日。李敏受母亲之托，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您的威信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毛泽东沉思良久，说：‘降低了。’李敏说：‘妈妈也是这样看。’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点十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历史巨人毛泽东逝世。

丧仪是超级隆重的。十一日至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隆重的吊唁，三十万群众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广大人民群众行礼如仪，感情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对毛迷信很深，他们接受了‘奸臣祸国，领袖英明’的公式，许多人拭泪的场面是真诚的。就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来说，对毛泽东敬畏多于爱戴，但敬畏不是为了祈福，而是为了免祸。文革初期最崇拜毛泽东的那些青年学生，那些红卫兵小将们，南抄北打，东砸西杀，为毛泽东打倒了一大批政敌——各级‘走资派’，当年许诺他们当革命接班人，后来才知道这个革命接班人的当法，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而是与广大城市青年一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心中充满了被利用、被愚弄、被欺骗的愤慨，‘四·五’运动是他们的

觉醒的证明。天安门追悼人一结束，在返回的路上，大多数人有一种轻松之感，好像参加完了‘十一’游行一样。那感情同周恩来去世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民心的向背由此可见。追随毛泽东一辈子的中高级干部开始觉醒。一位名叫董铁城的‘三八式’老干部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也想不通，亲口对笔者说：‘党内同志希望毛主席早点走，他不死，国家没有希望。‘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这位老干部代表了中共党内相当广大的一个层面。

追悼会一结束，尖锐的争权斗争就开始了。

‘四人帮’是一个极其狭隘的宗派集团，江青的小肚鸡肠注定了他们必然要失败。在‘四人帮’和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正统派之间，有一股游离的中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华国锋和汪东兴。华、汪作为中间势力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华有合法地位，汪统带御林军，他们二人‘袒刘’则刘胜，‘袒吕’则吕胜，至少第一个回合的结局是如此。

‘先王’归天以后，汪东兴必然要投新主。新主是谁？毛泽东没有明确。汪东兴正在观望的时候，‘四人帮’第一个动作是夺他的中央办公庭主任的权。据王洪文秘书米士奇说：‘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按：王洪文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庭的名义打。十

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

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是这样记录的: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感到蹊跷。张和华国锋谊属同僚,共事多年,在思想感情上当然是亲华国锋,不愿‘四人帮’上台。于是他给华国锋打电话问为何发生如此变故?华国锋问汪东兴是怎么回事,汪东兴说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磋商后,叫汪东兴的中办系统,重新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从此,汪东兴坚决倒向了华国锋。

‘四人帮’当然不会拥立华国锋为主席,但华已经是总理,稍有政治经验的人也会承认华的地位,以换取华的支持。‘四人帮’的权力分配方案是:江青做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委员长,没华国锋的一席之地。公开较量是在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的问题上。前面谈到,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字条之一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在悼词中没引用这句话。姚文元抢在悼词发表的前两天、即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公开宣传有个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致的悼词一见报,没有这个话,好像华国锋隐瞒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而‘四人帮’手里是有‘密旨’似的。华国锋跟他们摊牌,他们又拿不出‘密旨’来,华国锋说要是给我的那一条,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你们错了三个,时

间是在四个月前,也不是‘临终嘱咐’。‘四人帮’拿鸡毛当令箭,叫他们更正也不更正,舆论愈造愈大,明显地是要陷害会国锋,打倒华国锋。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华国锋到哪里找支持的力量抗衡‘四人帮’?只有向叶剑英靠拢,向老干部们靠拢。

叶剑英元帅成了党、军队和整个国家的重心。二月二日毛泽东批准的中央通知是说‘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他随时可以宣布‘病愈’站到前台来。

邓小平于七月的一天,秘密来到小翔凤胡同叶剑英寓所。对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建议叶剑英和李先念利用尚在台上这样一种地位,找老干部谈话,在中共上层统一思想。邓小平说:‘如果让他们把我们杀光,国家落入“四人帮”之手,中国历史将倒退一百年。’

朱德去世后,康克清来到了西山帅府。因为王洪文此时也住西山。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与康克清谈话,以防有人窃听和录音。

‘老总临走有什么交代?’叶剑英问。

康克清说:‘老总说,你去问问社会上所有的人谁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人闹得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他还说,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县以上的干部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一向深居简出的陈云也来到了西山。一见面就问:‘这个局势怎么办?’

叶剑英说:‘时间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

陈云说：‘是啊，主席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

叶剑英说：‘刚才邓大姐来，他也说，力争合法，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个人首先需要站出来。’

叶剑英看着陈云：‘这个人的工作我正在做。估计到时候，他会站出来的。’

陈云会意：‘剑英，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是半合法，究竟怎样办，大主意靠你来拿。我相信你会解决好的。’

叶剑英还分别找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耿飏、罗青长、李德生、杨成武、梁必业、刘志坚、熊向晖、王诤、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粟裕、宋时轮等高级将领谈了话，并密嘱他们找可靠的部下打招呼。

在华国锋感到‘四人帮’咄咄逼人、一步紧似一步的时候，叶剑英来到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宅第。听说老师来访，华国锋恭候在门口。进到客厅，落坐让茶之后，二人一拍即合。

叶剑英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你可以找一些老同志谈谈；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很高兴地说：‘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叶剑英又来到中南海找汪东兴谈话。

汪东光很爽快地表示：‘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东兴，这可是一着很险的棋，你要认真考虑一下。’叶剑英叮嘱。

‘叶副主席，这件事，我考虑过，关系非常重大，要从长计议，范围不要大，要绝对保密。’

‘是的，要做得周密，万无一失。’

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来到李先念寓所。‘先念同志，我下决心了，同“四人帮”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我们不解决他们，他们就要解决我们。请你找一趟剑英，请叶帅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说罢很快离去。

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处，转达了华国锋的决心和嘱托。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来到汪东兴的住处南船坞，这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宫廷小院，只有一石桥与陆地相连。三人缜密地研究了形势和行动方案。

九月二十九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吴德、陈永贵、陈锡联，候补安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互壮声势，提出‘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

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坚决反对，多数人附议，也有不表态的’但没有支持的，王、张动议被否决。

江青又提出毛远新是留京还是回辽宁的问题。毛泽东去世后，毛远新作为‘联络员’已无事可做，给华国锋写了封信，请定

去留。

华国锋当场读了毛远新的信，毫不含糊地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

江青说：‘毛远新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也不示弱：‘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

江青说此话时，张春桥、王洪文都在场，所以也不便出来帮她说话。

江青大哭大闹起来，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偏不走，我要留下。’又提出要留下毛远新整理毛主席的文件，闹腾了半夜。

张春桥眼珠一转，从另一个角度支持江青：‘毛远新不能走，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华国锋拿出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罢起身，宣布散会。这是‘四人帮’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十月四日黄昏，叶剑英的红旗轿车驶进东交民巷新八号，这是华国锋的新居。

‘听说他们正在调动第二武装（王洪文控制的民兵队伍），我们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否则会坐失时机，陷于被动。’叶剑英深沉地说。

‘叶帅，你看哪一天动手好？请你决定。’华国锋说。

‘我想至迟后天动手，你看怎样？’‘只是不知道东兴那里准

备得怎么样,能不能来得及?’‘我马上到东兴那里去。’叶剑英说罢告辞。

叶剑英又找到汪东兴,确定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时采取行动。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因涉及毛选五卷的改动,扩大姚文元参加。会议两个议题: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

这个行动计划圆满实现了。六日晚华国锋和叶剑英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怀仁堂。正厅的桌椅撤掉了。大厅一分为二,用屏风隔开。屏风后面埋伏着御林军。前厅迎着门摆了两个高背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一左一右坐在那里。如果只是华国锋,那力量就显得单薄,有叶帅在场,华国锋底气就足了;但是,如果没有华国锋,只有叶剑英,就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合法名义,成了军事政变。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功不可没。

汪东兴在八三四一部队挑选了足够的兵力,经过严密的组织动员,现已进入临战状态。行动组组长纪和富和他的助手们正等着‘拿人’。

正在这时,张春桥先来了。贴身警卫被留在外面了。他一进入怀仁堂就觉得不对劲,正要抗辩,只听华国锋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反党夺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他没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反抗,就被带走了。最初关在官园的地下室里。

王洪文也这样被捕了。姚文元低一个规格,是由警卫局副局长宣读的隔离审查决定。

与此同时,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带着人在中南海走廊二〇一号抓了江青。

中央警卫团营长李连庆带人在颐年堂后院抓了毛远新。

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和谢静宜。

耿飚带人接管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新华社。

晚上十点，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报告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会议在叶剑英的动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对不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由汪东兴——打电话征求意见，他们都表示赞成，遂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一致的决议。

‘四人帮’的被捕，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使中国长期动荡不安的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的结束。

在审判江青等人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供的资料，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七十四万四千五百五十四人，其中有三万四千七百六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受株连者多达一亿人。受迫害的高级干部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二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九十六名，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人，国务院副总理十二人，中央军委副主席五人，中央监察委员三十四人，全国人大常委六十人，全国政协常委七十四人，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十一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五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建国三十年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两次被毛泽

东打倒的邓小平能够不感情用事地处理毛泽东的身后问题是难能可贵的。他于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

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结束语 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一九九二年春，香港《镜报》报道，北京市某宣传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采取问卷笔答方法，让被调查者写出自己最尊敬的十位领导人，按获选率高低排出的前十位是：

- (1) 周恩来，获选率百分之百；
- (2) 邓小平，获选率百分之九十七；
- (3) 邓颖超，获选率百分之九十；
- (4) 刘少奇，获选率百分之八十八；
- (5) 朱 德，获选率百分之八十四；
- (6) 万 里，获选率百分之八十三；
- (7) 胡耀邦，获选率百分之八十；
- (8) 杨尚昆，获选率百分之七十八；
- (9) 江泽民，获选率百分之七十六；
- (10) 彭 真，获选率百分之七十二。

答卷中提到毛泽东的不到百分之二。看到这里，笔者心中有些茫然，甚至觉得难以置信。怎么？文革中地动山摇地被亿万人民三呼‘万岁’的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竟跌落得这么惨么？然而这是事实。细思之，也在情理之中。姜太公有言：‘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铸成‘害天下’之大错，天下人岂能拥戴！回想文革十年，兴师动众，开动全国舆论工具，辅以铺天盖地的

大字报,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结果呢,历史才过去了十五年,民心的变化如此之大,文革中被打倒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获选率百分之九十七,刘少奇获选率百分之八十八,大批判的幕后主持者毛泽东获选率不到百分之二。正是:一时是非在于力,千古是非在于理。刘少奇临终前说:‘好在历史是由大民写的。’信哉斯言。

这次民意测验有一点值得注意。人民群众是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了区别的,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威信的骤降动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选出来的前十名最受尊敬的领导人,还都是共产党人。

中共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极‘左’路线的纠正,平稳转轨,没有震荡,取得了最佳的社会效果。这要归功于邓小平。他领导中共纠正了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错误,又肯定了毛泽东创建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同。毛泽东作为一个使受尽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挺起腰来的历史人物,将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纪念。

由于十年文革中有组织地、大规模地、长期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内形成一种定势,不论谁主政,都得以毛的名义?都得打毛的旗帜,才能领导这个国家。这种局面是毛泽东生前远虑深谋、工心设计造成的。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一封讲私房话的私信中说:‘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就是要在身后的中共和人民中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大家争着‘高举’争着当‘左派’,使纠‘左’成为不可能。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是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条

件下进行的。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南辕北辙的转变，硬被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争得正统地位，减少纠‘左’中的阻力。这种情况虽然表现了高趣的斗争艺术，同时也带来了纠‘左’的不彻底性。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本来应该是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纠正毛的错误，却给干部和群众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印象，不敢不跟，又不敢紧跟，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前，改革开放走走停停，步履艰难；在东欧和苏联剧变的太背景下，出现了毛预期的‘左派’拉毛泽东的大旗，说文化大革命‘有正确的方面’，改革开放是‘复辟资本主义’，气势汹汹地点名要揪‘走资派’的严重情况，盖源于纠‘左’的不彻底性。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对改革开放的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作了总结。在给毛泽东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后，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并提出要‘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对文革后造成的党内定势的一个突破，是对邓小平路线富于信心的表现。现在是公开亮明邓小平旗帜的时候了。只有让邓的理论、路线、政策深入人心，才能造成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大势。

公开举起邓小平旗帜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一九九一年香港《镜报》披露一个很有价值的调查材料。他们在大陆六省二市三部召开近五百次座谈会，调查询问了四千三百余人，其结果如下：

(1) 离退休干部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百分之七十七, 部分支持但有保留的百分之十五, 不赞成或反对的百分之八(反对者中有四分之三是文革中的受益者);

(2) 现职高级干部支持改革开放的百分之九十七;

(3) 党外人士支持改革开放的百分之九十八;

(4) 中高级知识分子支持改革开放的百分之九十六, 认为毛泽东过大功于的百分之六十五;

(5) 青年知识分子支持改革开放的百分之九十二;

(6) 农民和农村干部支持改革开放的百分之九十八, 担心恢复毛泽东公社政策的百分之七十五。

领导者不要超前, 提出脱离群众的理论、口号; 但也不要落后, 在群众拥护一种理论、口号时, 不敢让它合法化。中共十四大敢于提出‘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而不提‘坚持用毛泽东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是中共彻底从文化大革命阴影的笼罩下走出来的标志。如果加以解释, 把邓小平这一套理论纳入毛泽东思想体系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的正确思想, 但剔除了毛本人的错误思想。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毛泽东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奇事趣闻。

要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坚持下去, 特别在哪小平身后能够坚持下去, 除理论宣传的深入人心之外, 还必须有组织保证, 即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否则, 出一个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 高举毛的旗帜, 翻出文化大革命的旧‘皇历’, 说改革开放是‘复辟资本主义’, 从上到下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一阵狂风，就能把现在实行的一套吹掉。这不是危言耸听。是历史发展的深层一次潜伏着的政治危机。当然，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违背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事情终究是站不住的，历史还得翻转回来，但那样一折腾损失就大了。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过一篇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其要点有：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倒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我们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这篇讲话的要点,应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纲领。邓小平讲话之后,有关机关在政治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和准备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政治改革进展不快,具体成果也还不多。在政治改革上拿大主意,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众心信服的权威.二是要有超脱于各个权力机关的客观立场。邓小平具备这两个条件。希望邓公在他的晚年,协助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办完这件造福后代的大事,给中国留下一套代表和保护人民利益的政治法律制度。将来人事有更替,制度稳定不变。贤明人物上台,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他能充分地为人民做好事;平庸人物上台,只要萧规曹随,国家仍能在轨道上正常发展;万一选错了人,有一套政治法律程序和制度制约他,也可以避免大的失误。此之谓法治。只有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走下去,到本世纪末完成‘八五’计划,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十二亿人民过上小康水平的的生活;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毫不逊色的同资本主义制度展开和平竞赛,在生产发展、人民富

裕方面不亚于资本主义,在社会公正、政治清明方面优于资本主义。到那时候,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算最终站住了脚。惧怕和平演变的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位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思想家作过这样的预言:‘在历史上的下一个荒谬想法是否资本主义将要走向灭亡,被改邪归正的社会主义所拯救,这听起来不是不可想象的。’(见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西德《时代》周报第三十九期马里昂·格雷芬·登霍夫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